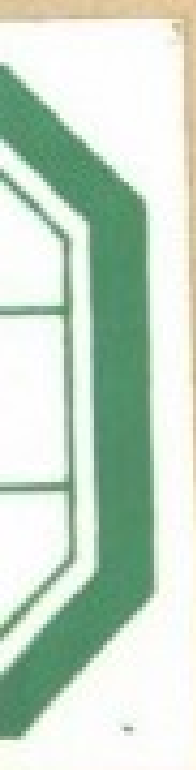




枫叶丛书

長夜漫漫

重 庆 出 版 社



长 夜 漫 漫

〔加拿大〕休·麦克伦南著

蓝 仁 哲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新
知
船
PDG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钟晓旭

[加拿大]休·麦克伦南著 蓝仁哲译

长 夜 漫 漫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涪陵群众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字数287千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700

•
ISBN 7-5366-0053-4

I·9

书号：10114·333 定价：2.20元

第一部分

有些故事，读者需要有人循循领进，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寒冷的二月初，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傍晚我离开大学课堂，沿着游廊朝楼梯口走去。五点钟，这是那年冬天我最喜欢的时刻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喜爱晴朗冬天的蒙特利尔的夜晚，就要映着盖埃街角的晚星。沿舍布鲁克大街步行回家，然后在炉火前喝杯酒，接着用晚餐；餐后同妻子静静地呆在一起，再做点事儿，末了舒舒服服地睡一宵。这一晚，我会感到精神爽快。

我想得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乔治·斯图尔特，出身于蒙特利尔的一个称得上古老的家族；但是家境贫困，即使现在，我认为自己既是蒙特利尔的子弟，更是萧条时期的产物，因为同许多朋友一样，我身上留下了它带给的伤痕。在萧条时期，这座莫测高深的迷人城市是个很糟糕的地方。

为了谋生，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但只有搞广播一项给

我挣了点名声。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我就是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并且同时是几家杂志的自由撰稿人。要在像美国那样的大国里，有了我在加拿大的地位和名声。一定是很阔气的。但加拿大的人口稀少，干我这种工作的薪金也就微薄得多。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知道我名字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比我富有。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经济上有保障，但也还过得去，起码不欠别人的债。

我从来没有安全感。除了愚昧无知的人外，在我这样年纪的人谁又感到安全呢？不少人认为我获得了成功，但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比那位希腊人更是幸运^①，他明知推上山顶石头又会滚下来，但每天照推样石上山。有的人认为我很冷静，但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是事实。我时常听人说我是位“成熟”的评论员，但我自己似乎从未有过成熟感。年青一代的人更显成熟，因为他们对三十年代一无所知。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无知使自己产生成熟的感觉，这是我喜欢他们胜过自己一代人的原因。几时出现过像我们那样的一群人？几时有过那么众多的人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几时有过任何一代，那么执着而又徒劳地去追求超乎自身能力的理想？

那个冬天我真的认为，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开始感到无忧无虑。我想我已经认识了自己，并与乖戾的命运达成了妥协；由于妻子的缘故我一向是听天由命的。我甚至开始遐想，从此会变得自信。我很喜欢在大学里谋得的半个教席，因为它使我有机会接近青年人。

^①指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生前是一位暴君，死后打入地狱，被罚推巨石上山，但每日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于是次日又从山脚下再推，如此劳苦不已。

战后的这些学生，在我眼里仿佛是世上陌生的一代。比起我们自己来，他们的思想更为开放自由，他们的情感更为坦荡无拘。同时，除非这个世界再一次乱套，他们会更为幸运。他们之中没有谁记得大萧条时期，没有谁知道希特勒称霸一世时的情景，也没有谁去为会成多余的人而伤脑筋。他们个个都期望找到工作，趁年轻就结婚建立家庭。这会儿我沿着游廊缓缓走着，听见他们在一天功课之后有说有笑，我也感到满心欢喜。一个学生走来问我一个课内的问题，我回答之后站在窗边，朝外眺望。

一个人应当保持记忆呢或是健忘的好？那个冬天，忘掉往事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容易。不知不觉就会进入梦乡，有时沉睡五个小时醒来，长夜像静寂的大海，我安详地躺着直到天明。我们住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但我们在公寓里的家总是静静的，从未有置身闹市的感觉。而在这座北方城市的冬日黎明，一切更显得静谧：偶尔会听见擦着窗户的丝丝细声，那是在飘雪；通常总是万籁俱寂，只感觉到大自然的节奏，直到大街上有轨电车开始朝内日区驶去，这时，那声音仿佛是一阵阵风吹过古老的枯竭泽地。

一个人应当保持记忆或是健忘的好？蒙特利尔的有轨电车对我来说俨然是历史，当它们被公共汽车替代时，我真感到历史有可能随之而消失。每当我坐在黄褐色的座位上，听见售票员用英法两种语言反复说着“滨山街到了，滨山街到了，”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勾起回忆，历历在目地记起坐在同一路车上的种种往事，以及阅读世界各地——沈阳、查帕尔·亚的斯亚贝巴、格里卡、苏台德区、埃本埃米尔等地新闻的旧日情景。我们那一代人领教过多么可怕的地理知识？那

是一些我们从前为之充满热情和恐惧的地名？难怪我有时感到自己是幸存者。那些至今使我不寒而栗的地名，对于每周花三小时听我讲课的学生说来却毫无意义，他们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

一个人能够通过专注于另一个人而忘却往事吗？那年冬天我对许多事满怀热忱，早上醒来便想着凯萨琳就是其一。黎明时分，她仍然在另一间屋里沉睡，我静躺着，她开始出现。我凝视墙头，她绘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她绘画时所感受到的乐趣也暖着我的心窝。我很高兴她发现这桩绝妙的事儿还不太晚，甚至为她能这样做感到骄傲。

我一直把凯萨琳当着生活的基石。还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有一阵子很虔诚，相信上帝在亲自关怀着我。但到了三十年代，我却对自己说：没有上帝。后来我得到了凯萨琳，担起了她的命运。而到了那年冬天，我感到自己有了担起她命运的信心，我暗暗在想：“没有上帝会有什么两样？倘若上帝存在，用得着担心他是否公正？”

凯萨琳的例子表明，我用不着相信上帝是否存在，是否公正。凯萨琳自幼患上风湿心脏病，这病放过了千千万万的人，唯独降落在她的头上，谈不上是她的过失，也不能说是她父母的罪孽。风湿心脏病是实实在在的疾病，既不能与之抗衡，也无法逃遁；而在不久以前，还是无可救药的绝症。在过去的几年里凯萨琳几乎两次丧命，而在她尚存的日子里，利剑就悬在头上，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她只能这样活着，我也一直提心吊胆。那年冬天，我终于感到骄傲，由于相信自己能在没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这样做；即使这种力量存在，我也不敬重它，因为它让我

心爱的女人落得如此不幸。

正当我坐着观望窗外渐次黯淡的黄昏，无端地遐想——等候打电话的时刻你可以思绪万千！——我不由自主地记起一个人，一想到三十年代我就免不了回忆起他；对于我来说，他是三十年代的缩影。我快要把他忘记了，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年，我已把他置之脑后，就像成年人将自己的长辈或父亲置之脑后一样。他并不真是我的父亲，但在三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当我在精神和感情上都无所依傍，我确实曾经把他奉为我的父亲。

那位教授从电话机旁站起身，微笑着向我表示歉意，侧着头离开了房间。我走近电话机，拨了号码，立即有一个刺耳的声音用法语对我说：“爱德华七世旅馆。”

“什么？”我说，断定是看门人抄错了号码。我接着用法语说：“我叫乔治·斯图尔特，你那儿是不是有人打电话找我？”

“请等一下。”于是我被撇在那儿，空握着话筒等待。我一面等一面想，这样做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不可思议，我认识的人之中会有谁住进这个旅馆。二次大战前，我认识几个常常光顾爱德华七世旅馆的人。这家旅馆曾经小有名气，一些有身份的人狂欢作乐之余爱在这儿住一宿，这份名声虽然不雅，但它不失为大战前蒙特利尔城里具有某种特色的地方。现在，这家旅馆的特色早被战争销蚀殆尽了。战争期间，旅馆把房间按小时租给一对对士兵和女人。因此，许多需要用盘尼西林的士兵一再向军医提起这家旅馆的名字，军事当局只好下令不准军人再进这家旅馆。现在没有谁再提起它，除非是有人在那儿被捕或者死在那儿。

我听见电话另一端有了声音，还喘着气，接着这声音讲

话了，我顿时毛发竖立。

“是乔治·斯图尔特吗？”

不可能！这个念头掠过我惊骇未定的心间。不，这是不可能的。绝不会有这等事发生。

“是，”我却听见自己的声音答道：“这是乔治。”

“真是你吗？真是我要找的乔治吗？”

“一点不错。”

“我是杰罗姆。杰罗姆·玛特尔。”

“我知道，”我说。“我一下就听出了你的声音。”

接着我开始浑身颤抖，脸色也变得苍白了。无论相不相信，心灵感应的现象确实存在着。杰罗姆·玛特尔正是我刚才记起的人，我一直认为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年了。

二

我惊愕极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得老生常谈地问道：“你几时回来的？”

“你要是指蒙特利尔，我是今天早晨到的。我刚和哈里·布莱克韦尔通过话。”

又是一个与过去相联系的名字，我不禁暗暗叫道：“天啦！”

“他告诉了我关于你和凯特的事，我往你家里打过电话”。

“你是说，已经和凯萨琳通过话？”

“没有，叫乔治·斯图尔特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我试了四个人都没成功，于是回头打电话找布莱克韦尔。他告诉

我，你在这个大学里有份工作。听我说，乔治——他说你们都以为我死了。”

“不错，我们是那样认为的。”

“凯特也那样认为吗？”

“她还能有别的想法？”

短时的沉默，接着他以一种未受惊扰的声音说：“可是，我却一直认为把信寄回来了呢。”

“从哪儿寄出的？”

“我到过——”又是短时的沉默，我听得见他深深吸气的声音，接着他说：“我到过俄国，到过中国。从中国出境进入香港，在那儿呆了一年以便恢复健康。我从香港写过几封信，没有一封退回过。我想过：要是凯特还活着，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我在心里坚信她还活着，我一直抱着这个信念。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掏出一包香烟，朝电话机旁的桌上抖出一支，递到嘴边点火，拿打火机时，右手直颤抖。

“我这次回来，一定令人大吃一惊吧，”他说。

“也可以这样说。”

“哈里·布莱克韦尔一个劲儿地说：‘那是报上说的，你死了。’可怜的人，他总是报上说啥就信啥。”

电话里响起嗡嗡声，我接着说：“哈里近来干得挺不错。我们大家都小看了他，我们小看了不少人，他们在战后都干得不错。”

杰罗姆似乎没有听我刚才说的话。“难道我寄出的信一封也没收到？”他问。

“自一九三九年以来，没有谁读到过你一个字。”

电话里又传来嗡嗡声。

“布莱克韦尔给你说过我们是怎样断定你已经死去的吗？”我问。

“他只是说，报上宣称我死了。”

“你对拉觉耶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一个法国飞行员？拉觉耶上尉？”

他停顿了一会，说了声“没有”。

“嗯，”我说，“战争期间，这个拉觉耶上尉来过这儿，他说在法国的地下组织认识你。他告诉我们的事可不太妙。”

“他也许知道以另外名字出现的我，”杰罗姆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纳粹折磨了你两天，然后用一柄吊肉的钩子，把你的躯体悬挂在一个法国小镇的广场上。”

“报纸登的也是这些吗？”

“不，只说你在法国地下组织里被人杀死了。《新闻报》上还载了一则有趣的讣告。你是知道的，他们怎样看待你的政治观点。”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杰罗姆说：“是不是大家都相信这个受折磨被钩挂的说法呢？”

“是的”。

“凯特也相信吗？”

“相信。”

“那么”，他说，“几乎像是真的了。凯特也相信吗？”

“我已经说过她相信，杰罗姆。”

从窗口望去，我发现黑夜的阴影笼罩了带着松鼠脚印的雪地，这时又看见一点亮光划过雪地的一角，留下淡黄色的迹印。我感到周身麻木，如在梦中，不由自主地问道：“你去过哪些地方？干了些什么？”

“乔治，一下子说不清楚。俄国——中国——战争，——什么事都沾过。你可知道，一九三九年我们刚越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境内，我和西班牙人一道被捕，我的护照搞丢了。后来我在香港，读到一本讲法国集中营的书，作者叫阿瑟·科斯科拉。你读过那本书没有？”

“读过。”

“那么，你该知道法国集中营的情形了。”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那么沉重，怀疑他是否病了。“当德国纳粹攻入法国时，法国人把我释放了，我只好与法国人一起转入地下，直到一九四三年被捕。他们没有杀我，因为我是医生。他们用船载着我东转西移，我逃跑时被抓住了，最后到了波兰。”

“在奥斯威辛吗①？”

“是的，”他简单地答了一句。

又是一阵沉默。我极力想象他此刻已变成什么模样，更觉得这一切难以相信。

“俄国人攻进波兰后，我被运往东部。俄国人也需要医生，在北极的一个地方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到西北利亚的一个城镇当了外科医生。他们答应过让我回家，但没有履行诺言，只是让我到了中国。说来话长，也很普普通通，成

①奥斯威辛：波兰的一个市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这里建立了臭名彰著的集中营。

千上万的人都有过与我类似的遭遇。我病倒后，中国人放我出境，他们让我去香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以极为沉静的语气说，但这比任何激烈的语调都更有力：“我心中一直想着回家。我挣扎着活下来的目的就是回家，回到凯特和莎莉身边。”

我感到全身乏力，就像昏倒在地的人。

“你刚才说和凯特结婚多久啦？”

“我没说，不过已经九年了。”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问：“她好吗？”

我这才恢复了些力气，因为这是我时常听人问起的问题。我在大街上要是遇见朋友，他们首先问的便是：“凯萨琳好吗？”我一开始谈起她，他的语气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医生的口吻。

“她现在究竟有哪些症状？”

我接着花了五分钟时间谈她的症状，他不时提问打断我。

我讲完之后，他问：“你是说发生过两次栓塞吗？”

“是的。”注意到他语气中带着怀疑，我又补充说：“杰罗姆，她得到最好的诊治，杰克·克里斯托弗现在是她的内科医生。”

“我想应该就是他，我很高兴是他。”

从他反覆盘问我关于凯萨琳的症状看来，他仍然是当初的杰罗姆，起码在这方面是如此。我让他放心，要是不仔细瞧，谁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病。我问他是否了解医学上的最新发展。他说可能有些生疏，但他在香港一家医院干过一年，那个职位是通过一位胸外科医生的介绍获得的，多年前他在

爱丁堡与那位医生认识。我对他说，有一种新药对她很起作用，这种药在蒙特利尔还是首次用于她的病例，他坦率地承认还没听说过。一位教授进来找信件，有人在场，我抑制着没多说话。我望望窗外，已经完全黑了。

“莎莉好吗？”我听见杰罗姆问。

“她在上大学，最后一年。”

“乔治，多谈一点她的事吧。”

这时，我心里萦怀着一种想法：如果继续谈下去，我必须先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他的年纪我知道——五十二岁了。但他度过的是多么不平凡的五十二个年头啊！他的皮肤还是白的吗？身上有没有伤痕？他的目光是不是带着蹲集中营的人所常有的神情？他的脸上有没有那种静穆的表情，这种表情有时是保持适度饥饿的人所特有的？

我努力向他描述莎莉的情形。

“小莎莉成了生物学家啦！”他惊奇地轻声微笑了一下。

“还记得她小时候我帮她安显微镜的事吗？她观察时说的那些话多有趣！”

他这样说着，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差点儿哭了。他最后说的这些话令人回到过去，~~我想起我离开他时~~身影，他出现在萧条时期的那些夜晚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时，他在狂热的争论场合是中心人物，~~人们从那儿聚集在公寓里~~，席地而坐，一边喝啤酒，一边议~~论政治和经济~~，~~谈论即将爆发的战争~~，讥笑鲍德温^①、张伯~~伦~~^②和~~大资本家~~。这会儿，他仿佛又出现在我面前，三十年代中期的杰罗姆·玛特尔，一副不

①鲍德温(1867—1947)，英国政治家，1923—1937年间连续三次出任内阁首相。

②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1940年任内阁首相

顺眼的英武模样；面膛绷着强健的肌肉，扁扁的鼻子，那是早年被摔破的结果，鼻孔同马一样仿佛直冒热气，头发硬得没法梳，只好蓄短发，方形的下巴，一张倔强宽阔的嘴，眼睛格外神采奕奕，闪着饥渴而又天真的目光，像孩子般羞怯，对弱小者和蔼可亲，对强者充满挑衅。他的相貌具有奇特的魅力，那是许多大胆的女性所企求的；在那些使我们感到压抑失望的不景气岁月，我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

“乔治”，我听见他又说话了。“你这会儿心里所想的，八成没说出口吧。”

“我想，你也一样”。

“她恨不恨我？”

“她从来没有恨过你。”

“那么。她真没有变！还是和当初一样！我在梦里看见的一切都是真的？她还谈起我吗？”

“没再谈了。”

我这样说了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我听见他悄声地念道：“凯特！凯特！”接着我听见他啜泣起来，真可怜，我几乎忍受不了。我从不怀疑他爱她。

“乔治，我一定得见她一面。我得见见她 and 莎莉。”

我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年轻的时候完全认为没有谁尊重我，理睬我。我年轻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长得很笨拙，从来都对自己感到不满，年轻时还很胆怯。但是和凯萨琳一起生活，我成熟些了；我所干的广播这一行，教会了我如何控制声音。我现在意识到——由于我学会听自己的声音像听别人的一样，经常听广播录音使我能分辨音质——我

明白，我的声音宏亮而又低沉。

“你现在适合去见她吗？杰罗姆？”

“你说的‘适合’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心理和身体方面。”

他仿佛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我的体格像头牛”，他说。

“凯萨琳的可不像。”

他好像没听清我的话。“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突然和奇怪，可是，听我说吧，乔治——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些国家挣脱回来，告诉你，我仍然是医生，而且是一位相当高明的医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我一定得见她，乔治。我不见她，会是一个大错。我与警方不存在麻烦，也没有其他这一类的事。我在温哥华和警察局谈过话。告诉你吧，乔治，是凯特使我顽强活下来的。我相信她会明白这点。在一次梦中，她曾说：‘我从来没有离开你。’”

“那是什么时候她在梦中对你说的？”

“这有什么要紧？”

“我认为是要紧的。”

“嗯”——他似乎在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确实是真的。那些事——你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相信它们可能是真的。”又停顿了一下。“当然纳粹曾抓住我，也折磨过我；我双手带了残疾，有些手术我不可能再做了，不过这并不比想象的糟糕。除了手上的伤痕外，别处的都被衣服盖着。我不认为我的模样会吓人，没有孩子会停下来看稀奇。”

“我明白了。”

可是我并不明白，并不真正明白。对一个像他那样生活过十多年的人，我怎么能自以为是呢？

过了一会，我说：“杰罗姆，你必须理解，凯萨琳是个毫无保留的直性子，她的神经受过创伤，如果这个词用得不错的话。而且，过去九年里她一直以为你死了。”

这时我感到一股使我自己惊讶的激情：他活着回来，我从内心里感到宽慰和喜悦。

“她可能会拒不见你，”我说。

“我想她不会的，请原谅我这样说。”

“我今晚先和她谈谈，明天中午时分再打电话给你。”

“我不能今晚见她吗？”

“不，不能。”这时我突然想起钱的事儿，“有钱花吗？缺不缺钱用？”

“哦，钱！不愁，我在香港挣的钱还没花光。我一路乘船回来，一个子儿也没花，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从温哥华来的火车费倒花了不少，不过还有剩余。很快我就能自食其力的。”

“你打算住在蒙特利尔？”

“我自己还不知道要住在哪儿，连想都没想呢。情况变了，整个国家似乎都不一样了。”

“杰罗姆，请不要和我住的公寓通电话。明天上午十点我会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大楼办公室里。要不，由我打电话到你现在住的那个晦气的旅馆。无论如何我得先和凯萨琳谈谈，不能让她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到你的声音。”我笑了一下，完全出于紧张。“你还记得这份广播差事是你给找的吗？”

“是吗？哦，对啦，是我找的。许多事都记起来了，乔治。”

“好吧，明天打电话给你。”

三

就这样，阔别十二载之后我和杰罗姆·玛特尔作了第一次通话，这十二年之中，发生了一次战争，大英帝国已经崩溃，欧洲变成了一片古希腊时代的城邦，美国一跃而为一个新的罗马。我瞟了一眼手表，真是难以相信，离我刚才给学生讲课只有二十五分钟，那是一次愉快而有时又很机智的讲演，讲的是富于机智而有时又很愉快的十八世纪。

教员室里仍然空无一人，我走进隔壁的一间厕所，把面部埋进水里浸洗了一会，然后擦干双手，对着镜子打量自己。

我认为自己的模样倒满过得去，但我的姑母艾格尼丝——我年幼时家里的女霸王，早就令我为自己的相貌感到害臊；我当时不胖也不瘦，但她深信我会发体，告诫我必须一直想着保持瘦型，我也这样做了。我自幼笨拙不善运动，可我一直喜欢散步和干体力活，比如掘菜园，劈柴火和划小舟之类。当然，我不是那种在人群中引人注目的人，绝不能和杰罗姆·玛特尔相比，无论他出现在哪里，大家的眼睛都会转向他。

我走到电话机旁，拨了家里的号码，很快耳边就响起凯萨琳热情的声音。我爱听到她那大提琴般的女低音和那快活的语调。

“乔治，今天我感到很快活，非常愉快，开心极了。”

“太好了。”

“今天下午的阳光——没有忙得顾不上注意它吧？太令人陶醉了。令人陶醉——这是唯一适合的词儿。尽管天气冷什么的，我还是去了美术馆一趟，然后到街上买了一张新唱片，晚饭后你可以听听。天气真可爱，雪地里一定有鸟儿歌唱了。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不错。”这时我记起午后不久从广播大楼打来的电话。“外交部从渥太华来电话说，部长想同我后天面谈。我想这意味着我得乘明日下午的火车，才会赶上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的约会。”

听到这个消息，她提高了声音：“简直了不起。乔治——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不认为有那么重要，不过部长召我单独会见，这倒是第一次。我还不知道他的意图呢？”

“你会弄清楚的，然后你会告诉我。我现在已经感到振奋了。”

但事情的真相是，这次邀请只不过是从我萧条时期恢复过来后的又一桩可以感到放心的事，表明我的工作干得不错，不致会为生计发愁。

“你回家后作画没有？”我问她。

“嗯，我先是躺下，想睡一会儿，但几分钟之后，我感到精神很好，便起身忙开了。我对自己的劳作挺满意。”

“我真想马上见到它。有人打过电话来吗？”

“一整天电话都规规矩矩的，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响声。”

我正想放下话筒，她突然叫道：“哦，对啦，还有一件事儿——莎莉刚来过电话，说她改变主意不在外面晚餐了。所以你要是在大厅里瞧瞧，也许会看见她，你可以同她一块儿漫步回来。”

大厅外边，学生们来来往往，有的成堆拥簇在布告牌前，有的坐在长凳上相互交谈。一切同平时一样，我却受着习惯的驱使，不由自主地一再重复：杰罗姆活着回来了。我想乘着静静的冬天傍晚步行回家，一路仰望舍布鲁克街头上空的夜星；我想静静地同凯萨琳共进晚餐，一道吃喝；想看看她新绘的画，想听听她新买的唱片，像整个冬天一样，再做一点事，然后在这静寂的城里安睡。我不想经受任何危机。多年来，凯萨琳、莎莉和我完全心里明白，凯萨琳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垮下来：顿时面部扭曲，内脏绞痛，我得立即打电话找医生，随后救护车开来，接着是可怕疾病带来的痛苦、悲哀和难堪，甚至可能是死亡。我不期望任何外来的不测扰乱这安详的气氛。

莎莉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杉木桌上，身边坐着一个大个子青年，两人的腿轻松地摆动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一望便知，男的在逗她，她心里喜欢却又装出愠怒的样子。我认识他，因为她已经带他回家几次了。他名叫阿兰·罗伊斯，我知道他是校园里的红人，如果算不上个大明星，起码是个人物儿。他俩见了我便从桌上下来，我注意到莎莉那灵巧的头还不及那大熊般的小伙子的肩部。他掀了掀垂到额前的一绺散发，拉了一把不合身的衣襟，这衣服也许是从某个卖海军剩残品的商店买来的，然后咧嘴笑了。

“嗨，先生。”他说。

“嗨。”

“你来得恰好是时候，”莎莉对我说。“阿兰和我正要争吵起来。”

“为了什么？不是什么大事吧？”

“先生，我早就告诉过她有关蜜蜂和鸟儿的事”。

“你告诉我！”她说。“你几时才知道一点生物学常识的？”

他在她背上亲切地拍了一下，接着我们走出大厅。艺术大楼前面便是蒙特利尔闹市区——像一支停泊在北极海港的舰队，所有的灯光都亮了，烟气直往上冒。校园里竖立着光秃的榆树，显得黑乎乎的，图书馆窗边长菱形的灯光映在雪地上；我看见学生们穿过灯影，嘴里喷出热气，脚跟踏在雪上吱吱作响。在城里喧嚣之际，这座校园仿若一个静悄悄的岛屿，当夜间城里灯火辉煌，这岛屿黑黝黝的。今天夜里天气特别冷，我扣上风雪衣的领扣，把毛帽拉下来遮住额头和耳朵；阿兰光着头，面膛红红的，又朝我咧嘴一笑。

“先生，你像是在苏联举行葬礼的场合抬棺材的人。”

“我的感觉的确如此。”

我身后有沉重的脚步声，扭头一看是罗伯茨，这位往日的掷弹手如今成了大学的看门人。

“您看到我记录的口信了吗，先生？”

“看到了，谢谢。”

他呼呼地喷气，打量着周围的情景说：“现在是零下十度，明天凌晨将是零下二十度。冰河在这样寒冷的夜里正在融化，真是难以相信，不是吗，先生？”

“在融化吗？”

“噢，是的，先生，一点不假。不久前的一天，我听见乔恩教授向一位外国先生解释说，冰河在消融。乔恩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冰河权威。”

“噢，噢。”

我们互相道了晚安，莎莉和我沿着校园大道前进，阿兰则朝校园左侧拐，往大学路的联谊会大厅走去。看门人站在原处，双手背在身后，胶住的短髭竖立，肩膀随着嘴里不断喷气而抽动。学生们护着耳朵匆匆行走，脚下发出吱吱响声，校园的这幅景象令人兴奋。在加拿大，最严寒的夜晚总是给人以兴奋的感觉。天文台映照着的上空，月华呈现出绿色，晚星显得黄灿灿的。在我们背后，高耸的大学和我熟悉的医院建筑物拥簇着城市的轮廓；罗亚尔峰象一条静静地躺在北极海面的鲸鱼，那照得透亮的大红十字，光芒一直射向城市东头的天主教地区。

“你今晚特别沉默寡言，”莎莉对我说。

“你平时认为我说个不停，现在听你这样说，我再高兴不过了。”

“我原先说那话的意思是，你谈话过多是由于无话找话说。”

“亲爱的莎莉，我真喜欢你。”

“你现在又逗我。”

舍布鲁克街和平常一样，交通阻塞，小车和公共汽车一直从大学路绵延到内日区，车流上空凝聚着停滞的烟雾，车窗冻上霜无法看透玻璃。汽车喇叭枉然地鸣叫。

“我希望你喜欢阿兰·罗伊斯，”莎莉说。从她谨慎的口吻，我明白应当喜欢他，这对于她是很要紧的。

“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呢？”

“你认为他不会说话。”

“我还说不上了解这小子。”

“我知道他高大得出奇，留上那发式像个畸形儿似的，但他可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父母离过婚，但难得的是他不属于那些阴郁的青年人。我猜想你知道他那糟糕的家庭。”

“我只有个大概的印象。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想是搞投资的。我和阿兰只在里茨大饭店见过他一面，他邀我们去午餐。他使我想起英国的售酒广告中身穿皮革衣服的那种人——你知道，很挺，怪神气的，但显然比次等还次。午餐桌上，他告诉我他会玩橡皮球，还说我们这一代人虚弱，他要我摸摸他的腹肌。他说：‘我现在的腹肌同二十一岁时一般坚韧。’好像我很在乎他腹部的硬度似的。阿兰称他是个好色之徒。”

“你在为小伙子造舆论。”

“不错，正是这样。尽管他的家庭很糟，我想让你知道阿兰不是一个阴郁的青年人。而且他的资质特好，要是他肯运用的话。他的母亲挺和蔼，但很有依赖性，全然帮不了忙，现在她住在渥太华，嫁了一个在政府部门供职的犹太人，名叫卢布林纳，我想你认识他，你知道渥太华的每个人。”

“如果他叫杰克·卢布林纳的话，我当然认识，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现在阿兰完全能自主自立了，但在那些把人逼成神经病的艰难岁月里，他的日子可不好受。他经受了那所有的一

切。也许我不应该提这个，——他曾经对他父亲直说，不认为他是他真正的父亲。”

“你可知道，莎莉，阿兰绝不是向一个完全合法的父亲说那种话的第一个青年人。”

我步履艰难地走着，感到面部像有千根冰针在扎。

“请你别小看他，诋毁他，乔治。”

“亲爱的，我怎么敢诋毁任何人呢。”

从堵塞的汽车长龙又发出一阵喇叭声，舍布鲁克大街像一支退伍的军队。我对阿兰·罗伊斯失去了兴趣，只是听着莎莉重述他的关于体型对于性格的影响的最新理论。这时我心里想着杰罗姆和凯萨琳，晚饭后应当对凯萨琳说些什么呢，但愿我能什么也不说。

“阿兰认为，我有些迷惘，”莎莉说，“他坚持要我努力说出自己的身世，他说要是你生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你只好这样做，别无选择。你朝我们走来时我们正在谈的是我的爹，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

我吃了一惊。“我想你对我说的是，你们正要发生争吵。”

“那是在你面前说的敷衍话，我害羞。”

“明白了。”

我们在交叉路口停了下来，等待几辆轿车加入拥挤的车流；交通灯变了，我们跨过街去。

“阿兰认为，每个历史时期产生一类特别的人，”莎莉告诉我。“这使我联想到一些我压根儿没想过的事。萧条时期是我爹的时代，对不对？我是说，他完全属于萧条时期的类型，不是吗？”

“我呢？我属于萧条时期的类型，但我并不像他。”

“哦，你就是乔治而已。我是说，我爹称得上分毫不爽，完全吻合，可谓那整个可怕时代的象征。那些像海明威式的铁打硬汉，还有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敢于群居，彼此乱来，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腐败发臭。那就是我说的意思。”

“这是阿兰的分析，或是你的判断？”

“主要是他的。但我认为他说得对。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们从一盏街灯下走过，我看见她的面孔像一块浮雕玉石，露在裹着围巾的头发下边。她无论走路或站立腰板都挺得很直，站立时你绝不会认为她个子矮小。莎莉既不像她爹也不像她妈，虽然她有凯萨琳的白皙皮肤，显示出杰罗姆的不少活力和缺乏耐性的特点。我知道她对自己的下巴形状很敏感，她的下巴略长，一周之前她问过我，到了我的年纪她会不会长成一张马脸。但她对此前景并不惊慌，这个冬天她一直过得挺惬意。使她奇怪的是，她竟成了校园中最惹人喜爱的几个女孩子之一；要是凯萨琳身体硬朗能应酬接待得了的话，我们的住处一定会挤满年轻小伙子。

“莎莉，在你记忆里你父亲的印象究竟有多清楚？”

“太清楚了。”

“他很喜欢你，知道吗？”

“那就是他离家出走撇下我们的原因吗？”

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杰罗姆一边，对我所钟爱的这个女孩有些不满，而我喜欢她们这一代远远胜过我自己的一代。

“你的父亲不是简单地出走，”我说。“他是去作

战。”

“在战争开始之前？”

“那次战争早在张伯伦先生公开宣布之前便开始了。”

“我怀疑那是真的？阿兰说，厌世轻生产生了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战争也一样。”

我们艰难地往前走，踩在结冰的溜滑地面，从那些站在公共汽车站旁冷得直哆嗦的女秘书身边走过，经过了一家美术陈列馆。

“别的不说，莎莉，你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

“得了吧，乔治！‘了不起’可是个大词儿啊。”

“我承认他不是彭菲尔德^①，但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医生，一个很勇敢的人。”

“在你的时代，一个人不作番事业就不算勇敢吗？”

交通车辆往内日区靠近了二十码，车停下来后，喇叭呜呜直叫；从一个暂时的车距空隙处看过去，我瞧见一个乌黑发亮的形体在夜幕下诱人的一闪，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从里茨大饭店出来，身上的貂皮衣衫飘动，优雅地向一个铁灰色的看似欧洲人的先生挥手告别，他秃着头站在旋转门前面。

“你父亲离开时你才八岁，”我说，“你多半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你们这些青年人没有谁知道。当时希特勒很猖獗。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假如当时没有人去接受挑战，希特勒至今还会猖獗。”

我们经过博物馆和一座教堂，然后在另一家教堂前面，我们发现已经到了辛普森街的转角处，交通灯阻止了我们，

^①怀尔德·彭菲尔德（1891—），出生在美国，一九三四年加入加拿大籍，蒙特利尔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呜呜直叫的汽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记忆中的爹，”她说，“不是他对希特勒有什么反应，而是他曾使我妈伤心哭泣。我记得太清楚了，有时我简直无法入睡。刚才我正和阿兰谈这个，他说：‘你指望什么？那时我们的父母个个都糊里糊涂的。’可是，我妈不糊涂，你知道她不。当时是他使她陷入那种境地的。”

一辆出租汽车想硬挤入主干道，它的保险杆钩住了一辆卡迪拉车，出租车夫和卡迪拉车的司机一齐从车内出来，站在寒冷的街道上争吵，一个警察看见他们争吵，却没有办法走过去，只好干瞪眼。这个拐弯处的交通堵塞还会延续十分钟。

“咱们翻山过去吧，”我说。

于是我们爬山，正要越过内日峰时，莎莉停下脚步，面对着我。

“你为什么替他说话？”她说，“在这之前我有一次谈起他，你也是这样。”

“因为我敬佩他，他曾帮过我大忙，因为他勇敢，而我懦弱。”

奇怪，大冷天气在舍布鲁克和内日峰的拐角处，身旁是喧嚣的交通车辆，我们竟会进行这样一次交谈。更令人奇怪的是，我刚和杰罗姆通过电话，莎莉便谈起他的父亲。真如我想象的那么巧合离奇吗？近来尽管她有说有笑，却一直心绪不宁，老在转弯抹角地问我三十年代的事。我没有注意到她的动机在于引我谈起杰罗姆。“我是谁？我的身世是怎么回事？”不用说，这孩子恋爱上了，但她不是一个浪漫派，她有一颗严肃求实的心，想要找到答案。也许还有别的原

因：她可能对自己感到害怕了，不能控制自身的感情，所以她想谈起她的父亲。

“乔治，”她说，“请你别笑。你要发笑，我便永远不同你交谈了。可是我有话想说。多少年我就想说了，但似乎——我不知道，但我总说不出口。乔治？”

“是吗？莎莉？”

“我希望我的生身父亲是你，而不是他。我把你当成我真正的父亲。”

那天谈的话尽管很多，这话却太感人肺腑了。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美妙的话语。热泪暖暖地烫着我的双眼，在它们变成冰冷的水滴之前。我伸出带着手套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面颊。

“谢谢你，孩子。”我说。然后我们开始爬山。

照在内日峰岭的路灯像是两条闪亮的河流，天寒地冻，整个北方像在朝着我的面孔静静喷气。冷空气从空旷的北部云杉和结冰的湖泊袭来，那儿没有人烟，那儿没有细菌生存，没有罪恶存在的土地。这样的冬气对凯萨琳来说是难受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但我情不自禁地喜欢它，因为它使我忆起我的青春年华，忆起冰河尚未开始消融的时代。

“莎莉——”我刚开口又止住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窘困的境地，一个从未考虑到的因素使我感到害怕：她要遇见自己的父亲时，会怎样对待他呢，这使我恐惧万分。在那种场合，她多半会有礼貌，能够应付，因为她是一个懂礼貌，善于应付的姑娘，除开偶尔同我或者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情形。但是我担心她见到父亲时，她的怨恨会使他目瞪口呆，甚至会出现更坏的情况。

——我担心她会不理不睬，这种可怕的事青年人对自己长辈是做得出来的。杰罗姆的遭遇我无法猜测，他现在到底是副甚么模样更是想象不到。但他原来一直是对生活怀着热情的人，而那正是他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手段。他不像这个姑娘，在城市里长大；他能从纳粹和俄国人的集中营里幸存下来，正是由于他有那股子力量，我记得他总是满腔热情，敢冲敢撞，百折不回。他并无过人的智慧，也不敏锐，甚至说不上聪明。他从来没有学会或者被人教会如何适应环境。

“感情的转移并不那么困难，”我听见莎莉说。

“弗洛依德^①教了你们这些小姑娘。”

“哦，我们掌握他的理论轻而易举。”

“被你们看得轻而易举的事儿太多了。”

四

我不知道谁能向别人描述自己的妻子，除非他厌恶她——再没有什么比厌恶更能把一个人说得绘声绘色了——但是，一个女人使一个男人喜爱之处恰好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女人似乎独具慧眼，能公正诚实地洞察她们所爱的男人的缺点。男人则缺乏这种才能。更何况我早就认识凯萨琳，曾在许多场合接触她，了解她。我能描绘半打截然不同的女人，在我眼里，她恰好博采众长，集中了她们的精英。

现在回到了家里的客厅，我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既感

^①弗洛依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本世纪前期影响极大。

到玻璃杯的凉意，又感到威士忌沿着血管流动的温暖。我在一旁看着凯萨琳和莎莉收拾桌子准备晚餐。我是多么幸运啊，和这样两个女人在一起生活。同往常一样，她们俩在屋里一道干家务活时总是不声不响。作为母女，她俩异常亲密。然而她们之间差别之大，很难相信她们有骨肉联系。

莎莉坦白直爽，反应敏捷，性情急躁，蓄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穿上大学生的运动衫，花呢裙，显得自然大方。凯萨琳穿上花呢裙或羊毛衫，却从不得体。这时她身着灰绿色的宽大便服，显得从容不慌不忙的，动作十分缓慢。她的头发原是乌黑乌黑的，轻盈闪亮，现在差不多也还是黑的，尽管开始显出银灰的迹象。她比女儿矮，腰身细柔，古典式的身段，但不那么丰满，两肩轮廓鲜明，使我想起毕加索画面的清晰线条。她的面孔呈心脏形，一双灰色的大眼睛，一张敏感的嘴唇。假如你能想象一位娇小的女王形象，你满可以认为凯萨琳与女王相似。

她一生中在许多人眼里留下了各种不同的印象。少女时，她孤独害羞，沉默寡言，因为她小时候不断遭受疾病的折磨。二十多岁时，她欢乐愉快，毫无顾忌，在有些人看来，她不顾一切地追求生活和享受。然后作为一个年轻妻子，她显得满足娴静，幽默风趣，善于交朋结友。但是现在，当人们想到凯萨琳——这我明白——他们把她视为可悲的人，因为她心脏机能不佳。尽管她看起来并不比她的年纪更显得衰老，人们却认为她老了，因为他们知道——至少她的朋友是如此——她活的时间不多了。

她还是一个艺术家，最初绘画由于孤寂的缘故，而今艺术却成了她生活在世上的主要吸引力，她热爱世界，却眼看

着它可能溜走。对于绘画，她起步的时间晚，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但她深信——这我知道——假若她能有充足的时间活在世上，她会留下一些为后代珍视的画卷。这个凯萨琳抱负不凡。这个凯萨琳在内心里出奇地感到孤独——我现在可以这样说了——有些日子，由于与色彩和形状建立了神交默契，她差不多全然不理我，置若罔闻。是的，她也会冷漠无情，所有艺术家都不例外。

最后，还有一个从未逝去的凯萨琳，她小时候天真烂漫的笑容，她小时候的孤独和渴望被人赏识的愿望。她独自守着自己的命运，自幼就对它心领神会了。

她的命运是她那风湿心脏病决定的。她的毅力，她的自持，她的神秘——有时几乎莫测高深——我只能称之为她的精神，我用这个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止如此。对于我，它完全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以致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制约因素不是剧作家所理解的人物，而是她的精神。故事的冲突，如果你愿意这样看，便发生在人的精神与人的境遇之间。

有的人心胸狭窄，只容得下一丁点儿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有的人心地宽阔，他们的所谓性格却又经受不住压力而炸裂。我把这视为一种力量。我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我发现这种精神力量大量地存在于实际上品性恶劣的人身上，而在另一些无可指责的人身上反而难以找到。也许我永远弄不清它真实的特性，只知道它存在着。如果你喜欢使用现代词语，称它为生命力吧。但无论它是什么，它拒绝约束，不受羁绊，甚至不顾褒贬。它创造，毁灭，再创造。没有它便没有生命；它的比重大了，生活便不得安宁。在我看来，这独特的力量与无情的命运相当，把一个人及其死亡联在一起。

凯萨琳具有的这种神秘力量是我在别的任何人身上见不到的，除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便是杰罗姆。这是不是难于与她相处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我不能想象自己没有她能够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有时我真畏惧她，因为我太依赖她了。

然而，我爱她，她是我依附的岩石，她是我的救世主。但同时我也不为任何缘故爱着她。当她像一位女王那样行动，我感到骄傲。当她像个小姑娘那样微笑，我快活得仿佛要消融。

我已经描绘了凯萨琳吗？我不这样认为。也许这只描写了我自己。

她们叫我吃晚饭，莎莉发现我在专注地遐想，一言不发，说道：“怎么回事，在办丧事吗？”然后接过话去，说她当晚打算去学生会参加辩论，而她明白，我知道她是想同阿兰·罗伊斯一起度过当晚，要是他打电话来约请她的话。我看见凯萨琳的眼睛眨巴了一下，然后停下来打量我。我知道她已经发现我心绪不宁。这就是有时候难以同她一起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她太会揣测人心了，几乎能看透我的心思，莎莉的心思，正像许多年以前，她能看透杰罗姆的心思一样。

吃过晚饭，莎莉收叠碗碟，以便让明晨来干活的女工清洗，这时我和凯萨琳各自端起咖啡到火炉两侧的椅子坐下。我注视着火苗，意识到她在无声地催问。

这时我听见她说道：“乔治，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

“我的脸上这样显示的吗？”

她又微微一笑：“当你打算讲的时候，我就听。”

“我的面孔是一张心理测试表。它表明别人的心理比我

自己的更多。谈到我的面孔，我真开始有些不安。年内他们就要在国内播放电视，当我的面孔出现在电视屏上——我的声音也许与罗斯福的相似，可是我的面孔！”

又是她那特有的微笑：“得啦，亲爱的。”

“什么得啦？”

“你估计部长会同你谈什么，当你会见他的时候？”

“我全然摸不着头脑，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正在干的一切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包括这位部长，他比那伙人更行。”

我打量着她那娇小玲珑的身段，注视她那黑发下的心形面孔，以及近来频繁浮现出的奇特而又安详的神情，具有一种——我原先拒绝承认但现在不再否定了——把我排斥在外的古怪意味，仿佛她已经到了某个我最后才会到达和弄清楚的地方。然而今晚她很快活，从容闲适。那个冬天，她的健康情况一直良好，而冬天早成了她难受的日子。她开始谈论春天，谈论我们在乡间的花圃，并且提到花草种子目录早该到了。她精心地反复计划那些花圃，要不是我喜欢园艺的话，一定早就厌烦了。无论做什么事，她总千方百计地弄得尽善尽美；假如有什么事她想做，却又无力自己动手，她仍要计划周全，由我去执行她的主意。

莎莉回到客厅，已穿戴好准备外出，换了一张围巾缠在金黄头发上，她带着异常羞怯的神情瞅了母亲一眼。

“我用用你们的电话好吗？”

她走开之后，凯萨琳眨眨眼说道：“我知道她干吗要问。她从来不问的。”

几分钟后莎莉又露面了，像只神秘而又得意的小猫。

“我回家时，敢说这儿的每个人都熟睡了。”她说。

“你会晚回来吗？”凯萨琳问，她的头扬过肩膀。

“希望如此，”莎莉说着，跑跳着走了。

现在，我和凯萨琳终于单独呆在一起，这该多好啊。但我从她的表情，知道她明白我没说实话，当我说心里没有不安的事。她站起身，放了一张钢琴协奏曲在留声机上，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曲子放完时，我从唱机上拿走唱片，然后重新坐下。

“我猜莎莉又是和阿兰·罗伊斯一块儿出去了，”凯萨琳说。

“我想是的。你喜欢他吗？”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合得来。”

“你对此会逐渐习惯吗？”

她又眨了眨眼说：“最难习惯的是莎莉的想法，她认为我老了，不能理会她的感情。别忘了，我也曾经这样看待自己的母亲。”

她起身去唱片架上找唱片，看着她背部的曲线，可爱的双肩轮廓，弯身时丰满的臀部，我感到很动情。这些日子，每当这样的情景，这种种富于肉感的身姿总带着强烈的刺激。我记得她突然从瘫痪状态恢复过来——第二次出现栓塞之后的第五天，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形象，那更惹人爱怜。

“瞧！”她大声说。“今天两只手都能用了。你瞧着，我往头发扎上这丝带。”

她像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在我的注视下扎好丝带。

然后她说：“知道自己不变成残废，这太好了。人们都以为我会残废，我不是老在胡弄他们吗？”

这表情令我忆起看到的另一次情景，那是在她童年时代，第一次风湿心脏病发作之后我去看望她。

“瞧我又康复了！”她那小姑娘似的脸蛋仿佛在说。
“不管怎样，我又恢复了。请别介意，因为我痛恨生病。”

她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音乐开始播放了，这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①吹奏的曲子。这个沉静庄重的女人，这个由许许多多特点汇在一起的神秘复合体，还爱好奥尔良爵士音乐；当琳路易斯的清脆如铃的小号声萦回在室内，我想，要是她的心脏正常，这会是所有乐曲中她最欣赏的音乐，因为它最能表达她的感情。

我站起来把双手伸向她，当我拉着她时，她撑起来软绵绵地扶在我身上。然后我请她给我看新作的画。我跟着她进了她作画的卧室，画还在画架上，又是一幅欢乐的色彩和形态奔放的画面。

她曾经对我说过：“无忧无虑的人才有心思绘悲哀的图画。我像那些黑人歌手，宁愿快快活活过日子。”

我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扯到杰罗姆的话题上去？她认为他已经死去，这个事实她早已习惯了，甚至不再梦见他。他的出现会要她命的。他会翻腾起往日的惊涛骇浪，那将给我们造成什么后果呢？我绝没有一般人的庸俗顾虑，怕杰罗姆将她从我身边夺走。事实是，我弄不清楚我所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也许是我自己？也许是她？也许是人生给我们大家带来不测后果？也许是当我一心向往和平与安宁之际，意识到不得不再次正视那种后果？

^①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爵士乐的著名的小号吹奏手，歌唱家和乐队指挥。

“凯萨琳——”我开口说，强迫自己告诉她。她意识到要谈的事挺重要，镇静自若地向我转过身来。可是就在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她离电话机近些，顺手拿起话筒，答上话便递与我。

“请说？”我对着电话筒说道。

这时我听见一个多年不曾听到的声音，平平淡淡，装出很谦卑的样子。

“我是哈里·布莱克韦尔，乔治。”

我暗暗诅咒自己，怎么不在学校给哈里打个电话，杰罗姆说过他已经和哈里通了电话，我早该意识到哈里很可能会与我联系。

“他回来了！”哈里叫道，一个很动感情的声音。

“我知道，他打电话找我谈过话了。”

我想，哈里一定已经秃头了。过去十多年里，我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匆匆忙忙的，而那些年月可够他受的。对于哈里，桩桩事儿都作梗。然而自大战以后，我知道这个默默无闻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生意兴隆的富商，很可能有了几十万元的家当。

“我得了胃溃疡，”哈里说，“他打电话给我时，我们正在盘货。糟糕得很，我指的是胃溃疡，不是货物。胃气痛得我简直不能思索。不管怎么说，我愿以为他死了。于是我只回答了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让他结束谈话。之后我吃了一片药，这会儿仍然感到挺难受。我压根儿没问他住在哪儿。我打电话找你，乔治，因为我猜你会知道。他问起你，我讲了你在大学有份工作。我一直怀着真诚的兴趣，注意你事业上的发展。我今晚可以来拜访你吗？”

“很抱歉，今晚不行。”

“什么时候能行？”

“真有必要吗？”

短暂的沉默之后，哈里说：“我一向喜欢你，乔治。”

“我也一向喜欢你，哈里。”

“这回我一定要采取点行动。我知道我不如你那么重要，但我同从前不一样了，不再是任人摆布的人。现在，情况会很不相同。”

他话语中的含义令我十分惊恐。这个默默无闻的人可厉害，我清楚记得这小子无足轻重，原是个失业的无线电技工。可是现在，他却拥有一家兴旺的商店，就在不远的圣凯萨琳街上。

我斜视了凯萨琳一眼，但从她脸上我没看出任何迹象。自然她明白这不是一般的通话。可是我在工作中接触许多她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中间会有人叫哈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这会儿不在房里。

“有警察局，”哈里说，似乎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他们知道他，在温哥华他就见过他们了。”

“他住在哪儿？”

“听我说，哈里——那一切都是早些年前的事了。你别管他不是更好？”

“不，不行，我得管。他在哪儿，乔治？”

“我不知道。”

“我想你在撒谎。”

“由你说吧。”我说

凯萨琳起身走出房间。她一走，我连忙到门边把门关

上，一面手里握着话筒，拖着长长的电话线。

“得考虑琼，”哈里说，还是那执拗的语气。

我向来记不住名字，这使我茫然不知是谁。

“琼，”他重复道，“我的女儿，乔治，不管你怎样想。”

“我没有别的想法。”

不过，事实上我确有想法。

“她长得与诺拉一模一样，有她在这儿，就像诺拉还活在家里一样。她正在国内最好的女子中学念书，不久将读大学，她一定得过上诚实而体面的生活。”

“那很好呀，哈里。”

“她一定得过上诚实而体面的生活，决不让任何人兜出那所有的——丑事。”

我吃力地呼吸着。是我变老了或者完全被危机和情感弄得精疲力竭了？

“哈里，听我说几句，行吗？找警察局或者挑起事端会有什么好处？我想你该明白，他的归来也够我伤脑筋的，但是我一筹莫展，也不打算筹划什么。哈里，他一直在蹲集中营，这些年来他的日子比死去更糟。他过去就是干了天大的坏事，我的上帝，他已经受到报应了。”

短暂的沉默。

然后，哈里说：“他还活着，可是诺拉死了。”

哈里·布莱克韦尔语气中流露出的深仇大恨使我不胜恐惧，因为我所记得的哈里原是一个温和软弱、没有魄力的小人物。我瞧着凯萨琳的绘画，它所表现的意境与我从哈里话语中听到的含义截然相反。

“不管他怀着什么目的回来，”我说，“我相信绝不是

要找谁的麻烦。他已饱经风霜，疲惫不堪了。很可能他像一只丧家犬回到自己的老窝。你可以放心，他对往日造成的伤害一定深感内疚的。”

哈里的回答同一个犹太人所作的回答一样，当他被告知希特勒感到内疚。

“你以为他那样的人能回来说自己内疚吗？这样一说就万事大吉了不成？你以为问题会那样简单？”

我耸了耸肩膀，等他缓慢而又慎重地说下去。

“琼还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存在。他的名字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过。她对她母亲的了解只是我告诉她的那些。我对她说，她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死的时候她还年幼。我告诉她，诺拉真是可爱极了。”说着他平淡的声音变得强烈了。

“在他出现并玷污她之前，她的确是这样。他把她变成了娼妇，拐走了她，后来又把她当作娼妇抛弃了。”

“他没有，哈里。他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干。”

“别对我说他干了或没有干。琼同她一个模样。琼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好姑娘，她不知道那种肮脏的事。”

我认为他这话给了我一个机会：“现在干吗要让她知道？如果你不理睬他，她就永远不会知道他。”

“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上。”

“出现又怎样？”

“她就会听人说起。”

“我看不一定。她是个中学生，我不相信她会。”

“乔治，你不知道有些人心眼多坏，多么残忍。话题一传开，议论纷纷，她便会听见，她会被问到有关他的种种问题。好心的朋友会给她挑明。”

对此我哑口无言，因为我意识到他也许说对了。

“我只要求你告诉我他住在哪儿，”哈里说。

“我已经对你讲了，我不知道。”天啦，我已经厌烦同哈里讲话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所能做的事。他明天上午要打电话找我，很可能他会告诉我，将要离开本市去美国。我将让——”

“别跟我说这个，乔治。他去美国！美国人可精明啦。你以为他们会让一个有他那样经历的人入境吗？”

“不管怎么说，我明天给你通电话。”

“暂时依你说的吧。”他说，那语气和字句全是威胁。

我挂了电话后心里捉摸：蒙特利尔大暗礁中的这只可怜的软体动物，几年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走运的商人，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了解政界风云人物的心理，我不用费多大力气，但对于他们所服务并假装尊重的普通人的心理，我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五

我手里端着一杯酒从厨房回到客厅——这泄露了我内心的秘密，因为我晚饭后几乎从不喝什么——我坐在凯萨琳对面，看着她颈动脉不规则地跳动；我很惶惑，她具有奇特的感知能力，同她一起生活应当如何适应。难怪杰罗姆对她大发雷霆，难怪他十分惧怕她洞察心思的能力，我要是同他一样，性情急躁，充满活力，也会对此感到恐惧的。

“刚才是哈里·布莱克韦尔，”我说，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会记起这个名字的。”

那张心脏形的脸转向我，睁着一双灰色的大眼。我一口气喝下半杯威士忌。

“无论如何，我刚才正准备告诉你，”我说。“这样做真不容易。”她同刚才一样张着嘴和眼睛。“亲爱的凯萨琳”——我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真难以开口。杰罗姆还活着，刚回到蒙特利尔不久。”

她的面色变得灰白，浑身颤动。

“我没见到他，”我赶忙说，奇怪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内疚。“他打电话到大学去的，我在那儿与他通的话。”

她一动不动，也不言语，但她的面色仍然灰白。

“我没有见到他，”我赶忙又说。“他打电话到大学去的，我在电话上同他讲的话，所以我回家晚了。”

沉寂之中发出了她轻声的话语：“他现在如何？”

“他说还好。”

可是，她心上的一扇门开了，她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

“这太出乎预料了。我受不了这个。求求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安宁？”

然而她的表情渐渐和缓了下来，眼泪模糊了双眼，她显得似乎更年轻了一些。她曾经全心全意地爱过杰罗姆，曾经依赖他那巨大的活力，为他生育了女儿，成了他的家庭的轴心。他也爱过她，我相信爱得同样地炽烈。后来，被他们的许多朋友认为是美满的姻缘出事了。自然，他们都责备杰罗姆，称她是圣洁的女人，但她不是圣女，也不是……。普通人要说杰罗姆只消尽他的责任就会无事的话，那太容易了。

“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记得他曾嚷叫着说。结果他远去西班牙，涉身战事。多少年来凯萨琳伴着他那健壮的身躯被鞭

打、扭曲和撕裂的影子生活。在她那沉静的心里，她听见了他的喊叫声。她在内心深处暗暗反省，她是否辜负了他，因而使他不得不出走国外。

“他独自一人吗？”她问我。

我知道这是询问他是否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另一种说法。我告诉她：不错，就我所知，是独自一人。

“他有钱花吗？”

“我想有，但他住在爱德华国王旅馆。”

她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喝点你的威士忌，乔治。”

“你认为喝威士忌好吗？”

“不。那么给我一点儿红水汁吧。”

那是镇静剂，我从她卧室里取了给她，她做了一个淘气的鬼脸，一口喝了下去。之后，她掉泪了，含着泪水低声说道：“我不能讲话了，我不能动脑筋了，最好上床去吧。”

我看见那穿着宽松便服、小巧而又优雅的身子站起来，略为有些蹒跚地走出客厅。几分钟以后，我听声音知道她上床了。我坐在长条椅上，努力阅读一份政治性的杂志，但怎么也看不清字迹。这时，电话铃像牙医钻牙的响声朝我乱叫，我起身去接电话。

“安德烈吗？安德烈吗？”一个生气的女人的声音。

“你拨错了电话，夫人，”我说。

我倒进椅里，环顾四周，看见杰罗姆从墙角书架顶层的一张照片里注视着我。为了显得自然些，我们总是把照片摆在那儿，但我很少瞅它一眼，或者视而不见。现在我注视着它，它几乎没有传达出我印象中的真实形象，而只是一个穿着白褂子的外科医生的端正照片。我起身到凯萨琳的房间，

发现她背后垫了一大堆枕头，膝部摆着一本书。

“谢谢你，乔治，”她说。

“谢什么？”

“就为你的镇静。”

我摇了摇头，坐在床沿边，眼睛盯着地板，感到她的指头插进了我的头发。我听见她安详地说：“往事通通都浮上我脑际了。”

我探求地望着她，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不是发生的那些事，”她说，“而是那些事情发生时我的感受。”

“我明白。”

“哎，你明白就好。”

这时我的手指轻轻握着她的手腕，触到了她脉搏的跳动，我真不喜欢那跳法。

“你看我是不是最好叫杰克·克里斯托弗来一趟？”

她摇了摇头说：“他除了告诉我做已经做了的事之外——喝点镇静剂后休息，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我多希望他没有回来。”

我一筹莫展地坐着，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

“以前我有时仿佛看见他和那些纳粹分子在地牢里。”

“我也一样。”

“但是你认为他很坚强，其实，他内心害怕极了。同我一样。”

“同每个人一样。”

“我爱你，”她直率地说。“我爱你，尤其是因为你从不打算夺走我过去的岁月，与此同时，你给与了我这么多新

的愉快的日子。”

“我没有给与你，是它们自己来的。”

“时间会医治一切创伤，对不对？只要你别老在回顾，发现它什么也没有治愈。”

“你可以回顾，而且会发现它治愈的比你想象的更多。”

“是的，也许我会。”

我看见一丝苦笑掠过她的面庞，掩盖了我同时看见在那儿的毅力，我感到她充满怜悯：怜悯杰罗姆，怜悯我和她自己，怜悯我们所有为人生催促的中年人。她具有一般女人的情感，但同时她近年来获得了一种气度，能同情她遇见的任何人。这种宽宏的气量几乎达到了超人的程度。杰罗姆会发现她不同于他记忆里的那个热情的女人。有时她这种超人的气质，同情别人，宽容人生，使我愤愤不平，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了。她懂得死亡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不明白，区别就在于此。

我瞅着她，说道：“亲爱的，我必须告诉你：他回来了我感到高兴，高兴他还活着。”

她向我回递了奇怪的一瞥：“我却不知道自己是否高兴。”

那是什么意思？自然不是什么明显的表白。我们默不作声地彼此陪伴着，两人在心里都希望感到年轻，但已不可能了。

“你看，”她说，“我仍然感到对他负有责任，而他也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俩做得对。我本不想感到负有责任，但事实上我却这样感觉，而且非这样不可。不知道他看

上去衰老没有？我差不多希望他如此。我不能想象他只是正在变老而已。”

然后，她身上产生了快得令人惊愕的变化。她突然嫣然一笑，笑得那样亲切自在，那样富有女性。

“告诉我——他问了今晚能否见我吗？”

“问了。”

“啊，杰罗姆！”

我踱到窗口边，从软百叶窗条向外窥视，看见月光照在温室的玻璃屋顶上，它的主人是一位年老的贵妇人，正在南美的巴哈马过冬。我看见松鼠的足迹，看见处于休眠状态的低垂玫瑰花丛被麻布袋笼罩着，斜倚在雪地上；白雪掩盖了从跟前到电杆之间的一切，明月映照在雪上。沿着圣劳伦斯河往下的广阔一带，月光熠熠地照在教堂建筑的尖顶上。农场主从教堂地下室玩罢纸牌归来，月光投下拖着雪橇的马匹的身影，还把巨大的山影倒映进山谷。

“亲爱的，”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我想设法睡一觉。”

“祝你睡个好觉。”

我亲吻她的额头，替她盖好被褥，熄了灯。

六

我像大多数经历了过去二十个年头的人那样，以职业而论，算得上一个相当成功的精神分裂者。我获得了专心致志于所干工作的本领，无论我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好几次当世界面临着似乎就要崩溃的境地，我仍能集中心思，坚持工

作。但今天晚上，这太艰难了。

说实话，我对政治感到厌倦，我已经得出结论：政治在十年前无论多么重要，而今却不再是根本的问题了。三十年代，我认为大多数政界人物是骗子；四十年代，我从表面上看问题，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视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可是现在我相信，一切真正的历史，几乎都是由科学家创造的，而政界人物仅徒居高位，坐享其成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倘不是骗子或天才，都十分平庸；事实上，他们是我所遇到的最能适应变化，随遇而安的人，因为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极不正常的环境，他们却处之泰然。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控制权已不再握，却又千方百计制造一种假象加以掩盖。他们具有识别什么是选民视为重要的东西的非凡本领，至少我认为就是这样，却对别的任何重要问题视而不见。只要在选民看来他们还在执掌控制大权，他们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但是，我知道他们之中很少人在行使权利。他们供职的大城市变成了庞大的初级计算机，一个月内编制出来的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报告，任何训练有素的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政界要员每天早晨到办公桌边，文件早已堆在那儿，他们抓紧处理以便接受更多的文件。他们工作得愈勤奋，思索的时间愈少。而现在，他们乘飞机四处互访，一辈子都疲于奔命。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每次选举都使我深信不疑，谁当总理或总统都没有什么两样，只要他不是疯子，能使公众相信他在领导而不是在尾随。选举尽可以举行，新面孔尽可以出现，但他们很快就会同旧人一个模样，步前任的后尘。他们会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时间思索。他们的空中旅行太多，只看得见迫在眉睫的重大事件。表演一阵，他们便会销

声敛迹。

但这关我什么事——就现代交通和政治的影响作哲理性的探讨。我工作得挺不错，我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觉，而这第六感觉一直在告诉我：朝鲜战争不会激发成一次人人都害怕的大战。我的问题完全是技术性的：我该如何用实例证明这种预感？一个受过训练的新闻记者能用实例支持他的见解，于是我开始工作，约莫半夜时分，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作为指派的任务，我知道它会令人满意的。

我去厨房倒了一杯牛奶，想轻松轻松，思考一下问题。但是我无法思考，相反感到害怕、矫揉造作、异常孤独。莎莉轻轻地用钥匙开了门，蹑着脚走进屋内，我仍然陷在孤独的情绪之中。

“你不睡还在干什么？妈好吗？”

“她睡了。”

我吹旺炉火，莎莉自己进厨房去取牛奶。她取回来坐下，说道：“假若我不讲话，我会憋死。”

七

我从来没见过莎莉显出这种光景。她浑身是劲，精神焕发，光彩照人，无论是杰罗姆的归来或我此刻的心情，都不能模糊那光泽。她的面颊冻得红红的，头发卷曲发亮，全身仿佛都在熠熠闪光。她把牛奶放下，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在我的手背上擦着那光洁细滑的脸蛋。

“乔治，”她悄声地说“快活的好乔治！”接着她说：“终于发生了，你敢笑，我就用这杯牛奶泼你的脸，简

直太美妙了，同那些黄色小说里说的一样。”

她一屁股坐上沙发，用力过重几乎弹起来；她翘着腿坐在那儿，容光焕发地望着我。

“你对此有把握吗？”我问。

“绝对，肯定，而且完完全全地。”

“你核查了自己的体型？已经逐条对照了神经病症状条目？你发现条条都符合！”

她端起牛奶，威胁着要朝我泼，之后又咯咯地笑起来，咕噜咕噜地喝下半杯。甚至她的下巴，到我这个年龄也许会厚实粗大，今晚也显得柔和优雅了。

“要是你有兴趣知道的话，”她说，“我们刚才的事发生在罗亚尔峰。”

“在零下十八度？你们这一代可比阿兰的父亲估计的更耐寒。”

“实际上只有十六度。可是在零下十六度谈恋爱应该能够向工程系的某些蠢汉表明，我不是一个弱不经风的女人。那太令人陶醉了。”一声舒坦的慨叹。“我们穿过松林大道上的树林登山，当我们到达山顶——你曾经在冬天夜晚登上罗亚尔峰吗？”

“我在你的年龄，罗亚尔峰更具有声望。有一次我和一个姑娘到了那儿，她问我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结婚。”

“别吹牛，乔治。今晚上让我来炫耀吧。”她往后一靠，双手捧在脑后。“那真是难以相信，如果你想知道。”

“总是那样。”

“我敢说那才不呢。可是，同样令人陶醉。”

“抽一支烟吧？”我建议说。

她奇怪地摇了摇头，卷发像在颤抖。

“完全像是整个天幕倒转了过来，连同颗颗明星一齐平贴地覆盖了山岭，带着亿万千瓦的电荷，像一块带电的胶状体在颤动。那是美妙的瞬间，我简直受不了，你猜那傻小子说什么来着？他说我长得很美。”

“你亲口告诉我的，你们一代人中数他最聪慧呢。”

“不错，他是个蠢汉，但却是一个可爱的蠢家伙！”她朝我迅速地皱了一下眉头。“幸好我自己明白那是胡扯，他居然认为我美；这使我很不安，因为很快他会再端详我的。我认为在性的吸引和彼此悦慕的坚实基础上结婚，比一些年轻人只顾挑选姑娘的美貌更为可靠，你不这样认为吗？”然后又是兴高采烈的笑容。“但是那太愉快了，即使听人说一次。我这辈子总想自己美，至少希望有人认为我美，而我心里一直明白自己并不美。我想当然地认为，绝不会有人说我美。要是有任何男人说我够得上漂亮，我便会认为他别有用心，企图弥补一个不称意的周末。男人就是这样一些讨厌的自作多情的家伙。愈是自作多情的人愈是糟糕。你看每年夏天去北极的那些多情的神经病，他们蓄起胡须，梦想女人，直到他们把在上个冬天舞会场上遇见的某个丑八怪美化成一位女神。”一声叹气。“哎，起码阿兰不属于那种人。看来他不像是没有经验。”

柴火爆出一声劈啪响，另一点火星蹦了出来，我起身将它灭了，然后把铁丝护罩挡在柴火前面。

“莎莉，有件事让我莫名其妙。究竟是什么使你认为自己不是个漂亮的姑娘呢？”

“哦，是妈，还用说。”

“呃，别傻。”

“我的意思不是她说了什么，我是指她本人。有她在咱们家里，谁个男人屑于瞟我一眼呢？”

我大为惊愕：“我想，你真那样认为。”

“妈热情奔放，可我自己却不。”

“慢慢来吧，亲爱的。”

“你不知道这个，但我认识的好些青年已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了，说我很冷淡。你在阿兰的年纪谈过恋爱吗？”

“我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正逢着萧条时期；我穷愁潦倒，而且相貌不扬。”

“但你一定谈过。谈几次才算多？”

“美国的社会学家也许对此有统计数字。你下次进图书馆时去查查不好吗？”

“我说的是正经话，乔治，你瞧——”说着眉间一皱，我多希望有谁，也许是阿兰·罗伊斯，矫正她这习惯。不出十年，这道皱纹将长存在那儿，于她毫无好处。“你瞧，”她继续说，“阿兰在校园和城里已经为自己挣了一份好名声。在我看来，他活跃得太早了一点。别误会我，乔治——我不是在品评他。成长在那样的家庭，还有别的什么期望呢？可是，我已经打听了一些他的事，他年纪轻轻据说已经成了我们最熟练的击剑手之一，听人说到这个，我并不完全感到喜悦。”

“你老在给这小伙子脸上贴金。”

这时她温和地微笑道：“但是我这胆怯的弱女子要嫁给像阿兰那样的一位击剑手，难道不最安全可靠吗？”

她一本正经，既深深沉浸在爱情里，又是如此审慎。

“你是说今晚你们订婚了？”

“唔，不。总之，‘订婚’这个词儿我们现在不大用了。我猜想阿兰打算捉摸一阵子，但很可能一两周内事情就会明朗，假若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可是只胆小的兔子，乔治。告诉你，我仍然是一个处女，你要有兴趣知道的话。”

“那使我很惊讶，莎莉。”

“当我一反常态，正经地谈事儿，我希望你别再嘲笑我。难道不是吗？我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嫁一个懂事的青年不比嫁一个以后才醒世的纯洁小子好吗？难道不正是这些纯洁小子后来变得很坏吗？”

“我原是一个纯洁的小子，不比别人差，总算得是纯洁的。”

“但是你不具有阿兰的诱惑力。”

“为什么，莎莉，你侮辱我。”

“我不是侮辱你。我讲的是事实。有的男人显得垂手可得，十拿九稳，有的却不然。而且你从一开始就爱上了我妈。”

燃烧着的木柴塌了一段，不再燃起火焰了。火光昏暗，室内万籁无声，我能听见她呼吸的声音。

“是的。”她神情恍惚地说，“我想我们应当一毕业就结婚。两人都找工作。阿兰愈早安定下来愈好。说什么我也不打算改变他，但我的确认为他应当安定下来。”她那张坚定的脸上充满温柔细腻的欢悦。“是谁写的这诗句：‘来同我住在一起，作我的爱人，我们将证明会欢乐无比。’能够证明欢乐无比那太精彩了。”

柴火灼灼发光，凯萨琳绘的图画隐隐约约显现在墙上。

在闹市区，成百上千的妓女已经疲惫了，无数酒鬼喝得酩酊大醉。在一间阴郁的房里，杰罗姆要是没有入睡，一定还眼睁睁盯着黑暗。而户外，按莎莉的说法，气温在零下十六度。

“当然，”她慢吞吞地说，“事情总有诀窍。”

“这桩事的诀窍是什么？”

“生孩子，”她说，“我们不想重犯你们一代的错误，推迟要小孩，直到我们的神经再也忍受不了，或者直到最后。”

“这是你的主意或是阿兰的？”

“他还没有提到，至少没有说到我们自己，但我相信这是他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婚姻的生理方面的事得尽快拿定主意。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我们应当活到八十多岁。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当我们年轻无知，一技无成，应该避开婚姻的生理方面。但伤脑筋的是钱的问题。在他应当自由自在生活的时刻，我绝不考虑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奴隶。我要他参加外交部的考试。具有他那样对人性的理解力，他在外交部将会前程无量。”

我沮丧地搔了一把下腭。

“呃，”她说，“难道不会吗？”

“他还得等一阵子，才可能直接向迈克·皮尔逊总理报告情况呢。”

“喂，要是他真的进了外交部，会叫他干什么事？”

“亲爱的女儿，叫他去问他的继父吧。杰克·卢布林纳在外交部干了二十年啦。”

“卢布林纳先生直接向皮尔逊总理报告情况吗？”

“我想有时候他这样做。但是在外交部干事，薪金不会太多。阿兰的生父怎样？能从他那儿得到些钱吗？”

莎莉摇了摇头。“他的生父必须付赡养费给他的第二个妻子，还有别的消费：情妇、汽车、俱乐部、去佛罗里达旅行、打高尔夫球、喝酒、制装，以及他一般的腐化生活的开支。阿兰不希望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一文钱，我认为这也好。”

又是一阵沉默，我们俩都注视着炉火。谈着青春的甜蜜可爱而又带忧虑的欢乐，我感到年轻了些。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柔和的青春忧虑，我想早已离我而去了。我忆起凯萨琳十八岁的那年夏天，我看见她从湖里爬上岸来，水珠沿着她的双肩和大腿往下直流；那天下午夕阳西下时分，我目睹一条载粮船横向西边天际的剪影，感到浑身快活而又隐隐作痛，我太天真了，甚至弄不清那是在渴求得到凯萨琳的性爱。

“乔治，”她咕哝着说，“你太随和了，容易交谈。”

“来亲吻一个过来人的额头吧。”

“可是我的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呢。”

“这正是因为我太随和容易交谈。”

我们又沉默了，我偷偷地瞟了一眼她欣喜若狂的侧影，不禁突然感到有些不平，她得意扬扬，而凯萨琳却郁郁寡欢。

“乔治，”她说，“我希望自己不这样害羞。我有一桩个人的私事想请教你，但又不好意思。”她的脸微微胀红了，眼睛避开我。“和阿兰一起到北边去过一次周末，你看应不应该？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自己的想法呢？”

“他怎么知道自己真想娶我，假如不首先发现我有什么

吸引力？这个想法是你们一代最先提出的，不是吗？”

“我的一代很快活，但据我的印象，最先提出那想法的人是亚当和夏娃。”

“你可知道，这在瑞典是公认不讳的。”

“我知道，瑞典人是很会享受的乐天派。”

“你又在嘲笑什么？”

“人与鼠之间的计划安排^①。”

“现在你到了中年就变得因循守旧不成？”

“也许。”

“当然，麻烦在妈。我讨厌撒谎，乔治，我不愿说假话。要是我和阿兰一道去北面，我只好对妈妈撒谎，但撒谎也没用，因为她会知道。无论什么总逃不过她的眼睛，不是吗？”

“不尽然。可你说对了，她会知道的。”

“要是换一个人，我可不在意。我知道很多人都去北边。这种事他们与父母之间心照不宣。他们对父母只说是去滑雪，父母装做信以为真，因为他们自己曾经干过同样的事。现在的孩子不愿让父母难堪。”

“孩子经常这样干，莎莉？”

“但是我不能这样对待妈妈。我总感到那会使她伤心。会勾起种种往事，我爹，以及那一档子事。”

“我明白了，”我说，转开目光，不自觉地注视着杰罗姆的照片。

“我压根儿不理解，她为什么爱上像他那样讨厌的人。”

^①此句引苏格兰诗人彭斯《写给小鼠》中的一行诗：“人也罢，鼠也罢，最如意的安排也不免常出意外。”（王佐良译文）

莎莉说，“但她真地爱上了——不是吗？”

“当然。”

“那他为什么像那样干？”

“我想因为他是一个人。”

“这那儿像个回答。”

“对，这不大像个回答。”

我的表情一定背叛了我，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我们俩由于激动和谈得很投合，彼此都疲倦了。

她尖锐地指出：“乔治，为什么今晚上你和我第二次谈起爹呢？我们已经一年多时间没提到过他了。”

我耸了耸肩。

“你在隐瞒什么，”她说。“每当你隐瞒，我总看得出来。”

“你的妈也一样，”我说。“今晚她也成功地看破了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趁势直说，“莎莉，你说对了。我们今晚两次谈起你爹，这不是出于偶然。人的敏感能力比自己认为的更强。既然我这两天免不了要告诉你，不如现在就让你知道。”

她立即正襟危坐，仿佛马上老了五岁，因为她明白这是一桩要紧的事。

“这会使你吓一跳，震惊不已，我真希望不用说它，但你迟早会知道的，我看还是说了好。”

她直呆呆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了。

“不用说，我今晚老谈起你的父亲是有意的，因为我脑子里思考的全是这个。莎莉——”我停了一下，接着马上讲下去。“莎莉，”我平静地说，“你的父亲根本没有死，今

天我才知道的。”

她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他回到蒙特利尔了。他打电话到学校找我。就在我遇见你和阿兰之前，我同他在电话上交谈过。”

她脸色略为有些发白，神情有点儿紧张，但一声不响。

“我认为他奇特的遭遇是你想象不到的，起码我没想到。你知道他在法国搞地下活动，你听说了——我们都一样——他在那儿被杀害了。噢，看来他只是被捕了，而且由于他是医生，幸免于死。”

我迅速地重复了一遍刚才告诉凯萨琳的同样情节。我在讲话时，她的脸色由白变红，我看见她细小的手指紧紧攥在一起，依然一声不吭。

“我想说的还有一件事，”我说，“他回来了我感到高兴，你的母亲也一样。我喜欢你，我敬重他。”

“那么，你已经对妈妈讲过了。”

我点了点头。

“乔治，”她突然发怒了，“你为什么不叫他进地狱去？到美国去，到任何地方都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妈？”

我们相互盯视着，然后她才移开目光说：“好吧，我想你赢了。要是你不介意，现在我想抽一支你的烟。”

我递给她一支，帮她点燃火，自己也点燃一支。我那天抽烟过多，像炮眼口一样，嘴边满是烟味。

蓦然，莎莉抑制不住感情哭了起来。好几年来我没有见她哭过，这会儿她像小孩子般啜泣。我坐在她身旁，用手臂挽着她瘦长的肩膀安抚她，但毫无用处。

过了一阵她抬起头来，拭干泪眼，擤了鼻子，转过头去。

她仿佛有点害臊似地问：“他问起我吗？”

“他几乎一开口就问起你，而且非常亲热。”

她又哭泣起来。“他简直是个大傻瓜！”

“不错，亲爱的，不折不扣。”

“他原来想过我们多么爱他吗？”

“没想过。他心里完全明白。”

“可他还是走了，抛下我们不管。”

“他是一个怪人，而当时又是一个古怪的年代。”

她侧过身来，两眼直盯着炉火，两手握成小拳头支在下颌，两条纤巧匀称的腿并靠在一起。

“我希望他真的死了，我从来没想到会再见到他。”

然后她起身走到窗边，拉动帘幔绳索分开窗帘，望着户外月光下的积雪。月亮已经转过大半圈，只有几团雪地还照在月光下，但温室的玻璃屋顶上依然熠熠生光。

“你见到他时，请你对他和蔼些，”我说。

她仍然望着户外的夜色，一面回答道：“我怎么知道会如何对待他？”

“见到他别立即关上门就行了。”

“我说不定会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她扭过头去，脸上露出好斗的神色，这是我当初经常从他父亲脸上见到的。“我如何知道？我只知道今晚回家时比有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快活，现在却陷进这桩事，我觉得心情坏透了。要是见到他，我怎么知道会如何反应？我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哭得像个小孩子，也许我根本不以为然。他老了，我还年轻。我为什么要对他产生责任感？”

我们彼此凝望着，感到可悲。

“为什么每个人都为他讲话？”她说。

“并不是每个人。”

“但你是。我认为你的整个态度有点儿不正常，把这同你对我妈的感情混为一团了。她爱他，你想欺骗自己，认为你也爱他。你想同她共有他就像共有我一样。”

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自己讲的话难听，我憎恨难听的话，但你为什么不承认：我妈是一个人，却不是完人？你为什么不承认她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她没有错，她嫁给你父亲并不错。”

她气得直蹬脚。“你简直不可救药。”

我生气了，不是由于她骂我不可救药，而是她的整个态度忽然使我感到气愤。

“你像小孩在说话，”我说，“你以为是我的一代人发明了神经病？你以为三十年代的情形与当今完全一样？错误？啊，我们自然犯过错误！但听我说，莎莉。你没有权利鄙视你的父亲。你也许在使用那种权利，但凭着上帝发誓，你还没有资格。”

我们的目光遇上了，她赶紧避开；仍然顽固不化，心烦意乱，愤愤不平，同时又感到内疚。是的，每当她发现自己身上有神经质的迹象，我认为这女孩子便自惭形秽，这使我苦笑了一下。神经病是罪过的新名词不成？

“对不起，乔治。”

“没什么。”

“你吃什么药来帮助睡眠？”

“麻醉片，为什么不吃两片呢？”

“一片足够了。我恨麻醉品。”

我起身穿过客厅，到卧室去找麻醉片，回来时手里摊着两粒小胶囊。我再去厨房打了一杯水回来，把杯和药递给莎莉。她毕直地跪在沙发上，像是冻僵了似的沉默不语，仿佛正在发呆。她机械地接过药片和水杯，呷了一口水咽下药，然后把杯递还我。我送回厨房再到客厅时，发现已经是凌晨两点一刻了。

“我要去睡觉了，”我说。“我已经筋疲力竭，明天上午还有事呢，下午得去渥太华。”

上帝知道，我的确疲倦了。骨头都似乎散了架，凯萨琳病危期间，我常常倦成这样，而且情绪低落，像感伤的民歌。可是当我解了衣，洗浴完毕，上床关了灯，我却仍然很清醒，不能入睡。

过了一阵——也许有半小时——我闭目静躺，感觉有谁进了房间。

“是我，”莎莉悄声地说，“乔治，我为刚才对你说过的一些话感到抱歉。”

我感到床垫承受了她的体重后在往下陷，不一会，感到她的手放上了我的额头，温存而又令人宽慰，这是我从来没感受过的。看来，这孩子有一颗慈母般的心，我一直猜想她有。遇上这位温存和蔼的姑娘，阿兰·罗伊斯将会多么幸运啊。

“你说我还没挣到这权利，”她轻声说，“这话真触动了我。中年人一定挺够受的，记得那么多往事，知道大家都认为人到中年自然就变得迟钝，逆来顺受。”

“我们当中有人早在死之前就习以为常了。至少我是这

样听人说的。”

从海洋般深沉的寂静里，我听见她说：“妈妈为什么嫁给了爹？”

“你为什么想嫁给阿兰？”

“我想嫁给阿兰，因为我认为我爱他，还有，因为我要孩子，想有我自己的家。”

“那就是你的爹妈想结婚的原因。”

“他也这样想？”

“当然一样。他想有个家，有孩子，同我遇见的任何人一样。”

“你是说他想有我？是说我的出生不是仅仅由于他喝醉了回家，一时高兴的偶然结果？”

“我的上帝，你这孩子，屁股呢？我真想揍你。”

“可我原以为你们谁也不想要孩子。”

“啊，看你说的多好听！”我说。

莎莉发出一声叹息，令人感伤的叹息声，接着她低声啜泣。

“你是说他真心想生我？他真是那样吗？噢，乔治，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感谢你，谢谢，谢谢！”

我感到她从我身边走开，我也在离开她。我不顾长途跋涉到了落基山下，在那儿我看见小山丘像棕色女人的身躯，远处高耸着白雪皑皑的山岭，我听见瀑布哗哗下泻，感到高山流水之间空气凉爽。然后黑暗隆隆地席卷过这景象，一只狐狸从松树丛林钻出来，眼睁睁地注视着我。

我听见莎莉说：“但你早在我爹出现之前就和我妈爱上了，不是吗？”

“是的。”

“当时你为什么不要娶她？为什么？”

“说来话长，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为什么？”

“没有钱。找不到职业。前景黯淡。太自负·萧条时期。但最主要的是缺乏勇气。”

她再一次用手抚摸我的额头，停放在那儿，我不知道谁成了小孩，是她或是我。

“妈在我这个年纪，相貌怎样？”

“我怎么知道？爱得太深了，视而不见。”

“当你和我妈还是小孩的时候，一起生活在湖边必定很有趣。”

“有趣极了。没有机场。离蒙特利尔不远。法国式的加拿大农场，石头筑的房屋，古老的仓库。”

“你第一次见到她，她像什么模样？”

“第一次见到她——真正地见到她——她周身穿着绿色的衣裳。”

“这不像是歌词吗？”

莎莉离我去后，万籁俱寂，我依然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月亮不再映照着窗外雪地上松鼠的足迹，城市静悄悄的，在稍纵即逝的凌晨三点钟，我躺在床上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凯萨琳的情景。我告诉莎莉的话一点不假，那天她周身确实穿的是绿色的衣裳。

第 二 部 分

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家住蒙特利尔西边圣路易斯湖畔的多沃尔。八月的早晨，我站在后院的沙窗门边，日头高照，蝉声聒鸣，热力正在湖面上聚积，我感受到这热力，尤其是它的湿度，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刚结束一次乘独木舟的旅行，从一个日渐短夜、初寒的地区归来。我们一共十八个男孩子，由弗罗比歇中学校长率领，从阿瑟港沿着苏必利尔湖北岸进入休伦湖直到乔治亚湾，再从那儿分头乘汽车或火车回家。我们观赏了因七人画家的作品而闻名的石头岛，穿过了僻静的山村——杰克菲希和玛雷逊，在营火上烤食过新捉到的鲑鱼和鲱鱼，清晨随日出而起，晚霞犹在天际便呼呼入睡了。

这时我过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回到家里，闻到清彻坦平的圣路易斯湖和湖里的蓑衣草散发出的气息，感到空气的热力，第一次发现蒙特利尔附近的这一带田野多么葱绿。我回到家了，庆幸而又骄傲。我是一个虔诚的孩子，深知自己

动作不灵活，不善体育活动，别的孩子不把我看在眼里；我一直向上帝祈祷，愿自己像别人那样健壮和出众。通过这次旅游，我发现自己固然笨拙，但起码身体结实，别的孩子也喜欢我。我能比大多数人扛得更重，可以不歇气地一连划桨几个小时。经历了这次水上和草丛中的冒险，目睹了野熊，耳闻了林狼嗥叫，现在回到水波不兴的湖边家园，重又置身于我所熟悉的蒙特利尔八月的热天，我发现母亲比以往更显得轻松自在，父亲更像一个孩子。

父亲又在玩他的老把戏。一个画着红白蓝三圈的靶垛竖在我家牡丹花圃上，父亲在靶前二十码地方站定，旁边围着一群小孩。凯萨琳站在我们家那颗独立的苹果树下，手臂上挽着一个盛满福禄考、玫瑰和晚开的翠雀草花的篮子。她笑着对我母亲说，那笑声很有感染力，要母亲别替她操心，不会出事儿的；假若真出了什么事，那是她自己的过错。母亲像平时那样说个不停，别人说的什么，她充耳不闻；而我父亲——我从未严肃地把他当做过父亲——他那护羊狗似的脸上现出温驯的表情，正拉开他自制的十字弓，不用说这弓箭同在金里科特^①使用过的箭一般厉害。那天早上凯萨琳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不清了——可能是白的，红的或蓝的——但她周围是阳光照耀下的绿色花圃，脚下是映上斑驳光影的绿色草地。在青春韶华的时光，我认为绿色与她最为相宜。

在斯图尔特家的院子里发生骚乱是司空见惯的事。父亲又一次差点儿射中人，而这一次恰好遇上凯萨琳。他把射靶

^①金里科特，法国北部的一个村庄，1415年英国亨利五世在此击败法国。

场摆在屋旁的草地上，谁要打后门进来，就得直接穿过靶场。使我跑到后门去的正是母亲惊骇的叫喊声，这时我的父母像平时那样只管自己说话，没有动气（他们从不生气），但彼此说的话一个字儿也不听。

“黑斯廷斯，你要射死了可怜的凯萨琳怎么办？”

“可是卡里，我们用的不是帕提亚箭，而是用的英国箭。”

“用英国箭射了不会长坏疽，”一个孩子说。

“斯图尔特夫人——”凯萨琳说话了，“你看不是一切都好好儿的吗？一点儿也没伤着我。”

“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黑斯廷斯，要真射死了凯萨琳，你有什么话说呢？”没有等回答，她转身向凯萨琳说开了：“你妈可真好，送我翠雀草花，我最心爱的花。它们总使我想到海军军官。瞧，黑斯廷斯，狗来了。”

我们家的四条狗，全都以英国海军将官命名，个头庞大，对陌生人十分凶狠，这时一齐冲出来团团围住凯萨琳，又是狂吠，又是扑跳。她努力挡开这几条恶犬；贝蒂和黑格曾受过父亲的训练，是专门扑向闯入者喉咙的两条猛犬，用牙咬住了她的花篮，想从她手上拖走。

“下去！”父亲高声叫道：“蹲下去别动。”

几条狗在凯萨琳周围蹲了下去，舌头伸得老长地悬着，两肋一张一弛地像风箱在鼓动，显得更比先前可怕。

“凯萨琳不会有危险，”父亲解释说，“她对靶场了如指掌。难道你不记得咱们表演威廉·特尔^①吗？射落彼尔头

^①威廉·特尔，据瑞士传说，是瑞士争取独立时与奥国作战的英雄，曾在奥国总督的命令下，以箭射落其子头上的苹果

上苹果的正是凯萨琳。”

“但愿射落苹果的真是凯萨琳，”凯萨琳说。“可是你们表演威廉·特尔那年，凯萨琳是个可怜的病孩子，病得连苹果都不能吃。”

“亲爱的凯萨琳，”母亲用她那夸张的一向使我不安的忧虑口吻说，“你那可怜的小心脏今天怎么样？”

“好多了，我几乎不感到它在那儿。”

“能感到它在那儿太可怕了，不是吗？那讨厌的小玩意儿在我们胸腔里砰砰地上下跳个不停。黑斯廷斯，把狗赶开，它们使我神经紧张。”

父亲命令狗走开，它们真走了。动物和小孩总是喜欢讨好他。然后，当凯萨琳和我的母亲交谈时，父亲转向孩子们，又开始了我听无数遍的独白。

“英国箭头采用这个形状的原因很简单，”他解释说，“帕提亚人制作的箭安了倒钩，你要拔出它们得撕破皮肉，中箭的人免不了害坏疽。可是英国人喜欢一箭解决问题。”父亲用手指亲切地抚摸着光硬的箭头，这是他在谷仓里的工作间自制的。“当这种箭头射中法国武士，它从眼珠直穿过后脑。英国人总是这样干，不射则罢，要射就干净利落，一箭结果性命。”

“干净利落与半死不活有什么区别？”一个小孩问。

“中了箭，又不长坏疽。”

“给咱们讲讲坏疽吧。”

父亲讲开了，仔仔细细，准确无误，令人讨厌。我没有听他讲，因为早听过了。他还津津乐道于遭响尾蛇咬与遭眼镜蛇咬之间的区别，同威灵顿较量与同拿破仑周旋的区别，

被狮子或灰熊咬的伤痕在大小上的差异。我一看见凯萨琳笼罩在从苹果枝叶间洒下阳光之中，便神魂颠倒，空中开始歌唱，由于她的美和一些莫名其妙的缘故，我感到头昏目眩。

我还没有露面她就离开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穿过大门到了路上，但我害臊，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跟随她。于是我退回屋里，从另一道门出去，通过邻居的地产，迂回绕道上了公路。一辆载满新鲜蔬菜的车吱吱地从我旁边过去，驾车的农场主人向我点了点头。凯萨琳在我前头二十码缓步走着，这时我看清她身上不再呈现绿色，但浑身光灿灿的，告诉你吧，我看见她周围绕着一道光晕。

她听见我的脚步声，转身叫道：“乔治！我还不知道你回家来了呢！”

我走上前去，瞅了一眼她的面容，便盯着地面。“哦，我昨晚才到家的。”

“好玩吗？”

“我想是的。”

“不用说，美极了！瞧，你进行了那样一次旅行。但愿我能，当然我办不到。不过，我也有新玩意儿给你看。父亲为我买了一条帆船，我已经学会驾驶了。这对凯萨琳说来，干得不坏。我终于逐渐进步了。”

我脱口而出：“逐渐进步？你尽善尽美。”

我们相互凝视，凯萨琳文静地走上前，双手搭在我肩上，仰望着我。她的一双眼温和，睁得大大地，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大提琴。

“说傻话！但说得动听呵！”

然后，她踮起脚尖，我感到她双臂抱在我的颈项上，两

片温暖柔滑的嘴唇吻在我嘴上；我们羞答答地彼此望着，那是我第一次神秘的体验。我看着她用手压了压乌黑的头发，那头发显得轻盈、满是生机，很快女王般的安详神情又回到她心脏形的脸上。虽然我对女人还从不了解，但我知道她白白的丰满乳房同棕褐色的胳膊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肉感的意象如此神圣，我脸都红了，生怕我的这些知识会显得亵渎神明。于是我盯着地面，看见她穿着拖鞋的一双细小的脚，脚趾似乎太大了些，那是由于患风湿病而指关节肿大的缘故。

“假如今下午有风，你来试试我的新帆船好不好？”

“你是说你真的需要我？”

“乔治，”她温柔地说，“你为什么用那种语气谈起你自己？”

“唔——”

“我不许你再那样说话。你瞧，比起我来，你可——对啦，驾船我不仅个子小，而且家里还不准我单独行动，因为要是起暴风，得立即收帆。还有，我想听你讲讲你的旅行。”

“可是许多人都想跟你一块去。”

她的手搭在我胳膊上，目光盯住我的眼睛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啰。”

“乔治，你太逗人喜欢了。”她转移了目光。“你难道没注意到，男孩子都怕我。为什么呢？他们的母亲教他们把我看成一个‘可怜的凯萨琳’，要他们对我和善，但同时又告诫他们别和我亲近，生怕有一天他们会同一个病人订

婚。”

“哦，不对！这不真实。”

“假如我是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爱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我也会这样做。”她拿开手，朝我嘲弄地一笑。“所以现在，我也警告你。咱们别再争论了。我一向喜欢你的父母，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要你警惕我。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害风湿病的情形吗？那整个冬天，你是来看望过我的唯一孩子。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正月的一天早晨，母亲差不多是命令我去看看可怜的凯萨琳·卡里。她病了，病得挺厉害。那天，霜冻很重，整个圣路易斯湖面白绿白绿的，像是在阳光下被北冰洋的寒风侵袭过的萨斯喀彻温草原。凛冽的寒风刮起一团团晶亮的雪块，阳光照耀，我沿着湖畔大道朝卡里家走着，飞扬的干雪花扑进我的眼睛。佣人把我让进屋后，我看见卡里夫人穿着围裙从楼梯下来，听她说话的语调，我知道她为我的到来感到高兴。

我一向对凯萨琳的母亲没有好感，凭着孩子所知的那些事，我感到她是一个怨这恨那的女人。她比丈夫年轻许多，大家反倒喜欢他。

她对凯萨琳说，声音里没有热情：“在这样的天气，乔治来看望你还不好吗？不是每个小孩都乐意这样做的。”

凯萨琳坐在床头，头上扎着一条丝带，肩上披着披风，她的面孔又瘦又苍白，眼睛显得特别大。一个孩子的脸上能有这样富于人情味的表情吗——聪明、懂事、心里一清二楚？她渴望生活，但又明白受了限制，身不由己。她希望令人满意，但又明白她的病体——她的自我——不能取悦任何人。

她脸上的这种表情，我后来经常见到，仿佛在清楚地表白：

“请大家别见怪，别责备我，我不想害病，我想同大家一样。”

卡里夫人离开我们后，凯萨琳说，“医生告诉我，我发的高烧他从未见过。”

“那一定很高。”

“我也经受了他所见到过的最剧烈的疼痛。”然后，她的左眼睑微微一垂，古怪地微笑了，她的面孔仿佛在说：

“我乐意呆在上。请别管我，因为我渴求生存。”

“我想你很快就会出门下地，”我说。

“哦，是的。”

“我们原打算下午玩冰球的，但雪覆盖了冰场，我看不行了。”

“你们不能把雪铲去吗？打冰球一定挺有趣。你很在行吗？”

“噢，我不擅长这类玩意儿。分组时他们总是到最后才挑选我，有时他们甚至不让我参加。”

“他们太小气了。”

“不，我想这仅仅是因为我笨拙，像我姑母艾格尼丝说的。她说我会老是笨手笨脚的。”

我们就这样谈下去，然后她在被单下高兴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无病无痛是世界上最惬意的感觉，”她说。“有一桩事我知道，但你却永远不会明白——能看见松鼠回来该多好啊。”

“松鼠？”

“当然。我以为自己再看不见松鼠了，但今天早晨，我那只灰色的老松鼠到窗前看我来了，我妈给了它一些果仁。一切都是妈为我操劳，她太好了。”

自那年正月以后，春去冬来，凯萨琳长大成人了。而现在，她像一个大姑娘那样朝我微笑。

“从现在起，我的身体将好起来。乔治，我敢保证。”

“见到你的人谁也不会以为你害过病。”

“不用说，我不能远行，也不能游泳，只能泡在水里乘凉。但是我能扬帆，说实话，我自己觉得身体满好。”

她的个子矮小，却又挺有气派，庄重而又富于魅力。那年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书，尽管玛丽究竟像什么模样我毫无印象——事实上我相信她很高大——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我现在见到的凯萨琳：黑头发，深肤色，勇敢而又带着一丝儿失望，黑暗里燃着一团火光。

可是，她也讲求实际，大大方方。她轻松愉快，毫无雕琢的痕迹，这是我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她企求快乐。她捏了捏我的肌肉，做了一个鬼脸，夏天划船之后我变得如此结实，她露出一副惊骇的神气。

“好吧，我想刮风时能在船头挂起三角帆。你真需要我帮你划船吗？”

“我是一个自私而又固执的女人，乔治。不错，我需要你。”

“什么时候去？”

“午饭后尽快出发。你打声口哨好吗，乔治？你应该知道怎么吹口哨，你父亲是这湖上一带最会打口哨的人。”

“干这类蠢事儿他最拿手，谁也敌不过他。”

“但是，打口哨可不是蠢事儿。第一流的水手都会。”她笑颜逐开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一条船，现在有了船，我真说不出有多高兴。像是”——她灰色的眼里突然热泪盈盈——“乔治，几乎像是一切都正常了。”

二

就这样，那个夏天我进入了阿卡狄亚^①，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萧管乐音四处可闻，上帝的荣光八方普照。那个夏末万紫千红的绚丽美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翠绿的田野，浅绿的花园，粉红的福绿考，熟透的红苹果；云淡天高，满天猩红金黄的落霞晚照；高山倒映在柔和的湖里，湖面的游艇一动不动。甚至夜间也亮沙沙的，明晰可见。月亮上升之前，它像暗黑的鹅绒；月亮升起来后，我和凯萨琳沿湖畔漫步，闻得到蓑衣草和禾苗的气息，生长作物的清香，腐败物体的恶臭；她走在夜里，在我看来，一团洁白。

但在那个夏天，除了我们彼此相爱，还有别的事发生。假如童年是一块花圃，那时它的门是对我们紧闭的；自此以后，我们便被排斥在外，甚至在我们出生的村社也成了局外人。

蒙特利尔现在成了国际城市，具有国际都会的种种景象，但在那时，正如一个法国访问者所描写的，还只是一处被稠密的法国村庄包围的英国卫戍要塞。士兵泡在银行、信托所和国民保险公司，将军是董事会的要员，官阶次一等的

^①阿卡狄亚：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比喻可以享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

军校是维持局面的执事。讲英语的这个蒙特利尔要塞，地处北美的法国岛的心脏，稳若磐石；在这座要塞里，人们需要知道的事物都能不假思索地得知。如果你生在其中，天性相合，你的道路从童年起便宽阔平坦。我和凯萨琳生在这儿，但我们俩却与之格格不入，我们的两个家庭也与之大相径庭。

卡里先生要是当一位大学教授也许心情舒畅些，但他独断专横的父亲执意要他成为一个信托所的职员。要是世上有谁曾默默地度过绝望的一生，那便是他。他沉默寡言，个头矮小，举止庄严，从不高声讲话，喜欢种植玫瑰，爱好阅读书籍，厌恶自己谋生的职业，却又一声不吭。他三十多岁结婚，与妻子不相匹配，妻子当新娘时刚到二十芳龄。凯萨琳是他们的独生女。

尽管我一直不喜欢卡里夫人，现在我才明白，她值得别人尊敬，至少应当受到同情。她长得俊俏，颇有爱德华时代的风度，要能频繁出入社交场合，她会出人头地，志满意得的，可是她丈夫的书呆子习气使她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她坦率真诚，热情奔放，但缺乏耐心。她把心思放在凯萨琳身上，孩子的疾病给她带来沉重负担，她虽然感到愤懑，却也一往深情。

那年夏天，随着凯萨琳长成一个姑娘，卡里夫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绝望地把自己视为一个青春早已逝去的人。她变得性情急躁，动不动发凯萨琳的脾气，而凯萨琳年轻气盛，也不示弱，常常与她作对。

“今年秋天我要去上麦吉尔大学，”凯萨琳告诉我。
“妈说不行，我说要去。我要到欧洲去，去工作，去做我妈

年轻时所做过的一切。妈说我体质柔弱，但我不愿做一个病人，决不！即使我只活上十年，我要让这十个年头过得充实。”接着她谈到把一支蜡烛的两头一齐点亮就会放射出可爱的光芒。

八月底，她对我说：“乔治，今年秋天你必须同我一起去上麦吉尔大学。”

我分辩说，我得回弗罗比歇中学去。

“今年春天，你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你可以上麦吉尔大学。去麦吉尔吧，乔治。快快去吧。”

“可是，如果我回弗罗比歇中学，我会当上级长^①。”

“那有什么区别呢？”

在当时，对我说来区别可大着呢。我的姑母艾格尼丝嫁了一个耳里长毛、面色苍白的大牧师（他是要塞里上层集团的精神导师之一），她一直坚持要我在弗罗比歇中学当级长。就麦吉尔大学而言，她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学校，因为她认识校务会的每个成员，但那地方接收了城里一部分她称为不三不四的人入学。换句话说，麦吉尔没有社会地位，而弗罗比歇这所私立中学却有。她决心要我去弗罗比歇当级长。

凯萨琳对这些大加嘲笑。

“那太陈腐了，仿佛蒙特利尔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实际上乏味得很。瞧你的朋友杰克·布坎南。我一想到弗罗比歇中学，就不由自主地记起他。我可以立即写一部杰克的传记。他将去皇家军事学院，当一个军校的高年级学员，然后到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个机构加入糟糕的军团。他会娶一个他

^①级长：私立中学的一种职务。负责维持学生纪律。

这号人向来倾心的那种女人。到二十八岁，他将有三个孩子。不出十年，他会有一个又一个的情妇，同时腰身渐次变粗。等他五十岁时，他的长相会与他父亲此刻的形象一模一样。到了七十岁，他会是各种董事会的成员，他的孙子将会同他现在一个样。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乔治，我也不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受得了。”

那年夏天，凯萨琳很专断；她心里一直如此，这个任性的姑娘感到，假如她迫切地想要什么，那东西便会有人从她那儿拿走。她渴望展翅高飞之际，不惜反叛她的整个经历；就在当时，我知道她对蒙特利尔不公平。这座居住着法国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古老城市比她更聪慧，外表上冷酷无情，内心却是仁慈和善的。要是你热爱这城市，它会把你心给你，虽然不给你钱袋。前不久，一个精明的女人对我说，蒙特利尔的真面目反映在它的老一代家庭的妇女脸上，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即使并不美丽，却竭力给人以美的幻觉，从而感到自己被人欣赏，甚至被人钟爱，而且不止被一个男人。尽管如此，她们都品行端庄，维护自己的美德。蒙特利尔的人对于至关重要的大事保持沉默，并不真正意味着虚伪，而是他们对于自己冷静判断、精心挑选的复杂生活在进行保护。可是那个夏天，凯萨琳桀骜不驯，我也一样。我让她替我作主，我决心去上麦吉尔大学，不顾艾格尼丝姑母的反反对；而姑母的反反对似乎不如想象的可怕，由于我在恋爱，那个夏天她自己又去欧洲了。

现在该谈谈我自己的家庭。我已经讲了不少，足以表明我家很乖僻，但还没有充分阐述像我父母那样的夫妻，如何

能在这个需要栖身和开销的世界上生存下去。我有一个大我六岁的姐姐，伊迪丝，比我离开家早两年，嫁给旧金山的一位工程师。我已经有十五年不见她了，我提起她只是为了说明我不是独生子。伊迪丝不出现在这个故事里。照我姑母艾格尼丝的说法，她长得像我的外祖父，但我从未见过他，我只好相信姑母的话。

我的祖父更为活跃，至今在蒙特利尔还有人提到他。他是一个商人，手段残忍，性情古怪，酷爱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挣了一份可观的产业之后，由于企图在南美修建铁路，弄得破产了。他在遗嘱里把房屋和家具留给了艾格尼丝姑母，把其余的资产给了我父亲。他把我的两位叔叔全然撇在一边，只以如下隐晦含糊的字句安抚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阿瑟和詹姆斯，将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给你们任何遗赠。其实，你们俩是唯一给与了真正财富的人。我给你们遗下两件无价之宝：我所特有的渴求财富的本能和你们对父亲的抱怨。无疑，它们将推动你们走向成功。”

假若我的两位叔叔肯利用我父亲的乐天派性格，也许已经从父亲手里夺走了这份遗产，但他们一向鄙视他，并错误地欺侮过他。而且有姑母为我父亲撑腰，不准许他转让分文。于是这个家庭永远地分裂了，尽管迄今我在蒙特利尔还有两位殷实的叔叔健在，但除了知道他们患关节炎外，别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父亲的能力中庸，他在湖畔成家立业，开始从事发明创造。他登记了十九种专利品，全是军事器械，有几种还很别出心裁；但除了一件之外，其余的发明都有某种缺陷。他发明的磁性水雷比德国人制作成功早二十五年，但被仓库里的

一只老鼠引起爆炸，险些叫全家丢了命。他造的机关枪发射很快，但热得叫枪膛熔化。他唯一的一桩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是一副大钢爪，能够固定在火车头的后部，并下放到适当位置，它能随着机车前进把枕木折断，其目的在于部队撤退时用来破坏铁路。英国作战部的人很感兴趣，父亲要是没去伦敦同他们面谈，他们有可能已经买下了。

经过这番挫折之后，父亲再也提不起劲头，于是乐天安命。他会不时去登记一项新的专利品，但他真正的职业是与儿童游戏，读儿童书，看战斗故事，以及其它任何谈到毒蛇、猛兽，士兵和水手的习性的书籍。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成吉思汗，他最感兴趣的爬行动物是非洲的黑毒蛇，他最喜爱的动物是加拿大的灰熊，他坚持认为，灰熊能折断狮子的背脊，如果它能先下手的话。他还是我所知道的最和善的人。他从未看过任何人暴死，一生中没有打过人，他伤害过的唯一动物是一只偷吃了母亲芦笋的土拨鼠；这只动物临死时的责备目光，在他记忆里萦绕了许多年。尽管我们家里挂满了步枪和滑膛枪，他从不多置弹药；射击时，他用草把子和罐头盒当目标，罐头盒是他假想的敌舰。他在我家地产上到处设陷阱，捕捉臭鼬、麝鼠、水獭、松鼠和土拨鼠，可一旦捉住，又总是将它们释放。当他大发善心一一放走它们时，确有无数的臭鼬向他喷臭气。有一个夏天，每当他身上打湿了水，周身便散发出死臭鼬的气味。他有一项发明以善心为出发点，这项专利的发明要不是破费太多，也许很有用处。这是一个捕鼠器，安有自动为被捕动物注射吗啡的装置。

关于我的家就谈这些。我不指望你都信以为真，但这些恰好是事实。最后再加一句：我的父母原是一见钟情。

八月转入九月，天气仍然暖和。月亮离开了我们，得在地球的另半部分呆半个月，但没有月光的夜晚同温热的牛奶般暖融宜人。过了劳动节^①，突然刮起一场风暴，这在魁北克倒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接着便是从北极长驱直入的寒流。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地面严严实实地盖了一层白霜，湖面弥漫着浓雾，太阳透过迷雾仿若一只铜盘。整整两天，湖边不见儿童的踪影，大家都呆在家里围炉烤火。然后寒潮像来时那样疾速突然，迎着从美国刮来一股温暖气流，便顿时隐退，出现了晴暖宜人的小阳春。拔锚机嘎嘎响着，游船纷纷从湖里吊出来，孩子们收拾好网球拍，又去上学；橡树枫树变成铜黄和金黄。弯弯月牙再度出现。一天上午，我走过一片正在燃烧落叶、烟雾弥漫的原野，到麦吉尔大学去注册攻习五门功课；然后买了教科书，再回家度过最后的几天假日。

一种内心的悸动同时发生在凯萨琳和我的身上，我们感到难以交谈，现在临到快揭晓的时刻，大家都变得害羞了。这个时刻发生在九月的月圆之夜。

明月傲然升起在城市所在的东北方向的暮霭之上，越过一堆散乱的云层，进入浩邈的天庭，皎洁的月光隐去了群星，然后往南移动，停留在湖面上空。月吐清辉，光照大地。凯萨琳和我见面了，手挽着手，踏过带露的草地，来到泊船的码头；我们知道这儿不会有人，因为划船季节已过，游船已经吊出湖面高高搁置。人们往日坐着观看船赛的长

^①劳动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加拿大和美国对劳动者表示敬意的法定假日。

凳，仿佛泼了水银似的熠熠发光，我找了一条旧麻袋，擦干一条长凳。我们手拉手地并坐在一起，整个世界的光辉都投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彼此相握的两手都在颤动，我不能相信坐在她身旁的是我自己，正在领略这不可思议的魅力和美的感受；因为我原先只认为自己是个中学生，略微有点胖，长着一张被我姑母描写成像一块难看的松饼似的脸，具有同我父亲一般和善的痴呆性格，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希望自己是一位英雄，却偏偏生来笨拙，长大后怯懦怕事。然而，凯萨琳的手就握在我手里，月光下我看见她的侧面，白皙的皮肤下隆起有力的颧骨，一双安详沉静的大眼，两抹优雅的、微微上扬的眉毛。这样看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了，从此不再是一个孩子。

她好像听见了我童心破裂的声音，就在这刹那她转过头来，我立即亲吻她。我脑子里浮现出带着露珠的果园的景象，可是她的双唇温柔，微微伸缩着；她双手捧住我的头往下移，直到我的耳朵触到她身子，我感到她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这是我第一次贴近一个女人。她拿起我的双手，引向我的头刚才靠过的地方，我拥抱她，我的双手仿佛正在接受两只圣杯。她轻声地呼唤：“乔治！”我也轻声地呼唤：“凯萨琳！”

她说：“昨晚我睡不着，老在告诫自己；我们太年轻不能恋爱。可是我们却在恋爱了。”

“唔。”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长大成人了。”

“是的。”

圆月俯视，圣劳伦斯的河水轻轻地冲击着芦苇，刚好能

听见汨汨的水声；远处的航道上，一艘光亮的船在徐徐移动。

“乔治？”

“唔。”

“除非我讲出心里话，否则不能活了。我爱你，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唔。”

“你爱我，那也是你的心里话吧。”

“是的。”

“乔治，我太不公平！”

她转过头去，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我，我感到她的激情像一股有形的力量从她身内迸发出来。我告诉你，我感受到了她灵魂的冲击。我的身体渴求她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渴望得到她的灵魂。怯懦地、探求地，我装作做一个抚摸的动作，朝她的面颊抬起手，发现她两颊泪湿了。她冲着我吻来，我感到她的泪水暖暖的，咸咸的。我知道她不再像一个孩子而像一个女人在哭泣，可我不明白究竟。

“我这样渴望生活，”她轻声地说，“强烈的渴求迫使我对你不公平，使你与我相爱了。我多么希望你爱我，可我又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呢？”我轻声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永远不能结婚，永远，永远不能。”

“为什么？”我茫然地重复着。

“因为我永远不能生孩子。”

我又一次问她为什么，她说：“请别装傻了。向别的任何姑娘装傻吧，别向我。”

“你的心脏现在不是好些了吗？”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带着她那古怪的直率神情说：“亲爱的，把你的头俯到这儿来听听。”

我再次埋下头，感到她的胸部温暖、圣洁、丰满，承受着压力；这瞬间我所能想到的是她多美，我所能感到的是内心的惊叹：把她握在手里的是我。

“听，亲爱的。”

这时，我第一次听见那埋伏着危险的内在器官——凯萨琳的心房——的跳动：咚克哈，咚克哈，咚克哈，接着是全然无声的停歇，之后又有一点儿模糊的响动，最后它又接续下去：咚克哈，咚克哈，咚克哈。

“扩大了，”她直率地说，“两片心瓣都坏了。有这样一颗心脏，我根本不能生孩子，因此我永远不能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下地之前我就会丧命。”

“这你怎么知道？”

“去年医生来时，我听见他对父亲谈的，当时他们不知道我在屋里。医生对父亲说：‘我想凯萨琳可以结婚，但这一点必须明确，绝不能生孩子。她有这样一颗心脏，分娩的阵痛，更不要说分娩的时刻，便会送掉她性命’。医生走后，我看见父亲坐在花园里，从他的脸上便知道他刚哭过。他没有从自己的婚姻中得到多少幸福，但他知道婚姻能给人多少欢愉，他希望我能得到它，这就是他悲伤的原因。像我这样的女人，乔治，只会给爱她的人带来悲哀。我父亲明白这点，他哭了。”

我凝望着湖面，闻到芦苇的气息，两眼随着船的灯光，

沿航道往苏兰基运河方向缓缓移动。

“凯萨琳？”我轻声地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说吧，这是我的请求，只是你得对我说实话。”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我说。

她激动地推撞着我说：“千万，千万别让我再听见你这样说自己，你很可爱。”

“我永远也不能这样相信自己，凯萨琳。”

“那现在就相信吧，因为你听我说了。听我说，乔治，我不同于你认识的任何别的姑娘。我比她们都要老成，真的。假如我身体健壮，有时我想，没有什么事我干不了。我不在乎是活上一年或者三十年——哦，是的，我也不在乎。但我知道，要紧的是怎样生活，而不是活多久。我希望活着，但不想仅仅为了我自己的愿望而伤害任何人。不伤害你，你是我在世上最不愿伤害的人。我知道你可爱，如果我这样说，你就得相信，因为我希望你爱我，而且要是一个人自暴自弃，他永远不可能去爱另外一个人。我只恨一个人，那就是你的姑母艾格尼丝，我恨她的理由，正是她对你造成了损伤。”

然后她把面庞从我身前移开，在皎洁的月光下望着我。

“别害怕，乔治。我能给你的都接受吧。请接受我，使用我。让我帮助你，使你不再是一个胆怯的孩子，然后你会变得老练些，娶一个身强体壮的女人。”

她亲吻我，那成熟的热情不亚于我日后在她身上所发现的任何情感。月亮继续俯视着我们，我们相互挽着手臂坐在寒冷潮湿的长凳上，直到一块浮游的云层最后遮住月亮，湖

面闪现一片银白之后变得幽暗。

她说：“只有你才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弱小的病姑娘。”

我说：“只有你才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人们总爱带着鄙夷不屑的态度谈论童年时的恋爱，我的童恋却和我跨过童年之后的任何情感一样强烈，当我发现所有的爱情都是在死亡的过程中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起身回家，彼此紧紧地挽着手。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自己处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外面的情景也确实如此。房屋在颤抖摇晃，我从窗户往外望，看见湖上的波浪掀起有四呎高。浪涛急促地拍打着湖岸，狂风削去浪尖，拨溅的水花像冰雹般喷向屋子前沿，树木在狂风暴雨中嘶叫和呻吟，树身变得又黑又滑，黄叶在空中飞舞，到处红黄点点，阳光照在铺地若毯的湿叶上。小阳春结束了，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田园牧歌式的幸福时光。另一组门关锁上了。当我去用早餐时，发现父母面面相觑，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望着我。

“你的姑母刚从城里打来电话，”母亲说，“恐怕明天她要来这儿同我们呆在一起。”

“哦？”我说，在桌边坐下。

“她已经听说你和凯萨琳的事了。我想得先警惕你一句。她还听说了你去麦吉尔大学的事。”

这可真是一个子女成长的家庭！在这个家里，我双亲一听姑母到达的消息，立即变成一对吓破了胆的孩子。

三

第二天上午，天色晴朗却又寒冷，艾格尼丝姑母在中午时分来到了。她一进屋就表现出一副主人派头。由于我对这些早已见惯不惊，不认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当她对父亲说道：“我要单独同你谈谈。”而他居然乖乖地跟随她进了他的书房，他十分钟后出来时显得侷促不安，浑身打颤，站也站不住，他告诉我们午饭准备好了，尽管实际并未就绪。

午餐时艾格尼丝姑母戏剧性地保持着沉默。吃完饭她才转向我说：“我是专程来与你谈话的，乔治，”她说，同时针对我的父母补充了一句：“我和乔治谈话时，不希望被人打扰。”

这下轮到我进书房了，房间里摆满了儿童读物，军事史，还有一条塞满填料的大蟒蛇，简直荒诞极了。

“坐下，乔治，”艾格尼丝姑母说，她自己在一张马鬃椅子上就座，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有四位素不相识的叔叔，他们都憎恨艾格尼丝姑母，其中说话最粗俗的一位据说曾经声称，如果她在妓院，会是一个出色的鸨母，莱斯利叔叔也许说对了，因为一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的人，惯常与那么一个角色联系在一起。艾格尼丝姑母蓄着亚历山大女王式的刘海，并且染了色。她脚上穿着小巧的黑钮扣鞋子，身上的绸衣沙沙作响。我相信她还穿了鲸骨背甲，要不然她的胸腰看起来不会那么挺直。现在回顾她的身影，我突然想到倘若她是另一类型的女人，也许对男人会颇有吸引力，像某些美妇人那样，因为她紧胸束腰，身材苗

条，有一副悦耳动听的嗓子，身高五呎零半吋，甚至她下巴上那颗小痣也会为她增色，要是她想惹人注目的话。可是她并不是这种人。

“乔治”，她用她那悦耳的声音说，听起来通情达理。
“我知道这个夏天你干了两桩蠢事。”

我咕咕哝哝地否认。

“首先是那个卡里姑娘，其次是麦吉尔大学。”

“凯萨琳怎么样？”我顶一句。

艾格尼丝姑母像是我的祖父一般愣住我，一时陷入了戏剧性的沉默。

“你是说不知道她害了什么疾病？”

“凯萨琳现在不是病人了，”我说。

艾格尼丝姑母从窗口外望，我循着她的目光，看见父亲两支胳膊下夹着臃肿的东西匆匆从屋前过去。

“在通常情况下，”她平静地说，“童年的迷恋并不比出一次风疹厉害，但目前你和卡里姑娘之间的情形太危险了，必须趁早收场。”

“你这是什么意思，艾格尼丝姑母？”

“这很容易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已经不可收拾了。我爱凯萨琳。”

她向我怜悯地一笑：“在十七岁的年龄？”然后她突如其来地说：“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相信你的确爱这弱小的病人。如果她回报你的迷恋，我不会感到奇怪。你们俩都是跛脚鸭子。不错。”她那小而发亮的眼睛盯着我：“我想她喜欢你吧？”

我点了点头。

“当然，她和一个残废人差不多，有了她那样的一颗心脏。有人告诉我，她长得挺俊，尽管我自己看不出来。事实上，她要是装了一条木腿而不是有那样一个心脏，情况也好得多。自然这孩子会对你感恩戴德，那怕你只是看她一眼。残废人总是感激别人的怜爱的，尤其是残废女人。是的。我能理解，即使来自像你这样的人的关注，她也会感激涕零。”

我感到面红耳赤，又气又恨，但想不出对答的话。

“我请教过一位医生，”她继续平静地说，“他懂得像她那样的病例，这种病完全是不可医治。只要她活着，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当然她目前看起来满不错，可她自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艾格尼丝以同样平静地口气问道：“这个卡里姑娘可曾偶然地向你提起过这事儿？”

“她当然谈到过。”

“看你多傻！你不像你父亲是个白痴，但也是个傻瓜蛋。”

我绷着脸看着她。

“我相信我低估了凯萨琳，她比我想象的更狡猾。她利用了你的男性殷勤。女人总爱玩那一套，而男人却傻乎乎的受人愚弄。我猜是她建议你去麦吉尔的，不顾我的计划？”

我没有吱声。

“原来如此！我就知道猜对了。”

长时间的沉默，我感到耳朵烫得像两团火。

“乔治，”隔了一会，艾格尼丝姑母才说：“我想你该明白，是你认真考虑自己前途的时候了。”

“我一直在考虑。”

“是吗？你打算干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艾格尼丝姑母。”

“你认为能获得哪些成功？”

“噢，我想会在好些事情上。”

“不会是好些事，乔治。你对商业一窍不通。商业不吸引你，对不对？”

“对。”

“再说呢？我看你不是当律师的材料，你缺乏从事法律的智力和干劲，很快你会感到厌烦。我设想，只有一项职业你可赖以勉强谋生，那就是当中学教师。不用说，得在适当的中学”。

外边噼里啪啦响起一阵枪声，艾格尼丝姑母扬起下巴。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那是父亲。”

她抬起眉头，想得到更具体的解释。我感到既惭愧又气恼，父亲竟然让这么个女人进入他的家，让她欺侮咱们，我不好气的说：

“他在同小孩一起发射炮弹，他自己制造的。他造了德国军舰的模型，现在正和孩子们一齐向舰艇射击。他们在表演日德兰战役。^①”

艾格尼丝姑母仔细打量我，然后和颜悦色地问我：“你知不知道在成人眼里你父亲是个什么形象？”

我避而不答，她也没有追问。

“乔治，”她接着说，“今年六月我乘船去欧洲之前，

^①日德兰战役：英国和德国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的一次主要海战，在日德兰半岛以西七十哩处进行。

我认为已经同你达成了明确的默契：你将回弗罗比歇中学去担任级长。蒙特利尔是一个男子汉角逐的城市，而当一个级长等于加入一个有趣的俱乐部。但在麦吉尔大学上一年级，你在一群犹太人中只会是个小不点儿。”

“我已经和你的校长谈了，他相信如果你肯发愤，今后会在大学得到一个二等学位的，而那就够你在一所良好的私立学校谋到一个职位。”

又是一阵沉默。

“如果作一个中学教员，你将挣多少钱？”她继续说。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我根本不希冀当中学教员，咕哝了一声不认为会挣多少。

“开始每年大约一千元，除了食宿，”艾格尼丝姑母说。

“还会逐渐增加。在中学、教会和船上干事，薪金绝不会丰厚，但可以得到其它补偿。当一个牧师，船长和中学教员算是有一个职位。到四十五岁，如果你干得不坏，有可能当上校长。”

“面对这样一个生涯——一个具有你那些弱点的人，这是唯一可能的生涯——你在选择妻子问题上必须一丝不苟。显而易见，至少在十年或十多年内连考虑结婚的事都是十分荒谬的。但当时机成熟，你必须娶一个类型适当的女人。

“对于你来说，这个类型适当的女人应当是一个有钱的年轻女子，她一向认为自己的长相平常。你的相貌到二十多岁会有改善，三十岁后又会逐渐恶化，直到五十岁为止；不过到那时，你的相貌如何，已无关紧要了。”

“你必须设法娶一个相貌不扬的女人，你得讲究实际，善于克制自己。这种女人为数众多，我已经注意到几个可能

的适当对象。她们会成为良妻贤母，因为单是能够出嫁就会令她们感激不尽。有了一个娘家殷实，相貌平凡的女人，个人又有一份收入，你这辈子就算小有成就，相当不错了，我们的家庭便不会消失解体，很可能你会生儿养女，她们兴许会有所作为。”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已经和你的哈里叔叔商量过，他同意我的意见。”

“所以，你必须回弗罗比歇中学去，昨天我去麦吉尔大学见了注册人，撤销了你的入学手续。因此，一切都办妥贴了。”

我发火了，脸红筋涨地站起来。

“我不干！”我说，“我要上麦吉尔大学，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坐下，乔治，别发傻。”

“我不坐。”

“可别像个孩子。”

“那么别再把我把当孩子。”

她眼睁睁地瞪着我，我感到她那钢铁般意志的威力；我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处于她的淫威之下，它使我瘫痪无力，毫无办法。我终于坐下，忧郁地盯着地面。

“说实在的，乔治，在这桩事情上你没有选择余地，你父亲将把钱寄到弗罗比歇，不会寄到麦吉尔。我已经对他说了，就这么办。”

这时她站起身来，不快不慢地离开了书房。

几分钟后，我也离开了。湖面上炮弹还在噼 噼 啪 啪 地响，我看见父亲的小船一字儿在前方行驶，小船周围水花泼

溅，但条条船都似乎安然无事。母亲焦急地从楼上下下来，开始和艾格尼丝姑母谈话。我红着脸，垂头丧气地从她们身旁经过，走出屋子上了去卡里家的路。我敲了敲门，没人开门，这才记起凯萨琳说过，那天她要和她母亲进城。我心情恶劣，自暴自弃，独自消磨掉了那天下午的剩余时间。

喝茶的时候我回到家里，发现艾格尼丝已经走了，我的父母在客厅里吃着果子面包。父亲装做视而不见，然后开心地耍起孩子气来。

“乔治，今天下午你该和我们一道。我们击沉了四艘德国军舰，孩子们和我一道干的。炮弹性能好极了。我们击沉了国王号、皇帝号、摄政王号和一条巡洋舰。这比贝蒂和杰利科在日德兰海战中击沉的还要多。”

我坐下来，一言不发。

“亲爱的乔治，”我母亲说，“喝点茶，吃块面包吧？”

我摇了摇头，父母显得侷促不安，像两个小学生在不被允许去的地方被老师发现了。

我终于说道：“艾格尼丝姑母干吗到这儿来如此对待我们？”

“是呀，”父亲说，“对，你知道她是个嘴硬手软的人。这个姑姑，”他接着对母亲说，“你知道她像谁。恐怕她自己心里最有数。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你知道，聪明透顶，一向如此。”

“她是个可怕的女人，”我说。

“乔治，”我母亲说，“别这样说你的姑姑。”

“她对我说，你不让我上麦吉尔大学，”我对父亲说。

“唉，我想不完全是那样，小伙子。你的姑姑关心你的前途，把你放在心上哩，尽管她手软——我是说她嘴硬——她心里一清二楚，小伙子。”

“看来她也欺侮了你？”

“唉，小伙子，那样说太过份了。”

“我可以去吗，父亲？那是我唯一的请求。我可以去上麦吉尔大学吗？”

他紧张不安地吞噬面包，极力表现出明智的态度。

“好乔治，你的艾格尼丝姑姑对我说明情况时，我意识到自己对那事儿考虑欠周。”

我瞧着他像一个孩子望着他父亲，知道父亲害怕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到底，”父亲继续说，“你的姑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要是没有她，我们不知落到了什么地步。你的祖父死时对我说，在重大事情上必须经常听取她的忠告，幸好我这样做了，不然，我们早就上无片瓦下无立脚之地了。”

我无精打彩地凝望着我的食盘。

“小伙子，”父亲强作笑颜说，“童年时代的一年有什么要紧呢？你现在乖乖地回到弗罗比歇。你将当上级长，那比我这辈子干过的事强多了。下一年你就上麦吉尔大学，说话算话。”

“如果我现在不去上，”我猛地站起来，“就会永远无法解脱出来。”

“从什么解脱出来，亲爱的？”我母亲问。

“啊，我的上帝！”我说着，径自奔向门口。

我听见母亲在背后悲伤地说：“我希望你在凯萨琳面前

千万别这样诅咒发誓的，她太脆弱了。”

“啊，我的上帝！”我又重复了一句。在外边门厅里，我用拳头猛击楼梯扶手的柱子，手关节的皮肤都砸裂了。

四

艾格尼丝姑母是个不含糊的女人。几年以后，我遇到一位年长的贵妇人，她谈到姑母时告诉我，说她是一位持有政见的女人，只是未获成功。她嫁了一个面色苍白，耳朵长毛的无赖，听觉不灵，而且懒惰，感觉迟钝。她自己没有孩子，几乎没有别的任何消耗精力的途径。她太势利，不愿和妇女俱乐部交往，还视之为中产阶级和美国的玩意儿，这也许是她觉得受了比她更有钱的人的怠慢。她遇见过凯萨琳父母，鄙视他们；她见到凯萨琳本人，厌恶她。她是否喜欢我，我始终不知道，但我不喜欢她这一事实确实使她愤愤不平。

艾格尼丝姑母一回到蒙特利尔就写信给凯萨琳，一个有经验的妇女对一个年轻姑娘写的那种信，她残忍，却表现得委婉；她明白凯萨琳的痛处，切中要害的加以打击。她表示同情她的心脏状况，钦佩她勇敢地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但她明白无误地向凯萨琳指出，她和别人都满以为凯萨琳会接受现实，懂得要是她打算像别的女人一样生活，那是有罪的，会毁了别人。她告诉她，我生性懦弱，开诚布公地谈到我父母是什么类型的人。她没有责备凯萨琳对我施加影响，却指出她的确这样做了。

凯萨琳给我看了这封信，我读信时她注视着我的面部表情。我感到对抗不了，孤单无力。我那时只有十七岁。对自

己从来没有任何信心。我的表情背叛了我，凯萨琳第一次对我变得很严肃。

“我绝不想撞进你的生活，乔治。”

奇怪而又老成的话语从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嘴里吐出来，我太怯弱，不敢正视它的含义。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那天我离开她时，她的面孔冷冰冰的。

两天过去了，我们没有见面。接着，艾格尼丝姑母传话来了，我回弗罗比歇中学的事全都安排妥当，尽管秋季学期已经开始。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打好背包，然后在秋风瑟瑟中独自沿着湖畔小道漫步，我熟悉的那些亲切去处都丧失了生气和欢乐，一片凄清。夜幕降临后，我和父母呆在一起，郁郁寡欢，一言不发地吃晚饭。

“打起精神来，小伙子”，父亲说，“只不过再呆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今晚不去和凯萨琳告个别？”母亲欢快地建议道。

“不，”我说。

可是一小时之后，我摸黑走上去卡里家的路，寒风穿过半凋零的树木，带着湖面的湿气吹打着我的头发。那年的树叶凋落得早些，唯有橡树还依然如故，这时听寒风呼啸着穿过半凋落的白桦和枫树，我差不多听到了冬天的信息。

当我走拢卡里家，只有两盏灯还亮着，我按了门铃，等在那儿。几分钟过去了，我正想转身离开。门忽然开了，凯萨琳身穿丝绸睡衣，映衬着背后昏暗的灯光，显得娇小模糊。

“乔治！”她的声音带着某些女人所具有的听天由命的语气，当她们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决心向某种不可更改的势

力投降。“进来，亲爱的。”

我跟着她进了屋，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凯萨琳令我惶恐不安。大门在我背后关上了，我走在前面，先进了客厅，闻到一股宜人的卡里先生抽的卷烟气味，从房间末端的窗户外望，只见一片黑暗。我背后的一盏灯又灭了，我立即转过身来。

“我已经上床了，”凯萨琳说，“妈和爹在城里参加招待会，伊沃娜还有两小时才回来。我听见门铃响，希望那是你。”

我坐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只是一个隐约的身影。她坐在我身边，头侧向一旁，显得既轻松又紧张。我知道她的手放在我身旁，我拿起来，感到它紧紧地握住我。

“乔治！”她轻声地说，我感到她的意向，女人的意向，正在征服我这颗怯弱的男性的心愿。

接着我们拥抱在沙发上；她只穿了睡衣和贴身衣服。我抱着她，感到整个房屋都在颤动，仿佛看见了奇怪的形象；她活泼可爱地贴近我，敏感地拥抱我，带着女人的本能意识，美妙而又令人畏惧。

“乔治！”她咕哝着说。“亲爱的乔治！亲爱的乔治！”

然后她坐起身来看着我，在昏暗模糊的灯光下我看见她下意识的目光。她脱下周身衣服，我看见她赤裸白皙的身躯，这是一个成人，或者说小孩，第一次见到女人的令人无限惊奇的美。她再次投入我的怀抱，我却只是茫然地抱住她。

“是的，”她轻声地说，“是的，是的。我们必须，我们

必须。”

可是我浑身颤栗，感到害怕，不仅怕使一个姑娘怀孕，而且因为我还没有成人。

她等待我，抱住我，像是平静的大海掀着不平静的波涛。

我终于坐起身来，不由自主地说：“不，我不能这样。”

当我这样说时，我感到一种贞操已经离我而去，我完全被打垮了，比起几个月来更缺少男人气概。

沉寂了至少五分钟，房屋在暴风雨中颤动，然后我突然感到房间亮了。凯萨琳显得沉着镇静，现在重新穿上了衣服，仿佛没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过。她坐在长椅上，不言不语。我也没吭气。

“乔治，”她终于开口了，“我希望那是你，乔治。”
我无话可说，也想不出什么话。

“我一定要活，乔治。我一去麦吉尔大学就不回这儿来了。妈妈气愤我，经常如此。我套住了她，破坏了她的生活。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是她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她自私，同时又害怕没有尽到大家都认为该她承担的责任。”

即使在那时，凯萨琳就能这样讲话了，可能由于她常常独处，远比我们大多数人读的书更多，不至运用我们平时人云亦云的日常语句。

她温柔地对我微笑，对此我非常感激。“乔治，谁告诉过你女人温柔和顺吗？我一向待你不错，亲爱的。我保护了你。不要让别的女人糟踏……”说到这里，她轻轻地耸耸

肩，又朝我微微一笑：“你身上有烟吗？”

没有。她知道我没有，因为我那时没有开始抽烟。

“爹常常抽烟袋，他有一些陈烟放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咱们先抽支烟，我就送你回家。”

她找到一筒他父亲的卷烟，已经又干又陈了，我们各抽了一支，边抽边咳嗽，然后她庄重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了。

“晚安，亲爱的。再隔一年，到麦吉尔大学见。”

我离开屋子，像是莫名其妙地逃离；回家路上，寒风吹卷起我的头发，雨滴打在我的脸上，令人十分愉快。

想作一个成人的首次努力失败之后，第二天上午我回到了弗罗比歇中学。两个星期之后校长在全校集会上宣布我被任命为级长。不出一周，我收到一封艾格尼丝姑母写来的祝贺信，并且让我明白她作的决策多么明智。我在弗罗比歇的最后一年是不愉快的，那便是我能记住的一切。它几乎成了我一生中一段空白，因为我蒙受了巨大损失。我一心期待着来年夏天与凯萨琳重逢，这才使我好歹熬过来了。

可是来年夏天我没有见着她，她到欧洲去了。其间我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但她的信很有分寸，一个女人写给一个男人的那种信，当她对往日的情人已掩上心扉。直到八月中旬，我才对她第一年在麦吉尔的情形有所风闻，我是从杰克·布坎南那儿听来的，他被凯萨琳视为蒙特利尔要塞生活中的呆滞典型。

“去年她狂起来了，”杰克会心地微笑了一下对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又是会心地一笑：“她确实使不少人大吃一惊。她在

这儿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她，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只老鼠，但到了麦吉尔大学，却成了谈论的中心。”

“谈论什么？”

“闹得很晚的社交活动呗，她和一大帮人搅在一起。我听说她竟当着女学监的面躺在地毯上。”

可是杰克的传闻并不真实。是的，她曾过分地耗费精力，过着一种绝望的生活，但她同时也很勤奋，各科考试成绩都不错。我听别的学生说，作为一年级的新生，她在校园里算是颇为注目的人物。第一次见她的男生认为她很有魅力，不少人追求她。我认识的一个女生，她比杰克或别的任何男生都更聪慧，真心诚意地对我说她羡慕她。

“我知道许多人訾议她，那仅仅是由于她那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不奢望能活上十年，但她决心真正度过这十个年头。我认为她很了不起，尽管她把我当做陌路人。”

这时我知道已经失去了她，失去了与她一起的最美好的时光。我害怕作为一个新生出现在麦吉尔大学，因为相见时我会感到痛苦，她是一个出众的人物，我却默默无闻。但这种耻辱感并未成为现实，那年秋天我根本未去麦吉尔。

那之前的一年里，父亲终于应验了姑母一向的预言：他必定倾家荡产。这是我自己不争气所酿成的另一桩罪过，因为我回到弗罗比歇中学后，父亲为自己在姐姐面前的懦弱表现感到羞耻。以前，他的每项投资都要同艾格尼丝姑母商量，然后她又去请教城里最有经验的投资家。可是现在，父亲决定自己当家作主，迅速飞黄腾达。

把他坑了的是一桩矿产投资，像父亲的大多数计划一样，设想都非常实际可行。矿藏位于昂加瓦半岛，悉尼有家

炼钢厂急需矿石，由水路运矿到悉尼比从墨萨彼运矿到匹兹堡更便宜。但同父亲的所有想法一样，总免不了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这次的弱点在于他的想法领先于时代整整三十年。没有推土机和飞机，不可能开采昂加瓦的矿藏，因为这个地区还未开发。父亲把钱押上去，结果输得精光。

我从艾格尼丝姑母那里得知，而不是从我父亲，这对我们的前途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家古老的灰色石房得卖掉；其次，父亲必须到城里的一个办事处当公务员，他和母亲得住进一个小套间。对于我来说，不仅去不了麦吉尔大学，还得自谋生计。

九月中旬凯萨琳从欧洲归来，发现我家的住宅卖掉了，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她写了封信给我，这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她想见我，恳求我告债——她保证她的父亲会作安排——无论如何要去麦吉尔大学。但我的自尊心将我从蒙特利尔驱赶到了多伦多，我不愿意住在曾经有过欢愉的地方，在那儿我的老朋友个个富裕，而我却穷得像个杂货店的伙计。我没有回复她的来信，对继后的一封信也置之不理，寄来的圣诞节卡片也听之任之。多年之后我才又见到她。

第 三 部 分

我与莎莉交谈至凌晨，但五个小时后我便起床了，洗完澡自备早餐，一边想着新的一天里要做的事。离开公寓时凯萨琳和莎莉两人谁也没醒，我下了电梯来到街上。我的双眼因睡眠不足而发僵，似乎大得与面部不相称；我走到室外，迎着寒风不禁噓了一口冷气。这是一个严酷的日子，零下二十度，铁蓝色的天空下，朔风呼呼地从北方直刮过来。没有见到出租汽车，我沿着内日区往下走，一边扭头注视从山上来的出租车；但我只看见私人小车滑过坚冰地面，从车后的排气管喷出一股股烟气。蒙特利尔在朔风中显得凄厉寒伧，房顶边缘积上白雪，冒着寒气，太阳照在雪上，映出道道彩虹。阳光刺眼；我懊悔忘了带上太阳镜。走拢广播大楼的时候，我的清鼻涕直流，手提包仿佛冻结在手上。

十分钟后，我在干燥暖和的办公室里烤火了。我打开公文包时，钥匙划出静电火花，从包里取出的纸沙拉沙拉直响。我利用等候录音员康诺利的空隙，努力涂抹一篇早已答应为一

家全国杂志撰写的稿件，但干这种事需要更多的睡眠才行。这时邮件送来了，停下笔令人舒了一口气。我开始读报，蒙特利尔的法文报和英文报，然后读《渥太华公民》报的社论，多伦多的《环球邮报》，伦敦《泰晤士报》的印度版，还有《纽约时报》。我正要拿起《芝加哥论坛》报时，门开了，康诺利走了进来。

“真要命，”他说。

“不错，我也有同感。”

“是呀，”他说，“在这样爽朗的冬天早晨，我却感到糟糕透了。”

康诺利一屁股坐进椅里，直瞪着我。他身材魁梧，腰宽背圆，臀部在花呢裤下鼓鼓地突起。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是个拿月薪的雇员，他嫌弃这工作，但要养家糊口只好应差；同时他相信自己在利用时间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伟大小说。他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曾驾驶轰炸机执行四十七次使命，除了由于出色的飞行而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外，还荣获一条彩色勋带，因为在兰开斯特浓烟四起之际，他坚持到其余飞机撤离。他瘸着一条腿，半边面部由于植过皮而发亮，而且在乱蓬蓬的黑发下显出不自然的粉红色。可是战后，康诺利受欧内斯特·海明威^①的影响更深；他参加了反希特勒战争，对《永别了，武器》着迷极了，他笔下的奥地利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都努力用英语思索，说话却像意大利人，正如他平时谈话酷似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中某个人物那样。他给我看了他的手稿，我不知道怎么评价才好，因

^①欧内斯特·海明威（1898—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为我喜欢并且敬重这个人。你不能说他的小说是剽窃，但他完全成了那位大师的奴隶，他的手稿读起来像后期的海明威在模仿二十年代的海明威。

“我真感到要命，”他重复着说。“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耸了耸肩。

“有什么新闻？”他问，“你弄完那篇广播稿了吗？如果弄好了，我最好也读读。”

我把稿纸从桌面推给他，当我读着《芝加哥论坛》报时，听见他在生气地咕哝。过了一会，他把稿纸推还我，问我自己是否相信那一大堆谎话。

“美国人在承头，”他大声对我说，“而这个国家原来好端端的，却成了一头蠢猪，躺在猪槽里打鼾。他妈的我们在朝鲜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能够这样振振有词？原先这个国家在打仗，美国人却在吹牛皮，可现在确实变了。难怪你大谈耐心和时机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节目每周听的人愈来愈多。我也在读托尔斯泰。”

“喔，你的主张如何？”

“全力以赴，为了上帝努力去干，狠狠地揍那些该死的中国人。”

我看着他，心里有些恼怒。他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却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确也是那么回事。

“这篇废话谈到印度人的观点的重要性，”他继续说，“美国人会把他妈的整个财政部的家当送给那些印度佬，而尼赫鲁那家伙照样会弹美国是帝国主义的老调。去他妈的，

那些印度佬！你难道不能改变调门说说真话吗？我说，在三十年代你赞成张伯伦和他的绥靖政策^①，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夜，你一定会声称那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和平。”

我把《论坛》报举在他与我之间说：“比尔，我讨厌你。”

“你讨厌我？你不想想我对你的感觉如何？”

他走出房间，砰地把门带上；我看着旁边的烟灰缸，里面盛满了烟头。我伸手从抽屉里拿了一块口香糖，这是我神经紧张的标记，因为我只在抽烟过多时才嚼口香糖，而我一般不过多抽烟，除非过于紧张。这时我边咀嚼边抽烟，一想到康诺利心里就上火；但我继续阅读《芝加哥论坛》社论，这使我对康诺利的反应稍微温和些。这天早上的事儿愈来愈糟糕。

电话铃响了。一个妇女俱乐部的活动组织者邀我去演讲朝鲜问题，我向她表示遗憾。一家全国杂志的助理编辑请我共进午餐，交谈几个问题，我告诉他去不了。还有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认为很重要，明智的人却认为不值得去浪费时间。后来有一次，总机告诉我是渥太华来的电话，阿瑟·拉任彼先生想与我通话，如果方便。

“请接通阿瑟·拉任彼先生，”我说，隔了半分钟便听见他的声音。

“喂，乔治。还记得我吗？”

“当然，阿瑟。”

“好久不见了。”

^①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以妥协姑息，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而闻名。

“是的。”

“我听说你明天要到渥太华来，”他接着说，“你与部长会见之后，我想请你共进午餐，行吗？”

“好的，阿瑟。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没有什么可以称做特别的公事，可我认为应当聊一聊。”

“那太好了。”

“你近况如何？我和蒙特利尔失去了联系，我对那儿的路径也生疏了。”

“我还是老样子。”

“与往日比较，总有一些不同吧？”

“不能与你相比。”

“行啦，明天早上我在部长办公室外边等你。你们的约会将在十点——十一点能结束。”

“他会给我那么长的时间吗？”

“谁也说不定。我不想无知妄说，可是我告诉你，你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很受我们部里的赏识呢。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是独立派，这就更引人注目了。”

“哦，谢谢你，阿瑟。”

“那就在部长办公室外边见，在东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咱们先别定。我答应了要去记者站见一位老朋友。”

“那么咱们中午在总督大厦的游廊见，好吧？”

我放下话筒，一种虚幻的不现实感更加深了。我忆起阿瑟·拉任彼已经有几个月，但不曾相见却好些年了，他是我心里总与大萧条时期联在一起的那些人物之一。在那些日

子，他沉默寡言，比我们其余的人略有保障一些，属于杰罗姆·玛特尔周围的追随者之一，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场合，他使我意识到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究竟能有多少了解。从那以后，他飞黄腾达，一进了外交部就青云直上。战争期间，他被派驻伦敦，以伦敦为出击口，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几项绝密而又危险的使命。渥太华盛传他能指望最高级的大使职位，只要他请求一声；但是他不大会提出请求，因为他现在已经够显要了。我记起他早先的光景，真难以相信这便是他的历程，但却一点不假。

“我重又读报，读了几则之后，康诺利才开门回来，现在露出一副驯善而又抱歉的神情。

“乔治，对不起，我不该砰地关门出去。忘掉那些话，呃？”

“那倒没什么。”

“哪能那样呢。我为什么要冲着一个人发一通气？而不针对一个忘八蛋？”

“我还不太知道自己是好人呢，比尔。”

康诺利接着向我解释，他的小说又被另一家出版商拒绝了，他和妻子吵了一架，然后喝得醺醺大醉，睡了一晚上酒还未醒。”

“因此，当我看见你沉着冷静，心里便觉得矮了一截，于是冒火发气了。我感到什么都不是滋味，像一条布满白苔的舌头。”

“我还以为你感到一团糟，像鸟儿的笼底。”

“也有那样的感觉。”

“你说得对，”我说，“我的广播稿是一堆谎话，但它

之所以是谎话，却不是你说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

然后我告诉他要去渥太华一趟，问他能否在下午为我的广播录好音。康诺利乐于帮忙，他说不难，可以先录音，到时播放会同当场播讲一样。除非对听众讲明是录音广播，通常是不这样做的；我的节目一向被认为是现场讲演，但这一次康诺利认为没有必要申明。

“雅克三点就空了，”他说，“我们会很快录好音，让你赶上火车。瞧，部长接见你，了不起的事儿，这可真是对你的赏识。”

“我倒不那样看，不过我承认对此感到高兴。”

康诺利离开后，我记起要打的几个电话。我先打电话给大学，告诉门房贴出通知，说我次日不能在同样的时间与学生见面。接着我向爱德华国王旅馆打电话，办事员回答说登记簿上没有叫玛特尔博士的人，我一时不禁着慌。但我揣测了一下这个解释，便问是否有人给乔治·斯图尔特留言。

“请等一下，”他说着便去查头天晚上的记事录。

过了一分钟他回来拿起电话，问我是不是乔治·斯图尔特——这是他的原话——我作了肯定回答之后，他告诉我有一个叫阿姆斯特朗博士的人，一小时前留了个口信，说十二点半钟我可以在爱德华王旅馆的走廊上见到他。

“告诉那位博士，我将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到达那儿，”说完我便挂上电话。

我坐在电话机前，两肘支在桌面上；我想起凯萨琳，心里感到内疚，因为早上离家前没有看望她。但为此感到内疚是荒唐的，我没去开她的门是怕惊醒她，她的心脏使她比大多数人需要更多的睡眠。我怎么知道她当晚寝不成寐的时

辰有多长呢？

我想到杰罗姆，不知道前一晚上他干了些什么：他以往日那副模样浮现在我脑海里。时间究竟是什么？过去仿佛是目前的一部分。时间已经失去它的形态。时间是我们生存其中的云彩，而气息则存在于我们之中。什么时候我是活着的，现在或是二十五年之前？或者同时在我一生中的所有时刻？

电钟指到十二点二十五分，我拿起电话，拨动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响了四次之后我听见凯萨琳的声音，但今天她的声音没有任何活力，与昨晚的全然两样，困倦，有气无力。

“你好？”我说，“昨晚睡得怎样？”

“不很好。你呢？”

“不很好。我一夜都在和莎莉交谈。”

“她也这样告诉了我。”

“电话里响起了嗡嗡声。”

“喂，亲爱的，”我说，“我可以取消渥太华之行，如果你需要我留下，不是非去不可。”

电话在我们之间又响起嗡嗡声。

然后她说：“杰罗姆早上来过电话。”

我等着没吭声。

“你看我该怎么办，乔治？”

“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又是一阵沉默。

“你支持得住吗，凯萨琳？”我问。

“我不知道。”

“听我说，亲爱的，”我说，“你无论怎么办我都完全

接受。”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

“凯萨琳！”

我又遇到这种情形，当丈夫恳求得到安慰时却没有任何反应。

“你什么时候动身去渥太华？”她问我。

“我本想晚饭后去乘火车，但——不，要是你认为可以的话，我就搭下午的一班车。午饭后我回家来取提包。”

“我会给你收拾好的。”

“请你别为那耗费精力。休息吧，听得出你很疲倦。”

“别老说我疲倦，当我满好的时候。”

谈话之后，我戴上皮帽穿上皮衣，穿过厅堂向电梯口走去。那儿照常挤着一堆讲英语和讲法语的人——工程师、速记员、演员、歌星、节目编制人、行政要员，都等着乘电梯下去午餐。他们显得比我年轻，有人向我打招呼，我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声；我是老兵了，在这一行里注意力总是落到年轻人和新秀身上。未来属于他们，他们明白这个还带着年轻人的无情呢。在电梯里，我听见一个电视工程师告诉一个女孩，第一间电视演播室随时都可能试演，我心想这是否意味着我的工作的终结，再过三年我是否还能维持生计。我是萧条时期的产物，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心有余悸，永远不相信一项工作会持久。

大街上依然同早些时辰一般寒冷，正午的阳光灿烂，照得我睁不开眼。屋顶上仍然冒着雪气，多切斯特大街的行人不断转过背来挡住寒风。我步行去爱德华国王旅馆，戴着手

套的两手深深插进衣袋，皮帽拉得低低地，挡住冰冷的寒风。在这样的天气，蒙特利尔真不是人活命的地方。

我到了旅馆，它甚至比我印象中的更糟，如今它被装点了一个假门面，这在法语区的低贱住宅中间是很时新的，用许多不透明的玻璃砖和发亮的铬片莫名其妙地拼凑起来。但旅馆里面仍然是那条破旧的门廊。

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我靠嗅觉穿过门廊，廊里的气味像一个旧烟缸，而且暗黑。差不多花了半分钟，我的瞳孔才适应过来。我看见那些发亮的黑皮椅，污秽的地毯，小小的写字桌，一个灰扑扑的招待员，耳额间夹着一支铅笔，手指头上带着一个金戒指，面部的神情仿佛表明，他五十年来从未见过任何赏心悦目或欢愉的事物。

“请等一下，”当我要求见阿姆斯特朗博士时，他说。

杰罗姆回来竟住进这么个地方，我心里咕哝。我坐进一张椅子，感到皮面粘乎乎的，还听得见顶上的楼板吱吱作响，继续闻到旧烟缸的气味。这家旅馆是酒鬼过夜之地，无数妓女麇集卖淫的场所。他回到家乡故土，偏偏住进这么个地方！

“先生？”

是那个灰扑扑的招待员的声音，我转过头来。

“阿姆斯特朗博士付好帐离开了。”

“有没有留言给我？”

“没有，先生。”

我出了旅馆，走过两个街区，在一家餐馆吃了比目鱼片（菜单上唯一的菜），看见一个法裔加拿大人长着鹰似的脸，正和他的未婚妻用餐，那女人文弱可爱，像个修女，显

然与他那样的男人一起生活不相宜。我知道他们订了婚，因为我浏览《新闻报》时见过他们的照片。我具有一种毫无用处的记忆力，可以贮存这一类形象，并且经久不忘。

午饭后我走回播音室，希望午饭前喝了两杯酒而不是一杯。我见到康诺利，技师雅克安排我录了音；重放录音带时，我听见罗斯福般的浑厚声音，那仿佛与我毫不相干。可是康诺利说录制得很好，第一流的；我谢过他帮我录音后，出来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凯萨琳正躺着，我们俩都心绪不宁，除了重复表示彼此相爱之外，几乎无话可说。

“我原想同他一道吃午饭的，”我说，“但他结了帐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吗？”

她摇了摇头。“他要来看望我，也许就在今天下午，也许明天。他打电话问我，他是否可以来。”

“他在电话上的声音你觉得怎样？”

“熟悉”

“只是熟悉吗？”

“哦，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乔治。”

当晚我搭上去渥太华的火车，窗帘上卷，我靠着椅背观看沿途的灯火，牲口棚里农民正在挤牛奶，雪白的原野上暮霭沉沉，显得灰暗，偶尔从西边的苍穹掠过一溜树影。我模糊地想着凯萨琳、杰罗姆和我自己，以及这些年来许多事。我心里明白，凯萨琳爱我，我也爱她。对于眼前的事态，我没有任何庸俗的焦急情绪。在过去的九年里，她与我鬓角相磨，彼此爱护，日子过得挺不错，但是杰罗姆是她核心的一部分，她作为女人的一生的重要部分，而今他还活

着，生命充满危险。难怪人们自寻短见，我想那是因为死亡更为安全。凯萨琳绝不会去干轻生的事，这我明白。她曾经为生命顽固地奋斗过，她会斗争到底的。不用说，她比我姑母艾格尼丝预料的强壮得多，甚至比她自己梦想的还要好。她使所有的医疗诊断落了空，至今照常活着。

然而我清楚，杰罗姆的归来会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而我仍然感到年轻。年轻而又衰老，衰老而又年轻。

“你才四十四岁吗？”我对着窗玻璃中的影子发问。
“你真的才四十四岁？”

火车轰隆轰隆地朝渥太华方向驶去，我合上眼睛。啊，上帝，请给我们片刻安宁。让我们从自身得到宁静吧，啊，上帝。

二

第二天在渥太华，我的举止堪称楷模，与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一般无二，这是我过去十多年种种经验的结晶。我和部长的会见很愉快，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友好和富于吸引力。他完全令我惊讶不已。在现代的政府机构里，没有哪个部门比得上外交部，在那儿部长日理万机，处理各种恐怖和邪恶事件。部长内心深沉而又高贵，表面上却和颜悦色。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客，但我绝没想过要把他当政客看待。他并没告诉我什么新鲜事儿，可我离开他时却感到比进他的办公室那阵充实得多。

一点钟之后，当我在罗里埃大厦的服务台前和阿瑟·拉任

彼握手，短暂的欢欣却被沮丧代替了。起初我没认出阿瑟，但他认出了我，走上前来同我握手，老成的脸上浮现出外交家的微笑。他原先握手时又紧又猛，现在却如此地轻，这轻轻的一握会不会是故意的。许多人当手被人轻握，会感到不受欢迎，因而往往在握手时特意比平时握得更重。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阿瑟，看来是一个会这样思考问题的人，但他也许仅仅是太疲倦而已。

“倘若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们不去里多俱乐部用餐。我倒想去自助食堂。”

“要是独自一人，我也会去那儿。”

我们到了楼下，在盘里盛好食品后，他领我走到屋角的一张桌子，背靠一根柱子坐下。

“我不想让人打扰，不希望抛头露面。”

这时我想起来了，他在这个政府官员群集的城里的确几乎是销声匿迹的。他的装束与公众对现代渥太华官员的印象一致：细条子的黑色西装，黑边角质架的眼镜，面颊上的肌肉适中，鬓角边的银发合宜。大变样了，比起我在萧条时期认识的年青的他，那时他个儿消瘦，一副饥渴的神情，总是沉默寡言。变化更大的是他的举止。在那些日子里，拉任彼全不引人注目，人们几乎对他视而不见。而现在，一旦你注意到他，一旦你发现自己与他有了接触，他便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他随和地谈了一刻钟的政治话题，有节制地提到一些名字；我听过的文职机构中所有的陈词滥调，他统统会用。他的表演娴熟，差不多令人愉快；我们彼此明白，他既没有任何失言漏嘴的地方，也没谈到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变样了，阿瑟。”

“你也一样，乔治。”他那有些诡谲的微笑令我纳闷：为什么邀请我一道午餐。

在我找到答案之前，我们都很窘困。

“这些日子你可曾注意自己在想杰罗姆·玛特尔？”

“是的，我有时想到他。”

“他是什么时候出走的？”拉任彼轻描淡写地问。“十二年以前还是十三年？”

我微微扬了扬眉，因为杰罗姆出走的时间拉任彼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

“我想，你听说过他在法国被害的事吧？”这是他问的下一个问题。

“还受尽折磨呢，照我听到的传闻。”

“那说法传出来时我在英国。我们倾向于对某些更恐怖的细节打折扣，但无疑的是，官方认为他死了。”

“那够置他于死地的。”

这一次拉任彼扬了扬眉，但他的语气还是那么舒缓。

“我可以告诉你，玛特尔已死的官方报告不准确。他出现了，此刻就在加拿大。”

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明白我已知道。我说：“不错，我已经和他谈过话。”

“我想你会的。”

“你怎么发现他回来的，阿瑟？”

“从皇家骑警那儿^①。几天前他们有位安全人员打电话问我对战前的玛特尔有多少了解。”

“他们怎么知道你那时认识他？”

^①皇家骑警（简称R·C·M·P·），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情报机构。

“他们知道你也认识他，同一个渠道。”

“我常常在想，他们是否立了我的档案。”

“他们自然立了，”他微笑着说。“不过，这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实际上，皇家骑警对玛特尔的出现十分高兴。他们只想和我核对几个事实，主要想知道的是，他是否会对我们外交部有益处。”

“他会？”

拉任彼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个雪茄盒伸向我，我谢绝之后他自己取出一支，切去末端，叼进白脸白色的嘴边。

“从情报的角度说来，他可能对外交部有些用处。他们核对这类事属于例行公事。但令人惊奇的是——难道不是吗？——从具有他这种经历的人身上能得到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他们死里逃生，常识以外的事他们见得太少了。他们的思想多半被扭曲了，往往分辨不清虚假与真实，处于惊骇未定的状态，以及诸如此类。战争期间，我和几十个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人谈过话。一点重要的情报也没掏到。”他停了一下，漫不经心地问道：“在你看来，玛特尔怎么样——悲伤吗？”

“听起来有些忧郁，但并不至于悲伤。”

“他问起过往日的老朋友吗？”

我摇了摇头。“那是一次私人性质的通话，阿瑟。你大概知道那是为什么。”

拉任彼点点头，抽了一口雪茄后又放下。仍然操起他那职业性的腔调，谈了几桩杰罗姆已经告诉过我的事，但有一桩是新鲜的。据他说，杰罗姆曾娶过一个年轻的俄国女人，或者说与她同过居，后来因为与他的关系，她受到苏维埃当

局的干预，陷入了麻烦。

“显然，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根本的变化，”他说。“他对女人总是具有吸引力，似乎从来没法让自己避开她们。”

我任他这样说，彼此沉默了半分钟，都在回忆往事。我在等待拉任彼摘下面具，变得自自然然；我开始怀疑，他身上是否还存留着任何自然的气味。他知道我十分了解旧日的阿瑟，但他仍然与我保持距离。

“医生是些怪人，”他若有所思地说，“遇上律师或技师，你清楚在和谁打交道，但在别的问题上对一个医生你始终摸不透。他们在这方面有些像士兵，我想那是由于他们的职业与生死攸关。”他轻微地耸了耸肩。“无论那是什么缘故，它使大多数医生和士兵在政治上十分愚蠢无能。”

“以麦克阿瑟为例^①，好吗？”

“事实上，就在三周前我和麦克阿瑟参谋长进行过交谈。”又是轻松地耸耸肩。“是的，他恰好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从政治上说，杜鲁门正在给他愈来愈长的绳子，长到够他自缢的。”他停顿了一下，又微笑着说：“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完完全全处于判断远东局势的地位。”

“这似乎不像是你所属的部门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的部门有什么想法。”又是温和地一笑。

“我只是说此刻他对局势的看法百分之百的正确。问题就在这儿。在民主政治中，无论对什么事，百分之百的正确看法必定遭到失败。我这样说并非玩世不恭，只是直言不讳而已。想想吧。”

^①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将军，朝鲜战争期间，曾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军司令官。

我想了想，凝望着拉任彼，等他继续往下讲。

“自然，我刚才谈论医生和士兵在政治上的表现时没有想到麦克阿瑟身上去。我所想到的是三十年代的杰罗姆·玛特尔。以我们这儿的尺度来衡量——我想你会同意这是基本的尺度——三十年代的玛特尔是个狂热分子。说他是怪人不够准确，但说他落落寡合，是一条没有羁绊的孤独的狼，倒也恰如其份。他与知识分子不合群，虽然他们围在他身旁。他不像拉斯基^①，大出政治风头。在我们常去的所有那些地方，你会发现他，而且常常见他独自滔滔不绝地谈论。”

“不错，”我打断他的话。“你不必提醒我他那时像什么人。阿瑟，你和我最后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呢。说得确切一点，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

面具终于剥下来了，他的面色微微发红，俯视着他面前的食盘。

“他为你在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差事，为我在外交部谋到一个职位，”他说。

“倒不一定为你谋到了外交部的职位。”

“但要不是他，我就会去西班牙了。我是说，要不是他告诉我关于西班牙的情况，上帝，我那时太年轻了。他对我讲的情况绝对正确，当时他简直正确完了。可是正因为他那时全对，以后便全错了，当时的政治就是那么回事。假如他耐心一点，等待一下。当然，他没有耐性。”

“的确没有。”我说。

^①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社会主义领袖。

“瞧你，”突然，拉任彼真情流露了。“你成功了，瞧我，我获得了成功。可是瞧他——多年的灾难，集中营，流放，疾病和失望。”

“是的。”

“他出生在时代的前面去了，或者说时代的后面。他未能顺应时代。像你我这类型的人才顺应了潮流。”

拉任彼突然改变的谈吐，对于像我这样知道他底细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看见另一个部门的官员从我们身旁走过，我想他要是知道拉任彼的面具能够如此喇地摘下，他会多么惊讶。阿瑟·拉任彼是在新形势下的加拿大的新人，直到这次战争为止，我们还不曾产生过像他这类型的人。他精明干练，与英国外交部的同行们相比，毫不逊色；无论派驻哪个国家的首都，他都胜任愉快。他很能干，战争期间在我们的伦敦办事处工作，成绩卓著，颇有建树；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他经历不凡，俨然变成了另一个类型的人；他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我是在杰罗姆的一位朋友家里第一次注意他，看见他在斟啤酒。

“不用说，他还活着是一个奇迹，”拉任彼接着说。

“他受折磨的故事起码有四分之三的真实性。盖世太保把他弄得够呛。皇家骑警的那人告诉我，他背上满是钢鞭抽打的伤痕。完全没有必要去猜测他那以后所过的生活。他原来有家，有妻子和女儿，享有第一流医生的声誉，可他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为什么呢？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我憎恨他们，同他们打交道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巴不得看见他们从地球上消失，说不定那天我会因此犯错误。”

他拿起雪茄，急促地抽着，又四下一望。

“你瞧——我自己一度是共产党。”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

“是吗？什么时候？”

“一九三九年那天晚上，当你对我谈起杰罗姆。”

“那天晚上我昏头昏脑。我说过些什么不太记得了。我想没告诉过你吧。”

现在我弄清他邀我共进午餐的原因了，我也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他。他兴冲冲地约见我，是想挑明部长同我的会见——这使我感到荣幸——是他安排的。可是我厌恶他，因为当他考虑杰罗姆或别的任何事情时，总是离不开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假如我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某个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①，于我多有不便，”他说，尽可能地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想你们部里知道你曾经是共党。”

“自然啰。我进这个部之前就告诉他们了。那是一大机会，可是假如我隐瞒不说，那就完蛋了，因为他们会查出来。我辩护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将会有用，能探测共产分子的心理，这的确是事实。斯克林杰博士信了我的话，他是一位精明的老手。你认识他吗？”

我不理睬他最后提的问题，说道：“我猜，你担心杰罗姆有可能在美国揭穿真相？”

他点了点头。

“你认为他是那种人吗？”

拉任彼狡诈地盯了我一眼：“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哪

^①五十年代，在国会参议员麦卡锡的狂热煽动下，美国出现了调查和传讯共产党嫌疑犯的风潮。

人呢？他蹲过集中营，要想赢得别人的同情和恢复自己声誉，他的捷径便是去那些该死的美国委员会，告诉它们一些姓名。”

这真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要是拉任彼处在类似的境况，就会这么干。我们桌上的脏盘里放着残剩的食品，它们令我恶心，于是我把它们端到旁边的空桌上。

“我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我缓慢地说，“杰罗姆感到孤独，我认为他无意同任何人谈起俄国，更别说到提战前那些老话了。”

拉任彼打量了我一下，耸耸肩，叹了口气。

“你也许说得对，”他说，“唉，你也许是对的。”但又说：“你可曾有过这种感觉：时间在一九三九年停止了？”

“经常有。”

“在那之前，咱们是生龙活虎的，不是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怀念。

“我想，的确是的。”

“自那以后，咱们各奔前程，锦绣前程！”他鄙夷地一笑。“不久，我要会见一位聪明人，他真的相信咱们要有谁还在干事儿，那是个大问题。但是也怪，我的工作偏偏干得不错。这并不足以表明工作的价值，对吗？”

我从眼角边瞥见了杰克·卢布林纳，莎莉的男朋友阿兰·罗伊斯的继父，他从柜台前过来，手里端着一个食盘，在中央的一张空桌边坐下，背对着我。

“对啦，”拉任彼说，“我想再次见到玛特尔。你难以想象我多么感激他。假如我去了西班牙，我便彻底完蛋了。说来也怪——当时那是一个人能采取的唯一，事后却又懊

悔莫及的行动。我要报答杰罗姆的情义。”

“你打算怎么个报答法，阿瑟？”

他耸了耸肩。“我并不是全然不具有影响，他在目前的处境也总还用得着。如果你在城里见到他，请告诉他我愿尽薄力相助，好吗？”

“随你的便。”

“我是真心诚意的，乔治。”

“我会把这告诉他，假如我见到他的话。”

我们喝罢咖啡，那副职业面具又回到拉任彼的面孔。他改变话题，又闲聊了一会政治，恰好在一点二十五分他看了看表，说他两点有个约会，事先得熟悉一下材料。我们一齐起身朝门走去，等我们走到门廊时，阿瑟又像我见到他时一样自然随和了。

“见到你真高兴，乔治。让我重说一遍——部长对你早上的谈话很满意。你同我一样清楚，目前外交部只得走钢丝了，当美国人和……。”

他继续对我唠叨一些毫无意义的恭维话，这些话对他也同样莫名其妙。然后我们握手告别，他跨出旋转门，钻进横扫联邦广场的北风中，我独自站在那儿，感到陈腐乏味，一无所获。我想，多亏上帝恩惠，世事总还在进行。我所属的一代，有多少志得意满的胜利者，在拚命攫住某种伟大的信仰之后，到头来发现他们所信仰的不过是自己的小聪明而已。

要不是天气太寒冷，我会去国立展览馆，在那些绘画中间消磨掉剩下的午后时辰，可是气温在零下二十三度。我买了一份杂志，坐在屋角里打发掉火车离开前的时间。我多希

望在家里，在家里和我生存的基石和理由——凯萨琳呆在一起。我希望美好的感情往返不辍。

“唔”，我自言自语，“也许会的。”

当晚在返回蒙特利尔的火车上，眺望沿途牲口棚的灯光，冬日落霞中的光秃树木，死一般沉寂的雪白田野。与拉任彼的会晤使我情绪低沉，我感到经历了一切艰辛和些微成功之后，已经走完了一圈，现在又回到原来的情景：失业者在街沿边磨蹭，教授在高谈阔论，希特勒在疯狂叫嚣。如今加拿大富起来了，她也在领略小康的富足滋味，但我一想到阿瑟·拉任彼，心里便茫茫然，不知这个国家是在进步或是在后退。

我合上眼，希望睡一会。也许我打了个盹儿，因为我意识到了两腿的麻木感，仿佛听见火车汽笛在数哩之外鸣叫。我晒得要命，脑瓜里昏糊一团，完全筋疲力尽了。我对教育莎莉的责任感到厌倦，厌倦撰写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以维持生活。啊，上帝，我厌倦凯萨琳的疾病，由于厌倦的缘故，也对自己感到厌倦了。

隔了一会，车停了，我往外一望，到了一个小站，站台上三个头戴方格纹厚呢帽的人，站在露天电灯下的一大片牛奶桶旁边，脸冻得红红的；他们吐气成雾，雾气绕在头部周围，我忽然坐直身，因为认识其中一位叫蒂——琼·拉弗朗布瓦兹的人。这地方叫拉昌斯，专为滑铁卢中学开设的一个小站，萧条时期我在这儿教了五年书，拉弗朗布瓦兹也许还在这所中学当门房。多少次他催促我走过往车站去的肮脏小道，以便赶上渥太华到蒙特利尔这趟车：有时是秋高气爽，风光醉人，有时是开春之际，路途泥泞，但我记得最清楚的

是眼前这幅景象——雪白的原野，干净，寒冷，农舍的烟囱升起缕缕炊烟。

火车吱嘎吱嘎地开始滑动，车厢内暖融融的，窗玻璃却像一块坚冰，蒂——琼的面孔，已经苍老干瘪，像一张猴脸，随着车的滑动看不见了。这一切真不可思议。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中小学更经久不衰了，没有什么能像中小学那样把你带回生命的循环圈。

我望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想起当初坐在车内的情景——当然不是现在乘坐的豪华客车，而是普通的硬席车厢——有时同沙特威尔一道，我们一起溜出滑铁卢到蒙特利尔去度周末，有时单独一人。沙特威尔——天啦，他准有七十岁了！

火车沿峡谷下驶，天很快漆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只见窗玻璃上映出旁的旅客的面影。从拉昌斯往下的铁路沿线，每个转弯，每个涵洞，我都了如指掌。我沉浸在冰雪中的滑铁卢的回忆，它的灯光把光秃秃的榆树身影投掷到大雪覆盖的运动场上，长条形的饭堂，墙壁由比格彼博士亲手嵌的板，学生们晚餐后从饭堂出来。我想，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可能还呆在那儿。滑铁卢中学已经换了新人，与我心目中的学校迥然不同，现在她有了名望。然而学校总是学校，无论好坏，时间永恒地贯穿其中；对我说来，她也许会永远如一。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莫过于稟性相宜的中学校长，但要是他生来不喜欢而又陷入那个职位，让粉笔灰屑渗透血管穿入灵魂，我会对他充满怜悯，为他抱憾终生。倘若我不爱溜到蒙特利尔去度周末，并在一个周末遇上了杰罗姆·玛特尔，我自己就险些成为这样一个人。

第 四 部 分

把我带上滑铁卢的道路漫长而又索然无味，我不想多耗费时间去谈它。父亲破产后，我在多伦多住了十年。先在一家银行做事，五年间从一份微薄的薪金中攒积了够在大学攻读两年的钱。曾一度中断学业再次工作，返回大学那年，经济萧条开始了。当我获得学位，已经二十七岁。

在这段难熬的艰苦期间，同那时千千万万的年青人一样，我身上出现了三种变化。我失去了宗教信仰，丧失了自信心，不再相信人类社会会健全完善。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了，但在多伦多没有工作的机会。我的学位一钱不值，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六月下旬我回到蒙特利尔，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别无栖身之地。

父亲总算度过了难关。人们一向喜欢他，他的周围总有一些老朋友，那些年月他保住了在信托办事处的小差事，天真无知使他蒙在鼓里，不知道那份差事纯粹是施舍性质。他对自己从未泯灭过希望。他和母亲住在圣母恩慈街的一套公

寓里，三间房中他用一间当作坊，仍然深信终会有所发明，名利双收。

我一到家，他便显出一副小孩似的神情，领我进入卧室——我将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并把他新近的发明给我看。

“摸摸它，”他说，“试一试。不是挺美吗？”

我摸了摸，摆弄了一下，问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你真不知道？杀伤力可厉害呢。晚饭后咱们到公园去试试，等着瞧吧，比猎象的枪还强。”

父亲从我手里接过那玩意儿，架在自己肩上，我终于明白它是什么了。那是用轻合金金属制作的弓弩，装了一个靠肩垫。

“可以阻止大象的攻击，”父亲说。“可以击退犀牛，能把狮子的头颅劈为两半。这件武器要在两千年前发明出来，准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

“我拿过他的发明，放在床上。”

“父亲，”我说，“现在是一九三三年，弓弩在一九三三年有啥用？”

“当然是用来猎狩。你要是名副其实的猎手，就明白猎枪对你有什么用处。几哩外的野兽都给吓跑了，可是这——”他爱抚地拍拍弓，声响轻微，“像婴儿的气息。带枪的猎人遇上两头犀牛，一头也不想放过，但他要能捕杀到一头就算他幸运。枪一响，另一头便逃窜了。可是有了这张弓，第一头倒下，第二头还会站在那儿张望。这弓还是双发的呢。你听说过双发的弓弩吗？没有，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啊，上帝！”我说着转身而去。

过了一会，父亲回到起居室，一声不吭地坐在屋角里，我意识到刚才太伤他的感情。这时我发现他苍老多了，母亲也苍老多了，我感到悲哀而又羞愧。可我自己也很失意，难以体谅别人；我开始用萧条时期年轻人爱谈论的话题来填补沉默的时间。

“在整个制度改变以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希望。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真正能够根除贫困了。但是贫困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乘车不买票的人吗？看见敞篷火车满载着失业工人越过大草原吗？与此同时——”我愈说愈起劲，像我们惯常做的那样，“看看这座城市，坐在国家财富顶端的人像孵卵的母鸡。今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亨特利、麦奎因吞并了另一家联合公司。昨天在圣亨雷发生了一起由于住房而引起的骚乱事件，警察逮捕了穷人，可是监狱却使他们几周来第一次有了栖身场所。谁也不出来采取点措施。不，父亲，这样说并不完全公平。你不是已经发明了一件弓弩，要在两千年前造出来，世界历史也许已经改观。”

父亲侧过身去，当他转回来时，我看见他热泪盈眶。

“只是一件小玩意儿，”他咕哝着说。“我不认为会带来任何结果。我干的事从来都是枉费心机。但我原想它会为你母亲和你帮点忙，如果获得成功的话。你知道，它确实能用。”

我离开住处到街上闲逛，直逛到七点钟。回到家里我饥肠辘辘，惭愧万分，吃下母亲为我准备的香肠和马铃薯泥。

那年夏天，我日复一日地在街边踟蹰，搜索招聘启示，但不久便放弃了这种努力，因为没有雇主肯登广告。我无事

可做，百无聊赖。我向加拿大所有的教师招聘处递了求职书，还向六七个美国的类似机构去过信。我在城里有几个泛泛之交，大部分时间我独自消磨。我身上正在成熟的性意识冷漠孤寂，像一片死海。

夏残秋至，树叶纷纷凋落。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回家看见一封电报。那是一个教师招聘处发来的，通知我滑铁卢中学有一个教席正等着我，月薪九十元，还管食宿，要求我立即报到上任。

十月中旬了，即使是私立学校也已经开学一个月，我相信一定是弄错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问父亲。

“呃，挂个长途电话，当然得问个明白。”

“长途电话花钱呢。”

“但这是一份工作，乔治，要挣钱得先花钱。几年前我就发现了。”

我给滑铁卢挂电话，等了七分钟后，才响起一个英国人的轰隆声音，似乎所有电话都是他的敌人。

“你说的是——斯图尔特吗？当然这儿需要你。我知道，是什么在阻碍你？明天上午就来。”

不等我再提别的问题，接话人便挂了电话。我估计他是滑铁卢中学的校长，但他既然没作自我介绍，我无从知道他就是莱昂内尔·比格彼博士，更不知道他那博士头衔纯属虚构；因为他相信学校要有威严，所有校长都应当被人称做博士。我努力搜索有关滑铁卢的记忆，但能记起的一鳞半爪似乎都不妙。我知道曾有一人去过那儿，但他却是一个怪人，我在弗罗比歇中学跟他认识，由于被学校解雇他才去滑铁卢的。他的名字叫亚当·布洛，自称雕刻家，目前在伊顿商场

卖地毯为生。

“我的天！”亚当悄声说，当我与他通电话。“你沦落到那步田地了不成？”

我提到每月的薪金，还有食宿。

“你的食品会包括粗菜野果。那儿的几个英国人过着罪犯般的生活。他们对吃的一窍不通，那些英国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餐像样的菜饭。如果比格彼那老头不辞退我，恐怕我早就死于营养不良了。”

第二天我在拉昌斯下了火车，迎接我的是一个矮个子，戴一顶扁平帽，他把开来的一辆A型福特牌汽车叫做滑铁卢公共汽车。他名叫蒂——琼·拉弗朗布瓦兹，带着我经过了三哩坑坑洼洼的路道，然后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车道直抵一幢建筑物前面，那建筑的样式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猜想，滑铁卢中学的校舍最初是一位富有的法裔加拿大农场主的家宅。屋前是一溜大理石阶梯，外边围了一圈圆柱门廊，门廊里以四个彼此示意的天使塑像作为装饰，她们像是从天主教堂的墓地偷来的。门楣上有一块盾形纹章和一幅奇怪的题词。

“这些阶梯怎么来的？”我问拉弗朗布瓦兹。

“七年前博士铺的。他和我。美极了。”

我的行李搬进屋后，拉弗朗布瓦兹领我上楼，穿过一条隆隆作响的走廊，到了一处没铺地毯、像间牢房似的房间，里面管道裸露，墙灰剥落，弥漫着老鼠气味。

“这是你的房间，”他说，“现在我想你顶好去见见博士。”

我跟着他下楼，穿过另一条走廊，那儿到处挂着填满草

的狮子头，老虎头，羚羊头，犀牛头和非洲水牛头，这些头颅彼此凝视，像英国乡间人家陈列的历代先辈的画像。

“这些是不是博士的猎射成果？”我问拉弗朗布瓦兹。

“他在一次大拍卖中买来的。等会儿你看看他的鸟吧，那才妙哩。”

他在一扇门上敲了敲，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响起来：“进来！”我进去同那人认识，他被成千的滑铁卢老校友描绘为平生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莱昂内尔·比格彼博士瘦得像白鹤的颈项，身高五呎五。可是这时他并不站着，正仰靠着一张木椅，双脚放在桌面上，左手抚摸着—个粉红、光秃发亮的头颅，一双水蓝色的眼睛从茂密的白眉毛下射出犀利的目光，右手不停地摇摆，仿佛我是一辆出租车，他正在向我打手势。他完全被鸟禽标本包围了：鹌鹑和鹅儿蹲在地板上，窗台上站着一只苍鹰和一只猫头鹰，一只信天翁展翅立在屋角，还有一大群小一些的鸟禽挤在桌上和书架上。

“噢，斯图尔特，”比格彼博士扯起他那男高音嗓门说，“我敢说，你到达这儿花了不少工夫。五周前你就该到了。你在干什么？误了船不成？”

“什么，先生？”

“我不晕船，也没有任何晕这晕那的毛病，可是我注意到许多人不能幸免。你呢？”

“我不懂，先生。”

“这儿没有你的椅子，所以别张望费心了。另一把椅子摔坏了，拉弗朗布瓦兹正在修理。站一站对人绝不会有什么坏处。说吧，斯图尔特。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咕哝着表示抱歉，前天我才收到他的电报，不明白他提到船和晕船是什么意思。博士听着，往头颅上抹了一把，望着窗外。

“你不是本家人^①，不带那个腔调，斯图尔特。”

“什么，先生。”

有人敲门，拉弗朗布瓦兹端了一张椅子进来，我才有了座位。从博士的头顶望去，我看见书架上放着一些破旧的课本，一整套《牛津字典》，五卷《笨拙》杂志的合订本，包括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二年之间的各期。博士背后是这间屋里唯一没有摆放鸟的地方，那儿是一幅版画——一艘十七世纪的战舰，两舷炮火齐发。

博士说道：“那些招聘代办处不值一枚邮票钱。我知道，挑一位新教师有点像伸手进袋子，摸着什么算什么；可是代办人起码该知道我需要从故土来的人。”他的一双蓝眼睛打量着我。“刚才你说是从哪儿来的，斯图尔特？”

“蒙特利尔。”

“唔——”博士说，他迅速地上下眨眼，然后停下说：“噢，我缺一位教师，所以聘你来了。我想你得了什么学位的吧？”

我告诉他，我有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位，成绩优良。”

“唔——”博士说，“不过，你不能在这儿教历史。庞森在教高年级的历史，麦克尼西在低年级。庞森参加过布尔战争，^② 麦克尼西在皇家海军服过役。社会主义者裁减了他，可怜的家伙才到这儿来了。别的你还能教什么？”

^①指斯图尔特不是英国人，讲话不带英国腔调。

^②布尔战争：英国与南非布尔人之间的战争，前后共两次，起于1880年，止于1902年。

我告诉他，我的法语还不错，也许还能教英语，但博士似乎听而不闻。

“我们会有课程给你教的，”他说，一边斜视着窗外。
“别为那发愁。你懂法语吗？”

“是的，先生，”我重复了一遍。

“那么，我想你会在这所中学教点法语，这儿总有空隙需要填补。最好不让法国人教法语，他说的话孩子们一个字也听不懂。我希望你能把这这个缺口填得平平的。”博士转过身来，声音里忽然充满了信任：“告诉你吧，斯图尔特。当你在这一行呆到同我干的一样久，你就会明白：当教师教书最不重要。要紧的是亮出旗来，树立表率，建立校风。你还记得中学教了些什么吗？我可记不得。但我对学校却记忆犹新，那是一所蛮好的学校。”

博士从袖口里掏出一张丝手帕，用力擤鼻子，震得周围鸟禽身上的尘埃飞扬。然后他又双腿交叉放在桌上，两手抱住后脑勺，身子再往后靠，几乎整个儿躺平了，这时他喋喋不休地谈起作息时间表，称之为“庞森时刻表，”并补充说像庞森这样的人才懂时刻表。

早上六点三刻打起床铃，七点一刻早餐，七点三刻祷告，接着是半小时的间歇时间。

“上厕所，”博士说，“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办好学校的秘诀在于使学生愉快，而学生愉快的秘诀呢，在于让他们内腹通畅。”

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是上课时间，中途有一刻钟的间歇。然后吃中饭，饭后休息半小时，接着上课到三点半。这以后是课后管教学生或课外活动，值日教师负责课后管教学生，

不值日的照管课外活动，值日教师还要巡视走廊通道，查访级长训斥室，在那儿低年级的犯规生由高年级学生用鞭子处罚，以及照管两节晚自习，这以后才放中、低年级的学生去睡觉。

“不让学生闲着，你就不会遇上犯规的问题，”博士向我解释。“但是假如给学生以胡思乱想的时间，你大概明白，他们会想出什么鬼花招。你使用过教鞭吗？”

“没用过，先生。”

“那你去找管教鞭的人——他是我们的武装警卫，过去是当警察的——向他要一根。劝诫学生，追赶他，让他自惭形秽，这最有害于性格的成长了。但是，如果他该挨打，你狠狠抽他六鞭子，却会交上一个终生朋友。”

博士望着窗台上的苍鹰沉思着，又摸了摸脑袋。

“喔，斯图尔特？”过了一会，他温和地说。

“是，先生？”

“我发现你一直在赏视我的战舰，”他突然把瘦削的大拇指往肩后一扬，指着那幅画着十七世纪战舰的版画，他的声音变得特别和蔼可亲。“她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在皇家海军战舰单上名列第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母系的一位祖先曾统率过她，普里斯尔海军上将。我想你不曾听说过他吧。我的全姓本来是普里斯尔——比格彼，问题很明显，在学校里用上普里斯尔不行，于是我把普里斯尔和破折号去掉了。你可曾注意到校门口的那幅题词？”

“是的，先生。”

“那是普里斯尔的名句。*Caveat Gallus*——‘让法国人小心点！’我有理由感到奇怪，因为法国人从未出击过

他；他曾监视他们许多年，但他们从未露面。我曾想给这个学校取个海军名字，但谈何容易。这儿的人谁也没有听说过坎伯唐，假若我们称之为圣某某学校，本省人又会误认为我们为罗马天主教徒。叫做尼罗？哥本哈根？显然都不行。特拉法加，这你自然知道，斯图尔特？蒙特利尔有了一所女子学校取名特拉法加，于是我只好勉强来到滑铁卢。这儿不是公爵最巍峨的城堡，萨拉曼卡才是，但在这儿，谁又听说过萨拉曼卡？”

哗啦一声，博士双脚着地，身子高耸在他的群鸟之间，摆出一副令人窘困的无赖神气指着我，指头还不断摇晃。

“斯图尔特，你是第一个本地人，我是说，我们这儿迄今为止的第一个非英国人。所以，加入我们得好好干。”

“我愿尽力而为，先生。”

“那还用说。到复活节，你要么证明自己干得不错，要么拉倒。”

二

五年的苦役就这样开始了。我喜欢这些男孩子，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同时我庆幸好歹总算有了个工作！可是大部分时间我被弄得筋疲力尽，因为滑铁卢中学一团混乱，像英国军队在战争头一年里的情形，随时都可能出事。

“公爵，”比格彼博士说，“乐意亲自动手。”

比格彼博士也一样：我完全相信，要是可能办到的话，他会单枪匹马开办这所学校，一个教员也不聘用。他教一大堆课，上课总是精力充沛，弄得隔壁教室的教师根本无法讲

课，因为他洪亮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灌满了所有人的耳朵。他喜欢这些孩子，对他们有着一种神秘的了解，他们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对他崇拜备至。他喜欢打板球，亲自投球，亲自冲洗球场，成天手忙脚乱。他骑脚踏车自娱，蹬在英式自行车上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踩在踏脚板上个儿显得挺高，尽管老走调，却不停地哼着水手的劳动号子，假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喜欢读书也好，也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校长。但是，如他所说，他太忙了，连报纸都无暇顾及。

这或许说明了为什么教职员像目前的状况。比格彼与我们其余人之间的鲜明对照——在凄清的时刻我常常这样想，同公爵与其部队之间的差异正好相似。我们之中唯有一人愿意当中学教员，其余的人与我一样，都是走投无路才到滑铁卢来的。

庞森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作息时间表的制订者，在葡萄牙做生意倒了霉才来到加拿大。教拉丁语的卡伦德，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教堂风琴手，擦铜器是他的嗜好，他在加拿大闷闷不乐，因为没有铜器可擦。教自然科学的先生原是太平洋客轮上的事务长。数学教员是一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常常惹得庞森暴跳如雷，他鼻音很重，老说英国危在旦夕。打算庆祝她的葬礼。一位不修边幅的青年——教员中唯一想当中学教师的人——推崇蒙台梭利教育法^①还有三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都获得了英国地方大学的学位，沿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曾在中学里向一些不三不四的学生传授过

^①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的女医生和教育家，主张启发儿童主动好学并强调感官训练。

一些怪七怪八的知识。”有一个教员原来是牧师，一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的神气，他坚持认为：韦氏大字典对于英语没有权威性。还有麦克尼西。最后还加上沙特威尔。

乔斯林·麦克尼西是一位被海军削减退伍的军官，四十二岁，瘦高个儿；他不时抽搐的头颅围了一圈黑发，因为多年戴海军帽，头顶秃成个马蹄形；黑眉毛又浓又直，像两把铁篦子。麦克尼西为了战争的爆发而活着，任何战争都行，这样一来他便有可能恢复海军少校的官衔和薪金。只有当报纸载有可怕标题的日子，我才看见他面带喜色。他神志清醒的时候，还算一个不错的教员，但他痛恨周末和值日，每逢这样的日子便酗酒，喝醉后怪里怪气，粗暴无礼。他值日爱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手执一截他叫做“启动器”的涂蜡绳鞭，这时学生们便把平时晾裤衩的地方搭上毛巾。他从未识破这个摆橱窗的把戏，而他们在鞭子下的坚忍刚毅精神令他暗暗赞叹，这在我的同事中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怎么说，”麦克尼西常常宣称，说话时头皮抽动一下。“无论怎么说，这些乡巴佬娃娃挨鞭子时倒有达特茅斯孩子的风度，比伊顿公学^①的那些小跳蚤强。”

我觉得麦克尼西的姓名组合很离奇，有一次我问他，这样一个姓氏为什么同一个基督教名字乔斯林联在一起。

“没有的事儿，”他头皮一抽，说道：“乔斯林是佩特的名字，而这个佩特绝不是苏格兰人。”

接着他告诉我，佩特是一位萨默塞特子爵，他在猎松鸡的季节到了金特尔，于是有了我。

^①伊顿公学：位于英国伦敦以西的一所私立中学，专门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

“自然，老头子不能公开承认我，”麦克尼西解释说，“但他经常对我表示兴趣。他供给我念完达特茅斯中学，我到海军服役时，他寄给我一张五十金尼^①的支票。自那之后，他音讯杳无，可我认为这事儿处理得够体面了。能够如此慷慨大方的人不多，假如他们周末外出，使女仆怀了孕。”

还有那位叫伦道夫·沙特威尔的教员。

第一次见到沙特威尔笔直的身板，尖形的脑袋，修剪的仁丹胡和核桃似的面容，我猜想他准是从孟加拉骑兵队革职来的。他那松弛的嘴唇，俗气的傻笑，呆滞的眼神，忧郁的声调，加上那老受挫折却依然欣然的神气，无论他到哪里，总讨人怜爱；而且正如他自己说的，女人一向对她和气。

“一个姓沙特威尔的人，”他解释说，“早就有思想准备，事情将会不妙，你懂吧。我动过改姓的念头，但又不无留恋之心，于是决定勉强对付下去。”

沙特威尔曾在一所英国私立学校念书，后来转学到桑德赫尔特，因为他父亲先到了那所中学，但他在桑德赫尔特什么也没有学到，只知道如何挺直身板。毕业后无事可干，他便去士麦那^②过了几年快活日子，葡萄干和枣子，任他饱食。但在士麦那出了点漏子后，他便沿苏伊士运河而下，到印度住了二十年；战争期间，由于不法行为中断了在陆军后勤部的工作。他在加尔各答做过柚木生意，在马德拉斯办过黄麻，在吉隆坡搞过橡胶，统统都失败了。据他说，在爪哇一年，差点儿办成企业；然后到巴厘岛闲住半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老兄。”）这以后到澳大利亚的港口布

①金尼：英国旧金币名，一金尼等于二十一先令。

②士麦那，土耳其的港口城市，现名为伊兹密尔。

里斯班当了一年轮船代理人，可事情又出了毛病；于是正当他考虑去南美之际，（“我正想去阿根廷，你知道。”）比格彼博士的长手，通过某个教师招聘处抓住了沙特威尔，将他乖乖地从地球的另半部分拉到了滑铁卢，从此他本来的惰性使他落了根。他梦想着回归故土——英国的柴郡，（“我知道诺兹福德附近有一处迷人的别墅。”）但不敢奢望实现。

“你知道，一个人非得机灵才能在英国混下去。那儿的情形与此间截然不同，这儿谁都能过日子。”

沙特威尔区别于其它同事的地方在于，他的视野不局限于学校附近的加拿大原野，不囿于从拉昌斯到蒙特利尔——他们出入加拿大的门户——火车沿途的景色。除了沙特威尔外，一到学期结束，他们全都慌慌忙忙赶第一趟客轮回老家；一到英国，我怀疑他们大多数人会去沿海城镇，依靠给学生补课挣些收入。但沙特威尔到了六月总是囊夹空虚，拿不出路费，只好勉强撑持，熬过夏天。曾有一年夏天，他和自己并不十分钟情的女人同居，但那女人却很喜欢他。另有一个夏天，他远去西部，到了温尼伯，返校后却评论道：那儿似乎平淡无奇。通常，他只能到劳伦琴湖畔度过漫长的暑假，住在一间破屋里，靠吃罐头食品过日子。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常去城里过周末，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他很喜欢她，有一两回甚至动了娶她的念头；但每当权衡得失之后，又决定作罢。

“你知道，我要和她长住在这儿，便没有什么盼头了。照目前的情形，我时常都可以盼望周末的到来。”

我在前面说过，自从博士去后，滑铁卢中学旧貌换新颜，

几乎难以辨认了。博士曾声称自己无暇读报，但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他突然发现英国危在旦夕，不应该老呆在这儿而应亲上前线。他变卖了家私渡海还乡，招雇的教员也逐个步他后尘。而今，这所中学由本国人开办，与往日大不一样了。当初，食堂的四壁贴了一圈海军上将的肖像，像与像之间挂着野兽头。而今，墙上是加拿大历届总理的画像，校长椅子上方原来悬挂着三个凶猛豹头的地方，现在被学校新董事会成员的集体照片代替。好些老校友抱怨，旧日的滑铁卢中学难以寻觅了。我承认，在事事和辙、个性消失的今天，我也有为之懊悔的时刻。

三

但是我在滑铁卢期间，却发现它索然无味，唯有周末才使我有些生气，神志健全。每隔三周我值日一次，有时感冒了卧床不起，不少时候是衣兜里一文不名；但只要有机会而又付得起路费，星期五下午我便溜出来上蒙特利尔去了。

蒙特利尔在三十年代的景象可谓空前绝后。圣凯萨琳大街两边，失业者川流不息，我常常看见他们停在商店的橱窗前，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无法购买的商品。一家在电叉上烤鸡的餐馆，窗外总站着一批垂涎欲滴的人，目不转睛地望着鸡皮烤得毕剥着响，油水横溢。我记得大雪之后，失业者便到街头扫雪。多么可悲的景象：大家一声不吭，没有戴手套，廉价的皮靴被雪浸湿，粗糙的皮面变成灰色。我最难忘怀的是，看见这一切所产生的内疚感，因为我有工作，他们却在失业。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蒙特利尔的街道仿佛心领神会，我沿街徘徊，凭着闻到的气味和目睹的情景，就知道到了什么街区。我逐渐爱上这个城市，当夜幕初降，罗亚尔峰还在夕照中显得高峻，凌空高耸的高楼大厦，紫气灰濛的下半城，轮廓多么鲜明。我爱听轮船发出的声响，当它们在港口或者沿着运河驶进湖区。这块静谧的区域，有人说像伦敦，但实际上它却只为这座饱经沧桑、愤世而不嫉俗的城市所独有。

虽然我在恩慈街父母的家里过夜，但通常要到半夜，他们已经睡了，我才去那儿。星期日我专门腾出来和父母在一起，这一天我也很疲乏。星期五晚上我进城后，在火车站寄放了行李便沿街闲逛。街道朴实无华，开阔坦荡，使每个漫步者感到平等：家庭主妇，办事员，成千上万的失业者，衣着破旧却手挽手的青年男女，在街角监视沉默女郎的妓院老板，还有那时丑陋的茶青色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半蹲半站地立在车后部的隔间里，拥挤的乘客手拿报纸，读着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所有这些人仿佛成了这个单一乏味却又自有特色的集合体的一部分。冬天，这个城市更比平时更富有特色。当雪花映着灯光斜飞，像黑色的电线飘动，当群星闪烁在寒冷的天空，白雪踏在脚下吱吱作响，会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穿上滑雪衣，乘上廉价专车，赶到北边去。而且那时，看一场冰球赛只消花五毛钱。

我在滑铁卢教书的第一年里，几乎所有的周末都单独度过；到一九三四年秋，我才开始在城里交朋友。最初的几位是通过亚当·布洛结交上的。布洛这位雕刻家曾被撵出滑铁卢中学，现在到了伊顿商场卖地毯，是他告诉我滑铁卢中学提供的食品包括粗菜野果。从他开始，我结识了一个朋友圈

子，最后终于与杰罗姆·玛特尔认识，于是多年之后，我又与凯萨琳重逢了。

我听别人把亚当·布洛描绘成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但也许不具任何典型性。他父亲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母亲出身于一个旧商人家庭，布洛自己却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假装在剑桥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深造，耗费了父亲几万美元，最后却声称自己本来就是一位天才。他父亲替他付帐也厌烦了。如今他在伊顿商场工作，业余从事雕刻，他在蒙特利尔繁华市区的住宅，成了一伙愤怒不满的年轻人的会聚之地。他们到这儿来喝啤酒，幽会，谈政治，论艺术，常常逐个訾议讥笑平庸的政客和艺术家。他们崇拜的偶像是画家毕加索和骚登，诗人艾略特和庞德，小说家乔依斯，卡夫卡和纪德。在这伙年轻人中间，亚当·布洛最接近于一个货真价实的无政府主义者。

可是我也感激亚当，他教我欣赏绘画，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我所知道的最和善的人。

她的名字叫卡罗琳·霍尔，我常常纳闷，是什么情趣把她引进了亚当这伙人之中。她体态健美，褐黄头发，是一个很在行的理疗师，她使每个男人感到自己讨得她的欢心。她活泼愉快，身心健康，但在性生活上却很不道德。她对性的态度可以简单归纳为：“只要是和你所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乐趣。”

正是卡罗琳使我离不开那些抽烟喝酒的夜晚，在那儿，年轻的艺术家和诗人唇枪舌箭，沉醉在空谈里。我第一次听到杰罗姆·玛特尔这个名字，也是从卡罗琳口里。她在杰罗姆上班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她怨恨地谈起他——怨恨他没注

意到她的存在——说他是蒙特利尔最富有男性魅力的动物。

亚当也认识杰罗姆，我迫不及待地想弄清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亚当嘲讽地一笑：“玛特尔？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跳伦巴舞的角色。”

“人们不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吗？”

亚当耸耸肩，做了个鬼脸：“也许是的。可是，干外科医生这一行不就很惹人注目吗？当然不一定比得上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运动员，但够惹人注目的，乔治。”

“我知道——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凯萨琳和杰罗姆结婚，现在我明白，要是有机会多同亚当的朋友见面，一定会见到他们的。我感到有些胆怯害怕，我所认识的凯萨琳是一个生长在湖边的姑娘，与杰罗姆结婚的凯萨琳却是我望尘莫及的成熟女人。我明白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真诚地相信，滑铁卢的教职与我能力相当，卡罗琳同我志趣相投。

无论她在那里，愿上帝保佑她。卡罗琳与我再次相逢时就接受了我，每次进城，我总设法去看她。我心目中的她，正像沙特威尔眼里的寡妇，成了我在滑铁卢那些枯燥乏味的日子里期待的目标，成了阻止粉笔灰屑沉积在血管壁上的活动剂。

然而，我们彼此从未真正相爱过，她以同样半心半意喜欢着许多男人。她那丰腴光滑，叫人动情的躯体，给十多个孤寂的男人带来安慰。她庇护了我们大家，甚至使我们之中有的人在夜间发出欢笑。大家都喜欢她，连那些大肆訾议她的人也不例外。患了关节炎去她所在医院的老太婆，专门点名要她治疗，当她们隐讳地谈到死亡的可怕，她怀着真诚善

良的神情倾听。我常想，她生来听人摆布，但她总算维持了自我，她毕竟做到了独行其是，自得其乐。

她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同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是一个外科护士，也与杰罗姆同在一个医院，和她丈夫两人就住在卡罗琳对面的一栋单间公寓楼房里，离亚当·布洛也不远。现在我就谈起她和她的丈夫，这是因为我与凯萨琳重逢之前，对于这个故事来说，他们俩远比我当时认识的其他人更为重要。

我对诺拉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她自己很少谈及，除了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她在安大略的一个清教徒城镇里长大。她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市面上出售的诗集她都读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似乎已经读完风行于三十年代的大部分社会革命方面的书籍。她的声音总令人难忘，她的面容也是这样。她具有科迪莉亚的声调^①：柔和，低沉，富于音乐性，浪漫，男子认为女人应该具有的那种声音。她的面庞清秀优雅，动不动就绯红。她丰满的嘴唇咧开，叫人感到幽深莫测。一双黄褐色的大眼仿佛能洞悉未来；苗条的身段具有古典的健美，看上去却又柔弱多姿；款款的步态叫人不禁动情，真想一把搂进怀里藏起来。

然而，这个宛若维多利亚女性再世的女人，活像一个——但并不全是一件德勒斯登的瓷器^②；作为一个外科护士，她心灵手快，才华出众。她那双纤细的小手灵巧有力，

①科迪莉亚：莎士比亚《李尔王》剧里三个姊妹中年纪最小唯一孝顺李尔王的女儿。

②德勒斯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萨克森邦的首府，以盛产优雅美丽的陶瓷闻名。

工作时她思维敏捷，疾如电闪；在最严峻可怕的手术面前，她神情镇定，不露声色；谈起她的业务，她冷静客观，同外科医生一样在行。唯有谈到工人大众和人类的苦难时，她才会大动情怀，像一位前拉斐尔派的女诗人误入了教会。

诺拉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她挑选的那位丈夫。我的相貌不扬，但可怜的哈里·布莱克韦尔生下地就是个畸形。他的头颅长在长矛似的身躯上，显得过于庞大，一对短短的脚步腿，走路像在小跑，如果我把他的面孔比作荷兰乳酪，并不是指它具有复杂的成份，而是说他的面孔就像一块荷兰乳酪而已。年刚三十二岁，哈里便开始秃头了，像他事事倒霉一样，他的秃法与众不同，不是脱落光秃，而是变短稀疏。他也是一个失业者。

可是，强烈的情感照样能够存在像他这样的人身上：哈里崇拜他的妻子，诺拉成了他的宗教信仰，庇护场所，圆满的美梦，生存的依据。我常常看见他尾随在她后面，带着渴求的微笑走进挤满人的房间，然后独自缩在屋角，听别人高谈阔论，自己一声不吭，他的一双小眼睛从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从来不带任何批判的目光——他自称喜欢每个人——只陶醉在欢乐里，当他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赞赏的神情，而赞赏的美人儿正是他的妻子。在失业的日子，他心甘情愿地作她的奴隶，即使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也尽心竭力地伺候她。哈里照料家室，把狭小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可与一个能干的法裔加拿大女主人的厨房媲美。哈里还补衣，做饭，洗餐盘，以及一切能表示他钟爱诺拉的家务事儿，而对于任何些微的回报，他便感激涕零。

岁月浑浑噩噩地过去，更被国际上发生的灾难搅混，在

一些国家里，这些成了屠杀镇压的先声。在维也纳，多尔法斯把炮口转向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与此同时他在施蒂里亚州的走卒活活绞死了瓦利斯。墨索里尼侵入了埃塞俄比亚，对此，奥尔和拉瓦尔表示默许。希特勒向莱茵进军，英国却强迫法国接受。西班牙土地上爆发了大屠杀，英法却撒手不管。与此同时，失业大军并没有减少。

告诉你，经过三十年代的人们，很少有人敢于或者能够回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景，那个时代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当然，那时的太阳照常放光，雨水同样下降。我当时年轻，有过许多愉快的白天，也度过了不少欢乐的夜晚。由于年轻无知，也有过驰骋想象，想入非非的时候。但那时充满了毒害人的气氛，我认为这气氛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腐败尸体。三十年代在我们头脑里留下了罪恶和羞耻的记忆。

岁月浑噩地过去，我失去了它们。我仿佛被无形的墙垣隔断，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我在滑铁卢教书，尽了最大努力，但说实话，我想任何人也无法在比格彼博士掌管的学校里教好书，除非他相信我们还生活在十九世纪。暑假里，我干各种低贱的活，能找着它们也暗自庆幸。我曾为一个犯罪少年补习功课，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制造商。有一年我乘一条载水果的轮船到了西印度群岛。我学会了那时的恶毒语言和过激思想，在一个受到长者和领导人物背叛的时代，任何敏感的青年都不学自会。我学会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整群整伙的人，肆无忌惮地评论政治，并且鼓励别人也这样做。这不是我一生中可以感到骄傲的岁月，也不为与卡罗琳之间断断续续的风流韵事而得意，因为当时的我不配同她一起生活。我至今不能理解，她为什么那样慷慨大方，真心地喜欢

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却顽固地拒绝接受一个女人衷心的爱。真实的原因在于，凯萨琳还留在我记忆里，深深地扎进了我的生命，即使在我故意回避见她的日子，她仍然扎在那儿。

卡罗琳猜到了有这样一个女性存在，尽管我压根儿没提过她的名字。

有一次，她说：“乔治，我愿意嫁你，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决不会嫁给任何男人，除非我深信自己能使他愉快。你在为某个人掌着一盏明灯，不可能让任何女人讨你欢心。她是不是已经嫁了别的什么人？”

“是的，”我说，脸不禁红了。

她的语气变得温柔和善：“那我只能说，你的整个观点是不健全的。你们这些男人总在痴心妄想。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女人这样生活？像我们女人这样坚强？乔治——”她突然眼泪盈眶，使我非常感动——“我希望你能让我爱你，但既然不能——”她微微一笑，丰满的双肩一耸——“我想只得面对现实了。但无论发生什么事，请你不要责备自己，也不必为我担心。”

她说的这话使我心里害怕。可我不明白那是她肺腑之言，直到那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进城去邀她外出晚餐，按响她的门铃却没有任何回应。

我横过大楼去按布莱克韦尔家的门铃，诺拉开门后，我问她能否让我进屋，在那儿等一等。

“当然，”她说，眼睛困惑地大张着。

“哈里不在？”我说着坐下，点燃一支烟。

“他出去了。他恰好找到一个工作。”

“那太好了。”

诺拉坐在我对面，细长的大腿并在一起，褐色的大眼流露出痛苦。

“他在议会大厦当招待员！”她说，那语调是妻子说这种话时才用的：“他死了。”或者说“他刚被捕了。”

“唉，好歹是个工作嘛。”

“可是他所要求的是干活，乔治。他希望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而不是为那些去看消遣电影的笨蛋引座。哈里是个了不起的电力工程师。大家都小看了他，因为近来没有工作，也从未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我点头称是。

“他太谦虚，从不谈自己，”诺拉说，“可是他学过两年工程学，由于没钱才离开大学的。在俄国，像哈里这样的人会受到重视。凡是技师在俄国都有用武之地。”

我听厌了她谈哈里，于是我们谈起俄国，一谈就是半小时，我们一致认为俄国了不起。我对俄国几乎一无所知，知道的丁点儿都是星期六晚上听别人说的，而那些为俄国唱颂歌的人也不比我知道得更多。可是诺拉读过《资本论》，还有列宁的几部著作以及韦布夫妇^①的一些小册子。

“卡罗琳究竟到哪儿去了？”隔了一会，我问。“她起码晚了一小时。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

“诺拉清秀的面容紧张起来，悲哀地望着我。

“乔治——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你是说她连你也没告诉？”

^① 韦尔夫妇：指西德尼·韦布夫妇，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哦，乔治！”她微微噓了一口气。“乔治，亲爱的！乔治——卡罗琳结婚了。”

“老天爷！”我叫了一声愣住了，然后我面红耳赤，像有一股怒火冲上头顶。

“她也没告诉我”，诺拉说。“她只管结婚，谁也没告诉一声。那是五天前的事了。”

我坐着没吭声，感到气愤而又绝望。隔了一会，我说：“唉，和谁呀？”

“吉姆·劳森。”

我想了想，记起一个不大修边幅的男子，很难说出他的年纪，一张松弛的嘴，身上有些臃肿，最近才在我和卡罗琳参加的星期六晚的聚会上出现。

“看在上帝的面上的！”这便是我的评论。

“你原来和她相爱吗，乔治？”

我望着窗外，看见一个妓女在街角的灯光下挽走了一个男人。

“我发誓，一无所知，”诺拉在我背后说，“直到星期一晚上，卡罗琳突然进来告诉我，她和吉姆结婚了，马上就要离开，要我保存几件她提包装不下的东西。她按月租房，恰好本周末到期。那儿已有一个古怪的人搬进去了。”

我转过身，又点了一支烟。“她去哪儿了？”

“纽约。吉姆在那儿工作。”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美国人。”

“她只是来看看我就走了。你原来是不是打算和她结婚，乔治？”

我苦笑了一声：“这年月，婚姻是件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她一双褐色的大眼盯住我，整个丰满的嘴唇都颤动了，接着她突然捏紧拳头，一本正经，异常兴奋激动，声音都变得生硬了。

“乔治——别走。加入我们！”

“你说的什么意思——加入我们？”

“像你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归宿——共产党。”

“我不知道你是共产党。你参加多久了？”

“一个月。在那之前，我什么也不是，一文不值，一无所有，毫无意义！现在，我属于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卡罗琳曾经嘲笑我，但我想她现在不再笑了。你也不会笑我。你和她早该结婚，可是——”

“瞧，诺拉，我和卡罗琳没能结婚怎么同共产主义拉扯得上？”

“在公正的制度下，你们就有可能。结婚的年龄到了，人们就应当完婚。但你瞧这——这个资产阶级肮脏后果！瞧你自己，乔治。为了得到性的满足，你爬遍阴暗角落，同时——”

“我没有那样糟糕。”

“一切都应当公开，诚实，光明磊落。哦，乔治！”

我弄不清心里这时是什么滋味。既感到失落和遭受拒绝的痛苦，同时又感到宽慰，因为不再为卡罗琳承担责任，但更主要的是感到自己垮掉了。这的确是事实。

诺拉目光迷离地说：“我一直喜欢你，乔治，你可知道？”

“我也一直喜欢你，诺拉。”

“你的感情是不是受到了严重伤害？”

我耸了耸肩。

“我要不是已经结婚，我会把你搂在怀里。”

我瞅了她一眼，不胜惊讶，立即转开视线。

“我唠叨几句你介不介意？”她说。“有时，我感到假如不同能理解我的人谈谈，我会死去。哈里如此可爱，一往深情，我感到自己配不上他。他这个人好极了，要是你理解他的话。我爱他，乔治。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话。我真的非常爱他。假如我不爱他，我不可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吗？”

“我相信你。”

“只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神智混乱。哈里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无论什么，无论什么，乔治。”

“也许，他做得明智。”

“他像一只殉葬羊。我想到这个制度对他多不公正！哈里穿着有辱人格的侍者号衣，用电筒替那些资产阶级笨蛋引座。可也怪，他还得从工资里扣除那猴儿衣服的钱。还要等多久人们才会大声喊叫？我们落入陷阱了，乔治。哈里一辈子都处于陷阱之中。他十四岁时死了母亲，后来他父亲娶了个邈邈女人。现在遇上经济萧条，他没有工作可干。他忠厚善良，乔治。他应当有儿有女，有了子女他会当个好爸爸的。”

“好啦，”我说，想着自己的事，我有些气恼；哈里是否当个好爸爸关我屁事。

“你们俩是结发夫妻。要是想生儿女，起码名正言顺，不会是私生子。如果怀了孕，至少不是非堕胎不可。”

她那双褐色的大眼噙满了泪水。

“我已经堕过一次胎，乔治。别的还有什么办法？我得继续上班工作。可我想孩子想得要命，现在还是这样。”

然后她红着脸转了话题。她向我谈起一个工人，一天下午被送进医院，背部破裂，头颅开花。玛特尔大夫还没来得及动手，他便断了气。

“我猜，这个玛特尔大夫在你脑子里占了不少地位吧？”

“他是我一生中遇见过的最出类拔萃的男人。”

“我以前认识他的妻子。你知道她吗？”

“当然，我还没有资格从社会的角度去了解玛特尔大夫。但我认为他尊重我的工作，他动手术时常常指名要我。我自然见过他的妻子。她有时到医院来，如果她和这位大夫要到什么地方去，她总在日光室等候。”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我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她现在怎样？”

“一位了不起的女人，”诺拉说。

我突然想要起身离开。我感到自己已经临到绝境，恨不得独自一人，尤其想单独欣赏音乐，我记得亚当·布洛有一套精选的巴赫唱片。奇怪，他竟会喜欢巴赫，但那是真的。这时我希望能听到巴赫的音乐。

走到门边，她用颀长的手臂挽住我，温柔地亲吻我，我回吻了她，她忽然靠上来，我一把搂住她。

“不，乔治，别这样。”

“对，”我说，退后一步。

然后我道了晚安，走上街道。

四

我在这个奇怪夜晚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形。我按亚当的门铃，又没有人回应，但我记得当他出去买食品或香烟时，常常不锁门，于是我转动门把，开门走进屋去。地板上到处是散乱的报纸，床上没有铺叠，几餐的食盘杯碟堆在桌面，桌上还有一本庞德的《诗章》和一本叫做《研读》的小杂志。房子中央放着一件不小的雕刻品，晃眼一看，像一只海豹，身上凿了些小孔。我绕过去时，被一双鞋绊了一跤，然后走向放唱片的地方。我发现唱片已经破裂，便决定上街去吃饭。几分钟之后，我在附近一家小餐馆看见亚当，独自一人在小隔间里吃意大利面条，一边在读一部法文版的塞莱恩的小说。

“请坐，”他说，向我挥动那本小说。“读过没有？你看这些年来我怎么把塞莱恩给忽略了。”

我叫了一盘炒鸡蛋，面包和咖啡；看看四周，空气里弥漫着炒菜的油烟味，香烟烟雾，洗碗碟的水声和喧哗的人声，所有小隔间和柜台前都挤满了学生。当他往后靠时，亚当的一副阴沉面孔被烟雾罩住了。

“对，你真的必须读读塞莱恩。最近你进过纽约地铁的公共厕所吗？失业者就睡在那些地方的尿槽突壁上面。塞莱恩小说就带这么个味儿。但是，上帝可以作证，他是诚实正直的。”这样说过之后，亚当抽了一口烟，让烟子从鼻孔里喷出。我告诉他，刚去过他的屋；他问我喜不喜欢他雕塑的像，我说无法欣赏它的奥妙。

“说得好！”他说。“你要能看懂，我早把它毁了。我叫它《黑女人等待着不成功的堕胎》。”

“当然，它不是黑女人，纯粹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形象。说起堕胎，你知道我们的卡罗琳怀孕了吗？”

我吃了一惊：“那是不是她匆忙结婚的缘故？”

“我想是的。谁给弄的——你？”

当我抵赖这种可能性时不禁毛骨悚然，亚当笑开了：“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你太谨小慎微了。那个健壮的白女人长了一个多么贪婪的性器官！各色各样的男人都适合她，光顾她的大有人在。你认识她嫁的那个王八蛋吗？”

“在你屋里见过他一两次。”

“我敢打赌，十之七八他不是那崽儿的父亲。像她那样随便大方的女人，哪里知道是谁造就了那生物化学结果呢？”亚当在嘴上抹了一把，做了个怪相。“劳森一身尸臭，我想你知道他是共党分子吧？”

“我对他全然不了解。”

“卡罗琳也不知道，”亚当凑过桌面对我说。“听着，乔治。劳森绝不是什么正派的人物儿，他是加入进来满足性欲的。他可能原是被遗弃在车站行李房的私生子。乔治，这我风闻一二，凑巧知道这龟生子在一个共党地下组织里。”

亚当声称咖啡凉了，俯身去喝，然后擦了擦嘴，带着嘲笑打量我。“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出在哪儿吗？你只是不情愿承认：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泥潭里。历史像一辆卡车——它的制动器坏了——滚了进去，溅了每个人一身泥。想开些，乔治，想开些，慢慢结束生命。你瞧卡罗琳，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一个普通女人不过是一座生物工厂。要在

正常的时代，她会嫁一个当地杂货店的老板，一年生一个孩子，直到那老板熄火为止。但是你瞧她现在，她太傻了，连什么叫地下组织都不明白。她一身又白又胖的肉，对一个地下分子将是多么可爱的护身符啊！”

我叫的炒蛋端来了，开始用餐；亚当添了咖啡，又点燃一支烟。

“今晚你见到诺拉吗？”他带着犀利的目光问。

“我去找卡罗琳时偶尔碰上了她。”

“向你提一点忠告，乔治。你显然要寻新欢的，但别去碰那个假正经的娼妇。”

“你为什么要这样揣测我？”

他带着玩世不恭的戏谑神情，眼睁睁地注视着我。

“你是在同你亚当老祖宗讲话。小心点，她是只狐狸精。”

“她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恰好成了能干的护士，也恰好与我的一位朋友结了婚。”

亚当大声笑了，又呷了一口咖啡。

隔了一会，他说：“我曾捉摸诺拉为什么要当护士，但我思索之后才明白，那正是她要操的行道。眼前她正对D·H·劳伦斯^①的小说入迷。留心点，老兄，留心。”

“这一切与D·H·劳伦斯有什么相干？”

“傻瓜蛋，她们都从他开始。她们这些假正经都从这位无知的英国村夫身上过性瘾。劳伦斯是一位天才！是个半丢

^①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出身于矿工家庭，他的作品爱情情节较多，性描写比较露骨。

子浪漫派，他的内疚情绪同纽约州^①一般大。”

我环视这家小餐馆，亚当厌恶地盯着一个女学生的臃肿背部，她正在屋角吃冰淇淋。

过一会，他说：“诺拉向你提起过杰罗姆·玛特尔没有？我是说，她准会利用各种时机向你解释她自己多么高尚，多么热爱她的丈夫，除了她，谁对他都不了解。她偶然谈起玛特尔大夫没有？”

“她为什么不可以谈呢？她是那家医院的护士。”

亚当的目光紧盯着我，然后笑道：“为什么老这样防备我，乔治？我们大伙儿不都在地下组织吗？为什么不告诉你的亚当老祖宗，玛特尔夫人原是你的老相识？”

“你怎么知道的？”

“从那位夫人自己的嘴里。她亲口告诉我的。随便问一下，诺拉是否不仅谈到玛特尔，而且还谈到凯萨琳呢？”

我眼睛盯着食盘，点了点头。

“她是不是主动说，她的确认为玛特尔夫人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

我的神情一定露了底，亚当又大声笑了。

“她逢人便说‘玛特尔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这句话。你能否认吗？”

我吃完炒鸡蛋，往椅背一靠，你“究竟想干什么，亚当？”

他搔了搔鼻孔，接着又擤鼻子。

“你明白，乔治，你是个很罕见的人，一个绝妙的标本，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分子。你讨人喜欢。你所追求的是

^①纽约州：美国东部的一个州，面积49,576平方哩，是本土四十八州中的一个州。

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套舒适的房间，一个宜人的工作，然而你却在我身边的野心家周围转来转去。你差不多同斯坦利·鲍德温^①一样革命。噢，不错——中产阶级把你驱逐出来，他们撵走像你这样的人是自我毁灭。当我们的乔治像狼一样嚎叫，真正的豺狼会何等嚣张？”他停了一下。回味着自己的精辟宏论，然后接着说：“现在谈谈你青梅竹马的故人凯萨琳吧。要不是在这个时代，她那样的姑娘怎么会嫁一个玛特尔式的土包子？”

“他究竟有什么毛病？”

“没有，没有。”亚当咧嘴笑了。“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到底的乡巴佬罢了。顺便告诉你，他是我的论点的又一个例证。中产阶级也把他驱逐了，而他这种人是绝对不应当驱逐的。他愚蠢，但具有危险性。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精力横溢，等于一般人的五倍。把这样的人撵出你的地盘，想想他会干什么？十之八九，他会设法反扑过来，把地盘占领。”

“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吗？”

“不，尚且不是。”亚当笑了。“他工作太忙，还没有工夫——暂时。听说他一天干十八个小时。显然那是硬撑。什么事他都蛮干。他的妻子是半个病人，这也可能是他过份工作的一个原因；只消看他一眼，你就知道他是匹种马。”这次笑得最欢。“那个布莱克韦尔家的小娼妇，总说他多么高尚，忍受家里的情形，毫无怨言。这是她在告诉你玛特尔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之前要发的议论。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还爱凯萨琳，乔治？”

^①斯坦利·鲍德温（1867—1947），英国政治家，三度出任英国首相。

这样对我讲话的人只有亚当·布洛。他明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但我的不悦却反而使他暗暗得意。我耸了耸肩，他突然变得庄重严肃，情真意切。

“你知道，乔治，谈起凯萨琳·玛特尔令我深思。她是一位体面的女人，真正的贵妇人风度，我坦白地说，每次见到她我便感到自己品格低下，望尘莫及。我为什么这样唠叨下去？那些下流的争风吃醋的假正经们，总是打着谈艺术的幌子——我的天，假如我早有觉察，一定去找医生喂我足量的激素，把我变成一个同性恋者。现在搞同性恋的人是青年男子。那些共产分子简直令我捧腹，高谈什么伟大的广泛的美好的革命——呸！”他轻蔑的“呸”声很高，好几个学生都回过头来瞅他一眼。“真正的革命与他们毫不相干。咱们等着瞧吧。五十年之后，这个农商之国将成为一个三流的罗马。难道你没有听见那些同性恋者掩口窃笑我们这些可怜的苦行僧？他们笑得有理。他们是最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与女人不沾边。他们不是追逐女人的浪漫派，而是自己混在一起，同流合污。假如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同性恋者，我可以立即在伦敦出风头，甚至可能在巴黎露一手，当然在纽约是不成问题的。”他嗤之以鼻，大声地哼了一声。“那个混蛋D·H·劳伦斯，只不过是那伙该死的浪漫派的一员。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艺术为了风流而艺术，我的天！歌德，雨果，雪莱以及其余的猥亵的一伙——给我举出一个能够把自己的灵性与兽性区别开来的人！”

我喝完咖啡后，决定起身，亚当请我午夜时分去他那儿，带上一瓶酒，但是我说打算早些就寝。他点点头，又回到他的塞莱恩小说。我离开了。

城市上空高挂着狩猎季节的满月，从餐馆的烟雾和喧嚷中出来，空气格外清新，干爽，几乎令人陶醉。星期五的暮晚时分，川流不息的人们，我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显得年轻，有几个还带着快乐的神气。在圣凯萨琳街角，我在一个失业者的手心里放了两毛五分钱，买了张《星报》，登上西行的有轨电车。我在淡黄色的座位上坐下，借着明亮的灯光，开始浏览报上的新闻：斯坦利·鲍德温相信局势正在好转；一个刚从达豪^①逃出来的人深信塞尔曼仍然活着；一个来访的天主教会主教声称，佛朗哥是一位基督教英雄；一个英国的访问者断言，除非消灭佛朗哥，我们的文明将会完蛋；一个来访的美国市长宣称，蒙特利尔是北美最令人神往的四大城市之一。

我下了车，站在盖埃街的拐角处犹豫不决。往上走半条街，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正在国王剧院演出，那是我原先计划带卡罗琳去的地方。现在卡罗琳远走高飞，剧已开始，我只好沿着圣凯萨琳大街往回走。

圣凯萨琳大街在萧条时期的星期五之夜：报贩正在收摊，失业者懒散地闲逛，橱窗照得圣坛般光亮，有轨电车一路上叮叮当当敲个不停，男女青年成双成对去看电影。我在一家酒店停下来喝了一瓶啤酒，然后拖着步子到了另一家，和一个货车司机一起喝了两瓶，司机告诉我，无论在萨斯卡通、温尼伯、阿瑟港、诺斯贝、渥太华或蒙特利尔，都找不到工作。在第三家酒店里，一个英国人对我说，要不是他妻子不争气，一切都会称心如意的。我去第四家酒店的途中，一个妓女问我想不想讨个快活，并且说只花三块钱就行；当

^①达豪：在慕尼黑西北十哩地方的一个城市。曾为纳粹集中营之一。

我回答说没有钱，她问我是不是想白揩女人的油。我喝下一瓶啤酒时边喝边同一个比利时水手谈政治，他知道戈林上次与希特勒交谈的内容，很有见识地对即将临头的战争谈了半小时，直到他的消化道出毛病，突然倒在地上，这时一个讨厌的侍者想把他撵出酒店，他呻吟着说：他钟爱已经出走的妻子。然后我在街上步行，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老妓女跟上来，问我想不想快活一宵。过了一会，我发觉自己在一个街角处，靠在路灯柱上，像要呕吐。漫长的大街两边，百货商店、电影院、杂货店、酒馆、空荡的银行、拥挤的有轨电车，仿佛都在我眼前摇曳。月亮已经沉落，刮起一阵风，翻卷着地上的废纸和尘土。人群渐渐稀疏了，但仍有不少人走动，我看见一个妓院老板的身影，在街角监视一个妓女。电车吱吱地停住了。我走去乘车，但人太拥挤，又退回来步行，走了将近一小时，直到觉得步子较为稳定。这时已过半夜，圣凯萨琳街上只剩下我一人，我独自站在街口，呆呆凝望。

那是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最低点。当时我明白——一个人能意识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自己毫无价值。我对自己说，要是命运好一点，我也许不致于落到这个地步；假如我有机会从事自己所喜欢和追求的工作，情形一定会截然两样。然而，整个世界正滑向战争边缘，失业队伍仍不断注入圣凯萨琳大街的洪流。我听见刮擦的声音，低头一看，报纸的正页沿着人行道被风向东刮去。我直视着这条凄清空荡的大街，仿佛在透视自己的心灵深处。

五

第二天晚上，我在城里提早晚餐，决定自我逃遁，逃离我在蒙特利尔认识的唯一类型的人，逃离对政治的高谈阔论，只要能逃遁就行。于是我买了国王剧院的戏票（那是我前一天晚上打算带卡罗琳去的地方），而且我真的喜欢第一场戏。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扮演一个爱尔兰牧师，这位牧师从西班牙度了一次长假回来，感到在本国难以适应，因为西班牙的牧师朴实而又有学问，而他在本国的两位副牧师，只是喜欢打足球而已。剧情顺利展开，我完全沉浸其中，直到第一场幕落。但这之后，舞台上演出的一切，我头脑里一丝影儿也没有。

那是因为幕间休息时，我终于见到了她，整整十二年之后，我又见到凯萨琳了；她那乌黑的头发，曲线鲜明的双肩，娇小丰腴的身姿。我不禁浑身颤栗，膝头发软，喉头干塞。也不完全是这些感觉。我还突然感到难忍的气愤，愤慨自己陷入了钟爱她的情网不能自拔，我几乎要转身回到楼上的座位去。

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被同她一起的那人吸引住了，我知道那准是杰罗姆·玛特尔。看上去他与我构想的形象相去甚远，首先他比我想象的矮些，其次他甚至比亚当描绘的更粗犷。他显得比凯萨琳老些，更比我老得多。他的太阳穴处有一小块亮记，亮记后面的一只耳朵与农牧神的相似。他只呈现一个侧面，鼻上由于有一块旧伤痕而显得扁平，前额深皱，正抵御袅袅上升的烟雾，一只宽大有力的手，只用拇指

和食指捏着一支烟。他扔掉烟蒂，当他转身用脚跟去踩灭时，款式贴身的夜礼服下看得见肩胛肌腱移动，这使我记起亚当·布洛称他为一匹种马的话。

外表凶狠无情——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但不一会这个印象便消失了。一个引坐侍者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转过脸读纸条时，我看清了整个面容：他眼睛大大的，显得聪慧而又年轻，嘴唇富于肉感，但也开阔有力，颧骨高突坚强，五官端端正正。这是一副医生的面容，混在任何人群中我也能辨认出来。

他把纸条揉成一团，带着遗憾的微笑看了凯萨琳一眼，那神情动人极了。当他走到衣帽间时，我发现他健壮有力的身躯有点颠簸。

我等待着。然后凯萨琳转过脸来。她看见了我，整个面孔立即容光焕发。我们很快便站在一块了。

“我一直想着给你写信，”她说，“我常常想见你。”

我刚才感到的愤懑顿时烟消云散，我又和她在一起了，她的声音在我整个身心里激荡。

“那是我的错，”我咕哝道。“我甚至害怕让你知道我的地址。”

“哦，乔治——为什么呢？”

“我害怕自己不能忍受已经发生的这一切。”

我一反平日妄自菲薄的自卫习惯，成了一个骄傲的人，我要对她明白地这样说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想，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已经忘了她的善意。有时她的心会残忍无情，有时她的性格会倔强固执，但我忘了她无限的仁慈，而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善，当我目不

转睛地俯视着她，我感到自己被包围在善意之中，我感到多年来承受的压力——茫茫无边，昏糊若云，终于纷纷散开，阳光又照到我的头上。

有人推挤了我们一下，说了声劳驾，从身旁挤了过去。

“我邀请你参加婚礼的信你都没理睬，我才最后放弃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乔治，亲爱的！”

然后她凑近我，当着众人的面亲吻我。

“凯萨琳！”

她的眼睛闪烁着，藏在假面具背后的紧张感消失了，她快活的微笑，无拘无束，坦荡自然。

“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讲，真不知从何说起。噢，对啦，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家小。你相信吗？不是一个大家庭，只有一个挺可爱的小女孩，活泼顽皮，她的名字叫做莎莉。我为她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那太好了。”

“你还不知道？”

“不，凯萨琳。谁也没告诉我。”

“你瞧——”眼帘微微一垂，回味着往日顽强与生命搏斗的闯劲。“你瞧，我再一次胡弄了他们。”

我转过头朝后望，看见杰罗姆正从内门厅出来，帽子斜戴在头上，晚礼服外面披上一件海军蓝华达呢的大衣，慢慢地穿过拥挤的人群，皱着眉抵御门厅里缭绕的蓝色烟雾，我捉摸他的年纪，三十四岁？三十九岁？也许还要大些。

“杰罗姆，亲爱的。来见见我一直想让你见的人，这位是乔治·斯图尔特。”

开始，他似乎没听清我的名字。之后他明白了，当他牵动

那宽阔厚实下巴时，我感到他的性格像有形的力量撞击着我。他喜笑颜开表示欢迎，一把捏住我的手，紧得我直退缩，但我喜欢这一握，也喜欢他。

“唷！”他说。“唷！我当然早就想见到你。你不是凯特爱上的第一个人吗？干吗有了机会又不娶她？”

我语无伦次地咕哝了句什么，杰罗姆爽朗地笑了。

“我想刚刚相见，不应该说这些，但我还是要说。你知道，”他又是一笑，“世界上再没有比娶一个妄自菲薄的女人为妻更糟糕的事了。要不是由于你，凯特就成了那类女人。在你们生长的那个鬼地方，你是唯一给了她自信心的人。我也一直在鼓励她树立自信心。谢谢，乔治，很感谢你。”他用胳膊挽住她的腰，像小孩似的笑望着我：“你看她这模样如何？”

她颇有女人风度，真诚地被人爱着，但我只说了一句，她看起来挺标致。

“你们男人在一起尽说这些！”凯萨琳说，但她很高兴，因为杰罗姆喜欢我。

“这儿，”杰罗姆递给我两张戏票的存根说，“拿去同凯特坐在一块儿观看后半场剧。我得去医院，如果不用动手术，剧完之前我再回来，但多半得动。所以，剧完后你和凯特一道出来，咱们再好好谈谈。”

他离开我们，我看见一个老在注视杰罗姆的高大黝黑的女人，把目光移向凯萨琳，带着某些女人彼此审视的爽直神情，仿佛在说：“她比我强的地方是什么？”我很高兴，凯萨琳领悟到这一审视，也明白我洞悉她的反应；她灰色的眼睛闪烁着，仿佛在对我说：“我还享有许多别人猜不到的东

西呢。”

第二幕的铃声响了，人们朝门边走去，但凯萨琳和我仍停留在原处。

“他是不是经常像这样？”我问。

“相当经常。他的病人喜欢他，怪不怪？”

“开始我认为他年纪不小了，不会理睬我，后来他却显得和我一样年轻。你们经常穿晚礼服赴宴吗？”

“很少。我们今晚是去参加一次医学界的宴会，由杰罗姆演讲。我希望他让我替他写讲稿，有时他也这样做。但他兴奋起来就会扔开讲稿，尽兴发挥。今晚恐怕他就很兴奋。”

“兴奋什么？”

“主要是针对鲁珀特·艾恩斯爵士，杰罗姆所在医院的董事长，他今晚也出席了；杰罗姆千方百计找些话来刺激他，让他血压升高。不用说，艾恩斯认为杰罗姆是个共产主义者。”

“真是吗？”

“他只不过是杰罗姆而已。”

我们走进堂厅，找好座位，灯光隐灭了，剧又接着演下去，但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凯萨琳就在我身边，她白皙丰满的手臂，应着生命节奏的呼吸，使我仍然感到像是回到了故土，有了归宿。当幕帷再次落下，人们又去抽烟，彼此顾盼，凯萨琳却和我留在座位上交谈。“教书不是一个耻辱的工作。”

“我没谈教书 而在谈滑铁卢中学，我并不是抱怨，凯萨琳。别的工作也轮不到我。我想，一场战争会改变目前的情况。”

“你也是一个盼望打仗的人？”

“当然。”

“杰罗姆认为战争已经开始。”

“他是对的。”

“要是没有这么多的人希望战争就好了。”

“不管愿不愿意，它在逐日临近。”

“是的，”她静静地说，“我知道它在临近。”

她激动起来话就多了，平时她很少这样。

“有一件事令人安慰，”她接着说，“战争到来后，杰罗姆从事的职业会允许他做些贡献。我初次见他时，他自称是个和平主义者，但恐怕我永远不会认真听信它。”她朝我沮丧地一笑。“我嫁了个斗士，乔治。当他更为任性顽固的时刻，会在号声中哈哈大笑。”

“他使你感到幸福，对不对，凯萨琳？”

她镇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是的，乔治。”

“你还和我们的老朋友有交道吗？”

她摇了摇头。

“你是我想见到的唯一老朋友。杰罗姆喜欢你，我希望你也喜欢他。”

我站起身，让回座位的一对夫妇过去；我再坐下时，凯萨琳与我的目光相接了。我们把手拉在一起。第三场演完了，幕落时人们向塞德里克爵士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走到门厅时还不见杰罗姆的影子。

“显然他必须动手术，”她说“和我一道走吧。”

“哪儿去？”

“大多数周末，我们去不同的人家聚会聊天。有时我身

体不适，有时我去，但中途退场。他们对我都习惯了，所以一切很自然。可是，杰罗姆的工作很辛苦，得读那么多医学杂志，所以他跟上局势发展的唯一办法是同那些有闲暇过问政治的人交谈。他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他常常担心医疗这一行的狭隘性。今晚有一位英国记者参加，我想他是《新政治家》的撰稿人吧。”

“是不是叫克利福德？”

“不错，他刚从西班牙归来，杰罗姆想会见任何从西班牙回来的人。约翰·大卫教授是今晚聚会的东道主。”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克利福德的文章。”

我羞怯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犹豫不决，因为在教书这一行，大学教授好比长官，而中学教员只是一名军士而已。

“请跟我来，乔治，”她乞求我。“这些是你合得来的人，你不属于亚当·布洛那一伙人。”

“他们也不错，”我说。

“他们可不怎么样，杰罗姆似乎觉得他们有趣，但我希望他不那样认为才好。”

“他们是我近来交结的朋友，凯萨琳。”

“你真喜欢他们吗？”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现在你的心脏怎么样了？”

“噢，你把话题转移到了我身上。我的心脏仍然在原处发出同样的声音，但我不再害怕了。亲爱的，请叫一辆出租车吧。”

几分钟之后，我们沿着舍布鲁克大街往东驶去。我看见月光在一座教堂幽暗的窗台上闪烁，然后到了结上露珠的大学校园，看上去像盖着一层白霜；最后汽车在一条黑暗的街

边停下，我们到了教授们居住的一幢幢灰石头洋房的面前。

六

三十年代的那些星期六之夜——现在似乎很遥远了，当我们能喝上更美味的酒，人造卫星围绕着被宣传家和广告商控制的星球转动。那天晚上，挤在约翰·大卫教授客厅里的人，有六位教授，四个普通人，连凯萨琳在内一共有八位女士，其中大多数是教授夫人；人们谈论着大家都议论的时事。为《新政治家》撰稿的英国记者克利福德，似乎认识在英国写过书或作过演讲的每个人。我感到异常兴奋，听见那些知名人士的大名从一个认识他们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知道剧作家肖伯纳对科幻小说家H·G·韦尔斯说了些什么，当克利福德在一次晚宴上恰好坐在他俩之间，以及知道哈罗德对韦布夫妇究竟有什么看法。克利福德双手插在衣兜里，背对空壁炉站着，很有教养地侧着头，长发舒散地从太阳穴处往后梳，当他谈到暴力行动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谈话持续地进行着，时而一人慷慨陈词，时而一问一答，有时高昂激烈，有时温和冷静。客厅中央摆了一张咖啡桌，上面放着饼干和乳酪。我们喝着啤酒，这天晚上的招待员是一个年轻人，名叫阿瑟·拉任彼，不断给我们斟满酒杯。我坐在地板上，背后是放在砖柱木板上的几排书。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大油画，画着秋天风暴中的安大略森林景象，墙上挂着几幅关于牛津大学的蚀刻画，约翰·大卫曾以罗氏奖学金^①的研

^①罗氏奖学金：由西塞尔·罗得（1853—1902）为英国殖民地、自治领以及美国学生而设于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享受此奖学金的研究生可在该校研习三年。

究学者身份在那儿住过，壁炉架上摆着德国巴伐利亚城的啤酒罐，这是他在那儿学德语的纪念品。那个年代的时髦名字和术语不断被人引用，瀑布般飘洒向整个客厅。拉斯基、凯恩斯，马克思、塞拉西、列宁、拉斯塔、考茨基、希特勒、墨索里尼、布卢姆、阿热拉、里特维诺夫、戈培尔、鲍德温、斯塔维斯基、张伯伦、兰斯伯里、佛朗哥、范帕森、沃利斯杜兰蒂、罗斯福、卡伯勒诺、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干部、第五纵队，新经济政策、技师、贸易指标、暴动、富农、资产清理、乌克兰（希特勒会不会占领）、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能否长驻）、如此等等。不断有人伸手去取饼干和乳酪。阿瑟·拉任彼忙着斟啤酒，那时的一夸脱啤酒才值一毛五分钱。凯萨琳坐在汤姆·奎德的一幅蚀刻画像下面，在身着罩衫的教授夫人中间显得穿得过多，男人穿的是灰法兰呢裤的花呢上装。三十年代是最后一个多事之秋，那自然也是大学教授们以天下为己任，自信能规划人类未来的最后一个年代。

过半夜了，客厅里有些骚动，这时杰罗姆进来了；我起身一看便愣住了，诺拉·布莱克韦尔和他在一块儿。

“蒙特利尔城里最出色的外科护士，”他向大家介绍，诺拉的脸红了。“她要一杯啤酒，我也要一杯。凯萨琳，你认识诺拉·布莱克韦尔，对吗？”

两个女人彼此合乎礼仪地致意，但在凯萨琳随和的礼节背后，藏着一种使诺拉不自在的警惕。拉任彼端来两杯直冒泡的啤酒，杰罗姆和克利福德握手之后便开始说个不停，好像他今晚一直在场似的。

“我不知道动手术为什么使我口渴，但事实的确如此。

也许是自我放纵，也许是手术室的温度和乙醚味儿，但今晚上可能是由于懊悔。”

他在沙发上找到一个位置，一口气喝下半杯。

“懊悔，”他重说了一遍。“在诺拉的帮助下，我今晚犯了一个罪。要不是咱们，蒙特利尔最可恶的坏蛋之一现在已经完蛋了。”

拉任彼斟满他的杯子，他把杯一举表示谢意，立即又喝下一半。

“不用怀疑，那家伙会恢复健康，”他继续说。“我至少让他多活五年。”这时他看见我：“喂，乔治，你终于来了，我很高兴。你与诺拉认识，她告诉我的。”

英国记者克利福德流露出厌烦的神色；这不能怪他，杰罗姆进来时他正在解释，一下给打断了。他仔细打量着杰罗姆，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他。

同平时一样，诺拉和陌生人一起总是羞羞答答的，她到我身旁找了个位置坐下。当克利福德继续解释，我和诺拉悄声地谈开了。

“他常常在医院外这样谈论病例吗？”

“不，不，当然不。他疲倦了，劳累过度。”

“这样晚你在医院干什么？”

“玛特尔大夫遇到这个急诊，埃利奥特小姐，医院的病危手术护士，突然发了胆囊炎，玛特尔大夫便打电话叫我去。”

她得意洋洋，不胜骄傲。我问他们拯救了什么大人物。

“那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全是玛特尔大夫的功劳。他的

手术太绝了。别介意他，当他像刚才那样谈话。他给开刀的那个老头吓得要死，而玛特尔大夫却轻手轻脚的，他开刀总是这样——轻手轻脚的。”

“动手术怎么能轻手轻脚的？”

她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仿佛我提了个怪问题。

“要不轻轻地，病人会休克。玛特尔大夫懂得这些。他与罗杰斯大夫截然不同。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动手术的速度会比罗杰斯快一倍，但他总是轻轻地接触病人的器官。”

“在我看来，他不属于轻柔型的人，”我说，“但我得说，看来他的确疲倦了。”

“怎么不呢？今早晨他六点钟就起床，动了七次大手术，还不提别的事儿。”

杰罗姆像一头休憩的动物轻松地靠在沙发上，一边抽烟喝啤酒，玻璃杯捏在手里，皱起眉眼抵制上冒的烟气。

“有些外科医生是很好虚荣的，”诺拉悄悄对我说，“他们对护士说话那神气叫人听了真想爬到什么地方去死掉。罗杰斯大夫就像那类医生。当然谁都知道，他很嫉妒玛特尔大夫。”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谈论医院的事；但她的表情和举止是那样天真无邪，她这样谈论时，人们从不注意。

我突然发觉，她钦羡地注视着杰罗姆。她明知道我在眼前，又是她唯一的谈话对象，但她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杰罗姆的面孔。我还注意到，客厅里起码有半数女人向他投去目光。他自己却似乎没意识到她们的赞赏。他俯身凑前，切下一块乳酪；我看着那只宽大有力的手把乳酪塞进嘴里，与其说它是外科医生的手，不如说它属于一个能干的海员，只不

过更清洁，手指更轻快灵巧罢了。他咽下乳酪，又呷了一口啤酒，然后身子凑前，突然插进谈话。

“克利福德，西班牙人民能够战斗到明年春天吗？”

“毫无疑问，”克利福德说。

“你怎么知道毫无疑问？”

“噢，你瞧，我刚从西班牙回来。”

“你参加过上次战争吗？”

克利福德的脸略微红了：“不尽然，我被你们这些当医生的拒绝了。”

“我问的唯一目的，”杰罗姆说，“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观察战争的。老百姓常常忽略本质的现象——你知道，我指那些只有当你同部队一起呆上几年才能观察到的现象。”他停了一下，眉头紧皱。“从报上读到的关于西班牙的消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想谁都知道，资本主义控制的报纸尽在撒谎，”克利福德说得斩钉截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后两个字。

杰罗姆伸手再取乳酪，当他取用时，克利福德又继续独白。但杰罗姆一咽下乳酪，再一次打断他。

“你不能回避事实，克里福德。忠于共和政府的一派正在吃败战，被打得焦头烂额，他们的指挥官显然是无用之辈，他们的部队显然没有受过训练。而另一方面，看来那个佛朗哥却是一个比较在行的将军。”

克利福德勃然大怒：“你真的相信情形如此吗？据我了解，佛朗哥只不过是普通的西班牙军校罢了。”

“我不管你所了解的是是什么，也许不错。果真如此就更

加糟糕，因为他正在节节胜利。”

“这里有个士气问题，”克利福德说，这时完全被激怒了。“你没看见，知道为什么而战的恰好是共和派。”

“你认为佛朗哥的摩尔部队士气低落？或者坚守在阿尔卡扎的法西斯分子的士气不行？”杰罗姆扬起身说。“你真的相信你说的话，法西斯分子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战，那就是他们战斗的目标。”

“如果你亲眼见过西班牙，”克利福德说，气得面色苍白。“你就不可能把法西斯分子的士气和共和派的士气混为一谈。”

杰罗姆说：“但愿你说得对。”

然后他身子靠后，又喝了些啤酒，过了好几分钟，受到冲击的谈话才又继续进行。我着迷似的注视着他，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能人，竟使满屋顿时沸腾。确实是满屋沸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触到了人们的底蕴。我看着凯萨琳心脏形的沉静面孔，看着她穿上晚礼服、轮廓鲜明的娇小身子，真不知道她怎么能与这样一个人共同生活。粗暴无礼！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没见过更粗暴的人。然而，我内心里不认为他有什么粗暴无礼的地方，因为他并不在挑克利福德的岔子，并不是故意令他出丑。他只是在自已关注的问题上失去了节制。现在，令他感兴趣的不再是克利福德，而是啤酒和乳酪，他像刚才热中于争论那样专注在吃喝上。过了一会，他又打断别人。”

“我今天收到一封诺曼·白求恩来的信。”为了让克利福德明白，他解释说，白求恩也是蒙特利尔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却仍然到了西班牙。他征求我对

他的一个新主意的看法：他想为前线组织一个输血队，还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兴趣参加。”

凯萨琳的面色略微有些发白，但她纹丝不动，也没有吭声。诺拉屏息静气地凝视着杰罗姆，仿佛他是一尊偶像。

“白求恩是那种性情冲动的人，想啥说啥，说了就干，凭热情办事。他也是个能干的外科医生，但我希望他不那么冲动。”

你认为自己如何呢？当我听杰罗姆谈论白求恩时，心里这样想。

“我主张更加谨慎行事，摸着石头过河。像白求恩和我这样的人顶什么用，如果共和派即将崩溃？”

“丝毫不存在那种可能，”克利福德尖锐地答道。“几乎是赤手空拳，他们已经——”

“战争不是赤手空拳能获胜的，克利福德。”

“请问，”克利福德说，尽量显得客气一些，“输血队的目的是什么？”

“输血队的目的在于避免人们死于休克。在战场上从未用过。据粗略估计，上次战争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伤亡者，实际上死于休克；不过，还是谈白求恩和我自己吧。干吗要扔下繁忙的工作，如果在我们赶到那儿之前，管理不善，指挥无能，整个共和主义者的抵抗已频于瓦解？我看不出他们会胜利。怎么可能呢，面临着各国的不干预政策？”

“恕我打断你的话，”克利福德说，“我记得那个话题刚才我已经谈得够多了。”

“我听见的，”杰罗姆说，“我一边听，一边不禁纳闷，你为什么是工党成员。”

克利福德的苍白面膛现在变成了两块红砖。他习惯于别人恭恭敬敬，侧耳倾听，不去打断他的话，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记者，还是伦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认定杰罗姆是在故意挑刺儿。不错，杰罗姆是在刺激他，但不是故意的；当我更了解他之后，我发现他几乎从不故意这样谈话。

“我亲爱的先生，”克利福德一反常态，以最庄重的温切斯特语气说，“我想你不会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工党受了银行的敲榨，目前恰好不在财政大臣的席位上。不干预政策属于保守党。”

“如果你们这些人在位，工党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

“真的吗？敢问有何根据？”

“当然会。你们一伙是和平主义者，天真派，仍然企图以通过决议的方式来阻止法西斯主义。”

“我们一伙——就用你的话来说——对目前这糟糕的局面没有任何责任。如果一九三一年的大选公正诚实，我们就执政了，目前的形势绝不会出现。”

“你是说，要是你们执政，便已经通过种种反对的决议把希特勒阻止了？”

“如果我们执政，希特勒绝不会上台。大不列颠国土上的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会使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坚定不移，社会主义会防患于未然，使目前局势得以避免。”

“会个屁！德国人饥不择食，生性凶狠，他们嗜好战争。”

我瞅了一眼凯萨琳，看她对此有何反应。杰罗姆说的话不仅粗俗，而且他说这些话时使出了很大力气。

“你明白我说的玛特尔大夫是怎么回事了吧？”诺拉悄

声对我说。“他披肝沥胆，而这个英国人只是个社会民主派。”

杰罗姆显然忘了克利福德在场，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应该有人去面对挑战，这样做的唯有西班牙人。上帝知道，他们怎么能够取胜，但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也许现在是去西班牙的时候了，当你知道他们没有希望。”

“但我坚持认为，他们充满希望，”克利福德说。

杰罗姆放下空杯，凝视着自己的双脚；过了一会，他沉重地吸了口气站起身来，带着温驯的微笑望着克利福德。

“我刚才忽然意识到，今晚对你莽撞无礼了，”他说。

“真的吗？”克利福德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每当我疲惫时就会像这样。今天我动了两次不称心的手术，晚上在一个该死的家伙身上浪费了一次成功的手术，而今天下午，一个应当活下去的人却死在我刀下。”他扫视了诺拉一眼，诺拉这时也已站起身。“他从离地一百英尺高的梁柱上摔下来，而建筑公司的老板就是今晚救活的病人。死者留下妻子和五个子女，看来赔偿问题还有一番争论。”杰罗姆闭了一下眼。“我的天，如果这位遗孀得不到赔偿费，我要让那活下来的家伙收到一张从本市外科医生开出的最高额帐单。”

杰罗姆的双脚换了一下重心，凯萨琳站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膊。这是第一次我见他这副神情：突然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后来，我常常见他这样。

“约翰，我们最好告辞了，”凯萨琳对主人说，“杰罗姆从天明忙到现在。”她转身对英国记者说：“见到你很愉快，克利福德先生。”

克利福德嘟哝了句客气话，但没有说见到凯萨琳或杰罗姆很愉快。

我看见凯萨琳的颈动脉突突跳动，杰罗姆也注意到了，他俩的目光相遇，递了个夫妻间会意的眼色。他用手握住她的手臂，向众人再次投以温和的微笑。

“我很抱歉，讲话太多了。诸位再见。”

到了外面的街沿，杰罗姆去打开车门时，诺拉对凯萨琳说。

“我认为玛特尔大夫今晚说的每件事都完全正确。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不相信，他对那个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都应当像玛特尔，有话直说，毫不讳忌。今天下午的手术事故使他心烦意乱，晚上还能开刀，真是一个奇迹。”

凯萨琳静静地看着她，说：“我知道手术事故使他很不安，布莱克韦尔太太，现在我们可以开车送你回家了吧？”

七

那夜之后我的生活改观了，尽管我仍在滑铁卢中学工作，每周五天泡在伤透脑筋的教室里，守着那些噉噉喳喳的男孩子，每四周得值日一次；沙特威尔、麦克尼西和其他教员仍然是我的同事，但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不再空虚，因为凯萨琳和杰罗姆拯救了我，恢复了我的灵性。他们让我成为莎莉的叔叔，那时她刚六岁；介绍我认识他们的朋友，了解这些朋友的兴趣爱好。我逐渐产生了自信心，认为自己不仅仅只配当比格彼博士手下的一名听差而已。每当我想到“家”

字的含义，脑子里便浮现出杰罗姆那幢邻近大学、位于半月街的寓所。

我每次进城，他们坚持要我去看望他们。我意识到杰罗姆特别喜欢我上那儿去。

“凯特很寂寞，”他告诉我。“医生的妻子总是被撇在一边，只有一些零星的时间同丈夫在一起，而凯特的情形比大多数人的更糟。有你在周围，我心里好受些；当我抽不开身时，你还可以领她出去走走。”

有时，我的确领她去听音乐会或观看演出，还看过一次冰球赛，因为第一个年头我有好几个周末没见到杰罗姆，凯萨琳也一样难得见到他。有时当他就寝，她却已经进入梦乡；她还未醒来，他早起床了。她只见床睡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们在滑铁卢工作时间够长的，但与杰罗姆相比，简直等于是游手好闲。他每晚平均睡不上五小时，有时少到两三小时。通常他一天得动六次手术，还要应诊，到大学讲演，每天花两个小时在他为失业者开设的免费诊所里服务，而且还参加各种公众活动。除了这一切，他还挤出时间阅读医学杂志，帮助遇上麻烦的人，陪自己孩子玩耍。有一件事他总是努力坚持：回家吃晚饭，饭前保证花半小时同莎莉在一起。

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我与他们的生活愈来愈接近。我自信了解凯萨琳，她深入到了我的骨子里；在某些方面，她同我谈起来比与杰罗姆更为随便些。她寂寞，因为她钟爱一个不同类型的人，我相信自己能减轻她的寂寞感。但是我也喜欢杰罗姆，不怀任何疑虑，那些日子他在我眼里更像一种自然的力量，不仅是一个人而已。而且他比我年长，能干，已

经开辟了一个真正的生涯，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望尘莫及的。

凯萨琳总轻松愉快，当她谈起杰罗姆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情形。

“杰罗姆要是喜欢谁，总想和他一心一意，并且常常想当然地以己律人，莽撞蛮干，不顾后果。同时他也有体察入微的时候。但是，他绝不猜测，除了在工作中。人们认为他工作很大胆——蒙特利尔最果敢的外科医生——干工作从不粗心大意，但在日常生活中，他随心所欲，鲁莽行事，不顾一切，有时真令我不寒而栗。他顶撞起别人来像两极之间爆出的电火花——你可见过这样的情景？”

不曾见过，这种刚烈性格我倒认为很简单；因为那时我很羞怯，还不习惯人们那样待我。不知不觉地，我逐渐把杰罗姆视为我的保护人，几乎把他当做我父亲的替身，因为避开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从未有过父亲。

我明白，凯萨琳带着鉴赏的乐趣看待我。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很厌恶他，”她说。

我爽朗地笑了：“他不喜欢你，是不是？”

“我几乎不在他眼里，这可能是我厌恶他的原因。那时我常常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忧心忡忡，生怕不为人知，不被人理睬。我常常出洋相，成为别人谈话的资料，不止一次干出连我自己也不胜惊骇的事。我也会冒冒失失，不顾后果——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吧？”

她眼里闪着娇羞的目光，我说：“是的，亲爱的，还没有忘。”

“我希望男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喜欢我，但又常常为自己

抱着这种期望而气恼。”

现在她显得平静而又自信，这是在她自己的家里，茶杯茶盘摆在她面前。

“我与杰罗姆的最初几次见面，”她神情沮丧地说，“有可能成为相见的最后机会。我不知道他来自何处，觉得他喋喋不休，固执得令人讨厌。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蒙特利尔该如何为人处世——假如与人意见不合，总是藏而不露。我知道他是加拿大人，但在我看来，几乎是个外国人。然后我们突然相遇了，我是说真正意义地相会。”

她灰色的眼睛坦率地望着我。

“亲爱的乔治，我不是瞎子，能理解你的感情。我对你说这些太不合适了。”

“你对我太好了。”

“要是我不那么自私，那么喜欢你，我会干出下贱而又可怕的事，你会离开我，把我忘掉。由于你慷慨，你太喜欢我了，我也十分珍惜这种感情，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我笑了：“我想你刚才是在谈见到杰罗姆的情形。”

她对我眨了眨眼。“当然是的。那是七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又出现了。他不常在聚会场合露面，至少那时是如此。在那之前的半年里，我恰好见过他几次。喔，这次他看见我了。我们早经别人介绍过，但我知道他准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这一次他看见我，便侧身挤过来说：‘我们怎么还不认识呢？’”

“那太过份了，我说，玛特尔大夫，实际上我们已经见过六次面了，你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真了不起。”

她又对我得意地一笑：“他很乖巧，乔治，简直乖巧极

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咱们离开这儿吧。’我回答他：‘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离开这儿。’于是，很自然地，五分钟后我们俩坐上他的车去斯坦饭店了。晚餐中间，他去打电话给医院，回来时说他已经找好另一个医生动手术。我知道他以后从未这样干过。他说：‘只是一次阑尾切除。’我那时很无知，不明了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他对你是不是直得要命，乔治？”

“我不敢说直得要命，但确实够直率——是的。”

“他会突然袭击。你没有注意到吗，乔治？——杰罗姆会突如其来。吓死我了。有时候他准会把事儿弄糟的。”

“但这一次他弄对了。”

她醉心地笑了：“哦，太对了。他领我上了西山的瞭望台，我们站在那儿，仿若独自一人似地俯视眺望了几小时。你猜他后来怎么说，他问：‘你的名字除凯特外还有别的什么？’你猜我说什么来着。”

“猜不到。”

“‘要不是我尊重你，你这样问话，我真想宰了你，’我说。然后又说：‘你要是有兴趣知道的话，我出生在这一带的一个普通人家：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除了你谁也没称呼过我凯特。’接着我把姓氏告诉他，他说他喜欢它。我说：‘你的姓意味着铁锤，怎么来的？’”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英国人，姓氏源出于法国新教徒。他自己在哈利法克斯长大，对蒙特利尔不甚了了。”

“‘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只知道东部沿海各省，’他说，‘战后，我在这儿的麦吉尔大学修完了基础课程；具备医生资格以后，我到苏格兰和英格兰行医，并获得了皇家

外科学会名誉会员的称号。我在这儿已经行医四年，但除了医生，还没有机会见识多少人。”

“‘你曾六次遇见我，却视而不见，’我说。”

凯萨琳又朝我妩媚地微笑：“乔治，女人要嫁了像他这般举止的人，谁能安稳放心？让我继续讲吧。我的话他根本充耳不闻，我等着他回答，他却说：‘我想你对自己的心脏很担心吧？’”

“他这话真叫人受不了。我只字未提自己的心脏，当然是别人告诉他的，听他说这话，我怒不可遏。本是一次不期而然、可爱而又令人兴奋的夜晚，他却突然评论起我倒霉的心脏来了。我一时心慌意乱，说了句我的心显露在脸上不成之类的蠢话。”

“这时他盯着我，乔治，他有时就是这么看人的，带着一种和蔼可亲的表情，使你顿时忘了别的一切。他说：‘不，凯特。你的心不显露在脸上，但恐怕会表现在你的手腕上。我摸过你的脉搏了。风湿病，对不对？’”

“这时我极力取笑他——不知道他是取笑不得的——问他这是不是医生的时髦方式，首次遇到姑娘就替她诊病。你猜他怎么着？他转过身，抱住我就亲吻，乔治——从那一分钟起，我便身不由主了。”

凯萨琳的外表很像女王，当她说这类话时，听起来有些古怪，极不协调。不过对她来说也十分自然，因为她身上童心长存。

她继续说：“后来我们开车沿山坡回走，他又谈起我的心脏。”

“‘我想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吧？’他说。‘我猜，

于我这行的早有人摆出一副体贴入微的神气，慎重其事地摇头对你说过：卡里小姐，事情很不妙，但我有责任对你说明，有了像你这样的一颗心脏，绝不可以动生孩子的念头。嘿，他问，‘我说得对不对？’”

“我回答说，大致不差，于是他从鼻子里发出轻蔑的哼声。”

“‘无论说那话的是谁，见鬼去吧！他那样说是为了他自己，绝不是替你担心。注意，我并不是说你的心脏不需要多加观察。过一两天我会给你照个心动图。不过我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你很想孩子，是吗？’”

“我反问他怎么知道，我说有不少女人并不想让孩子来到我们所在的世间，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是说会有不少女人对不少男人这样讲，当她们想嫁给某个人，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城区沿山的街道，杰罗姆让车缓缓地行进。”

“‘你知道，’他说，‘一般认为医药在于维护生命，’这可不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医药旨在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享受其可能具有的生命。’”

凯萨琳止住话，朝我苦笑了一下。“乔治，能和谁讲讲这些事我很高兴。我还不曾对任何人讲过呢。你知道，我没有多少知心朋友。你乐意听吗？”

我回答说乐意，尽管她的追述令我浮想联翩；我清楚地记得，当她以身相许时我曾多么害怕接受她，我明白自己永远没有胆量担起杰罗姆肩负的这种责任。她羞怯地望着我，

面膛涨得红红的。

“假如我还要告诉你别的事，你会介意吗？他当时对我讲的那些话？”

“当然不会介意，”我说。她显得更害臊了，转过目光，眼里涌出迷濛的泪花，但这是由于欣喜和骄傲的缘故，而不是出于悲哀。

“杰罗姆突然煞住车，转过头对我说：‘凯萨琳，你做我的妻子，我会让你怀孕，至少能生一个孩子，你还会活很长时间，起码在你有机会充分享受人生之前不会离开人世。’”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便爱上了，三周之后正式结了婚，而莎莉出生之快，凯萨琳相信在上教堂完婚之前就怀了孕。莎莉的诞生几乎要了凯萨琳的命，可是她顽强的意志加上杰罗姆的力量，使她闯过了难关。莎莉之后，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我用不着去问任何人，杰罗姆在病人心目中的印象，”她说，“因为我自己曾经两次当他的病人。我永远不相信会有任何医生能够像他那样解除病人的恐惧。”

这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唯有我知道来龙去脉，许多细节她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告诉。事实上她很少见到父母，因为她的母亲不喜欢杰罗姆，不赞成他，而卡里先生已经从商界退休，只潜心于自己的花园和学问，仿佛在努力忘却自己还活着这个事实。凯萨琳如今同杰罗姆住在被认为是蒙特利尔城区最有意思的地带，处于英语区与法语区之间，哪个区都不知道他们，这儿居住着五洲四海的人，他们的兴趣广泛，涉及世界各地。

那些日子，我不太敏锐。一个阅世的男人，甚至一个普通的女人，一眼就明了的事情，我总是迟迟才能意识到。就说这事吧：无论凯萨琳多么深沉地爱着杰罗姆，同他一起总感到孤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并不全然由于他的医务占据了大量时间。亚当·布洛称他是个原始人，这也许不错，因为女人喜欢在男人面前表现的种种柔情蜜意，对于杰罗姆全是对牛弹琴。除非当他筋疲力尽的时候，他总是视而不见。

但是，他们俩也领略了蜜月的甘汁，蜜月的明朗幸福时光至今还留在他们心里。凯萨琳告诉我，婚后的头几年仿若天堂，这我完全相信。杰罗姆把她拥抱起来旋转，好像她生来从未害过病似的。婚后那些日子，他也曾轻松自在，暂时把一生不息的奋斗和竞争搁在一边。他已经取得医生的资格，正努力站稳脚跟；医术日益提高，工作愈来愈出色；与此同时，这几年里他无忧少虑，生活在现实之中。每年夏天，他整整休假一月，而在婚后的第三年里，整个秋季他带着凯萨琳去欧洲旅游，阔绰度日。杰罗姆喜爱航行，童年时在哈利法克斯不仅拥有一条帆船，还曾在捕鱼季节去大洋海边，乘上庞大的黑黝黝的纵帆船。他生活豪华，有时入不敷出；有一年他租了一艘六十呎长的双桅船，在加勒比海巡游一月，要不是钱花光了，他会继续航行，穿过巴拿马海峡。

正是由于杰罗姆的欢娱生活方式，使他受到所在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斯坦福德·罗杰斯另眼看待，而先前看重他的这位医生现在成了他的仇敌，因为罗杰斯是贵族，喜欢看到自己的年轻同行既胜任工作又显得阔气。杰罗姆的生活也许会优裕下去，要不是来了席卷整个世界的三十年代初的变化。经济萧条一来到，他头上的太阳立即沉落；他记起童年和战

争的岁月，马上结束了欢乐和享受，开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有时甚至十八小时，凯萨琳见到他的时候也就愈来愈少了。

可是，爱情、欢乐和令人兴奋的美好时光还烙在凯萨琳的脸上，表现在她的仪容上和举止中。我们在国王戏院的走廊重逢的时刻，她给我的印象便是一个深受宠爱的女人，甚至比这更胜，一位真正领略过美满生活并为之自豪的女人，因为她身上还闪烁着往日的光辉。我希望不被人认为带上了感伤情调，如果我说世界上最优雅的形象莫过于沉浸在与丈夫和孩子的无限欢乐之中的年青妈妈。这就是往日的凯萨琳，现在仍然未变。

我与玛特尔家的关系既奇特又简单。杰罗姆没有嫉妒心，我们彼此喜欢，虽然我怀疑不在一起时他会想得起我。我不仅爱凯萨琳，而且悄悄地以心相许，但爱情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更何况在那些日子，她整个的心思都倾注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她常常取笑我，要我结婚，而且还像大媒婆似的，好几次给我介绍她看中的姑娘，俨然像一位慈母，要担当起为我成家立业的重任。然而我怀疑她真心希望我娶任何一位她介绍的姑娘，因为她明白我爱的是她。她知道有时我也和别的女人睡觉——我告诉过她，我同卡罗琳、霍尔的关系，但是我没有让她知道，除非万不得已我总是孑然独身。说到女人，我发现自己要么是心思太专一，要么是缺少兽性的情欲，这种兽欲使男人觉得向自己喜欢的女人发泄性爱是自然而然、甚至有益于健康的事。凯萨琳令我神魂颠倒，朝思暮想。当我约女人外出，预先总是暗自决定要与她们调情作爱，但事实上很少这样做。凯萨琳的形象常常阻止我。

就这样，我继续住在滑铁卢，却时刻期待着到城里度周末。我在城里渐渐交上新朋友，慢慢获得了自信心。凯萨琳给我的情意，杰罗姆对我的兴趣，使我很快感到在恢复失去的尊严。亚当·布洛说得对，我本质上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所谓资产阶级分子不过是一个希望建立家庭、赢得朋友的尊重、相信有自己的未来、属于某个社会团体的人，别的还有什么呢？

但是杰罗姆——我对此深信不疑——绝不可能属于任何特殊的团体，只属于总括的人类。这一点他自己似乎永远不知道。他的基本社会观念比我认识的人都差，假若他遇上英国国王，他只会感兴趣把国王当作一个人看待，如果国王的谈话令他厌烦，他完全可能改换话题，或者走开去跟别人交谈。他毫无阶级界限的意识，蒙特利尔城中种种阶级层次和细微区别，他全然不在意。我相信，他曾无数次地受人冷落；我同样深信，他却从未觉察过。

我逐渐了解一些他的身世，我想这便是他对社会差异漠然置之的缘故，而这此差异对于生活在蒙特利尔的人来说，却是自然而然、不学自会的。他生长在新斯科舍省，这个面积不大的老大哥省份成为加拿大领土的一部分是一项政治协议的结果。战争期间我在那儿见过几个人，他们对待上加拿大诸省的态度，使我有点儿联想起杰罗姆。他们目空一切的态度基于他们的智慧、能力和海军身上的那种勇气。他们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政治，他们跟别人交谈的神气，总把对方看作同类，比起我们来，他们更坦率，虽然不那么敏感，但憨厚朴实，对自己更富有信心。

就在那年十一月下旬，我发现杰罗姆并不真是新斯科舍

人，只是在那儿长大而已。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在漫长的冬雪开始降落之前，魁北克有时会出现短暂的暖和天气，白天气温可高达华氏50度，晚间也不会有霜冻，就在这样一个暖和的时刻，杰罗姆突然决定，我们大家上他在劳伦琴的别墅。凯萨琳、莎莉和我坐上他的小车，在布满波纹云层的天空下向北方驶去。当我们走进别墅时，莎莉发出欢快的叫声，室内像一个干燥的冰箱，我们把木柴放进壁炉，点燃这个魁北克式的取暖设备。室内渐渐变暖，我们拿出带来的食品在游廊上用了午餐，然后凯萨琳安顿莎莉上床午睡，她自己也躺下休息。

杰罗姆和我抽了一会香烟，之后他变得坐立不安，于是提议说：“咱们去湖边活动活动，出出汗吧。”

“好，咱们到湖边去，但你自己去活动出汗吧。”

“那很适合我，”杰罗姆说。

十一月里，万籁俱寂，折断树枝的响声会传到一哩以外的地方。没有度周末的人到这儿来，除了我们俩的话音，再没有人声。杰罗姆的这幢别墅位于荒野，湖边的另一幢别墅远在湖的尽头。像劳伦琴地带大多数的湖泊一样，这个湖的水不深，茂密的云杉直长到湖岸，湖边有些地段浮现出成片的灰色树桩，冲刷得非常光滑，腐蚀成奇形怪状，湖水呈现出琥珀色彩。更奇特的是这天下午的太阳光。离冬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太阳出现的方位如此低，阳光几乎平行地照射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湖岸弯曲像狗的后腿一般，湖长约莫三哩，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半哩。杰罗姆划桨，我躺在独木舟底抽烟。

“那儿有一只捕鱼的潜水鸟，”他说，“刚钻出水

来。”

我转过头去，看见四分之一哩的远处，有一只黑色的水鸟，猫着身映在绚丽的霞光里；我正看时它发出一声狂喜的欢叫，尾部一翘栽进了湖面。

“我小时候常在夜间听见潜水鸟啼叫，是的，尤其是夜里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开始缓慢坚实地划着桨，每划一桨整个小舟都能感到，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划得这样好，他使的力气都凑效，舟头像箭一般向前，船身平稳，毫不左摆右晃，因为他划的每一桨都那样坚实有力，那样完善优美。

“你小时候一定划过不少桨，”我说。

“我八岁学划桨，是的，划了不少。”

他划过了第一道湖弯，开阔的湖面呈现在眼前。

“差不多同九月初一样暖和，”他说，一边把桨放进船内。“我真喜欢十一月里像这样天气的日子，好天气仿佛又复活了。一个月之前下过雪，两周前这儿一定积了七八吋厚的雪，还能看见树林边残留的几处雪呢。可是现在，却和夏天一样。”

他解开衬衫，脱下长裤，独木舟连晃都没晃一下，然后他只穿着紧身内裤坐在船尾。当他重新划桨时，他的身躯像一座活动的雕像；随着每一桨的划动，他强有力的肩膀和肌腱一张又弛。经过多年的日晒，他全身永久地保持着棕褐色，青年时期的繁重劳作造就了他一身发达坚实的肌肉，即使当医生的几年没有经常坚持锻炼，他照样身强体壮。理得短短的一头黑发，两鬓间已露出几根银丝，拳击手的躯干，医生的面孔，看上去完全不同于我认识的任何人。他的左腿

正中有一处青黑色的往内皱缩进去的痕迹。他看见我在打量它，像一个孩子似地咧嘴嬉笑。

“妙吧，对不对？洞眼如此整齐，该是中了一枪，但实际上只是一颗机枪飞子。左腿上给留下标致的印记！当时我正走着撞上了那粒子弹。我的天，弹伤可疼啦。”

“现在还疼吗？”

“疼，每当天气变潮的时候。它成了我个人独有的气象计。因为这个，滑雪惹人笑话，不过我的滑雪本来是可以作为谈话资料的。我小时候在新斯科舍的家乡，那儿没有任何人滑雪。我玩冰球和足球的时间不少。我们玩的是英国式橄榄球——不是你们北美玩的足球，我第一次滑雪是在阿尔卑斯山峰，差不多一直从山上滑下来。”

他把独木舟划到湖的尽头，又掉过来缓慢地划到湖面最宽阔的地方，这时才停下来休息。周围的湖面、山林和天空一片静寂，这宁静一直延伸到一千哩之外的哈得逊湾。没有一丝儿风，没有人声或兽叫，唯有这只独木舟和它的影子。静悄悄的湖面、山林和天空，只见淡淡的阳光从西边撒向东去。

“乔治，”隔了一会他说，“我很高兴凯特又找到你。相信我。”

“你不介意使我高兴。”

他点燃一斗烟，仰望浩瀚的十一月长空，像动物似的吸着空气。

“明天就要下雪，真正的冬雪。”停了一会，他说：

“像这样的天空为什么会显得格外清明？你记得小说《战争与和平》里写安德烈亲王负了伤，卧地仰望清明天空的情景

吗？那太美了。可是我负伤之际，却没有这种好运。”

在神秘的寂静之中，我听得见烟丝在他烟斗里燃烧的声音。

“乔治，”他腼腆地问，“请对我讲真话，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这不是我愿意回答的问题，即使我答得上。”

“你们这些蒙特利尔人，”他笑道。“好吧，算是一个蠢问题。不过，你喜欢我，对不对？”

“你自己明白。”

“我也喜欢你。和我谈点别的事吧。凯特幸福吗？”

“你难道不知道她感到幸福？”

他摇了摇头，转过脸去。“我不敢肯定。我这人不易相处，可是你准知道，所以才问你。”

“她不只是感到幸福而已。”

“你这话是真的？”他像一个孩子那样充满感激。“你远比我更了解她。我看见你俩在一起的光景心里就明白了。她同你很随和自然，同我一起就不那么自在了，你知道。她需要朋友。我有自己的工作，女人嫁了我这样的人是需要朋友的。她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人们都在注意她，尽管她正在摆脱这种想法。那是因为她从小就生病造成的。天啦，乔治，我真不愿伤害这样一个女人。”

他转过目光，望着山林，然后目光越过湖面，落在那只潜水鸟身上，鸟儿刚从一次长时间的潜水后露出水面，停在一百码远的水上。

“我从来不喜欢这些鸟，”他说。

他冲着那只潜水鸟大声说话，鸟儿跃身飞走了。鸟飞之

后周围又恢复了平静。

隔了一会他说：“这样的天气使我相信会成为 一个 好人。”

竟然说出这种失格的话，我忍不住笑了。

“别笑，”他说，“我不是开玩笑。我害怕伤害凯特。”

“你怎么会怕这个呢？”

“我们开始在很多事情上产生分歧。她特别珍视家庭，她做得对。而我呢——但愿她不会轻易感到受了伤害，不那么脆弱，但愿我自己更容易相处一些。”他敲掉烟灰，又装上一斗烟点燃火。”你认识亚当·布洛以及他们那帮人。你喜欢他们干的事吗？”

“不太喜欢。其中有些人也许不坏，可是我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

“你认为他们的为人怎样？”

“有的人我挺喜欢，但亚当这人不敢恭维。”

杰罗姆打量了我一眼：“以他的年纪而论，他懂的东西可不少。”

“举例说好吧？”

“比如，残忍。凯特认为他简直是个坏人。但是如果由于他知道的东西多就是坏人的话，我也算一个。对我说来，残忍可谓罪大恶极。而淫荡——无论如何算不了什么，除非和残忍联系在一起。”

他重又开始划桨，小舟在一片静寂中平稳前进，我望着他那张莫名其妙的面孔，暗自捉摸他坦率地把自己与残忍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我爱那女人，乔治，但我们俩都有很强的个性。她比

我更为敏慧，这我知道。然而眼前的世界形势，在我看来，她却全然无知。她甚至无意去弄明白。假如我也漠然置之，她会很愉快。她没看见——我是说，她感觉不到——眼前的形势已深入到我的骨子里。与此同时，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难忘年月里，瞧，我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发出孩子气的笑声。“我已经把她当做我的法官。这些日子我有时感到孤独得要命。当我从事理智告诉我是正确的事而她又不赞成时，实际上我也感到异常内疚，于心不忍。是不是有不少人称我为赤色分子？”

“我想是的，有一些人。”

他的脸上浮现出争辩的神气：“这成了他们污蔑任何反对派的不实之词。瞧我所在的医院。呵，不用说啦，要是随波逐流，我会安然无事，丰衣足食，他们都会夸我顶呱呱。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的确都那样行事，而对于我们城市所面临的形势，他们却默许容忍。”他厚实的下巴突翘了起来。

“治病得治本，而发病的根本——大部分病因——在于经济形势。填不饱肚子，没有像样的食品。贫民窟。毫无保障。还有鲁珀特·艾恩斯爵士所代表的十九世纪的整个机构。医院仰仗百万富翁给予的资助，而百万富翁们争相挤入董事会供职，因为这表明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有所作为。关于我所在的医院的外科首席医生，你有什么风闻吗？”

我摇了摇头。“只听诺拉·布莱克韦尔说过一次，你和罗杰斯大夫不太合得来。”

“她居然说起这个来了？”他的声音很刺耳。“我要揍她一顿，敢在城里这样议论。”

“我想她不会对别人说。”

他又和颜悦色：“我喜欢那个女人，第一流的护士，尽管你看不出，永远想不到。她经历过艰辛，聪明伶俐。她的丈夫真是个傻瓜蛋吗？亚当·布洛是这样告诉我的。”

“亚当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哦，一周前我偶然碰见他，他便告诉我。”

“畜牲！”我说。

“因为他告诉了我？”

“我敢说是的。哈里并不傻，虽然也并不太聪明。他挺喜欢诺拉的。”

他听了这样重要的个人评价，仍然不予理会，无动于衷，又回到医院的话题。

那是一家小型医院，但相当现代化，名叫比米斯纪念医院。在我祖父的时代，老乔舒亚·比米斯经营木材生意发了一笔大财，死时留下大部分财产办医院以扬名后世。对于他的遗嘱曾发生过争议，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平息下来，结果比米斯医院迄今为止才开办二十一年。从一开始，首席外科医生便是斯坦福德·罗杰斯，他看起来像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①，只是没有长络腮胡，但享有国际声誉。据杰罗姆说，他做的手术已不再如前了，过份的奉承滋长了老医生的虚荣心，尤其是在蒙特利尔这样夸耀自己医术的城市，对出类拔萃的医生更是恭维备至，不遗余力。

“那真是天字号的虚荣。在大多数人看来，却纯粹是为人严厉而已。比如说，他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但他并不小气。他讨厌我恰好保护了我，使我不被鲁珀特·艾恩斯解

^①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政治家，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94）

雇。罗杰斯虽然同巨商大贾一道上俱乐部，但他打心里鄙视他们。他自视为医务界的太上皇，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应该作他的臣民。与此同时，他在逐渐衰老。”

我躺着注视这个怪人的面孔。他充满稚气，又如此能干，既莽撞又容易受人攻击，在一些事情上聪明透顶，在另一些事情上又单纯无知。“没有安全感”这个短语那时不如现在常用，假如当时常用的话，我一定将它用在杰罗姆身上。如果我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人生。我会认识到他是真正值得关切的人，要是你喜爱他的话，因为他的生命活力——这使他与众不同——老是令他惴惴不安，容易冲动。

“你同罗杰斯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紧张吗？”我问。“这个问题也许与我毫不相干，对吗？”

“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乔治，你算咱们自家人。”

听他这话，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有一颗宽宏大度的心，只了解他个性中傲岸和暴躁一面的人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

“嗯，乔治，大致像这样。艾恩斯爵士是董事会的主席，就我所知，蒙特利尔一向有他那样的企业寡头，一辈子发号施令，当今的寡头无疑就是艾恩斯。难道你不这样看吗？”

“是的，”我说，“当然这样看。”

“而其余的人——蒙特利尔的古老家族——却似乎永远容不了像艾恩斯那样的粗暴家伙。”

“他们不想那样做，”我说，“相反，他们要驯服那些粗暴家伙的子孙。就像中国人做的那样。”

“天啦”——杰罗姆咧嘴笑了——“我竟然没想到这

点。”他拨了几桨，然后再次停歇。“有趣的是，与老艾恩斯打交道，我反而觉得好玩。他真是个好胜敢斗的人，无论如何你得承认。他好斗因为他喜欢斗。假如他不像老虎那样好斗，恃强欺弱，他和我会相处得好得多，远胜过我们各自与上流人士之间的交往。但不庸讳言，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他太老了，属于腐朽将逝的旧秩序。他要是法国人，一定会像赛森那样为希特勒效劳，也会像赛森那样，到头来大悟，却为时已晚。

“现在明白了吧，艾恩斯与我并无个人恩怨，不像罗杰斯的情形。他仅仅视我为赤色分子应当被解雇。这就是爱尔兰人所谓的蹊跷——要不是由于老罗杰斯的虚荣心，我会遭到免职。假如我的雇主同别人的雇主一样，与我毫无私人介蒂，我反倒会瞧不起在比米斯医院的职位。”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杰罗姆笑了。

“告诉你——罗杰斯自视为医务界的皇帝。他自己的情形倒算得上一个绝妙的例子。首先，他受过古典教育，父亲当过法官，祖父是教授，曾祖父是军人。作为一个门第显赫的保守派，他总是看不起从事企业的人。照他的看法，他比艾恩斯高贵，他知道艾恩斯原是爱尔兰的乡巴佬，穷愁潦倒，来闯北美，靠着艰苦奋斗才爬上金融界的宝座。罗杰斯天经地义地认为，专门职业胜于商贾，而最优秀的职业莫过于医生。就是这样。当艾恩斯召见他——每年大约两次——告诉他应当把共产分子玛特尔从医院撵走，罗杰斯则非常冷漠地答道：不。要不是艾恩斯老叫他这样做，或许他自己也会把我撵走的。但事情就是这么怪，却因祸得福，平安无

事。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我对这个充满政治倾轧和政治纠纷的世界一窍不通，我只有侧耳倾听。

“医院里的情形不妙，”杰罗姆说，“到处一团糟。这当然不合我的性情。”他又露出一丝孩子般的微笑。“在这儿我可以对你有啥说啥。凯特的看法是，我在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因为我生性好斗。但我不相信自己真正好斗，只不过我这个人容易急躁发火。她很担心我的脾气，我可以坦率承认，我自己也感到害怕。”

我望着奇妙的天空下水波不兴的坦平湖面，一片静寂包围着我们。

“你为什么决定当医生，杰罗姆？”

“战争，”他的面容再次改变——我不知道谁的面容能像他的那样迅速变化——变得阴沉忧郁，心神不定。“乔治，我在战争期间是个出色的士兵。可是进入战斗之前，我吓得要命，喉头干得像团沙，两膝直颤抖；我祈祷愿自己在越过护墙之前就负伤，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不必冲出去就行。我同别人往外行动时，臀部以下的部位完全失去了知觉，可是一旦与对方相遇，却变得狂暴起来。我用刺刀捅死过十一人，乔治。”

“所以你就决定从医吗？”

“是的，在那以后。远距离地枪杀人倒没有什么，除非你想象丰富。但用刺刀捅却是明目张胆地杀人害命。他面对着你，渴望生存。你一刀戳去，他的手便不动了，身上留下刀痕。我曾经像这样杀死十一人。”

他茫然地望着远方，他这时的面部表情我至今还记忆犹

新。

“我戳穿了一个可怜家伙的喉咙，又一脚踢开他，他滚进了一个弹坑。我上前一步，一颗飞子穿过我的腿部”——他用右手扬了一下伤疤——“我也倒进同一弹坑，扑在他身上。我还没来得及移开身子，他便咯咯地断了气。之后，我只得同他的躯体一起呆十个钟点，因为当时机枪在地面密集地扫射，连老鼠也逃不过去。唉，乔治，那真令人忘不了。假若每个士兵用刺刀捅死人之后都必须同死者的躯体呆上十小时，便不会再发生战争。我夺去了那人的性命，而他还只是一个——黄毛孩子。虚弱的小伙子，一头金黄头发，从来没同我这样强壮的人交过手。”

杰罗姆停了停，目光落在湖面。“这就是眼前这场西班牙战争叫我日夜不宁的原因。上次大战毫无意义，但这场西班牙战事却相反。如果我们能在那儿制止法西斯势力，便将永远遏住它，就不会再爆发另一场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战争。”

我们相互沉默了好一会，杰罗姆才接着说。

“我一直未能从上次刺杀人的恶梦中挣脱出来。”那之后我躺在医院里，精神困惑，无限震惊，几周都说不出话来。躺在下一号病床上的是一个犹太青年，奥西瓦人，名叫阿伦森，他像许多犹太人那样，具有洞察别人的奇妙能力。他不住地说：“讲跟我听听吧，讲出来后也许就过去了。”但我办不到，因为我不能说话。有一天我终于能讲话了，我告诉了他。他说：“杀死那士兵的不是你，你只不过充当了工具。杀死他的是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然后他向我解释这个制度在如何起作用，这使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每个有

头脑的士兵都感到自己受了骗，白白地充当了刽子手。他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个叫阿伦森的人。”

不安的神情重新回到杰罗姆的脸上，他异常和蔼地看着我说：“你很幸运，乔治。”

“什么意思？”

“有些事情没有降落到你头上。没有闯上也不可能闯上像你这样的人。你信不信上帝？”

“不信，”我说。

“从来就不信？”

“除了小时候。”

“我也一样。我信上帝，直到遇见阿伦森之前，而且还很虔诚呢。”

他皱着眉头眺望远方，过了一会又接着往下讲。

“还有一桩事我想告诉你。我杀死那个德国青年的时候”——他那张富于表情的脸上紧缩了一下——“是的，我杀害他那时可是双倍糟糕的年月。一年之前，我经历了所有激烈的战役，那时是一九一八年春天，黑格颁布了他‘背水一战’的指令，我们大多数人都等着再次被派到前线去送死。然而我们却偏偏留下来作为后备，我首次获准休假，第一次到了伦敦。我想再过一两个月便会完蛋了，这样的想法是人之常情。有个女人勾引我，我跟她去了；可是一回到前线，我发现自己染上了淋病。我遇上第一个女人，却是一身淋病。那可不是滋味呢。”

这时他勉强一笑，仿佛那时的苦涩从没有离开过他。

“像我这样成长起来的人，自然感到额头烙下了明显的罪恶印记。我有意要在那次战斗中丧生。不顾猛烈的炮火，

我冲在别人前头，希望以此送命。”他阴郁地一笑。“那样做的结果，我反被赠与军功奖章。患上淋病去寻死，却被称为英雄。

“住院时医生为此取笑我，不过还说病会很快治好。果然不错。当然，我对凯特说过这事。但这儿留下了伤疤，乔治。”他扬了一下头。“伤疤在这儿。”

“住院期间，那位犹太青年阿伦森给我讲马克思、社会主义和战争的根源；那些话使我开窍了。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我们大家都是被迫去充当刽子手。我出院后有可能拒绝再去战斗，也许会被枪毙或关入军事监狱，幸好是否再去战斗的问题出现之前战争结束了。我当即作出了当医生的决定。我什么也不信了，但我喜欢人民大众，对他们怀着同情。我的一生只是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而已，医学却似乎明白自身的使命——至少那时我是这样想的。我一进病房就爱上了医务工作。”他的面孔露出喜色。“我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便想当一个生物化学工作者。我们某些在文艺界的朋友为什么不透过显微镜来观察人生呢？我取得当医生的资格，在国外进行了通常的实习；回国后遇上凯特，我内心里再次变得静谧恬淡。同她生活的头两年，世界仿若一朵玫瑰展开在面前。”

好几分钟的沉默，我观察他的面孔，发现他的话发自内心。接着，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假如世界没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会一直保持谐和宜人的心境。”

“是吗？”

“一九三三年前后，经济大萧条，希特勒蠢蠢欲动，以

及诸如此类，那些糟糕的岁月像未偿付的帐单重又一齐呈现在眼前。那时我已经是医生，也还算走运，要独善其身的话并不困难。可是当时谁能独善其身？所有的仇恨和杀戮重又开始，而且情形恶化了一千倍，杀人者明白为什么杀人。有什么办法可以砸烂造成那些罪恶的制度，乔治。有什么办法？”

周围又陷入一片寂静。想说的话都说了，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杰罗姆在这凉爽的下午倾吐了一席话语，将它们永久地播进我的心田；这天下午的静谧如同我俩谁都不相信的上帝所赐与的和平也将在我心里长存。杰罗姆拿起桨，滑动小舟；越过他的肩膀，我看见十一月的太阳像一个圆球隐现在淡淡的云雾里，那儿凝聚着古老的善与恶；良辰美景，凄风苦雨，人们都必须见识和领受，但是高高在上的天穹俯瞰一切。淡白泛光的天空告诉我：我们犯下的罪恶会得到宽恕。

“莎莉很可爱，你不这样认为吗？”我听见他说。

“可爱极了。”

“我费了很大功夫才使凯特怀了孕。我为什么那样煞费心机呢？患了风湿心脏病的女人几乎是不可能生孩子的，我比谁都清楚。但我似乎感到，她可能生一胎并安然无事。我想这使她不致枉作一个女人。莎莉到十八岁会不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

“我认为她已经是个出色的姑娘了。”

“凯特认为这孩子像我，你看呢？”

我回答了他羞怯而又快活的微笑：“我不知道。”

他的表情变了，变得令我惊讶。“你和凯特都知道自己是谁。我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想到莎莉也会知道

“她是谁，我心里很高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杰罗姆？”

“我是说，只有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父亲的姓名，母亲的姓名，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国籍。”

“你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吗？”

他摇了摇头。“不是一般意义的孤儿。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母亲。哦，对啦，我最好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听。我并不是出生在哈利法克斯。我只是在那儿长大，当父亲——我仍然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收养我之后。实际上，我出生在新布伦瑞克省的一座森林里，至少我猜是如此。总之，那是我记得的第一件事。你到过新布伦瑞克省吗？”

我摇摇头。

“那儿的森林绵延伸入圣劳伦斯海湾，河流穿过林间注入咸味的大海——我没有见过那样偏僻的地方。那儿之所以显得偏僻荒凉，因为当地的人们老住在那儿，住了将近两个世纪了，但一切如故，毫无变化。沿海的鱼港，沿河伸入林中的伐木工棚，只是日益陈旧而已，从来没有扩展或改建。我就住在那样一个伐木工棚里，一直住到十岁。”

他俯身笼进汗衫，穿上裤子。然后用了一个多小时讲述下面的故事。不是完完整整，只是最重要的部分，有的还是我后来从凯特那儿听来的。现在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如实重述；杰罗姆童年的故事后来织进了我的心间，因为我曾探索他的言谈举止的由来。总而言之，下面便是他的故事。

第 五 部 分

—

现在了解新不伦瑞克省那片土地了。我驱车越过它，乘飞机俯视过它。从机上俯瞰，我看见那些铅灰色的河道，蜿蜒曲折地穿过宁静的云杉树林和矗立的岩石；遇着晴朗的日子，坐上全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一万四千米的高空俯视，我看见绿毯般的地面熠熠生辉；当阳光从树木稀疏的沼泽地带反射回来，更能辨认。我也了解海湾沿岸的那些小鱼港和伐木小镇，甚至我仿佛能嗅到它们的气味。各种各样的浓烈气味交织在一起：凤仙花，捕龙虾的篓子，干鱼，填船缝的麻絮，新伐的木材，船底的污水，扔在海滩上的鱼内脏散发出的恶臭。但是，在离海边四哩的内地，景象却判然两样。这儿没有大海的影子，只见原始的云杉森林，倒塌在林间的成堆朽木，地上是几千年积成的能吸音的杉树针叶地毯。流过森林的河道，繁殖着无数鳟鱼和鲑鱼；密林深处则是鹿子，野熊和其它大大小小的北方兽类的出没之地。春天蚊蚋纷飞，冬日雪花飞舞。到了冬季，这片土地同西北利亚

的光景一模一样。

杰罗姆幼年居住过的伐木工棚，年代古老，就我所知，一百五十年前皇家海军来此伐木当桅，这儿便开始有人作工了。他在工棚里长大，他的母亲是厨工，几乎是工地上唯一的女人；为什么说“几乎”呢，杰罗姆说，一队男人无论到哪里驻扎，没有几个女人寻去是不可能的。这座伐木营地位于一条较大河流的左岸，旁边还有一条小河从北方缓缓流过森林。一幢谷仓形状的饭堂立在一片满地木屑的空地，周围是伐木工栖身的木板房，还有一间马厩，一间没有漆过的小木屋，里面是转动水锯的固定式发动机。用木头铺成的道路通向四面八方，伸进树林，有的长达几哩。伐木营地与小河之间原来没有通道，我相信现在已经开出一条了。冬天，人们溜冰出山，夏日则乘船顺流而下。河上出现第一艘汽艇的时候，杰罗姆还是个孩子。

往日的情形今天在加拿大已经绝迹了。现在，伐木工人能吃上新鲜肉食，工资也挺不错。有的伐木营地，人们还住得相当舒适。但在从前，人们吃的是猪肉、蚕豆、混合菜，咸马肉、酸橙汁，通通是水煮盐拌；那样的生活环境和待遇使人变得野蛮，性情阴郁。伐木工人头戴红帽，身穿粗呢短大衣，腰间束上宽大的皮带，以金属钩当鞋带的脚上是油光高统皮靴。杰罗姆告诉我，有的工人可以一连几天不说一句话，除非在一起喝酒，彼此从不交谈，喝醉了则胡说八道，相互殴斗。甜酒、烈酒和柠檬精沿河偷运，酒到营地之时，便是打斗肇事之日。

“那些殴斗是发泄性的替代方式。那群性饥饿者，眼看着打斗，脸上泛出贪婪的神情。乔治，这是性本能，我们大

家身上都有，我曾经目睹一个人遭鞭打，像水手那样被捆绑起来，执鞭人一头白发，当过皇家海军水手长的助手。我一直不明白那人遭受鞭打的原因，但他的确被打了，周围的人也认为活该。我听见他一直在惨叫。是的，那样的事曾经发生在这个国家，当然是过去而不是现在。这是我耳闻目睹的事，乔治。”

伐木营地没有学校、商店或教堂，没有同杰罗姆玩耍的小伙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所有孩子都这样成长，因为别的他一无所知。然而，他也有受到特殊照顾的地方，这不仅由于他是唯一的小孩，还因为他母亲是工地上的主妇。

厨房与谷仓形的饭堂连在一起，他和母亲共用的狭小卧室就在厨房的背后，即使是工头，未经母亲的允许也不准进去。她在厨房是绝对权威，不止一次向人们泼开水，用柴刀威逼他们出去。开饭时间，人们手捧锡盘排成长队等在厨房外的饭堂；杰罗姆在厨房里帮母亲的忙，看着她从锅里一瓢瓢地把食品盛给每个人，这些人将锡盘从厨房与饭堂之间打通的墙洞逐一地伸过来。母亲操作的形象他记得很清楚：矮小粗壮，手臂有力，突现出结实的肌腱，一头黄发，发边淌着大粒的汗珠。她身后是厨房里那口烧木柴的大灶，洗碗槽上架着用来抽饮河水的水泵；厨房的松木板墙，烟熏火烤，满是黑团污斑。

“这就是我所谓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含义，”杰罗姆说。“我对母亲一无所知。她来自何处？我不知道。是本地人吗？我似乎觉得不是。波罗的海人，挪威人或者是瑞士人？我猜想她是波罗的海人，尽管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谁？早在我能记事之前，他便出走不见踪影。我想他同母亲

没有正式结婚，但也许结了婚。”

杰罗姆很烦恼，他不知道母亲的姓氏。人们都称呼她“安娜”或者“安娜太太”。他能记起她，当他闻到某些气味，比如稀粥，咸鳕鱼，沿海居民称做“洗锅汤”的黄色涮锅水。她的嘴宽阔平直，嘴唇很薄；由于杰罗姆自己的嘴唇厚实，头发深褐挺直，而他母亲的头发呈黄色，于是他推想自己素不相识的父亲是黝黑皮肤，像葡萄牙人，粗暴傲慢而又狡猾，很可能动刀很麻利。但这些纯粹是离奇的幻想，因为没有谁告诉过他父亲的模样，母亲连他的名字都不曾提过。

营地的某些人杰罗姆倒记得清楚，甚至比对他母亲的记忆还深刻。有一个老水手，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骄傲，常常给他讲非洲、印度和中国的故事，竭力要他答应长大后喜欢大海。他特别喜欢的另一位是法裔加拿大人，身材魁梧，满脸雀斑，红面膛，胳膊毛茸茸的，他从未见过这样多毛的手臂。

“大部分时间他讲法语，但从他的相貌来看，他是苏格兰高地士兵的后裔，他的先辈是在伍尔芙将军^①之后来到魁北克定居的；他是工地上最强壮的人，妻子儿女住在魁北克，他只是一名季节工。他爱小孩，我既是工地上唯一的孩子，他常常关心我照料我。每当手风琴在饭堂演奏的夜晚，我总是坐在他的膝头上。”

这位红头发的彪形大汉还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制作小巧的轮船模型，杰罗姆的第一只独木舟就是他建造的。这只小舟准是历来最奇特的独木舟，大小适合小孩，外板用光滑的桦树皮做成，船身用松木，座板下装有气罐，船翻了还能浮

^①詹姆斯·伍尔芙（1727—1759）英国将军，1759年在魁北克战胜法军。

起来。当天气变暖河流解冻之后，杰罗姆常去小河划桨，溯流而上，直入森林内很远的地方，但从不准他去营地前面的大河，这儿河水湍急，他无法沿河再划回来。

“我的母亲，”有一次他对凯萨琳说：“有时我还梦见她，多半是恶梦。无论怎么说，她准具有个性。她成了营地的女王，并且对此从不含糊。她能支配那些人，这权力远远超过了对食物的分配。她的权力源出于她身内，曾使我十分害怕。她爱我吗？我相信她自认为如此。她像一头雌熊护着它的幼仔，有她在身边，我从来不用担心会被别人欺侮，甚至不知道会有人欺侮小孩子这类事。谁要是斜视我一眼，她就会拿起菜刀对准谁。她整个儿地憎恨男人，而且鄙视他们。我不知道听她这样说过多少次：‘不中用的家伙，只想一样事，这事加上喝酒便是他们追求的一切。他们通通是一路货色。’”

多年后凯萨琳告诉我，杰罗姆怕惹女人生气的反常心理来自他的母亲。

反过来，憎恶男人的女人也需要男人，而一旦她需要便叫来一个，她也可能一连几周都不理睬他们，只管她的炊事，不屑于回答他们的问话。然后某个时候，杰罗姆发现她脸上露出某种神情，这时他会怀着恐惧等待当天夜晚的来临。

“她有男人的夜晚我太受罪了。我总是感到害怕。我和她同睡一张床，我睡着了，然后她抱着我走出卧室，我便醒来。她把我放在厨房灶边的一席草垫上，盖上一条毯子，让我同那条狗睡在一起。有时，男人走后她又来把我抱回床上；这种时候，我总是整夜躺着不能入睡。但通常她让我与狗盖一条毯子，一直在那儿睡到天亮。

“她是一个娼妇吗？我是说，她这样做是为了钱吗？我想不是，虽然也可能。也许我只是不愿那样想。我不知道。我真的记不起她是什么人。可是，我永远忘不了有男人的夜晚。我最后一年在营地时，来过的每个男人我都记得。”

杰罗姆总是躺在草垫上，先是听到厨房门栓开启的声音，然后听见某个男人压低声音说自己来了。有时他的皮靴踩在木板上会吱吱着响，有时他的指头啪啪地解皮带，有时他会从喉咙发出一声笑，有时他会像森林中的驼鹿站在黑暗处。隆冬时节，当映在雪上的月光把厨房照亮，杰罗姆会认出这个人，当他站在桌椅和墙头锅盆所投射的阴影里。卧室的门关上后，杰罗姆紧张地躺在草垫上，狗用鼻子凑近他，他看着从门底下透出的一线亮光，等着别的声响。

“哦，上帝，”他说，“男人这样作践自己！他们之中没有谁需要我的母亲更比我的母亲需要他们，他们都比她强。是的，不错，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一些事情，他们需要女人——是的，但除了性之外，他们还要求同情，同女人谈谈话。假如她真的给了他们这些，要是可以选择的话，他们多数人会放弃性欲。我常常听见有人对她谈起自己的母亲，或者很想对她谈起，但她从不让他们多谈。我常常听见有人向她谈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但是，我记得她总是说——自私而又尖刻地——‘我管得你爱不爱你妻子？那与我什么相干？’”

“她只要求从他们那里得到性的满足，天啦，她会为此唠叨吵嚷。我躺在那儿，一面听一面用指甲使劲掐住掌心，祈求上帝，愿今晚这人能满足她。可是，少有人办得到。于是她残酷地对待他们。我常常听见她嘲弄挖苦他们。平时她

不开腔，除了非说不可。但要是召了男人来，而他又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会唠叨不停，我知道她脸上的表情会多难看。我常常看见有的男人像被鞭打的狗那样爬出来，我恨她这样对待他们。最后那个冬天，只有一个男人满足了她，而他是一个形象丑陋，个子瘦小的外国人，几乎说不出一个英文字。不，她并不喜欢他，白天她甚至不屑瞧他一眼，但他来得相当频繁。后来，他悄悄地乘船离去，再没有回来。”

杰罗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伐木营地的最后一年，这年他十岁，长得结实健壮，具有一个十三岁男孩的力气。这一年以前的事，他记不清了，最后那年却生动地印在他脑海里。

“那年冬天有一个男人，”他说，“叫我不寒而栗，就像现在我看见蛇会受到的惊骇一样。他的形象与蛇无关，但他瞧任何人时眼里总露出那种神情。他从不谈话，喝酒时也闷不作声。我们都叫他工程师，因为他掌管那台固定式发动机，全工地只有他能修理汽船。他又黑又瘦，面容干瘪，阴阳怪气；无论走到哪里，他手里都拿着一把扳钳，仿佛以此表明他不同于别的普通伐木工。他把扳钳套在一个圈上别在裤腰，甚至吃饭时也带着，也许睡觉时也不例外。”

“三月的一天早上，大约在那个瘦小的外国人走后三个星期，这位工程师对我开了金口，当时我正看他操作发动机，我对那台发动机挺着迷，要不是惧怕他，我会更经常地观看它。我懂得工地上所有人干的活计。我常常同他们坐上雪撬外出，回来时坐在载满柴火的撬顶。我和他们大多数人都合得来，但工程师同我讲话，这还是第一次。他讲的话就是这些：‘今晚上我想吃煎饼，告诉你的老妈子，我要吃煎饼拌

糖浆。’”

“于是我去厨房告诉她，工程师想吃煎饼拌糖浆。我知道做好饼后，很快就要在厨房里见到他了。”

但是，“很快”却成了一段时间，因为在整个漫长的春休期间，整个四月以及五月初，工程师都郁郁寡欢，不与人来往。那时的伐木季节从九月下旬到四月，河水解冻之前，原木全堆在岸边。冰雪融化后，才分两批把原木漂浮出去：先是运长段的原木，然后是短截的支撑木料。原木一放下河，大多数工人便离开营地，回到自己的农场进行春耕。留下来的人不多：长期干活的机修工和沿河搜索被绊木料的工人。留下的人中间包括那位工程师，因为还有一大堆原木需要锯成短截当作撑柱。

杰罗姆在伐木营地的最后一夜平静地开始了，那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加拿大的春夜。五月初，当一股暖流从美国涌来，越过半冻的大地，吹拂着树枝上未绽的花蕾，春天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森林里整天暖烘烘的。少数留下来工作的人，沉浸在节日气氛里，他们不顾黑蚊叮咬，把上衣解到腰间，到晚来身上像烤熟的大虾满是叮咬的伤块。有的人跳进小河游泳，不顾水寒如冰，其中一人起了痉挛，只好用绳子拖他上岸。晚餐时间到了，吃过猪肉和蚕豆，又送上煎饼和糖浆。离夏至只有六个星期，春夜很长，人们吃过晚饭后坐在空旷地上，看着日头坠没林间。手风琴师在饭堂前的台阶上坐下，奏了一曲又一曲，有的人和着琴声唱歌；其余人遭了蚊叮虫咬，又累又倦，倚靠在林边的树桩上，一面听歌一面喝酒一面打瞌睡。那天晚上有烈酒，但由于这天晚上的魅力——我们这个北国的最完美的夜晚之一，人们不是大喝大饮

而是浅杯呷啜，谁也没有喝醉。杰罗姆的母亲腰缠围裙，出来靠在饭堂门边，听人欢唱。天黑尽了，疲乏的人们才逐个起身，缓步走回工棚睡觉。杰罗姆上床的时间比平时晚了许多，伐木营地如此宁静，只听见阁阁的蛙声，上涨河水的慢声叹息。

母亲抱他时他醒了，他双手抱着她的颈项，胸膛贴着她温暖厚实的乳房，他猜想快到半夜时分了。他的脸晒了太阳还在发烧，耳朵被蚊虫叮了又烫又肿；他清醒得很慢，直到那条长毛狗用鼻触他，用舌头舔他的脸，他才睁开眼睛。他看见月光从正对月亮的三个高窗口照进厨房，形成三股独立的光柱，光柱之间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位工程师。卧室的门开了，他母亲站在那儿，说道：“老站在那儿干什么？”然后那人跟她进去，门关上了。

这一次的交道颇不相同。他原先很畏惧的工程师开始低声地侃侃而谈，诚恳地谈到他自己，谈他感到多么孤独，他的一生多么可悲，假如她愿意跟他一起离开，情形会多么不同。杰罗姆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清他的话，很难记住任何字句，但他明白工地上孤独的人们中间，工程师是最苦的人。他渴望听到她的声音带上一些温情，而不是令人住口的缄默，或者他所担心嘲弄，如果工程师继续讲下去。他希望工程师能打破母亲的冷漠，触发她内在的善心，某种能给人欣慰的善意。

隔了一会，工程师止住了谈话，通常的声响开始了。但那声响差不多立即停止，杰罗姆听见他母亲大声责备，竭尽讥笑鄙薄之能事。

“原来这就是你的本事！连个小孩都不如！”

他听见男的哼吟的声音，然后又是他母亲的揶揄和嘲弄；杰罗姆记得他当时曾这样想：工程师，别让她这样对待你！啊，请你，请你设法制止她这样对待你吧！

工程师这样做了。当女人诋毁他追求温存的渴望，他的声音突然变了，代之而起的是他的自尊心和仇恨，这是杰罗姆整个冬天一直害怕的。工程师开始用一连串脏话辱骂她，杰罗姆听人骂娼妓的每个字眼都用上了。接着是短时间的动武，他母亲吁吁的喘气，啪地掴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杰罗姆心想：哎，别再让她这样做！

接着发生的事像瓶子突然爆裂。杰罗姆听见他的母亲发出一声恐惧的惨叫，他和狗惊骇得一齐跳起身来。有什么东西扑通一声跌在地上，然后是身子翻滚的声音，坚实的拳头梆梆地打在身上。接着是男的一声叫喊，痛苦的喘气，比拳头更加可怕的哐啷一声。最后无声无息了。

这静寂来得突然而又深沉，仿佛世界完结了，但很快空气里又充满了各种悦耳的声响。交媾的青蛙在黑夜里愉快地高声歌唱，整个厨房洋溢着它们的欢乐。接着传出另一种声音，一个吓坏的男人在痛苦地啜泣。

杰罗姆把手搭上卧室的门把，推门看见工程师弯着腰，用手捂住腹股沟，他明白母亲最后一次击中了什么部位。越过工程师弯曲的身影，他借着月光看见母亲赤条条的躺在那儿，但弯着腰的人挡在中间，看不清她的面孔。

狗暴露了杰罗姆。长毛狗哀鸣着进入屋内，触了触工程师的腿，使他转过身来，他的面孔被难忍的疼痛扭曲了，他气喘吁吁，意识到他干的事后吓坏了。但他一见杰罗姆就认出了，立即向他扑过来。小孩往后躲闪，工程师站立不住，一头

栽倒在地上，扳钳嘎拉地脱开他的右手。杰罗姆见他的裤衩垮在腿上，这便是他跌倒的原因。工程师从地上抬头仰望，紧闭着嘴，像鱼那样静静地挣扎。杰罗姆转身就跑，逃出卧室直奔厨房门口；他感到狗在腿边，镇定地把它推回去，随手关上门。他只穿了件睡衣，光着脚跑过月光照亮的木屑空地，进入黑暗的森林。一进林子，他便感到树下的草丛刺着他的光脚，他停下步，转身卧倒在地。空地上没有动静。竖起两根金属管作烟囱的长形厨房静静地蹲在那儿，倾斜的房顶被月亮照得白亮白亮的，窗户闪闪发光，只有墙壁黑黝黝的。上涨的河水冲击着树干发出汨汨的声响，但他没有听见人声，看不到任何工棚亮着灯光。他辨别不出住有人的工棚，要是有了灯光，透过树丛也会看到光影的。

凭着动物的本能，杰罗姆站起身来变换位置，他悄悄地溜进林边的树影，朝他知道的一个约有三十呎远的地方走去。他找到了那片离月光还有十呎的洼地，躺下身子，撮起松针掩住白色睡衣和身体。他平身伏地，双手捧住下巴，两肘支在松针上；他凝视着厨房的门，只听见自己的心房怦怦直跳。

杰罗姆看见工程师只在十呎之外的地方。他在林边来回搜寻，手里拿着扳钳，一忽儿向林中暗处窥视，一忽儿转身环视身后。他没有戴帽子，敞着粗呢短大衣，月光下杰罗姆看得见他黑乎乎的毛发露出衬衫，直到他的喉头。工程师停在他的正前方，杰罗姆赶紧把头埋进松针，松针刺得他痒痒的。他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脚很小，尽管穿着高统靴。工程师走进树林时，脚踏在蕨草上吱吱直响，一只脚踩在离杰罗姆头部仅一码远的地方，但他只顾往林中的暗处

瞧，没有注意脚下。夜里空气凉爽，杰罗姆听得见工程师喘气，担心工程师能感觉出他身体的热气。皮靴转动了，工程师走出树林，进入空地；等脚步声远了，杰罗姆抬起头，看见工程师的背掠过厨房转角处，踏上了去工棚的小路。

“我完全明白他在搜寻我，阻止我接近工棚里的人。他知道我不能悄悄地穿出树林，而去工棚的小道正是我希望去的唯一路径。”

杰罗姆暗暗捉摸该不该叫喊，但他知道那些人睡得多死，而首先听见他喊声的会是谁。更何况他吓得不敢喊叫。除了他母亲的讥笑，工程师的辱骂，当晚发生的事都悄悄地进行，动物在黑暗里互相残杀。

杰罗姆一动不动地俯卧着，直到冻得发抖；他抖得如此厉害，仿佛地面都震动了，大家都会明白该到哪儿找他。

他站起身，拍掉睡衣上的松针，刮去扎进头发的另一些松针，还有一些夹在他细嫩的腿间，但他顾不上这些，慢慢地走出树林来到月光下。他停下步，等待那人出来再次追他，但他听到的唯一声响只是他自己的心跳，唯一见到的人是月亮里的人影。他相信月亮里有一个人，他洞察一切但不闻不问，高高在上不理睬世人，只在那儿暗自发笑；他想这时那人一定正在笑。他披着睡衣跑过空地，开了厨房门进去。这次他忘了狗在里面，不等他关门，狗便跳出来跑了。

卧室的窗帘放下了，室内一片漆黑。杰罗姆找到火柴盒，点燃灯，转身看见他的母亲像麻袋似地摊在地上，上面盖了一条被毯；工程师把她盖上之后，放下窗帘走了。杰罗姆揭开毯子，用手摸她的脸，右手指触到一团粘乎乎的暖暖

的东西。他猛然缩了回来，仿佛手放进了火里，他站在那儿吓呆了。

“伤口在她头部左侧，伤势严重，左眼被拳头揍得青肿了。她大张着嘴，好的一只眼睛瞪着，充满怒气，她的神情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愤怒。我的母亲在暴怒之下死去。”

她的躯体未冷，但已失去暖意；心脏停止了跳动，血还在缓缓往外渗出。枕头上到处撒着湿漉漉的暗红血液，头发上也沾凝了不少；他试着搬动一下躯体，她的乳房胀得像两只灰白的气球。这时他才完全明白她死去了。他对着她哭，拍打她袒露的胸膛，仿佛要唤醒她，虽然他这样做时心里明白她已经死了。明知她死了又呼唤她，那是为了要她活转来照料他。但与此同时，他为工程师感到宽慰，他没有像别的男人，白受了她的嘲弄和羞辱。

这时他又一次骇呆了，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他赶紧吹熄灯，转身便朝着暗处窜，想钻到厨房的饭桌下藏起来，但来不及了。厨房门吱地一声开了，他只好钻进床下，靠墙蹲着，头刚好顶着下陷的床簧。

那人走进屋来，杰罗姆听见他嗅了嗅，知道他闻到了灯心油味。他唰地一声划燃火柴，室内顿时一亮，但他没去点灯。借着渐次熄灭的火柴光，杰罗姆看见他的皮靴就在床边。又是一片黑暗。工程师低声啜泣着走开。杰罗姆听见他的脚步声吧哒吧哒走远，一屁股坐进厨房椅子的响声，最后开门离开了。

杰罗姆蹲在床下，又冷又怕。要不是狗又回到屋来，他会一直在床下蹲几个小时。狗钻进床下，呜呜咽咽，用鼻子嗅他，用湿漉漉的长舌头舔他的双脚。狗的舌头使他毛骨悚

然，他侧过身把狗推开，用手挡住它的嘴筒。狗快活地叫着，杰罗姆顿时头发倒竖，知道狗正从他的指头上舔去他母亲的血。他给狗一巴掌打去，狗叫了一声；他又狠狠地朝它嘴筒上一拳，狗痛得尖叫，只得悻悻地离开他。这时杰罗姆从床下爬出站起身来。

几年以后他对凯萨琳说，他曾多次在吓瘫之后又头脑清醒过来，这是第一次经历。他只有十岁，但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杀死他母亲的凶手要是捉住他，会有什么危险。他知道凶手已经离开卧室，因为他对自己干的事害怕了，但他这时还等在外面监视。他极有可能就站在厨房门口，那显然是杰罗姆出去的必经之地，也是到其余人正在熟睡的工棚的最直捷的路径。

杰罗姆必须逃离他母亲躺在那儿的恐怖房间。他从衣架上取下衣物：衬衣、袜子、内裤、风雪运动衫和他终年穿的平底牛皮靴。他抱着衣服进了厨房，在炉膛尚暖的炉边穿好衣服；狗老在身边呜呜咽咽，闻闻嗅嗅，他推开它几次才穿上袜子。穿好衣服后，他到水管下洗去手上残留的血迹，在拉布手巾上揩干手。现在他头脑完全清醒了，揭开盛食品的大冰箱，顺手拿出一袋血肠，这既笨重又不便携带，他切成短截，往两侧裤兜各塞了一段。他离开厨房来到摆放着搁板桌和长条凳的饭堂，朝平常不用的另一道门走去，走拢时发现门未闩上。他猜想，工程师第一次到空地去搜索他时，准用过这道门。

“第一次准是狗救了我的命。当我朝空地跑时，狗一定钻进了饭堂；工程师听见里面有动静，把它当做了我。这一失误给了我时间藏躲起来。”

现在狗又同杰罗姆在一起了，这次他不让再出错；他抓住狗的颈背长毛，跨出门时仍然不松手，然后推它一把，把它关进屋里。

从饭堂的这个角落到树林边缘，最多不过二十码远；当杰罗姆跑进树林，周围没有人影。他悄悄地穿过树丛，直到一阵凉风忽然触到他的面颊；他知道离停靠着小舟的河面不远了。涨水的季节，河水淹进树林已三十码左右，现在河水哗哗流过灌木丛和倒地的树干。月光稀疏地撒进树林，反映在汨汨的流水上，杰罗姆可以看见闪烁的亮光。

他继续费力地前进，长统皮靴使他脚底不受浸湿，但有一次脚踩进了水坑，冰冷的河水从靴眼钻了进去，脚很快冻得麻木。几分钟后，他到了小船和划艇停泊的地方，他自己的独木舟也在其中。工地的汽艇停泊在大河下面约一百码的防波堤边，独木舟和划艇则靠在水流不急的河边，现在他能看见那些船头露在黑压压的森林边缘处的月光下。他走出树丛，仰望天空，一轮明月悬在开阔浩渺的天空正中，周围有一大圈被辉映得格外明朗。

“我知道能行。我长大之后，每次遇上危险，每次濒于绝境，这样的时刻总是来临。突然我喃喃地说道 ‘你会化险为夷的，你定会成功。’ ”

用桦树皮做的小舟，又装了气罐，举起来并不费力，他翻转小舟放进水里。他发现桨板适合他的身高，只消一推，小舟便离了岸，他纵身上了船尾座位，继续朝前爬，在中部坐稳后开始划起桨来；他引着小舟迈过树桩和倒地的树堆。河水的急流不断推他回岸。但他使劲地在左侧猛划，进入了一团回水，小舟便轻易地往外浮；接着他在右侧猛划两桨，

小舟终于静静地浮上开阔的河面，来到一片月光朗照的河上。河水的急流载着他远离了岸边，当他感到河风拂面，便知道最后上了河道。他再猛划两桨，让船头顺流而去。这时，他开始在宽阔稳定的银色水面上快划，迅速地划过了沉静的伐木营地。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单枪匹马闯天下，河水载着他在浩邈的夜空下穿过深山老林，直朝大海奔去。

杰罗姆按照他学过的办法在急流中划桨，每桨划得又长又慢又平稳，划一桨稍停一下，让桨板朝后漂起像一柄舵那样。这个地段的河水在这个时令以每小时五哩多的速度流动，浅滩地方河水哗啦啦作响，映着月色闪烁发光，但在河道的中流，河面却像一匹平滑的锦缎，涡流旋转，旋出一个个磨光的玻璃似的水涡。比空气更凉爽的薄雾漂游在水上，月亮衬着一片无垠的蓝色夜空，显得分外皎洁明朗。

“当我长大一些，懂得人体器官的活动，”他说，“我知道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常常在惊骇之后出现的亢奋状态，这是肾上腺面临危险的反应。但那样说太书呆子气。这好比一个人绝路逢生之后，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那一整夜我完全没想到死去的母亲，我的整个心思都倾注在小舟和河面上，我全神贯注，所以当时见过和做过的每一件事，至今都还记得。”

小舟在林间平稳地沿河而下，顺着曲曲弯弯的河道流去。现在杰罗姆稳坐舟中，逐渐往装有气罐的船尾倚靠，好让船尾下坠船头略为上翘，借助急流加速前进。他不断超过浮在水面的原木，有一次碰上了一架被暗石阻止的木筏，该死的急流翻腾起浪花，使整个木筏忽上忽下地晃动，像是筏

下有什么东西在推动一样。他划桨绕过去，只用桨板顶触过一两次木筏；刚绕过木筏，又发现一大片脱离木筏的单根原木，正散乱地独自下漂。他不停地划桨，偶尔撞在一根漂流的原木上，有时担心小舟会被卡住，幸好原木都往同一方向漂流，发生这种危险的机会不多。岸上不见灯光，没有小屋或房舍的迹象，眼前唯有森林、天空、月亮、河道、小舟和漂流而下的原木。

“当晚我丧失了时间概念。最初听见汽艇的声响时，我猜是凌晨一点左右。那声音我现在仿佛还能听见。所谓汽艇，原是一艘高船头的鱼船，简陋得很，只不过装上了发动机而已。它的马达经常出毛病，整个伐木营地只有工程师一人能修理。我最初听见汽艇声时，它还在我刚绕过的河弯，隔着树林马达的声响变得相当低沉。”

以他的年纪而论，杰罗姆异常强壮，他的肩膀那时已经非常有力，恐惧又增长了他的力气。他奋力往岸边划，但那段河道的水流疾速，当他逆水横划，小舟转到了背风方向，他知道得花几分钟才能抵岸；即使抵岸，回水也会重新把它载入急流。在一百码前方的河中央有一个长着树木的小岛。他折转船头，拼命地划，每划一桨船向前跃一大步。汽艇吧哒吧哒的声音持续地敲在他耳鼓上，回头一望，他看见船的轮廓，工程师弯着腰站在前舱驾驶盘旁边的身影也依稀可辨。杰罗姆向小岛靠近时，他看见早有许多原木漂到岛边，聚成了一大片。他惊慌失措，因为这一大片原木在岛边占了二十码宽的水面，他没法穿过它们上岸去躲进树林。原木形形色色，长短杂陈，相互挤压，在急流中碰来撞去。“以前我没见过这个小岛，但我却模糊地觉得知道它。这条河里有

好几个类似的小岛，每年阻挡住成吨的原木。两批原木放下之后，总要派工人顺流而下，逐个地清理这些岛屿。这便是伐木季节之后仍有人留在工地的原因之一。”

小舟蹊了一下，溜上了几根半沉半浮的原木，搁浅在上面；杰罗姆无计可施，只好平躺在船底，听天由命。他从船舷偷视，嗅到湿原木的气味，听见流水汨汨地流动，小舟上下晃动随着原木漂流。与此同时，汽艇直开过来，愈来愈近，愈近愈大，吧哒吧哒的声音响彻河岸、站在方向盘前的人耸立着。杰罗姆心想，那人一定在端端地注视他，但汽艇开到离小岛二十五码的河面，工程师改变了方向。杰罗姆见船头急剧地转开，船身的暗影很快从岛左边消失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在逃跑。众所周知，河对岸不远的小镇有条铁路线，那是遇上麻烦或者想离开营地的人去的地方，有时在殴斗之后，有时不为别的什么，只是为了离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工程师作恶心虚，吓得神志不清了；也许是喝了酒，因此醉眼惺松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经过那番折腾完全筋疲力尽了。当一个人不敢再想再看而处于不能思索、视而不见的境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盲目行事。我说不清楚。但他的确是在孤注一掷，逃之夭夭。

营地那儿既不能通电话又不能发电报，到了早晨才会有人发现我的母亲被害，等他们再找不到工程师，又会经过一长段时间，然后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他有很多有利条件，他比任何人早到火车站，一到车站，便可以选择去东或去西。谈到铁路线，我简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什么去东去西的路线一概无知，至少当时如此。我不知道往东可下蒙克顿和哈利法克斯，是条绝路；往西则可上魁北克和蒙特利尔，

因此他必定会选择西路。但是我知道他肯定能赶上车，因为那个小镇是水路的终点站，所有火车都停。

杰罗姆躺在船底好一大阵，倾听着渐远渐弱的马达声。这时河上恰好刮着逆风，过了准有二十分钟，马达声响才听不见了，这之前忽弱忽强，像要消失又再次响起，最后终于没有任何声息，除了河水的拍打声和湿原木缓缓漂动的撞击声。

随着汽艇的消失，杰罗姆先前的欢欣也化为乌有，他开始颤抖，忍不住哭了。凌晨时分更加寒冷，穿树林时浸湿的左脚开始疼痛。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到塞在那儿的血肠；拿出来在河里洗洗，咬了一口，血的气味令他发呕，但他继续往下咽，直到不再颤抖，体内有了新的力气。他用双手捧起河水来喝，水冰凉，冰得牙齿发痛。这时，更多原木从上游漂浮而下，黑压压地隐现在水面，默默地向他转动，朝他挤压过来，仿佛它们是河水的胳膊，要把他排挤出去。幸好原木之间还有他插桨的余地，于是他改变方向，又推又划，直到小舟转向急流，避开那片原木，进入小岛左边的流道。又一根原木快要撞过来，但他闪开了；当急流的冲力向船头袭来，他用力打桨；接着他被急流无形的手抓住了，赶紧在左舷猛划，船头一摆，重又回到急流。就这样，他灵巧地划过了小岛，现在到了宽阔的河面，随波逐流，疾速地穿过森林向大海划去。

过了一些时候——失去了时间概念，无法知道多久——他意识到周围逐渐变得光亮，愈来愈显得开阔。两岸的森林不再是黑压压的一片，他能看见一颗颗直立的树干。这时月亮所在的西部天空比东边晦暗；很快东边变得更加光明，比

他离开营地一路行船以来明月高照的天空还要亮；回头一看，月亮低低地沉在树林梢头，月边一抹淡淡的铜黄昏晕，河面呈现出铁灰颜色。接着，东部天空露出彩霞，现出粉红，然后红霞像锁住黎明的两条平行门杆渐渐散开；之后两杆逐渐消失，云彩愈变愈浓，愈散愈宽，酿成一片冷静的火烧天景象，光芒辉映开来，布满浩邈的天空，这时整个大地也开阔亮堂了。

现在，杰罗姆能感到周围的生命活力，桦树的白色树干在望，两岸林中鸟儿的啁啾可闻，刚好是河流转弯的地方，鸟雀的鸣啭更听得真切。一只乌鸦从一株松树梢飞了出来，哇哇的叫声回荡在沿河两岸；一头饥饿的啄木鸟用力啄一棵枯死的树干；一只蓝色的大苍鹭在破晓的黎明展翅斜飞，缓缓地打转，微曲着的两条长腿迎风向后，蛇形的头部下垂，正拍打着双翼沿右岸巡飞，伺机啄鱼。杰罗姆听到泼溅的水声，看见一条鲮鱼的肚腹闪现出水面。他继续向没有原木漂浮的水面划去，十分钟之后，听见周围到处是噼啪噼啪的响声，鱼纷纷蹦出水面啄食清晨的虫蝇。季节到了，第一批成鱼离开寒冷的咸水海域溯流而上，回到它们曾经被孵化的河床。离独木舟十呎左右的地方，杰罗姆看见一条鲑鱼缓缓游动，当它忽地一扭，往深水沉去，水面现出漪涟。他听见背后泼刺的水声，回过头去只见水面划破的波纹。他又划了几分钟，鲑鱼还在活泼跳跃；就在船的正前方，河面划开一道路子，一条大鲑鱼鳞光闪闪地跃出水面，曲身竖须地停在空中，然后又泼溅入水；小舟越过破开的水面，杰罗姆还瞥见鱼尾卷动着最后猛戳一下的动作。

小舟继续顺流划下，杰罗姆坐在船的后部。转过一道河

湾，他看见一处简陋的木屋，但烟囱上没有冒烟。现在他又累又困，划不动桨了，只坐在那儿，桨板横放在膝上，头耷拉下来。

“我那样坐着准睡了半个小时，醒来时小船歪斜着随波漂流，阳光刺得我的眼睛发痛。”

那是东升的太阳，天空里充满喜气，放射出金色的阳光，金光普照在森林与河面上，耀眼闪亮。杰罗姆冻得发僵，四肢不灵；他拨正船头，让它顺着水流而下，由于这儿的河水变深，小舟的前进速度慢了下来，他感觉得出水下潮流的无形力量。他离河岸不远，看见一头鹿儿在沙坑边饮水。隔了一会，他害怕再次瞌睡，担心会把桨丢掉。前方有一个小岬突入河道，上面长着一株像放哨的青松、小船靠近时轻微地撞了一下。杰罗姆爬上岸去，把半截独木舟拉出水面。然后他爬进船里睡觉。

他醒来时，太阳差不多已经当头，热得鼻孔干燥，疲惫不堪，周身僵硬，沉重乏力。这是五月的上午，天空晴朗无云，暖烘烘的天气已经使凤仙花草放出浓郁的香气。

“这时准是早上八点钟了。每年这个季节，太阳五点升起，因此我一定睡了将近三个小时。要不是强烈的阳光，我会一直睡上一整天。当时我还惊骇未消。即使现在，我也无法告诉你沿河划了多远，但在我睡觉之前，至少在急流中划了四个小时。”

“我醒来时没想距离问题，也弄不清那段距离有多远。我能记得的只是醒来后的感觉；周围一片黑暗。这也是我在战争中首次杀人那天早上的感觉。我仿佛看见母亲死后的脸色，一副冷酷的怒容浮现在我眼前。天啦，她是一个暴怒的

女人，我的母亲！我仿佛看见工程师手执扳钳。当我咬下几口带在身上的血肠，几乎呕吐出来。我得离开那条河，走出那座森林。我要去的地方很遥远，于是想到了铁路。”

尽管不知道去处，杰罗姆现在已靠近大海，划行在一种新的河道。邻近大海，潮水上涨，几哩内的河道都变宽了。那座小镇离海有一段距离，杰罗姆看不见海湾的开阔水域，但他能闻到它，面颊触到一种新的咸味的湿气。他开始注意到岸上有人家——不是城镇，而是零散的房屋和森林间的大片空地，看得见田野和牲畜。同时，他也感到桨变得沉重，划起来很费力了；这儿河面宽阔，受了海潮涌入的影响，不再出现急流。他费劲地让小船前进，周身累得酸痛，疲倦得低声哭泣，身上汗流夹背。正当他想放弃再作努力，却绕过了最后一道河湾，正前方出现了一座铁桥，桥上便是从哈利法克斯到蒙特利尔的铁路干线。铁桥那边是一座公路小木桥，桥的另一边河面显得宽广无边。小镇在杰罗姆的左岸，全是木头建筑，没有一丝生气。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他记得曾经到过这小镇，那是上年秋天，随同母亲和别的工人一道乘汽船来的，在这儿她第一次给他买了一块冰淇淋。当独木舟朝铁桥漂去，他顶住水势，让小舟驶向岸边。他太疲乏，禁不住哭了。然后，他吓得几乎丢下桨板，当一列火车仿佛凭空而降，轰隆隆地开过他头上的铁桥。

“那只是一列小火车——一辆旧式发动机车带上两个灰褐色的车厢，末尾挂着一辆公务车。但它震耳欲聋，因为它隆隆地开过铁桥时我恰好在桥下。当它加快速度，排气装置发出巨响，喷出大量烟雾，那年头的火车都烧煤。火车驶过桥面，整个河流仿佛都在颤抖，但等我穿过桥下，它的轰隆

声却停止了，只听见车过之后铁轨发出悦耳的嗡嗡声。我抬头望见公务车上有人朝我俯视，他面孔黑得发亮，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黑人。于是我想，伐木营地以外的世上，会不会都是像他那样的黑人。”

杰罗姆使出最后的力气，横过河面，朝两座桥之间的左岸划去。他记得上次乘汽船来就是在那儿上岸的。看见码头他不由得想起汽艇，马上心惊胆颤起来，要是工程师在码头上等候他，该怎么办？但是，那艘汽艇的踪影，无论在码头或是在岸边，都看不见。

“他要么不到小镇便上了岸，否则便把汽艇沉入河里了。他一定想在黎明时分悄悄进入城镇，这时人们还未起床，可以在火车站附近躲藏起来，等候火车进站。”

两个身穿粗棉布衣、头戴尖形帽的人，坐在码头边上观望杰罗姆，当他把独木舟划近码头的时候。他抵达了靠岸处，两人仍然坐着不动。他爬出小舟，拖住船舷，心里没了主张；他习惯性地做着该做的事，下一步是拿起缆绳，把绳套在停泊桩上。

“小崽儿，哪儿弄来的小船？”

一张瘦削、未修过面的脸从码头边俯视着他。

“我自己的。”

“是我见过的最小巧的独木舟，”他说着，向水里啐了一口。

杰罗姆倔强地爬上石梯，当他爬上码头时，那人懒洋洋半转过身让他。

“从哪儿来，崽儿？”

“我一直在划船。”

那人又往河里吐口痰，但没有吭声，继续翘起二郎腿坐着，没有刮过胡须的灯笼下巴不停地转动，嘴里嚼着口烟。杰罗姆事事畏惧，怕遇见任何人，使出浑身余力，蹒跚地走过码头，踏上镇边一条沿河的肮脏小道。上了铁路线，他躬身去摸发亮的铁轨，发现它烫得灼人。他到了火车站，看见几个男人在一节孤零零的棚厢旁边卸货。奇怪，他们之中谁也不是黑人。杰罗姆在候车室的一张条凳上坐下，咽下一整节血肠。他像这个小镇一样半睡半醒地坐在那儿，不知坐了多久；但现在肚子里有了东西，他感到精神好多了。

我认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杰罗姆·玛特尔那样的人居然以这个镇为入口进入有组织的世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加拿大总理和一位大不列颠王国的首相，居然在这个地区长大，年青时代还在这儿工作过。有一次我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驾着车穿过小镇的大街小巷，只花了不到二十分钟，而且它使我感到沮丧。这些属于殖民地时期的半被遗弃的小镇，在我国的这一带还有好几个。而今你看了真是不敢相信：身穿燕尾礼服的英国海军大员曾在这儿上岸，从巡洋舰、护卫舰和海岸炮舰下岸走进他们的木头小房。我记得这个小镇的大街是一条两百码长的碎石路面，只有两座木头教堂建筑，几家商店，一家晦气的红砖银行，一家更晦气的红砖邮局，房顶上架着一座四面时钟。我记不起这条街的名字，但可以打赌，不叫威灵顿街便叫国王街。我忘不了那些锯木厂，成天传出单调的尖叫声，你能意识到它们存在的唯一时间恰好是工休的时刻。我记得衣着随便的男人靠在商店门前，不是削木块便是嚼口烟。小镇背后沿河一带有几幢豪华的住宅，其中一幢的确可供人参观游览——维多利亚式的

木头城堡，拉毛水泥的前门粉饰，四座塔楼，一座木头观景楼，不少铁制浮雕，还有一架日晷仪竖立在旧日的草坪上，窗户没有帷幔，越过后墙围栏，看得见一片矮矮的云杉林子。除了锯木厂外，小镇唯一值得提起的是它的火车站。

那天早晨杰罗姆去的正是火车站，在这个有组织的社会，同他讲话的第一个公民是售票员。他惊奇地望着杰罗姆，条纹衣袖上系着臂章，大腹便便，身穿蓝哔叽西装，衣袋口悬着一条表链，插上小饰品和铅笔。一副眼罩把灰朴朴的弹头形秃顶与圆胖光溜的灰面孔隔开。

“你在等谁，孩子？”

杰罗姆呆呆地凝望着他。

“叫什么名字，孩子？”

杰罗姆仍然凝望着他，售票员发出一声驴叫般的笑声。

“什么也不知道呀？呃，呃！你妈要坐火车来这儿？”

杰罗姆仍然望着。那人掏出一只银质猎用表，咔嚓一声打开，悬在孩子的眼前。

“晓不晓得这是什么？”

孩子点点头，售票员从嘴边吐出一口嚼烟汁，烟汁啪地一声溅落在邻近的铁轨上。

“滨海号列车还要等很久才到站呢，孩子。你干嘛身上弄得这样脏？你像堆大粪，臭气熏人。”一只大手伸出来抓住孩子的肩膀：“跟我来。”

杰罗姆太累了，没力气反抗，售票员推着他走下月台，到了站内，他看见一个大炉灶，炉前有堆木柴灰，周围放着几个邋遢的痰盂，旁边有道写着字的门。

“认字吗？”售票员问。

杰罗姆摇摇头。

“啥也不懂，呃？嗯，牌子上写的是男厕。进去洗洗。”

他开了门，把杰罗姆推进去各自走了。孩子站在这臭熏熏的地方发抖，但从这儿的气味明白是什么地方。他听见水从漏水龙头嗒嗒滴落，从一面破镜里看见自己的脏面孔，眼边通红，头发里还插着云杉针叶，耳朵像扇子悬在两侧。洗脸池边摆着一块黄色的脏肥皂，他先洗手洗脸，然后擦擦后颈。没有面巾，他举起手臂用衣袖揩脸，在裤子上把手擦干。虽然他有生以来还未见过抽水马桶，但从安放的位置明白了它的用途，使用之后又洗了洗手，把嘴伸到水龙头下喝了一阵水。然后他离开盥洗间，蹑着脚走过候车室，生怕被那怪人看见。售票员的确看见了他，但现在一动不动，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又着腿坐在转椅上，守在信号机旁边，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口烟，两眼半睁半闭。

外面阳光下情形好多了。一辆调轨车开过来，推着那辆棚车到了侧线。调轨车与棚车分离后，又噗噗地冒着烟沿轨倒退，消失在铁轨转弯处，剩下月台暴晒在阳光下。一股睡意包围了杰罗姆，双眼合上了。他睡得挺香，没有谁去打扰他，弄醒他。正午时分他被惊醒了，庞大的火车头拖着一长串货车，遮天蔽地，轰隆隆地开过来，整个车站似乎都在震颤。火车慢慢停稳后，杰罗姆听见火车头在水塔下呼呼喘气。

“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听人说过爬车，不用花钱，现在面前就停着列车。我看见售票员站在老前面的背影，正在同火车司机交谈，我从列车下钻过去，在另一侧爬出来。那

是双轨道，我沿着车厢一面往后走，一面观察。大多数车厢是红色的棚车，也有一些平板车，还有些装煤的黑色敞篷车。这是一列空车，拖了至少四十多节车厢，一直延伸到转弯处的那边去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爬上去，但心里又害怕，火车反倒帮他下了决心。当车头发出一声尖叫，火车猛地一震，碰撞声一节节地传下去，车钩碰合紧了。接着前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旧式车头带动沉重的车厢时都这样，巨响吓坏了杰罗姆，一节平板空车从身旁滑过，他从后面抓住铁梯爬了上去，列车出站之前，他一直躺卧着，望见小镇和河流从铁轨转弯处退去。这天下午，火车把他带到了新不伦瑞克省的东边。

“真令人惊奇，一个人会学得多快。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碰撞，一列不同类型的火车哗啦啦地奔驰过去，我知道那是快客车。我听别人用过这个词，知道那是什么。”

傍晚前，他吃下最后一节血肠，睡了一觉。当他醒来时，火车停着不动。一道巨大的光束朝下照着他，他吓得头发倒竖地跳起来，还听见煤渣上有轧轧地脚步声。光束移到他头顶时，他直往后缩。然后又突然黑了，他抬头一看，就在近到可以触摸的地方，一个穿着工装的人坐在火车头机舱里，一条胳膊扶在机舱窗边，右手操纵着节速杆。一团红色烈焰闪入他眼帘，他看见司炉工挥动双臂，铲起煤炭投入炉箱；接着火车头开过去，后面没拖任何车厢；越过平板车的边缘望出去，杰罗姆看见面前列车多得成林。

“嘿，这小子！你他妈的在那车厢上干嘛？”

一个人在车下用手指着他，另一只手提着灯。杰罗姆往

后退，跨出车，从车厢另一边的扶梯下去时踏上了炭灰。他在两列货车之间奔跑，脚绊在换辙器上，迎面摔倒在地。煤渣扎进他的额头和手掌，但他吓得要命，不顾疼痛，爬起来又跑。他跑到了一排篷车地段，工人正在检查车轮和查看热轴，只听见四面八方铁锤敲得叮当直响。两列篷车犹如两堵铁墙，中间的通道黑黑的，没有止境。突然，左手边的列车猛地一拉，发出碰响，便开始缓缓地前进，他吓得赶紧弯下腰，钻过刚才离开的列车。他从另一侧爬出来，发现那轨道上没有车，但在前方约五十码的地方，停着调轨车，正是它的强大光线刚才照醒了他。这道空轨的那边，还停着一列火车，他又从车下钻过去，膝头碰着枕木的裂口，他感到划伤的疼痛。爬出来之后又面临一列火车，他又钻过去。

不再有更多的列车了。他发现自己面临一幅从未见过的景象：偌大一个城镇的夜景。他站在煤渣路堤的边沿，放眼一看，处处是灯。当他沿堤往下走，一粒尖锐的煤渣刺上他的脚踝，但他还是顺着煤渣炭灰滑下去，滑到底时又绊了一跤。他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煤灰，把手伸进皮靴拔出那粒煤渣。他抽泣着吸气，浑身汗流夹背，但他不敢老站在那儿，尽管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完全不知所措，不懂得城市像什么样子，那儿的人干什么。他站在一条肮脏街道的木头街边上，一队马拖着辆沉重的车正爬坡去车站，赶车人坐在车厢上挥舞鞭子。杰罗姆招呼车夫，那人只侧头瞪了他一眼，啐了一口痰。（那时候，这个国家里乱吐口痰。）杰罗姆随着马车上了坡，认出到了车站的月台，这比他中午离开的宽阔多了，停在旁边的火车也另是一样。车上到处是灯，仿佛坐着几百人。

“让开些，小孩！”

两个人推着一架叠满皮箱的车沿着车边的站台走来，他赶忙闪开。他想寻个地方躲藏起来，但站台光亮如同白昼，到处都看见人——这些人的穿戴异样，他们之中的女人与他母亲毫无相似之处，男人也和伐木工地的人迥然不同。

“我不知不觉到了蒙克顿。现在当然可以说，蒙克顿只不过是一座不算小的铁路城市，有火车从蒙特利尔、波士顿、圣约翰和哈利法克斯开到那里，并在那儿调轨和重新派发。但我告诉你，这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任何城市——甚至伦敦，有我当晚见到的蒙克顿那样显得巍峨雄伟，触目惊心，有那么多列车、灯光、声响和川流不息的异样人群。”

杰罗姆悄悄穿过人群，没有人注意他；到了候车室，他看见双手活像擦了煤炭灰的生汉堡包。

“你知道那个时候，衣衫烂褛肮脏的小孩在这个国家里是见惯不惊的。像我当时那副形象的孩子惹人注目。”

那座小锯木城的车站售票员，曾经使杰罗姆为自己的肮脏感到羞愧，因此他害怕蒙克顿也会有人看见他，同样说长道短，把他赶入黑暗。他偷偷地穿过候车室，有意不让人瞧见他，直到发现一个最远最暗的空角落。他坐在那儿，缩成一团靠在墙头。他闻到咖啡和炒鸡蛋的香味，唾液直涌，但他怕去灯光明亮，摆着煮咖啡金属器具的咖啡摊，那儿人们正在喝咖啡吃三明治。一个粗嗓门反复叫道，到某地某地的乘客上车，人们开始涌向门口。候车室空了，隔了一会，杰罗姆听见火车开出站去。车开走之后，这一大间候车室静悄悄的像一间空仓房。

半小时之后，才有人注意到这个花着脸缩在角落的孩

子。一个老清洁工推着宽大的扫帚缓慢地来到候车室；那儿有成堆的花生壳，糖果纸和桔子皮，他弯下腰扫进宽大的撮箕，然后倒入垃圾桶。扫到杰罗姆蹲的角落时，他停了下来看着孩子，杰罗姆低下头。清洁工离开后，杰罗姆不禁想到，这老人同他一样孤独可悲。

“喂，”他招呼老人。

但是老人没有答理。过了一会，他干完活便拿起撮箕、扫帚和垃圾桶走了，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

现在车站各处都在收拾，准备过夜了。咖啡摊不再灯光明亮，头顶上的灯有的也熄灭了，一个强悍的女人从咖啡摊后面出来，轻快地走过候车室，离开车站。那一边还有两个窗户亮着，杰罗姆看见一个戴着眼罩的人坐在一个窗口后面，担心那人会发现他。

观察了人们进出往来，杰罗姆猜着男盥洗间在哪儿。他走了进去，发现只有他一人在里面，不禁深深地舒了口气。这儿有好几个盥洗盆，不像先前的小站只有一个，而且多数盆都相当干净。他开龙头洗手，灰尘洗去之后显得并不那么糟糕；到处是红斑点，但没有流血。他用了马桶，再洗洗手，用指头尽量把头发理顺，然后出了盥洗间，独自在车站走动。他透过窗户凝望城里的灯火，感到不可思议：破旧的建筑物光彩夺目，仿若宫殿；街灯照在无人行走的人行道上，映衬着关了门的商店。他没有多久便累了，于是回到先前的那个角落，背靠着墙坐着，双脚伸在条凳上。

这时候，悲惨的身世终于使他忍受不住了。他思念伐木营地，怀念躺在炉灶边的狗，想起卧在她母亲身旁的温暖。他连连祈祷似地小声念着“妈妈”，眼里噙着热泪；坐在充

满痰盂和消毒溶液的昏暗候车室里，他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前一晚在河上的经历像一场恶梦，他小声地呼唤：“妈妈，回来吧！”之后，他又声嘶力竭地叫喊：“妈妈，妈妈，妈妈回来！”没有人答理，连售票房里的人也纹丝不动。最后他筋疲力尽了，这才救了他。他睡着了，睡得那么沉，全然不知夜间来往的火车。

杰罗姆醒来时已经是大白天，车站人声熙攘，一对男女在瞧他。男的微笑着，杰罗姆醒来后揉了揉眼睛，也报之一笑。那人瘦小，面容有趣极了，这是杰罗姆从未见过的：一双蓝眼睛，眼角布满皱纹，总是挂着微笑；下巴上长着灰色的山羊胡子，身上穿一套浅灰色哔叽西装，马褂黑得发亮，白圆衣领，没有结领带；头上戴顶黑色软礼帽，两手细长，特别洁白优雅。身旁站着一位同他一般高矮的女人，但体态丰腴，苹果形的宽面颊，挂笑的嘴，头发银灰斑驳，戴一顶方形的草帽。

“喂，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问得这样亲切和蔼，他的用词听起来很清新，迄今还没有谁用这样的语调同他讲过话。他毫无恐惧，也笑了笑。

“杰罗姆”，他说。

“就是你一个人，杰罗姆？”女的问。

“是的。”

“没有母亲或别的人？”男的问道。“没有父亲？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

“我的妈妈死了。”

“和我一样，”男的说，“哎，真是！”

教士眼角边的温和皱纹从不改变，但他看着妻子时止住了微笑；杰罗姆凭着孩子的直觉，感到这位奇怪的小老头也许愿意帮助他，他甚至更有把握，有趣的矮小女人会成为他的朋友。她的嘴唇显得热情温存，她启齿微笑，像一只温柔的鸟儿，还有她那顶草帽——

“你头上顶了一个炒菜的锅，”小孩突然说。

“啊，的确是！”男的说。“乔，这个孩子挺机灵。”

“你一个人在这儿一定饿了，”她说。“想吃点什么吗？来杯茶好不好？”

“亲爱的，一杯可可，”男的说。“可可茶里含的食物多些。”

“你想要什么，杰罗姆——可可或是茶？”

他谁也不愿得罪，但“可可”这个词怪好听的，他说要可可。

“那就给你可可吧，”女的说。她的丈夫跟即上咖啡摊去了。

她语气中的关怀爱抚意味深入了他的心，触动了他的郁积，解开了他的愁结，他感动得哭了。他从条凳上一头扑向她的肩膀，双手抱住她矮小而丰满的身体，闻到她身上整洁清爽的气味。当他把头靠着她时，感到她短小的指头不断抚摸他的头发，听见她温存地安慰他。最后她轻轻地推他回去，当他抬起头来，她立即俯身——她个子矮小，不用俯下多少——用自己的手绢替他轻轻拭泪，她的草帽边擦着他的前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梳子，梳理他的头发。然后她退了

一步，微笑着说道：“现在不哭了！”

泪水止住了，杰罗姆感到饥饿，重新回到坐凳，朝她微笑；他环视周围，寻找她的丈夫，但只看见他站在咖啡摊前的瘦削背影。

“我丈夫为咱们弄吃的去了，我们自己也饿。我们在车上过了半个晚上，我真不喜欢车站，太脏太嘈杂。可怜的孩子——你被遗弃了吗？”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蒙克顿镇的人？”

他摇了摇头，远望着咖啡摊，看见教士正在朝柜台后面的大个子女人比比划划。他的山羊胡子不住翘动，杰罗姆以为他在和那女人争吵，生怕他吃亏，因为他记得同他母亲吵嘴的人会遇到什么麻烦。

“你的姓呢，杰罗姆？”她问。

他脸上没有表情，她又补充道：“所有小孩都不止一个名字，对不对？你除了叫杰罗姆之外，还叫什么吗？告诉我。”

“我的名字就叫杰罗姆。”

“天啦！”女人说。

这时教士手里端着一个托盘过来，瘦削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情。他把盘放在条凳上，搓了搓手，含笑地看着妻子。

“乔，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你总是说女人占我的便宜，但今天早晨我同一个刁妇较量，结果胜利了。站在那儿卖东西的女人，卖的食品既脏又贵，还不给我托盘。但我坚持要，甚至指着她收藏起来的一个盘，她终于让步了，你看这

儿。咱们可以一起用早餐了。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杰罗姆，”他的妻子说。

教士喜形于色地瞧了一眼杰罗姆，然后摘下帽子，神情庄重起来。

“孩子，现在闭上眼睛，我要做感恩祷告了。来，闭紧，用不了多少时间。”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杰罗姆莫名其妙，但他还是闭了。教士马上开始祷告起来。

“最仁慈的上帝，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份食品。我们恭请您恩准我们使用它，让我们为您效劳。我们还祈求您不让消化不良发生，我们怀疑体内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特别请求您指引我们帮助这遗弃的孩子。他的形相和困境似乎由于非常严重的罪恶造成，我们还请求您指示我们如何办，阿门。杰罗姆，现在睁开眼用餐吧。”

“孩子立即闭上眼，怕教士看见他睁得太快，然后再次睁开，端起一大盅可可，一口气喝下一半。”

“贾尔斯，”女人温和地说，“你刚才祷告时，大可不必把杰罗姆扯进去。”

“还要可可吗，杰罗姆？”教士问道。

又甜又暖和的可可，烤得又干又脆的咸肉，涂了奶油的面包，开始一齐在杰罗姆体内产生力量。经过昨天的奔波，前晚在河上的逃命，他周身酸疼，双手发痛，膝头的裂口开始化浓了，他现在能够微笑是因为与友善的人在一起。教士边吃边谈，一会儿赞赏咸肉，一会儿指责面包的质量太差；吃完饭后，他在一张白手绢上擦了擦手，架起又短又瘦的双腿，手指尖捏在一起，清了清喉头。

“杰罗姆，咱们现在作自我介绍吧。我们姓玛特尔——王旁加个马，特别的特，你字少个人旁的尔，玛特尔。我的全名叫贾尔斯·玛特尔。这是我妻子，我叫她乔。你知道教士是干什么的吗，杰罗姆？”

小孩摇了摇头。

“我想可以这样说，”教士说，“嗯，我算是一个典型的教士，这是最不受欢迎的职业，主要的问题在于教民对教长的智慧不够信任，当他宣讲乐土的奇迹，他们心里怀疑他讲的是真话。”

“贾尔斯！”他妻子提出异议。

“瞧，杰罗姆，假如我们要帮助你，得对你了解得多一些。你已经把名字告诉了我们，但还没有说姓什么。你难道没有姓吗？”

“我的名字叫杰罗姆，”孩子说。

“类似的事我在伦敦听说过，”教士对妻子说他的手指尖攥得如此紧，细小的指头都弯曲了。他再次看着孩子：“你总该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杰罗姆。告诉我们你从哪儿来。”

“营地。”

“噢，营地！在什么地方？”

杰罗姆呆呆地望着他，没有更多的话说。

“会不会是伐木营地？”

杰罗姆点点头。

“你是怎样到蒙克顿来的？”

孩子再一次呆望着。

“这个地方”——教士用手臂在面前划了一圈——“叫蒙克顿。我们不必太精确，就算这样吧——这地方名叫蒙克

顿。但你是怎样到达这儿的？”

“我从一节货车上跳下来。”

“你说什么，一节货车？”

“贾尔斯，”女的说，“请别那样问！你完全明白杰罗姆指的是什么。”

“这件事你一人干的？没有同你的父亲或母亲一道？”

小孩点点头。

“噢，不用说，你一定走了不少路。”教士直视着孩子的眼睛，一手捋着山羊胡须温和地说：“通通讲给我们听吧。”

“我吓坏了。”杰罗姆突然痛哭起来，开始大声讲话：

“他想要杀死我，所以我驾上自己的独木舟逃跑了。”

“谁要杀死你？”

“他杀了我妈妈。”

两位老人相互望了一眼，杰罗姆感到她的手臂搭上了自己的肩，让他靠在她身上。

“喔啊！”她咕哝着说，“喔啊！喔啊！”

“他是工程师，我看见他杀人的。”

这时，一个身材矮小粗壮、身穿蓝制服，头戴一顶镶上银边蓝帽的人从站台进来，两手合在嘴边大声说，去哈利法克斯的车到了，十分钟内就要离站。教士“嗯”了一声站起来。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说。“没有要紧的事总是会有时间，遇到重要的事儿，偏偏没工夫了。这儿我们正谈这个——”

“去取包袱，贾尔斯，”女的说，“我留在这儿和杰罗

姆谈话。”

教士向行李房走去，他离开之后，杰罗姆以孩子的眼光看到：这两人之中，女的更有权威。这似乎很自然，因为在伐木营地，他母亲便是女王，然而这个女人与他母亲截然不同。她温柔和蔼，却仍然具有权威。

“杰罗姆，亲爱的，”她安详地说，“咱们没有多少时间。玛特尔先生和我要乘上去哈利法克斯的车，几分钟之内就要离开。你刚才说的事儿太可怕了，我们必须完全弄清楚你说的都是实话。所以，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杰罗姆，重新对我说一遍。”

他这样做了，看着女人和善诚挚的灰色眼睛。

“你得告诉我，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怎么发生的，或者——”她微微一笑，“——要是并没发生这事儿，你也得明说。”

杰罗姆害怕她生气撇下他不管。他感到必须让她相信他说的全是真话。

“他奸了我母亲，她指责他不中用，于是他恼怒发狂，打她，杀死了她，还流了血。”

她像受了打击似的满脸通红，杰罗姆见她张着口，心里愈加害怕，以为这下可惹恼她了，她一定会扔下他不管

“他奸了她，”他绝望地重复说，“然后打她，杀死了她。”

她用手捂住嘴。“孩子 你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他绝望地点点头注视着她，见她的脸由通红变灰白。然后她移开手，冷静地打量他。

“你刚才告诉了我闻所未闻的最可怕的事，”她说。

“太可怕了，我知道你讲了真话，像你这样的小孩子无法编造出这种事情。”她泪如泉涌。“可怜的孩子！我想象你这样的小孩，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

他默不作声地望着她。

“我得再问你几个问题，杰罗姆，以便证实。伐木营地上别的人呢？可怕的事儿发生时，他们在哪儿？”

“在睡觉。”

“我明白了。”又轻声地问：“这人是你的父亲吗，杰罗姆？”

他摇了摇头。“我没有父亲。”

瘦小的教士回来了，他扛着两个大包，狭窄的肩背压得弯弯的。他放下包袱时，那个穿蓝制服的人又走了进来，双手在嘴里围成个喇叭。

“上——车——啦。去沙克威尔，阿默斯特，特鲁罗，新格拉斯哥，悉尼和哈利法克斯，上车——啦！”

人们开始朝门口走动：一对男女拥抱，迅速地交换了一个吻。小孩牵着父母的手，摇摇摆摆地向门口移动。玛特尔太太从条凳上站起来，理直了裙子。

“杰罗姆对我讲了发生的事情，”她悄声地对丈夫说。

“咱们不再问任何问题。”

教士看着妻子，又回头瞧瞧杰罗姆，显得有些担心的样子。

“火车就要开了。”他说。“我想走之前应当跟警察或站长说一声。”

杰罗姆惶恐地爬下凳子，死死地抓住女人的手贴向自己的胸膛。

“请别扔下我！请别扔下我！”

两位老人又一次相互望了一眼，女的弯下腰，在小孩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杰罗姆，亲爱的，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直到你自己希望离开我们的时候。”

小孩心里充满了快乐，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牵着女人的手，同她一道上了站台，就像小孩子随同父母云乘火车一样。列车员接过教士手中的包，装进平板货车，三人一齐进了车厢。教士在车厢中部找到两个空位，翻转靠背便有了够四人坐的地盘，他们像车厢里别的家庭那样坐在一块儿。火车开动了，出了蒙克顿站。杰罗姆从窗口外望，看见车站、调车场和一系列货车慢慢退去；不一会他们便平稳地奔驰在绿色的原野。他们穿过地峡进入新斯科舍省之前，杰罗姆一直未打瞌睡；在地峡一带，他看见大草原风光似的坦特拉玛沼泽地，鹰翔鸥飞的景象，涨潮冲刷过的光滑褐黄泥岸；但是过了阿默斯特之后，杰罗姆睡了几小时。

火车大约开到特鲁诺与哈利法克斯之间，他慢慢醒来，眼睛还闭着，心神仍有些恍惚，但他能听见两位老人的谈话。

“他的面孔长得挺俊，”教士说。“会长成一个强壮英俊的男子汉。真怪，他活着，却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可能会如此。”

“杰罗姆？”教士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只有罗马天主教徒才叫杰罗姆。这会不会造成麻烦？我没有把握，要是某个牧师听见他的名字，认定他生来是罗马天主教徒，会不会

从我们身边把他带走？噢，一个人应当信守罗马人的准则，事实上我喜欢其中不少——天啦，这孩子可脏。我想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肮脏的孩子。乔，我钦佩你，你真坚强，他靠在你肩头上睡了四个小时，他身上的气味儿真够受，我坐在这儿能闻到，也许整个车厢的人都能闻到。你不认为他身上有虱子吗？”

“只消好好洗个澡就行啦。即使他身上长虱子有什么要紧？我并不那样怕虱子，要是我发现它们，它们会更怕我。”

“他不可能很快洗澡。”杰罗姆听见教士轻声笑了，他抬起眼皮看见教士往前俯身，把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膝头。

“乔，家里终于有了个孩子！啊，经过这许多年之后！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让咱们照管他？我想我得和警察局谈谈，唔，我和警察局长比较熟，但还牵涉到律师和其他问题。假若某个讨厌的亲属冒出来认领这孩子，那就糟糕透了。”

“要是上帝把他赐给咱们，”女人说，“我绝不相信上帝又想把他领走。”

“但愿我同你一样确信上帝的美意。他常常对我是个谜。当然，这整个事儿真太奇了，除了这孩子浑身的怪味外，别的我一概不敢相信。他也许是个骗子，乔。可能只是个普遍的孩子，遭了残忍父亲的毒打，偷偷逃跑出来。说不定他父亲是律师，也有可能是浸礼教派的牧师。谁也说不准。他至少有十三岁，一个壮小子，乔。你摸摸他的肌肉了吗？比我的更结实，当然那不说明什么。你知道，我喜欢他的头发。我们找人给他理了之后，长起来会满头葱茏。我羡慕头发葱茏的人，这种人富有男子气概。大家都敬重头发青

葱的男人。

“我想，你可以把我的灰色旧西装改改，很幸运我个子小，等他长大一点，我的衣服就后继有人了。当我出席爱德华兹在任德斯托克布道的仪式，看见他一家人坐在那儿望着他，我承认自己有些羡慕他，虽然我不明白他怎么能供养那一家子。我知道他比我干得好，但干我们这行的人要赡养七口之家太够受了。杰罗姆喜不喜欢我的讲道？我想他不会，因为连我自己也开始感到枯燥无味了，尽管上次耶稣受难日我作的布道还不错，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在他这个年纪——我刚才想到一些事情。当然，这孩子读写都不会。咱们得马上让他学。幸好还有整整一个夏天，每天我都教他。你注意到他眉间的距离吗？显然是个聪明透顶的孩子。”

火车隆隆地前进，横跨公路之前，不断鸣笛，杰罗姆半睡半醒。

“乔，你想到了吗？”教士问。

“想到什么？贾尔斯？”

“想到这孩子和我。我的意思是说，在他这个年龄的我。多奇怪，我竟然能理解他的感情！你瞧——我信奇迹信对了！世间这么多人，他恰好遇上我们——唯一希望收养他和理解他的人！咱们告诉教区会众，上帝注视着一切；有时你会怀疑，上帝真在注视吗？可是像这样的事发生了，叫你无法不信。”

火车仍在隆隆前进，过了一会，杰罗姆感到教士有些坐不住了。

“将近五点钟了，整整一天我一滴未沾。我想是时候了，不是吗，乔？”

“贾尔斯，——周围的人！”

“哼！他们怎么猜得着？”他指了一下自己的狗皮衣领。“我乔装得很彻底。我只去冷饮处拿一个纸杯回来——两个纸杯——谁会注意？我想现在就去。”

“请多加小心，贾尔斯。”

“你知道我很小心，几时粗心过？”

杰罗姆又睡着了。教士轻轻地摇他肩头时，他才醒了，闻到教士的气息里有股熟悉的甜酒味。

“醒醒，杰罗姆，咱们快到了！现在你起来看看吧。”

杰罗姆睁开眼从窗户望去，看见一片开阔的水域，远处绿色的对岸在阳光下熠熠闪亮。

“这儿是贝德福德内海湾，世界上所有的舰队可以同时在这儿抛锚而不至于拥挤相撞。那座有红色建筑物的山上，就是我们居住的哈利法克斯。你会喜欢那儿的。我来自英国，杰罗姆，当我第一次到这儿来，一见到哈利法克斯就爱上了。那儿有大大小小的船只，我们要教会你扬帆——真正的帆船，不是你在河上看见的那种印第安式的独木舟。那儿有学校，教堂，还有别的孩子，你们可以一同游戏。你会为哈利法克斯感到骄傲，因为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适宜人成长的地方——噢，即使对成人来说也不坏。我说——告诉你，我来自英国，这使我突然想到，你知道英国是什么吗？”

孩子摇摇头。

“怪哉！”教士对妻子说。“想想看，你遇见过任何人，即使是小孩，会有不知道英国是什么的吗？”他咯咯地笑了。

“啊，对人讲起这个，会很有趣的。”

他们一齐站起来，教士从行李架取下包袱。当火车向左一摆，开始向贝德福德湾东岸奔驰而去，杰罗姆差点儿跌倒。几分钟后，火车又跑在与刚才相反的方向。突然水陆相交，又在码头和船坞旁边奔驰，他们看见一条细长的灰色船舰，桅杆上挂了不少旗帜。

“杰罗姆，那是巡洋舰。你知道巡洋舰是什么吗？”

孩子摇摇头。

“哦，好极了，你会学到许多有趣的东西！那条巡洋舰名叫尼俄伯，她太陈旧了，不再让她开出海港，害怕她会沉没。”

火车的隆隆声变成坚实沉重的轰响，车站的上空像拉上了一道帷幕，烟雾缭绕，日光昏糊，他们穿过一段玻璃房顶之后火车停下来了。

“这就是北街车站，”杰罗姆后来告诉凯萨琳说：“在一九一七年的哈利法克斯爆炸中被摧毁了，玻璃房顶倒塌下来，压死将近一百人。在我眼里，这座城市是个庞然大物，喧嚣吵嚷。车站尽头停着一排出租马车，车夫扬鞭高叫，招徕乘客。我们经过时，他们围了上来，我吓坏了。玛特尔先生认识其中一辆车的主人，我们很快到了街上，又改乘一辆高背黑色马车。在马车时代的最后十年，我抵达了哈利法克斯，这儿的街道不但有鱼腥味和海水咸味，而且有马粪味。今天它的海港气味仍然保持着这种气味。进入哈利法克斯就像走进一个有着各种新奇气味的世界。”

马车载着他们走过巴雷顿大街，然后越过一带房屋拥挤的陡峭山坡，之后杰罗姆觉得又过了好一阵子，马车才在一

幢住宅前停下来，宅前有一个小草坪，在最底一级梯坎旁边竖立着三球结成的黑色三角座。一条结满常春藤的门廊，藤后隐藏着一张吊床，窗边挂着洁白的帘幔。教士放下包，掏出钥匙开门，杰罗姆闻到一股室内关闭了一天之后的沉闷气味。

“这是我们的住地，”教士说，“屋子小，又不在城里的繁华地带，但我们喜欢它。”

当天晚上，杰罗姆用了一顿罐头食品的冷餐；与此同时，水壶放在炉上，老式的英国煤气炉在为他烧洗澡水。他脱下衣服。肮脏的衣服被拿去烧掉。浴盆用锡制成，表面涂上白瓷，背部触到粗瓷感到舒适，热水温暖着他的肌肤，清新爽身的肥皂擦在身上光溜光溜的，把污垢洗得干干净净。当约瑟芬·玛特尔替他洗澡和揩干身子时，杰罗姆笑了，然后他两手抱住头，让她给穿上一件法兰呢的睡衣。

“这一件是我的，”她说，“但我的个子小，你的个子大，你穿上恰好合身，起码可以临时对付。”

没过多久，他躺进床里，盖上清爽的床单，端详墙头挂的图画，一幅是乔舒亚·雷诺的《天真年代》的复制品，另一幅是暴风雨中的一条帆船。他躺在洁白光滑的麻织床单里，望着照料他的女人笑了。他的手摸到枕下一个小包，他捏在手里，嗅到一股闻所未闻的清香。

“那是熏衣草，”她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们总是把它放在枕下。”

“什么东西？”

“是一种长在英国——玛特尔先生故乡的花草。我从未到过英国，但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国家，国王就住在那儿。

英国的玫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熏衣草就长在那里。”

“太好了。”

“我们不富，杰罗姆，在别人眼里也不重要，但我们不介意，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对上帝的有用。玛特尔先生出身于英国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但他年青时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快活——我们不希望你同我们一起时会这样。我们的小女儿去世后，我们就只有彼此二人和教会里的几个朋友——我是指我个人而言，玛特尔先生几乎认识哈利法克斯的每个人，至少他同每个人交谈。恐怕教会里的有些人不完全赞同玛特尔先生，我很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然而他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杰罗姆，你自己很快就会发现他多么善良。”她拿起熏草包嗅了一下，脸微微一红，递了回去。“说来是傻话，但小时候我家里的确没有熏草包，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样可爱的东西。我的父亲也是一位教士，但他比玛特尔先生更严肃朴素。”她又嗅了一回熏草包，然后递回去。“我第一次遇见玛特尔先生，是他去拜望我父亲的时候——知道吗，他比我年长得多——我记得闻到他手绢上的熏草香气，那味儿真别致好闻。”

她弯下腰在孩子额头上亲了一下，她正要离开卧室，又记起了什么事转身回来。

“亲爱的杰罗姆——有人教过你祈祷吗？”

他摇了摇头，不明了祈祷这词儿的意思。

“那么，我想最好今晚就教你做第一次祈祷。平时你应当跪着祈祷，那表明你很敬重上帝，但今晚你很疲倦，就在床上祈祷，他不会介意的。你只消闭上眼睛，跟着我说。”

杰罗姆闭上眼，感到女人的手按在他的手上。

“现在我躺下要睡，我祈求上帝让我的灵魂保持……。”
他重述着他理解的语句。

“如果我醒来之前死去，我祈求上帝带走我的灵魂。”

他跟着重复了一遍，她用手抚摸他的额头，他感到她的手清凉而又温柔。他感到她的嘴唇在他面颊上擦了一下，便闭上了眼睛。

“那就行了，你懂不懂说的话不要紧。以后玛特尔先生会通通解释给你听的。事实上，恐怕这位好心人会太急于求成，巴不得把他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你听。他知道的可多啦，甚至我也惭愧，没认真听他讲，说不出他的知识有多广多深。亲爱的，现在睡觉吧。上帝会整夜地看护你，明天早晨我们会等你。”

当天夜里杰罗姆熟睡之际，教士夫妇坐在没生火的壁炉前面，拉着手交谈了几个小时。上床之前，他们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并保证要把小孩引上诚实正直的道路。现在有了儿子，他们终于深信，慈善的德性将会伴随他们终生。

就这样，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由一个无知的女人在一个她可能不知姓名的男人怀抱里孕育出来，成长在古老的海军和卫戍要塞——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里，变成了一位有教养的人。于是他长大后的名字成了杰罗姆·玛特尔，他把贾尔斯和约瑟芬·玛特尔当作自己的父母。

战争期间，我在哈利法克斯呆了几个月，与海军合作一个项目，遇到几个小时候曾和杰罗姆一道上学的人。教士当初对他的智力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杰罗姆学得很快，六年之内补齐了他没上过的学科。当他准备读大学时，却上了战争前

线，这时他刚满十七岁，但他身材魁梧，同一般年满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一样强壮。他在哈利法克斯受到好评，擅长运动，勤于工作，非常虔诚，但正如他那天下午在湖面上告诉我的，战争毁灭了他的宗教信仰，把他推送到了一个新的轨道。战后归来，他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心里充满了内疚，受了战争经历的震惊，他再也不能同养育他的父母一起生活了。他没有进达尔豪斯大学，尽管那儿有现成的奖学金；相反，他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的考试，在那儿获得了一份奖学金，靠干各种杂活维持生活，直到获得学位，取得医生资格。

与此同时，他几乎伤害了拯救他的两个老人的心。凯萨琳恰好在教士逝世之前见过他一面，但见过约瑟芬好几次。她爱她，约瑟芬也爱她，并为杰罗姆找到她、同她结婚感到高兴。但战争之后杰罗姆自己却无法接受这对虔诚夫妻的温存和简朴，他为此感到遗憾和内疚。贾尔斯过世之后，他数次回家看望母亲，在经济上支持她，当她不得不迁居时，还为她买了一幢小住宅。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她在杰罗姆第二次赴西班牙期间逝世了。她曾感到十分孤独和失望，却从未告诉他，但凯萨琳有一次这样提到她。

“像她这样的人是世界上的最强者。他们要求的如此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那儿拿走。他们接受的如此多，再没有更沉重的东西可以压垮他们。”

在杰罗姆远渡重洋时，贾尔斯赠送他一本《圣经》，我看见扉页上摘引了《天路历程》中的这些话：

“一个相貌严峻的人走到人生之册的书记官面前说道：‘记下我的名字，先生，’接着立即扑向武装卫士，伤了许多

人，自己也身受重伤之后，终于杀出一条进入天堂的路。”

凯萨琳在杰罗姆离开她之后，还对我说过：

“约瑟芬有一次告诉我，我永远不会理解杰罗姆，如果我不明白他们一起生活时杰罗姆曾真心诚意地视自己为上帝的卫士。他对福音书深信不疑，福音书对于他远比对于大多数人更具有深意，因为他感到精神依属绝对必要。你小时候也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不是吗？”

“是的，”我说，“但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我终止了信仰。”

“杰罗姆不是终止的问题”凯萨琳说。“他是失去了信仰，区别就在这里。”

我们在湖上度过漫长下午的当天晚上，莎莉被安顿上床之后，杰罗姆和我洗好了碗碟，我们三人在别墅的火炉边坐了一个半小时。油灯挑熄了，只有壁炉里燃烧着的木柴火光。杰罗姆和我安闲自在，无拘无束，凯萨琳显出从未有过的闲适愉快。她身上洋溢着幸福，半明半暗之中，她仿佛同时是各种年龄的女人。想着杰罗姆告诉我的奇异故事，我心里充满感激，不禁暗暗发出疑问，有谁能筹划人生？像他们这样的两人居然能够相遇——在我看来，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九点半左右，杰罗姆舒展了一下肢体，起身步出室外，吸收更清凉的空气，我和凯萨琳彼此望了一眼。

“真美，”我说。

“有时候，如像现在，我感到如此快活，却有些害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感觉太强烈。也使他害怕，有时候。”

“今天下午他把童年的事讲给我听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我猜他也许这样做了。这意味着他很喜欢你，因为除了我之外，我不认为他告诉过别的任何人。点点滴滴对别人讲过，但不是整个故事。”

“他有点儿令人惊奇，不是吗？”

她凝视着炉火，没有吱声。

“不会缠住他吗？我是说，像精神分析学家说的那样，那些事不会常常出现在他梦中吗？”

“有时候还属于他的一部分。”她仍然凝视着炉火，
“与他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真不容易。”

“与别的人一起生活会容易吗？”

她笑了。“说得有理。但是我不能想象自己与别的任何人一起生活——至少不是现在。”

她这样说有些伤人感情，我想她一定意识到了，但既说出了口，更正也没有意思。

“对他来说，同我一起生活也不容易。我尽量使他容易接受些，计划这安排那的，而对此我很擅长。可是我多么希望自己强壮些。”

“你比从前强壮多了，谁也想不到你害过病。”

她摇了摇头。“并不强壮，乔治。还是原来那颗心脏。杰罗姆告诉我，我别的器官起了调节补偿心脏的作用，但心脏毕竟是整个器官的中心。懂吗，乔治？”她看着我，惊异地苦笑了一下。“一直过得很好，和杰罗姆一起。我从未感到厌烦过——那怕是一天。可是要感到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我也

办不到。”

“这会儿你就自由自在的。”

“是的，也许不错。可能由于有你在这儿。”

门吱地一声开了，杰罗姆抽着烟袋进来，穿一件粗糙的高级紧身运动衫，两手塞在衣兜里，脸上泛出满意的神情。

“有兴趣知道的话，天变冷了。开始刮风了，风向偏东。只能看见几颗星星。”他沉默地站在炉火前面，隔了一会，发出咯咯的笑声。“我想今天下午讲的话太多了。”

“那是我的荣幸。”

“荣幸，见鬼！我的话太多了。喂，乔治——你喜欢自己现在干的工作吗？”

“不，但毕竟是工作。”

“我听你谈起过工作，这使我想起个主意。你有一副浑厚的嗓音，愿意到广播电台工作吗？”

“我——广播电台！”我哈哈大笑。

“你陷入了那所学校，对你这样的人，那绝对不是一份适当的工作。我不是指你不胜任那儿的工作，你不属于那个类型的人。只有少数人适合干那一行。我在哈利法克斯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杰出的校长，完全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五十二岁还上前线，因为他要是不跟他的学生一道去，他简直受不了。从一九一五年秋天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在前线。战后又回去干老行道，感到很新鲜。他干得出色的原因是，他一直保留着一颗童心。”

我笑了“比格彼博士还一直保持着童心哩，那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校长了吗？”

“他只是自以为保持着，不是吗？”杰罗姆咕哝了一

声。“不管怎样，那与你有什么相干？乔治，你必须明白干错了行道。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于把一切都推上牟取利润的轨道。教师被视为一种高级仆人，它不会让他教书——不是真正意义的教。听我说，乔治，按目前的形势，教书是没有前途的，也许形势改变之后会有所不同，但不是现在。而像滑铁卢中学那样的学校，永远不会有前途。比起教那些贵族子弟来，你这辈子有更富有意义的事情可做。仔细想想。你懂得不少政治，有一副合适的嗓子。像你这样的人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会有出息的。想想吧。敞开思路，别把话说死。我去给你问问。”

又谈了些别的事之后，杰罗姆和凯萨琳相互笑了笑，过一会他们便上楼就寝。我睡的帆布床安放在客厅，在炉火前脱了衣服，躺着观看光影在木椽之间摇曳，那架魁北克加热器的影子黑黝地投照在松木板墙上。我顿时感到自在安宁，没有睡意；我回味着刚才杰罗姆向我提起的事，捉摸是否有可能而不致于成为一个失败者。楼上的床板吱吱作响，传出凯萨琳和杰罗姆的喁喁低声，之后他们的门关了，四处一片寂静。我躺在小床上，心情愉快，没有妒意，充满遐想，不知不觉地坠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听见脚步声，楼板吱吱作响，莎莉兴奋地叫嚷：“瞧！瞧！瞧！”

我坐起身子，从窗户望去，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雪整整下了一夜，现在，太阳正挣扎着穿破迷雾，湖面映衬着雪白的原野显得墨黑。莎莉把小脸蛋贴在寒冷的窗玻璃上，兴高采烈。振奋人心的空气使我想立即做事。从别墅后面飘来炸咸肉的香味，杰罗姆一面哼唱一面在准备早餐。

“出去吧，”我对莎莉说。“上楼去穿衣服，我也得穿。”

她朝我跑来，仿佛要确信我也爱她，在这个可爱的世上，人人都爱她。我们追逐了一会，直到她突然停下来，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要上楼穿衣裳了。我自己能够穿衣了。”

我穿好衣，修了面，正准备吃早点，凯萨琳露面了。早上，她穿着粗花呢衣服，安宁娴静，显示出头晚深受过爱抚。我不曾在别的任何时候见过凯萨琳像这天早晨那样快活，那样健康。她亲吻了我的额头，微微笑着，显得如此恬静；我忽略了她话里的深意，只在几个月以后才回想起来。

“但愿这个世界别来打扰我们就好了，”她说，凝望着窗外雪白的原野和墨黑的湖面。“假如它不打扰我们，我们的日子会像天堂一般。”

第 六 部 分

—

那年冬天，我太专注自己的事，无暇细想凯萨琳当着我发的那句感叹的深长意味。我的整个世界由于她和杰罗姆的缘故扩展开了，通过他们，我有机会结识那些先前只在书本上读到的人物。在城里度过的那些周末，是我精神振奋的难忘日子，而在学校的天日，每晚只好一连几个小时地蹲在床头，阅读有关政治、历史和那年头的激烈言论。杰罗姆似乎认识蒙特利尔城里所有的敏捷之士，这些人多半来自欧洲或加拿大的其他部分。城市依然执掌在旧的一批人手里，他们高高在上，对新人物新思想不闻不问；但新人物新思想终于出现了，正不顾一切地把蒙特利尔变成一座名符其实的世界城市。从蒙特利尔度了周末回到滑铁卢中学，像是回到了殖民时期的十九世纪。

强光比黑暗更能模糊人的眼睛，而这新的突如其来的强光，使我迄今所能看见的景象变得朦胧不清了。

那年冬天，尤其在过了新年的日子，玛特尔家里的气氛

改变了。有好几次，我发现凯萨琳萎靡不振。她常常措词尖刻，话中带刺，令我不胜惊讶。同时我发现杰罗姆谈到政治形势时愈来愈暴躁不安。我猜那是他们之间意见不和的唯一根源，实际上那只是基本原因。凯萨琳不愿也无法对政治产生兴趣，甚至比我现在的政治态度还要淡漠。她相信，杰罗姆的鲁莽使他被一些不足道的人利用，而她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杰罗姆却是真心诚意地沉溺其中，他的鲁莽暴躁性格正好与他的坎坷身世奇特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妻子为他担心，为自己和女儿感到忧虑，不知他一时冲动会导致什么结果；毫无疑问，这一切反过来又会使他与妻子一起生活时感到孤独不适。那个时期，你随时都会遇到有人对政治着魔就像对宗教入迷一样。政治能像福音那样在我国传布，也许那是本世纪的最后一个时代；假若一个人曾经笃信宗教，他对三十年代那样的政治气氛一定会如鱼得水。为什么要耗费时间去解释当时的情形呢？现在已经不言而喻，写它的专著不下几十部。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伴随着这种新的宗教狂热出现的某种激情。激情具有一种进入人们各种思想感情的途径。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无论它凑巧发现在爱情、宗教、改革、政治或艺术上。没有它，世界将会枯萎凋敝，但它既创造又破坏。由于我很少成为它的受害者，总对那些为它所苦的人充满同情。当然，我不以适用于好自为之的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否则我只是伪善而已。

但我看不见那种迹象，只按常轨度日。我一周又一周地忍耐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每天教那些不肯用功的孩子，而在课余闲暇，我把自已视为福音的政治新观点向老同事兜售，这使我在滑铁卢大遭白眼，极不受人欢迎。大多数同事离开

英国很久了，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当代英国像什么样子的概念。在庞森心目中，英国还是他年轻时候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结婚五十周年纪念的盛况，那时英国拥有船舰、枪炮和金钱。麦克尼西念念不忘重返海军行列，而那位博士先生，一个月只读一张报纸，兴致勃勃地幻想会有一天，约翰·布尔得好好教训外国人一顿。而年轻一些的同事，从各省大学毕业出来的社会主义者，目睹比自己社会地位优越的人受到当权的保守政府的虐待，自私地感到庆幸。那年代的滑铁卢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

冬天过去了，这个冬天对凯萨琳、杰罗姆和我来说，关系都十分重大，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未意识到。四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又发现自己与沙特威尔同坐在去蒙特利尔的火车上。他是与我一起而不使我感到别扭的唯一同事。他虽然有些漫不经心，但总是带着快活的神气，他勤于读报，报上无论登载什么，都不会惹他动气或忧郁。沙特威尔对待一切——包括他自己——的一贯态度是：“你知道，我一向认为情形不妙，每况愈下。”

但那天晚上，沙特威尔却特别意气消沉，连谈话都没有兴致。我知道他疲倦了，猜他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受了委屈，滑铁卢中学常常发生的使教员感到屈辱的种种事件。博士先生只顾自己的“博士”身分，损害了助手的威信还不自知。那天早上，沙特威尔的班里恰好起了点风波，比格彼博士竟然自己冲进去平息。因此我现在极力宽慰他。

“这一切混乱都是比格彼故意制造的，”我说。“要不是有他，我们的日子会自在得多。用得着为那点小事烦恼吗？”

沙特威尔无精打彩地转身朝我说：“乔治，老伙计，自然是那老东西令我烦恼。我一见面就看清了他是什么货色。他跟我在印度服役时的那位空军连长是一丘之貉，那家伙后来被毒蛇咬了，只好退伍完事。”

沙特威尔然后告诉我使他烦恼的真正原因。与他姘居的寡妇，莫法特太太，在比米斯纪念医院由罗杰斯大夫替她切除一个良性瘤，一周来沙特威尔不断与医院通话询问她的情况。

“显然，某种可怕的突然事情发生了，”他说。“据说，她周身肿胀，不管那是什么，总不是愉快的事，而那要是护士或医生的说法，就更他妈的倒霉了，她一定十分痛苦。”

“动了腹部手术，免不了有些难受的，”我引用杰罗姆的话来说。

沙特威尔摇了摇头，凄凉地凝视着窗外。在布满斑纹云彩的天空下，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在湿润的原野。阳光突然从西边射出来，照在坑洼里的积水上，水面如同一块块黄金。

“嗯，”沙特威尔解释说，“凡我染指的事到头来总不妙。你知道，可怜的玛莎并不强壮，事实上很娇弱。她一向不走运，但从不提出什么要求。如果你不坚持的话，我想那帮医生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

“不会那样的。”

“你的朋友玛特尔也许不像那样，乔治，但我见识过一些事情。知道吧，有一次我的境况变得格外糟糕，曾经一度沦为医院里的勤杂工。便盆、灌肠器、屎尿，清洗病人弄脏

的一切——干这一类的事，那真是可怕的工作，但它使我明白了一些事儿。医院和学校一个样，做坏了手术他们总是掩盖。”

“可是你没有证据说这儿的手术不行。”

“伙计，我有某种感觉。”

一列西行的快车飞驰而过，风浪扑打在窗口上；列车开过后，沙特威尔接着说。

“玛莎的性情温和顺，懂吗。我们在一起快活极了。她从不求人，我是说，从不唠叨或者怂恿我娶她什么的。她只是接受我这样的人，而我们过得很快活。伙计，你猜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一生中很少有过这样的乐事。我的妈倒可亲近，爹却是个武夫，而英国军人是干得出狠心事的。他总是让妈和我，用他的话来说，站在起跑线上，这样节省他的时间。当然他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出于他的高兴。男人都像那样，女人则喜欢唠叨。我曾经娶过太太，她成天唠叨不停。”

“你从未对我说结过婚，伦道夫。”

“说又有有什么用？结果很不称心，而且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在印度嫁了个什么工程师。然而，可怜的玛莎，她和我要好，一点也不嫌弃我。她从来没生小孩，可怜的人。”

“她的丈夫几时死的？”

“我猜是十年前。他的年纪大得多。我估计他是那种结了婚便坐着不动的人。他从事某种商业，但并不走运，也许自认为干得不错，或者认为应当走运。他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而可怜的玛莎却对一切都欣赏赞叹不已。”

我对沙特威尔说，不必担心，那年头动了手术的人都恢复健康的，但他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要是她喜欢别的什么人，而不是我，”他说，“她也许更走运，我情不自禁地这样想。”

“哦，得了吧，伦道夫。这有什么相干？”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说：“士麦那地方有个姑娘，我给她带去了霉运。还有在吉隆坡那位领事的女儿——我对你讲起过她。还有加尔各答的那位，她嫁了一个该死的炮手，还有在布里斯班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姑娘——我想不曾对你讲过。”

“至少我不记得。”

“说实话，伙计，我当然自愧不如。你瞧，我去找了当地最优秀的医生，他肯定地告诉我，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完全没问题。但是你知道我并不是那样。”

他以温和而又呆滞的目光望着我，我半天没听懂他的意思。

“好乔治，如果一个小伙子拍一下姑娘，尤其是在爱她的情形，完全不用着别的言辞。你现在明了我谈医生的含义了吗？仅仅由于他们告诉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不意味着没发生倒霉的事情。”

当火车一拢城，沙特威尔跳下火车便钻进出租汽车，直往比米斯纪念医院奔去。我寄放了背包，悠缓地越过城区的斜坡地带朝杰罗姆住的公寓走去。

这是蒙特利尔的一个宜人的下午，树枝吐芽，新叶初绽，知更鸟在自治广场上空啼叫，尽管人行道还残留少许冬天的雪泥。我在一家花店停下，为凯萨琳买了束郁金香。然

后缓步上行，穿过男女青年手挽手溜达的大学校园，处处感受到漫长的冬天已去，人们重新开启窗户的气氛。天空里云彩斑驳，有些云彩使我想起鸽子翼下的颜色。

我走进凯萨琳的住宅时，客厅的窗户开着，莎莉正在地上玩耍。

“乔治叔叔！”她叫道，跑过来让我赏识她。

我抚弄着她金黄色的头发，拧拧她的鼻子，她高兴地咯咯直笑，可是当我问她在干什么，她却变得一本正经，在我唇边竖起一根指头。

“听我说！”她命令道。

我这样做了，于是听见手摇风琴奏出的快乐歌声。我们走到窗边，看见那位讨人喜爱的意大利老头。（就我记忆所及，他一直在城里各处弹风琴。）一首小夜曲引得半月街沿街窗户都打开了，人们笑着探出头来靠在窗边。屋顶上空，云彩向东掠去，太阳周围的云层像一块拥簇着水仙花的田地。莎莉满面欢欣，我真希望我是她的父亲。

这时门铃响了，莎莉吵嚷着要出去和弹风琴的老人玩，凯萨琳从楼上叫我去开门。

杰克·克里斯托弗来了，请来晚餐的另一位客人；他从医院来，在那儿他是有经验的住院实习医生。他总是有些拘谨，过去和现在都仪表堂堂，个子高高的，嘴角两边牵出对称的线条，显得严肃精明，一丝不苟。我们的年纪相仿，但我认为他比我看上去老些，现在仍然如此。他是杰罗姆的门徒之一，出身于蒙特利尔的一个古老而殷实的家庭，家里人本来希望他进入商业界，但正当他在从商与从医之间徘徊犹豫之际，偶尔遇上了杰罗姆，杰罗姆的热情点燃了他。现在

他犹豫不决的是，马上作为内科医生开业呢，或是进一步深造，专攻内分泌学。杰罗姆劝他先两者兼顾一阵，这是典型的杰罗姆的观点。

“妈咪，我出去和弹风琴的人玩玩好吗？”

从楼上传出凯萨琳的声音：“你一定得穿上外套。”

“会穿的，妈咪。”

我看着莎莉走出门外，背后电话铃响了。杰克就在电话旁边，拿起话筒只讲了几个字便转向我。

“杰罗姆来的电话，他说被缠住了，但过几分钟会回来。他要我们自己先喝酒。你要一杯吗？”

我要了一杯，他思索了一下，也决定来一杯。

“杰罗姆比平时更忙吗？”我问他。

杰克略为耸了耸肩，没有说什么。我们彼此默默地啜饮，一会儿风琴声停止了，接着莎莉走进屋来。我叫她去拿花瓶，插好后端进客厅。杰克和莎莉在地板上玩，莎莉轻松自在，杰克像是一位年长的政治家在选举期间同孩子一起玩耍，莎莉要求知道她父亲为什么没有回来。

“我一周都没有看见爹了！”她说。“整整一周！”

然后，她跑上楼去和母亲讲话，杰克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表情。

隔了一会，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从小孩嘴里说出来。我可不喜欢。”

“不喜欢什么？”

“当然，他干什么与我毫不相干。”

“谁干什么？”

“自然是杰罗姆。告诉我——他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不认为他是。”

“你是吗？”

“不。”

杰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但你们这伙人像群赤色分子老在谈论不休。男男女女在一块儿。那个护士，布莱克韦尔那女人——她也是你们一伙的，不是吗？”

“我不愿那样叫她。我认识她有一阵了，但——嘿，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杰罗姆见她的时候太多了。他完全不拘小节，我不喜欢这样。且不说对医院不好，对他自己也不利。我敢说那女人一定是共产分子，他两人在太多的场合出现，难免招人闲言杂语。我不喜欢。请你注意，我说的就是这些。”

“你的言外之意可远比这多得多，杰克。”

“是吗？也许不错。假若我不说，别人准会。”

我喝完酒，又倒满一杯。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大家的脑子里灌了些什么。这场该死的西班牙战争，你会以为正在这儿发生呢。在所有的集会上，同样的人相互诉说着同样的事。他们对西班牙有多少了解？见鬼，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讲的是真还是假？他们最多是在猜测，不然，只是在梦吃自己想听见的东西而已。那些有关西班牙战争的集会与卫理公教会里的鼓动性宣传一样。对杰罗姆这样的人，西班牙意味着什么？他从未到过那里。那个国家一直是不可救药。对他们这些人来说，除了为他们任意发神经提供借口以外，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意义？”

我被激怒了：“杰克，别太自以为是。”

“你真这样认为吗？”他的表情像是一位科学家面对一

项新的证据，责无旁贷地要作出估价。“也许你正确，我自以为是。可是我现在谈论的是杰罗姆，不是我自己。他在医院里的某些言行现在被人当作笑柄。我们得到一笔新的遗赠，数目可观，不带附加条件。谁也没提起这笔钱该如何花之前，他便在走廊里谈论，于是每个人都听见了：‘嗨，我想咱们应当为有钱的病人修一座娱乐大厦。’他同别人一样清楚，比米斯医院缺少病床，而他那话听起来像是搞了一笔肮脏交易。当然，他想为院外病人提供方便，我并不认为他的想法有什么错——至少现在看来如此。这一切都是他为失业者开诊所提供免费服务引起的。我不是说这样做错了，但五花八门的人便由此围在他身边。”

杰克很少这样说个不停的，我惊奇地望着他。

“当然，”他继续说，“他说的每个字都传到罗杰斯大夫耳里了。他犯得着这样行事吗？你们大家为什么都一个腔调，仿佛在位的人都是骗子？医学应当超越这种宣传。”

“按照杰罗姆的观点，城里的许多医学界人士都站在大本营的这一边。”

杰克的面膛微微涨红了。“他太容易被人影响了。他从前是医生，现在仍然是。政治使我嫌恶。”

“当今之事，你能让哪一桩不沾政治？”

“你们这些人的心被自己读的和彼此重复的东西毒害了。我想你会认为我是个反动派。”

“既然你问我，我的确这样认为。这个国家恰好有一百万人失业，美国约有一千二百万。在希特勒猖獗之际，你居然想生活在象牙塔之中。”

克里斯托弗耸耸肩膀。“乔治，我幸好有一副科学的头

脑。你没有，杰罗姆也没有。他是一位不错的生物化学家——他究竟懂得多少科学，我感到奇怪。但那是因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受过良好的训练。他学东西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快，但他并不是一位科学家。”

“好吧，他算不上那个范畴的成员。又怎么样？”

“就是这样，遇到他本行外的事，他和别人一样容易受骗上当。”

“非科学家有谁不是这样呢——在他本行以外？”

杰克冷冷地正视了我一眼。“乔治，幸好我受惠于杰罗姆不浅，而且我很关心自己的朋友。他正在作践自己。他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你大概不明白他有多么出色。别问我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外科医生是天生的而非人为的结果。迟早他会成为北美最优秀的腹部手术专家，而且他还具有医生中少见的神秘本领。我难以仔细加以描述，也不想显得动感情，或者让人认为他是小说或杂志中描绘的那种医生。但在实际经验方面，确有一些医生具有别人望尘莫及的本事。杰罗姆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我还没有见过谁是他的对手。”

“是吗？”

“那是很罕见的，乔治。他这样的一个人顶得上十打政治宣传家。可是，假若他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他恼怒地耸了耸肩。“他正在被那些神经病和无事生非的人利用。那一群社会主义者、共产分子和空谈家之中，谁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干，如果他们自己混得不错。”

“杰克，”我说，“把这话告诉你在圣詹姆斯街的朋友吧，也许你就是从那儿听来的。”

“是吗？”他气得面孔通红，这是很少见的。“让我告诉你，他们在利用一个比自己强的人，他们恭维他，他也爱听奉承话。我要不是挺喜欢这倒霉的傻瓜，一定会讨人恨的。我不愿看到一个头等的人物被三等货色的人利用，尤其不能容忍那婊子护士。也许我自以为是，但还有不少人期待着杰罗姆，无论他喜欢不喜欢，人们期望他在医院里作出表率。”

我从来没听到杰克这样滔滔不绝地谈过话，平时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一声不吭。要是我善于观察，一定会意识到他这样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发议论，实际上是在隐约地表态。可是我不善于观察，被自己的感情蒙蔽了，绝不允许自己提防杰罗姆。杰克关于本行以外的谈话，整个观点我都反感。我很愤慨，要不是恰好这会儿杰罗姆进屋来了，我会立即开始反驳。

我们听见他大声在门厅说：“喂，诸位，我回来了！”

莎莉连蹦带跳地跑下楼去迎接他，他把她高高举起几乎接近天花板，她高兴得直叫；他一面和她玩，一面叫我替他倒一杯酒，而且要烈性的。他继续逗莎莉玩耍，逗得她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杰克看着这景象，仿佛在思索其中的奥妙。她喜欢杰罗姆粗手粗脚地逗她玩。这时凯萨琳下楼来了，他把孩子抛上沙发，转身过来吻她，用胳膊挽着她的腰，抚摸她；然后轻轻地拍了拍莎莉的背，一口气喝下半杯酒；又叫杰克到书房去，要跟他谈话。杰克起身跟他去了。莎莉跑上楼去取她想给父亲看的東西，只剩下凯萨琳和我在客厅。

“噢，”我说，“这似乎是他狂躁的一天。”

“每天都这样，如果不是他叫许多人受不了，便是人家弄得他精疲力竭。喂，帮我摆桌子。”

我们往来于餐厅与厨房之间，一面端菜，一面交谈，我看见她臀部的曲线时，一股强烈的刺激向我袭来，直刺得我发痛。

“杰克告诉我，杰罗姆揽的事太多了。”我说。

“这个人生来爱揽事。有时我不禁在想，除了西班牙外，他脑子里还有别的事不。你一直在思考西班牙的事吗？”

“我想是的。”

“我敢说他在做手术时也想着西班牙。乔治，我是怎么回事？做餐时想不到西班牙上去，就是整整一周闲着，也绝不会想起西班牙。”

“这是当前相当重要的话题，凯萨琳。”

“我想是，但你真的相信，这就是你们大家对旁的事麻木不仁的原因吗？”

她皱着眉头看着我，心形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安详的影子。

“要作杰罗姆的好妻子可不容易。”她说。

我笑了：“有时一定很费劲。”

“岂止费劲！”她转过脸去。

“杰克认为他在工作之外管得太宽了。”

“杰克是对的。他是我们朋友之中唯一没有完全瞎眼的人。”她重又朝我转过身来。“杰罗姆的变化太快了，乔治。你难道看不出去年秋天以来的变化吗？是什么缘故？但愿我知道。他太露了，自己还不意识。”她抬起手又落下。

“哦，咱们谈谈自己吧。你上周过得怎样？”

“每周都大同小异。”

七点半我们才在桌边坐下，杰罗姆没有留意凯萨琳的情绪，兴高采烈地谈起一位西班牙的坦克军官，他要在下一天晚上的公开集会上介绍他。

“战争开始时他还是个汽车修理工，现在却当上大校了。这不是一个好例证，说明在优越的制度下一个人会有何等作为吗？我第一次感到诺尔曼·白求恩在西班牙问题上做得对极了。那位英国人克里福德也做得对。现在既然苏联人帮助共和派，他们一定会胜利。但他们的确需要医生。白求恩已经到了那里。他们需要任何可能得到的外界帮助。”

我们到客厅喝咖啡时，杰罗姆像通常一样更加得意忘形。他拦腰挽着凯萨琳，向她投去一瞥，杰克看了只好尴尬地转过身去，他太露骨了，每当他有性欲感，脸上便电光似地闪现出来。凯萨琳娴静地一笑，溜到一张扶手椅上，我想这是她情绪不佳的一天。

杰罗姆正在独自侃侃而谈，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说是找我。我心想除了父母以外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拿起话筒就听出沙特威尔的声音，焦急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乔治，玛莎快死了。开始，他们不让我见她，但我执意要见。太可怜了，他们干的好事。”

他一口气给我讲述了她的症状细节，直到我打断他，问他为什么不找主治医生商量。

“怎么找呢？给她开刀的那家伙，那个外科医生，明白吗，正在底特律、布法罗或者别的这类该死的地方，向别的医生宣读他那该死的论文。”

“我指的是她的内科医生。”

“哦，他简直毫无用处。”

“呃，伦道夫，你怎么知道？”

“这个内科医生把她交给外科医生动手术后，自己也病倒了，现在也是这儿的病号。”他犹豫了一下说：“乔治，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告诉玛特尔大夫吧，乔治？”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伦道夫，这太过份了。她不属于玛特尔大夫管的病号。”

“但他在这个该死的医院工作，不是吗？”

“她的内科医生是谁？”

“我想那家伙的名字叫克劳福德。听我说，老伙计，问题不仅仅是严重，而且令人绝望。我问过医院里所有实习医生、护理人员和别的任何名目的人，很明显，没有谁不遮遮掩掩。如果玛莎得等那家伙从底特律回来，得等到星期一，那时她会没命了。”

“得啦，伦道夫！他们不会收了病人住院，然后撒手不管。”

“他们不会吗？是那样的吗？乔治，请帮帮咱们吧！”

“我替你说说，但不能许诺。要是我回电话，哪儿找你？”

“医院这儿。我守在这儿不走，乔治。他们巴不得赶我走，但绝对办不到。”

我挂了电话后对杰罗姆说，他皱了皱额头，叫杰克和我到他的书房去。他坐在转椅上，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一根烟，两眼罩在烟雾里，他静静地听我重复了一遍沙特威尔讲的话。克里斯托弗瞪了我一眼，暗示我别说了。

我第一次目睹杰罗姆处理病例，他的变化富于戏剧性，给人深刻的印象。快活的神情消失了，充满活力的举止无影无踪，他顿时认真起来，聚精会神，一本正经；看来在思考我的意见，正要作一项困难的决定。克里斯托弗也随着改变，采取了实习医生在长辈面前应抱的正确态度。

“你知道任何有关这个病人的事吗？”杰罗姆问他。

“今早晨克劳福德查病房时我同他一道。”

“还有呢？”

“我想你最好问问克劳福德本人。”

杰罗姆不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杰克不再推托了。

“出现了并发症。克劳福德大夫说，要是她的温度持续上升，需要再次进手术室。”

他们交换了一些医疗术语，杰罗姆突然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医院的号码。

“她那层楼今晚谁值班？”他扭头问杰克。

“我想是索耶。”

我为那位实习医生感到难过，他一上电话，杰罗姆就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题，打断他大多数的回答，最后发火了。

“你以为我们在训练你为自己作想吗？甚至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说她的体温在十一点半是华氏一百零一度，三点钟时一百零二度又二分之一，现在是一百零三度。在这种情形下，你也读了她病历上的说明。你作出了什么反应？我知道克劳福德大夫在排肾结石，整个医院的人都知道那该死的结石。别的就没有医生了吗？你说麦格雷戈大夫上北边去了，史密斯大夫不知去向？该死的，你不知道哪儿可以找到我？为什么不给我来电话？”

他啪地放下电话，盯着杰克，仿佛是他的过错。

“诺恩大夫在城里，”杰克静静地说。“我还知道亚当森大夫和辛普森大夫在哪里。”

“是呀，”杰罗姆说，“我也同样知道。”

我们跟着他出了书房，听见他对凯萨琳说必须回医院一趟。临走时他请她向邀请来度过后半晚的客人表示歉意。

“也许我最好跟你一道去？”克里斯托弗建议道。

“不，你呆在这儿。”

“真的，我愿意去。”

“我真的希望你留下。”

当杰罗姆随手把门关上，杰克的脸色略微有些发白；我们听见他跑下梯坎的脚步声，听见他发动汽车，然后开走了。

“去他妈的！”杰克咬着牙咕哝了一声。

他进屋来望着凯萨琳，她回望着他，彼此似乎心照不宣。凯萨琳疲惫不安，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不明白她与杰克之间所默契的事。

不一会响起了脚步声，第一批客人到了，接着来了更多，很快客厅里噉噉喳喳，充满了熟悉的话题：西班牙、张伯伦、布卢姆、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罗斯福、苏联人、资本、失业，以及诸如此类。我朝凯萨琳走去，在她椅边的地板上坐下，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宁愿躺在床上，”她说。

“那为什么不去卧室呢？”

“等到杰罗姆回来的时候。”

“出了什么事吗？”

“关于杰罗姆？我想是的。”

“我是说你。”

“啊，我！半条命地活着，我只是感到厌倦而已。去帮阿瑟·拉任彼斟酒，别管我。”

“无论阿瑟走到哪里，他总是干斟酒的活儿。”

“哪儿有今晚这样的聚会，哪儿就有阿瑟。”

“只是他不参加谈话。”

“你讲话吧，乔治。这对你有好处，爱讲什么就讲吧。”

可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讲话的兴致，或者说，我只想和凯萨琳交谈，而且不谈政治。杰克·克里斯托弗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场合，坐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指头捏在一起，两眼望着天花板。整整一小时没有谁理会他，他也不瞟谁一眼。拉任彼走过去劝他喝啤酒，断断续续地扯谈了几句，但他谈不下去，趁势另找了个位置。十一点半左右，杰克离开客厅，我猜他是到杰罗姆的书房打电话。不一会，我看见他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门边，面对一群争论不休的知识分子，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他瞟见我，我们一起到了门厅。

“嗯，”他冷冷地说：“他做完了，给你的朋友的情妇动了手术。”

“你怎么知道她是沙特威尔的情妇？”

他不理睬我的问题，说道：“我估计情况会更糟的。”

“对于莫法特太太？”

“坦白说，我才不管什么莫法特太太呢。”

“你主张他置医疗道德于不顾。看着她丧命吗？”

杰克鄙薄地狠狠盯了我一眼，然后他的愤懑在职业性的

举止背后消失了，但是却冷冰冰地瞧着我。

“要是你没听见他发表类似的意见，你绝不会这样说。他不会那样作，要不是为了那些新朋友和他持的观点。乔治，他不应该管，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也许是事实，一千个病人中会有一个受忽视，由于他无足轻重，但——”

“沙特威尔恰好认为，也许正碰上了千分之一。”

“这并不是什么独到的见解。十家中会有一家迟早产生这种想法；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

“杰克，听见杰罗姆与那个实习医生的谈话，我感到难受。”

“你只听到事情的一半，不处在能理解的地位。你们这些政治人物老在寻找弊端。我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回事。”杰克恼怒地耸耸肩膀。“至少那位实习医生打了电话找底特律，当然罗杰斯大夫不在旅馆里，他无法找到他。他的确找过克劳福德，但这位医生在病床上痛苦不堪，显然只能叫实习医生自己作主了。当然，就事论事，杰罗姆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你抱怨什么呢？”

“就是这个。过去两三年里，杰罗姆一直在医院里招惹罗杰斯大夫的对抗情绪。我想他自己还不明白事情达到了何等程度。对手总在力图证明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也许只是他自己想弄明白。

“现在，你从罗杰斯大夫的角度瞧瞧。论年纪，他足够当杰罗姆的父亲，他指教过杰罗姆不少，一度把他当作门徒。恐怕他从杰罗姆那里获得了关于罗杰斯大夫的错误印象，让我告诉一个绝对的事实：十年前，罗杰斯大夫被尊崇

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专家。你想想，一个高傲的长辈发现他偶然的出错被他憎恶的人挑出破绽并加以匡正，他心里会舒服吗？”

“那笨手术确实是罗杰斯做的？”

克里斯托弗烦恼地转过身，过一会又转过来。

“乔治，我会不胜感激，如果你能向你那怪名儿的朋友暗示，他要为这一切表示感谢的话，最好的致谢是闭上他的嘴。我在医院里见过那家伙，不喜欢他那副神情，像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鬼。”

“你以为他欣赏别人这样看待他吗？”我说。

杰克朝凯萨琳走去，向她道谢告辞。客厅里进行的谈论，他好像压根儿没沾边似的。隔了一会，我去屋角同凯萨琳呆在一起。她的面部表情告诉我，无论谁的谈论，她一个字也未听进去。

我坐下后，她抓住我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又放开了，然后转开目光。

“你应当心安理得地娶个好女人，”她的谈话使我不胜惊愕。“别来和我搅在一起。”

我笑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这时我看见她脸上呈现出痛苦，透露出沉重的心事。

“我想你一切都知道了，”她安静地说。

“一切什么？”

“我们遇到的麻烦。没有谁告诉过你？”

“什么，凯萨琳？杰克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可是——什么麻烦，凯萨琳？究竟是什么？”

她抬起手又放下。“如果这个问题可以三言两语回答，

事情也就简单了。什么麻烦？啊，乔治，要发生在五十年前一定很简单，大家都明白那该是谁的错。”

我大惑不解地望着她。

“我能责怪谁？甚至那女人。我不喜欢她，但我能责怪她？她没有责任。我能怪杰罗姆吗？我不相信这场西班牙战争是场圣战，但他却相信。你瞧——啊，乔治，你问我出了什么麻烦？我知道谁能说出麻烦是什么吗？也许，生活。当今的生活。”她苍白而又平滑的面孔仍保持着沉静。“也许是他丧失了宗教信仰后所留下的空白。我努力填满它，以为把它填满了，但是现在，我明白自己没有办到。”

我扭头看了看，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我看见阿瑟专心听人辩论的侧影，又重新转向凯萨琳。

“大家都认为他和布莱克韦尔的女人的关系不正常，”她平静地说。

“我相信不会。”

她圆通地笑了一下。“我不以为然，只要他不感到对她负有责任。你瞧，乔治，他不理解女人。有的女人耍滑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有的利用男人的善良性情，使他为陷入的处境感到内疚。杰罗姆不是同女孩子一起长大的，以后又成天忙碌，顾不上了解女人。即使他了解女人，我不敢说他就了解诺拉·布莱克韦尔。”

凯萨琳娇小的身子笔直地坐着，受了损害而不失尊严，她那心形的面孔依然安静自若。

“我为诺拉担心，”她说，“不是由于人们所相信的种种缘故。我不假装喜欢她，不想掩饰她对我造成的可怕损害。不，我并不高贵。但是，乔治，那女人的心理不正常，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认为她生性热情，但日子过得不幸福，可你说——”

她冷静地瞧着我说：“她很富有魅力，乔治。”

“我完全不那么看。”

凯萨琳笑了，差不多是怜悯的微笑。

“对杰罗姆这样的人来说，她是我能想象的最有迷惑力的人物。她看上去温柔和顺，同时工作又很在行——差不多同他的工作一样。她运气不好。她希望改善自己——事实上她的确在改善！她崇拜他，当作一位英雄，可是他太不可靠了。”

“杰罗姆不可靠！”

“远远超出你，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太傲慢，或者——不，不是这样。他内心里常常感到绝望，因而不顾一切。”凯萨琳深深吸了口气，叹息着说：“但愿诺拉不把他想得那么高贵就好了！”

我无话可说，只好干望着她。

“我没有低估她，乔治，从来没有。很可能她爱他，不过我知道他不可能持久爱她。事实上。我想他从未真正爱过她，也不相信他现在正爱着她。但有一件事我深信不疑——她会缠着他不放，让他感到负有责任。他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乔治。内心深处，他仍然是虔诚的。他从未干过这种事，这我知道。要是他干过，他早对我讲了。他心里瞒不住事，总会情不自禁地供认。啊，乔治，多糟糕的一个冬天，多么糟糕！”

“凯萨琳！”

“别那样替我难过！别让我为你做什么事！”

“好吧。不让。”

“那个女人——她要是存心作恶也罢了。但是我不这样认为，甚至不相信她设了圈套。也许纯属偶然。他疲倦了，我病了，害了流感，他们眉来眼去，恰好单独在一起，于是他发作了。可是，她那眼神表明，她要缠住他，乔治。她会以世界上最良好的动机把他毁掉。更可怕的是，她是一个共产分子，完全赞成他去西班牙。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使他与我在一起时感到孤独，在他不应该有孤独感的时候。我能帮助他处理好与诺拉的关系。我可以帮助他，而且维护他的自豪感。可是，别的一桩事叫人受不了。还有，乔治，我相信诺拉在骨子里是一个忘命徒类型的人，杰罗姆明白这点，害怕得要死。”

我们再一次陷入沉默，室内的政治谈论对我们来说像不存在似的。

“良心这东西太可怕了，而他偏偏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良心。”她说。“我太令他失望，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太多。”

“你怎么那样说？”

“因为那是事实。我把他看作自己整个的生命。”

“还有莎莉。”

“是的，上帝保佑她。”她勇敢地苦笑了一下。“我在心里说了那么多关于诺拉的坏话，我甚至憎恨自己。关于杰罗姆，也是这样，当然，他感觉得出来。因此，西班牙成了他逃遁的去处。”

“我相信不止这些。”

“是的。”她的面孔突然老了许多。“是的，确实不止这些。他对你讲的在战场上杀死德国兵的往事太历历在目了。他良心上承受着可怕的重担。他认为在这次西班牙战争中，他会有机会拯救生命从而得到补偿。啊，良心——它的确使我们大家变成懦夫！乔治，乔治，我真为他担惊受怕死了！如果他去西班牙，那些共产党人会抓住他不放。他的家庭比大多数人猜想的对他更为重要。这个女人对此不可能理解，她只把我看成一个累赘的病人。是的，但同时是我在支撑起这个家。这个糊涂的傻女人！我多希望她不曾出生在世上！”

突然我感到忍受不了，站起身来。

“我想该走了，”我说。“还是去医院看看，看看沙特威尔的情形。”

我沿着城市的陡坡走去，四月的空气沁人心脾，星光从光秃的树枝照下来。我到了杰罗姆工作的医院，对探病者来说，时间已晚，但没有人注意我，当我乘自动电梯到日光室所在的楼上。住院病人都躺在床上，医院里静悄悄的。日光室的窗户开着，凉爽的空气透进来，清新而又甜润。灯光晦暗，我看见两个人影在远处的屋角，一个往后躺靠在椅子上，另一个前倾着同他交谈。我认出是沙特威尔和杰罗姆。

“她会好起来的，”杰罗姆说，“你也一样。”

沙特威尔显然已经累垮了，我听见他在低声啜泣。

“这对你没有好处，老兄，”我听杰罗姆说，他的声音能慰藉任何人。“你身世凄惨——再惨不过了——当然，亏你熬过来了。”

“凄惨！”我听见沙特威尔差不多啜泣着说，他的英国

风度完全荡然不存了。“我低贱卑微，不配活在世上，事事都不称心。”

“不，”杰罗姆说，“不至于。”

“你不了解我，大夫。”

“我知道你的可贵之处，你是一位善良的人，沙特威尔先生。”

“那有什么用？”

“那远比你猜测的更有价值。一个人要违背社会的意志是不容易的。你在英国殖民地碰壁值得赞许。显而易见，像你这样的人遭遇必然如此。你太善良了。现在——”杰罗姆站起身——“跟我来，我给你服镇静剂，睡一觉醒来会成一个新人。”

他们从我身边出去时，杰罗姆看见了我，沙特威尔却没有。他步履蹒跚，一身威士忌酒味，我猜他是借酒浇愁，喝得过多了。杰罗姆打手势暗示我，他就回来；我等着，十分钟后他果然回来了。

“嗯，”他说，他的声音表明了疲惫。“只好那样做啦。出现了败血病的症状，我们要是等在家里，就不会有多少希望了。”

“现在平安无事了吗？”

“是的，她的一切都正常。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但感到他正搜索我在暗影中的面孔。

“凯特和你谈话了吧？”他突然发问，切中要害。

“要是说谈了，我想也没什么。”

他把手覆上额头压了压说：“我很难过，乔治。我后悔我——”

我没有吭声，因为无话可说。

“一个人所能作的最蹩脚的借口是说难以抑制自己。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有时我的确情不自禁。”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绝望的调子，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对无法抵抗自己内在的力量感到绝望。

“你是不是爱上了诺拉·布莱克韦尔？”我强迫自己问道。

“爱上？”他耸了耸肩膀。“这事儿的起因是我打算帮助她。当时她思想混乱。她从来就不大走运。”

“她还是个颇有吸收力的女人呢。”

“是的，尤其是对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男人。”

“我想，凯萨琳理解这点。”

他的声音变了。“可是她并不理解西班牙意味着什么，我没法让她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问题，假如我不敬爱凯特——不崇拜她——”他转过身去，然后又转回来。“那些家伙——他朝蒙特利尔城区挥动了一下手臂——“那些家伙认为我是赤色分子，因为我想帮助西班牙的共和派。我的上帝，他们多蠢！我不是革命者。我看见有事必须做——像今天晚上——就做而已。老是对抗潮流真他妈的没意思。”他的目光直视着我。“想过吗，你没有生就我这付脾气，多么幸运啊？”

城市在我们下边的一片灯火中闪烁，医院四周静悄悄的。四月夜晚的宜人清风不断吹来。

杰罗姆魁梧的身影一动不动，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接着他说：“如果我像你和凯特那样长大成人，也许我对眼前这一切会有不同感受。乔治，你可知道——我总觉

得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无尚光荣。”

我没有开腔。

“你们把文明社会视为当然。我却不。再经过一次大战，它会迅猛地发展。生命能够迅速成长。而它要是不存在了呢？”

我抬起手，耸了耸肩，隔一会，他又开始轻言细语地谈话。

“我在工作中常常得眼睁睁地看着老年人死去。他们能够活下去，如果——如果年轻些。道理很简单。现在是老年人在主持我们的文明社会，像罗杰斯那样的人。他们的用意不错，但是老迈了，筋疲力尽了。他们企求安宁，不想被打扰。他们希望自己转开视线时，老虎会吃掉别的什么人。”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理解凯特胜过自己。我明白她的日子多艰难。生就那样一颗心脏，她自然需要安宁，不愿人打扰。”又是一顿。“可是，除非法西斯势力在西班牙被遏制住，她将得不到安宁。这场战争我们也许会失败。我知道法西斯是什么，它绝不是什么政治因素，而纯粹是人类嗜杀本性的集合体。”

他站起身，我也跟着站立，他沉思地凝望着城市好一会功夫。

“乔治，我不聪明。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错了，但我真心诚意地相信是这样。给予我们以文明的古老国家对文化感到厌倦了。可是像我这样的人，生活边缘上的幸存者，却十分关心。我在哈利法克斯的成长期间”——他转过身望着我，带着一丝忸怩的微笑——“你知道我梦想些什么？我常常梦见一座城市耸立在山巅——也许是雅典。城是白色的，壮观

美丽，能进入城内是特殊的荣耀。我常常梦想，假如我终生勤奋，毕生奋斗，也许有一天会获得允许，进入城中。可是现在，我看见法西斯分子在包围这座城市，城内只有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农民在坚守。由于缺乏医疗服务，他们正在死亡。所以，我的职责是什么？告诉我——我的职责是什么？”

二

我在担任政治评论员的年月里，得出了一条使一些朋友震惊的结论，这些朋友认为搞政治是一项合理的职业。我相信大多数国际危机都像大型神秘剧那样，形式类同原始的宗教仪式，民众作为观众，他们的蒙昧而又荒诞的情绪则由一伙政客操纵着。在一场政治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人的言论或想法是合乎情理或基于事实的。危机几乎都不是那些看起来与之相关的表面现象；同样，绝没有突然爆发的政治危机，危机的因素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得经过数月数年的暗暗酝酿。它隐藏在一个国家，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城市内部，点燃它的导火线常常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事物。我们不记得那时西班牙如何成了巨大激情的汇合场所。其后发生的大战——很可能由于各大国拒绝正视西班牙战事的意义——使我们大多数人忘记了当初西班牙内战曾在人们心里引起过什么反响。正是触发了许多彼此冲突的恐惧和希望的导火线，引起了远离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千万里之外的爆炸。

就在杰罗姆为沙特威尔的情妇开刀的后一天晚上，蒙特利尔城里出了一次轰动事件。事过之后，大小报纸都装做很

震惊：这样的事居然会在城里发生。但是它们没有震惊的理由，因为造成那场轰动的因素埋在蒙特利尔已经多年了。

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涉入这次事件。当天中午时分，我父母住处的电话响了，我发现是阿瑟·拉任彼打来的电话。

“我想你知道今晚杰罗姆要介绍那位西班牙坦克军官吧？”阿瑟说。“你去吗？”

“正在考虑。”

“咱们先吃点意大利面条，一块去吧。”

我们吃面条时阿瑟谈起来格外激动。他显得瘦削，饥饿，充满狂热，身上像有什么在燃烧，但同时又出奇地高兴，志得意满。如今我见到的拉任彼，中年而又走运，却死气沉沉，与当晚年轻快活的样子截然不同。

“今晚要出麻烦”他喝咖啡时说。

“什么样的麻烦？”

“你记得冬天里那个阻止共和派教士讲话的牧师吗？”

“我知道他是谁。是不是那一次他们在旅馆租了一套房间，管理人不能合法地驱逐他们，于是以断电来阻止会议？”

“不，那是另一次会议，另一个西班牙人。这位牧师命令他的信徒冲散任何倾向于共和派的集会。他宣称共和派分子是反基督的。等着瞧吧，今晚会出现麻烦的。”

市长显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到达会议厅时发现到处是警察。他们像蒙特利尔的大多数警察那样，呆头呆脑，却又和和气气，但我们进会场时必须从两个便衣中间穿过去，那两双眼睛像刀似的。

“皇家骑警，”拉任彼说。

会议厅内的气氛令人惊骇，共产党人到处都是。他们在大厅当中结成一片，纪律严密，兆头不祥地保持着缄默。厅里挤得水泄不通；除了难以预料的紧张气氛之外，看不出会闹事的迹象。不一会，六、七个彪形警察进厅来了，把守在各道门口，站在那儿木然地朝厅内张望。

突然，发出了有组织的嘘声，有人高声叫道：“哥萨克！”^①

那外国字音听起来挺怪，我吓了一跳，然而这是多余的。当天晚上大多数共产党人是犹太人，有的出生在波兰和俄国，有的是逃避大屠杀而移居来的农民后代。在这座城市的英语区与法语区的中间地带，慢慢地出现了一个可观的犹太区。经济大萧条对犹太人的打击——至少在心理上——远比对城里任何别的种族更为沉重。

我想对此说明一下。在我眼里，犹太人是文明社会的前辈。我最亲密的朋友中有犹太人，虽然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讥讽别的民族的毛病。然而，有人告诉我，不上犹太教堂的犹太人、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很容易变成共产党人。在蒙特利尔城里，不少犹太人这样做了，从而伤害了他们父母的心，这种内疚感更使他们痛苦难受。当然，那时城里的共产党人绝不都是犹太人，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激烈情绪是犹太人酿成的。谁能责备他们呢？他们完全清楚，而法语区和英语区的人却不明白，希特勒磨刀霍霍，就要向我们所有人下毒手了。

“哥萨克来了！”有人再次发出叫喊。“哥萨克！”

当主席团出现在讲台上，嘘声变成了掌声和蹬脚声，随

^①哥萨克：本义哥萨克人，用以指镇压罢工，集会等的武装打手。

后是欢呼声。领头的一位像个卖鞋的中年店员，第二位像码头水手，第三位是那个西班牙坦克军官，第四位是杰罗姆。军官那张黝黑的面膛上有一道长的伤疤，个子瘦长，目光狂热，一副斗牛士的高傲神气。会场中央那一群人唱起了《国际歌》，我朝过道张望，看见两位长老会的长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主席团的人在工人阶级的赞歌声中肃然站立，除了杰罗姆外，都高高举起一双紧握的拳头。杰罗姆见别人这样也跟着做了。赞歌完毕，场内曳然肃静无声。

卖鞋店员以平板的声调介绍杰罗姆，称他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医生，杰出的科学家和真诚的朋友，仿佛杰罗姆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一员。我一面听，一面回味杰克·克里斯托弗说杰罗姆甘心让人利用的话，我感到内心不安，凉了半截，因为事实证明他被人利用了。会众的激情影响他，他自己的鲁莽性格，面对激动场合总是慷慨而又情不自禁作出反应的习惯——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失去常态，无法控制自己。这天晚上，他说了在头脑清醒时不会说的话。乍一听来，他比那位店员更激进，更像一个共产党员，他讲的每个要点都使群情激昂，发出喊叫。

西班牙人站起来，用不顺畅的法语足足讲了三刻钟，措词刻板，举止天真，更加感动听众。他谈到在西班牙目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法西斯分子如何杀死他的父母，佛朗哥指挥摩尔人侵犯之前西班牙人民所抱的希望，尽管他使用的是共产党的宣传术语，西班牙战争的情绪感染了我们。他的态度傲慢，但也有高贵的地方。我不喜欢他，感到他要是有一朝一日大权在握，会变得残忍无情，毫无疑问，他勇敢，热情，讲求实际，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参加共产党还不

久，参加的原因是共产党人可能给他以希望。他结束演讲时高举拳头，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这时，会场中央的人群仿佛一声令下，唱起了国际纵队德国挺进队的进行曲，他们用德语歌唱，听来象是一曲日耳曼赞美歌。不等他们唱完，骚乱开始了。

骚动从扔果子开始，一只熟透的水果越过人群，啪地一声打在杰罗姆头部背后的墙上。他站起身来，翘起厚实的下巴，充满西班牙军官煽起的激情，顿时变得粗野起来，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我从未见过有谁像杰罗姆这样。西班牙人交叉起双臂，站在那儿巍然不动，卖鞋店员的脸上浮起傻笑，像很得意似的。杰罗姆却冲到台前，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仿佛在宣称：谁要找麻烦，他奉陪。我转身看见戴黑色贝雷帽的法裔加拿大学生蜂拥而入，后场的人挤来挤去。不一会，他们冲过中间甬道，直奔讲台。

“打手把法西斯分子放进来了！”有一个共产党人尖叫。

拳头开始挥舞，我听见有人用法语在叫“肮脏的犹太人”，对方则以“野蛮”、“法西斯分子”和“饭桶”回应。报社记者的水银灯直闪，一队警察在学生之后赶至甬道，开始维持秩序。三个戴黑色贝雷帽的人爬上讲台向讲话人和杰罗姆逼进。杰罗姆目光炯炯，灵活地转动身子，一拳端正地揍在一个学生的下巴上，学生被打下讲台后溜了，杰罗姆眼里闪现出快活的光辉。更多的学生挥拳上阵，把杰罗姆围在中间，他倒也勉强招架住了。这时警察来到讲台，开始拉开斗拳者。

“咱们离开这儿。”

拉任彼说着，一手指警察，一手指侧门。我还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他便消失不见了，这时候，骚乱已经被控制住，穿着深绿制服的警察正赶着人们从中间甬道经侧门走。我被揪出混乱的人群后，发现约翰·大卫教授就在身旁，他激动地说，这个晚上真有意思。街上停着几辆囚车，围着一群闲荡者，约有二十名警察，大家都规规矩矩，不作声地观看两个彪形警察把一人推向囚车。他的嘴迅速地开合，高叫如果不放开他，他要控告他们乱捕人。警察把他推上车，关好门，不理睬他。

我等在那儿，想起了凯萨琳。我感到震惊，讨厌，但又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共产党人逞过了威风，变得安静而又规矩。他们大多数从东面退出，独自或三三两两行动，只有几人还逗留在周围。看不见拉任彼的影子，我干脆把他忘了。过一会，我去问一个警察，主席团的人怎么样了。他楞了我一眼，并不回答，我绕到会场建筑的背后，看见一辆警车开到后门边，车轮后边有一个警察守着，另有两个正同三个戴黑贝雷帽的学生交涉。我用法语问其中一人，主席团的人怎么回事，他不吭声。我等了四分钟，后门一开，他们都出来了：店员、水手、西班牙人和杰罗姆，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女人，我认出是诺拉·布莱克韦尔。杰罗姆的左眼下有一块青肿，他哈哈大笑，像很开心似的。诺拉上前挽住他的胳膊，杰罗姆迅速吻了她一下，然后与其余人一齐进入警车开走了。这一切很快，不到三十秒钟。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用法语问警官。“逮捕讲演者？”

他显然认为我是记者，回答我时很客气。

“不，先生，我们在保护讲演者。”

会场里再没有什么可看可做的了，于是我也离开；但刚转过街角，便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前面，我加速步伐，赶上亚当·布洛。

“你参加了这该死的集会吗？”他问我。

“当然。”

“你这辈子可曾听过那样的大话？”他发出一声讥笑。

“哼，我对玛特尔的看法是对或是错？还有布莱克韦尔那小婊子，他像一棵树倒向她。你这会儿往哪儿去？”

“回家呗。”

“我在找女人，找那些纯洁的姑娘，今晚上看到的表演是最好的催欲剂。多切斯特街上 我花两块钱可以找一个女人，但和她们在一起，我只能说憎恨佛朗哥。”

我们分手后，我朝麦吉尔大学方向走去，直走到凯萨琳和杰罗姆住的小街。客厅没有映出灯光，我知道凯萨琳在家。便上台阶按了门铃，没有动静，我穿过小巷绕到屋后，看见她的卧室也一片漆黑。凯萨琳也许睡着了，或者只是清醒地躺着，但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灯光，杰罗姆一定没回家。

乘着下弦月色，我离开安静的大学区，朝圣凯萨琳大街走去；抬头看见街口的时钟，才十点过十分。星期六晚上的圣凯萨琳大街熙熙攘攘：失业人群拖着脚步，发出河水流动的汨汨声；有些小工可做的年青男女，手挽手从电影院拥到街上；有轨电车来来往往，街灯闪闪发光；皮尔街角散发出爆玉米花的香气；报贩在叫卖刚印出来的《新闻报》；街面上撒着纸片残屑，到处跳动着蒙特利尔闹市区到晚来的脉搏。我坐上西行的电车到父母的住处，他们还未睡，为我早

归感到奇怪。母亲询问起可爱的凯萨琳，父亲在工作凳前干了几小时后还穿着衬衫，兴致勃勃地拿出早上收到的一封电报。

“他们要采用我设计的罐头开刀，”他说，“那张护羊狗似的脸上洋溢着光辉。

“不是太妙了吗？”母亲说。

“谁要用什么开刀？”我问，他们脸上的光泽阴暗了下来。

“乔治，你是知道的。几个月前父亲给你看过他的罐头开刀。”

“这儿，乔治，看吧。”父亲把电报递给我。

我看了电报，才知道纽约的布法罗家用工业发展公司对父亲设计的罐头开刀至少发生了兴趣。

“这一回，我决心弄简易而又离不开的玩意儿——人人需要的东西。”父亲笑着说：“我是在一份杂志上读到金·吉勒特时受到启发的。你知道这位造刮胡刀片的人。他有一个理论：发明人们一旦使用就离不开的东西，而且这东西很快就坏，得随时替换。现在瞧瞧我的罐头开刀。想想你们常常外出野餐用过的老式开刀，开得缺缺凹凹的像锯齿一样，还会划破手。等着——我就拿来给你看。”

父亲立即钻进卧房，拿出一个玩意儿，看上去像中型的旧式电工刀，掰开就成了一柄开刀，但与固在墙头的开刀不同，它支在一个三脚架上，能在地面使用。

“如果你不生气的話，父亲，我说这玩意儿有些不结实。”

“你刚好说到点子上，故意不让它结实的。用一两月之

后，它就会折断或者变弯。但在它使用期间，它凿起罐头皮来同吉勒特的刮胡刀片一样灵，家里一旦有了它，就会永远少不了它。”

突然，我感到筋疲力尽，从沙发上抬起头，递回那机件说：“太好了，父亲。”

“你真这么想，乔治？我看重你的意见，不是言不由衷吧？”

“我确实认为很好。”

“我心里一直明白，你父亲很了不起，”母亲说。“我知道他迟早会被承认的。”

“可那把弩弓怎样？”

父亲笑了。“哦，那！我长大成人后就把小孩玩意儿扔到一边了。”

他拥抱妻子，亲吻她，好像他们刚结婚似的。我道声晚安，就寝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正午前我到了玛特尔的住宅，发现凯萨琳穿着室内宽大便服。她找了个借口叫莎莉上楼去，以便我们单独交谈。

“我猜你昨晚去那儿了吧？”

我点点头。

“自然，我没去。几个月来，他那些集会我一次也没去过。也许我应当每会必到。问题或许就出在这儿。”

“杰罗姆今天好吗？”

“无从知道，没见到他。”

“你是说，他没有回家？”

“半夜时候他打电话回来，说他没出问题，但得照顾那

个西班牙人。他叫我睡觉，好好休息。我几乎通宵未合眼。”

“会后我到这儿来过，”我说。

“我想按门铃的是你。”

她站起身，在壁炉台上摆放玻璃器皿，背对着我讲话。

“我父亲很博学，我小时候能背诵他喜欢的一位古希腊诗人的一首诗，说到蜻蜓翅膀翻飞。”

“像蜻蜓翅膀翻飞，变化如此疾速”，我说。

“你也知道这首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凯萨琳？”

她仍然背对着我，说：“只需要给我一颗正常的心脏，给我足够的力气做一个正常的女人。”

我盯着地板没有吱声。

“近来我一直在读《圣经》，”她说。“你知道第九首赞美诗吗？”

“不知道。”

“没有谁再读它了，我想。人们应当读。‘您把人转向毁灭，说道：回来吧，你们这些人类之子。’是的，我们的所有天日的确都用在生某人的气了。唔，乔治——”她转过身，正面对着我，整个面孔堆满痛苦，同时又十分美丽。

“我想你现在该走了。”

“凯萨琳！”可是我也站起了身。

“是的，你该走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她一双大眼直视着我。“昨晚布莱克韦尔的女人去了吗？”

我想撒谎，但对凯萨琳撒谎没有用，于是我点了点头。

“她以一个共产党人或是以一个女人的面目出现？”

“我应当说，两者兼备。”

我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讲台上的情形，讲到杰罗姆和主席团的人被载走。

“她很能吸引人，感动人，”凯萨琳说，“尤其对于热心助人的杰罗姆式的男人。他坦率地和我谈起过她，希望我喜欢她。当然，他希望这样，可怜的人。”圆通地一笑。

“有时男人在我看来如此陌生，也许我们在他们眼里也一样。然而——从她的举动和他对我讲的话来看——我担心，他会懊悔转向她的日子，因为她不能用正常标准加以衡量。我告诉你，她的心理不平衡。我想杰罗姆第一次与她相爱后不久就会厌倦她。但愿他不会感到对她负有责任就好了！可是，她一定会千方百计使他这样。”

我点燃一支烟，凝视着窗外，好一会我们谁也没吭声。

“唉，”她最后说：“假若他一定要去西班牙，他是非去不可的。我知道他真心诚意。为了我们的尊严，我希望那女人从我们眼前消失。人们会说他是因为她而去的。他对我说，当千千万万的人走向死亡的时刻，个人的生活算不了什么。我想他说得对，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我所理解的只有个人生活。”

然后，她很简明地说：“杰罗姆和我爱得太深了，我未能让他休息。他需要休整，这个冬天我却使他失望。一个人老在伤害别人又被别人伤害，这太令人厌烦了。一个人总在苦苦思索，太莫意思了。”

我从窗口望去，街上空荡荡的，只见一只猫在路边做洗脸的动作。

“那女人伤了我们的尊严，我怨恨她。”凯萨琳说。她

耸耸肩膀接着说：“但杰罗姆还未意识到这点，我为什么要理睬呢？他把我置于被动地位似乎还不知道。他令我爱莫能助。如果我把那女人的真相——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真相——告诉她，我岂不是只会被人视为一个好嫉妒的女人吗？我怎能叫他别对她产生内疚感，当他对我也感到内疚的时候？”

“他真像那样糊涂？”

“我自己也够糊涂了，怎能责备别人糊涂？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你认识的人中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的为数不多，我似乎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人由于是理想主义者，才与他们搞在一起，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憎恨。我不能接受杰罗姆对他们的看法，现在我甚至同他谈不到一起——由于那女人的缘故，她也是一个共产分子。女人要横了心会令人畏惧，而男人要对女人献殷勤会很可怕。”

她站起身来，高昂着头，娇小的身材似乎高了许多，她说：“尽管有这一切，我想再作一次努力，同这糊涂人谈谈。可是我不想伪装自己赏识共产党人。”

她走到门边，转过身来说：“乔治，现在你得走了，他很快会回来。”

我咕哝着说：“我不相信他与诺拉一起过夜，他只是同讲演者离去后谈个不完，没有回家。”

她微微一笑，使我觉得像个小孩：“我懂得爱与性之间的区别，乔治。我知道他对诺拉的感情——除开正常的欲望——是怜悯而不是爱。”

下一周的星期一早上，我在滑铁卢的饭堂早餐，旁边坐着麦克尼西，我从晨报上读到：星期六晚的骚乱使蒙特利尔

的公众舆论哗然，引起公众义愤的真正原因不是那个西班牙人、那群学生或者会众中的共产党人，而是杰罗姆的出现和他所扮演的角色。

蒙特利尔是一座难以理解的古怪城市。外来的陌生人永远无法窥视她的本性，甚至从加拿大别的一部分移居来的人家，两代之后也不了解她的实质。我敢说，蒙特利尔是北美最难以捉摸的玄奥城市。由于历史原因，只因为如此她才得以维系至今。两个多世纪以来，住在这儿的法国人、苏格兰人和英国人，总在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哪管国家存亡或文明兴衰，但在表面上却又努力保持着和谐。这也非偶然，他们在骨子里懂得某些准则。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蒙特利尔人，我对那晚杰罗姆出现的集会感到震惊，虽然它的目的显明，我也抱着同情参加了。现在，当我从星期一的报上读到有关报道，我为杰罗姆和凯萨琳不寒而栗。对于卖鞋店员，码头水手或高喊“哥萨克来了”的群众，这篇报道不大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是局外人。但杰罗姆，无论他在多大程度上自视为外来人，却不会轻易被放过，因为他属于城里一家最受尊重的机构，而医生这一行自奥斯勒的年代^①一直被视为崇高的职业。以杰罗姆在比米斯纪念医院的地位而论，不管喜不喜欢，他至少居中。假若他生来是蒙特利尔人，也许能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但他并非土生土长，因此我相信，现在他仍然蒙在鼓里。

这天早上的报纸异乎寻常：专门报道一次地方骚乱。我明白这是报社的精心安排，有意向杰罗姆本人宣战。他们不

^①威廉·奥斯勒爵士（1849——1919）加拿大著名的内科医生和医学教授。

仅在头版上报道骚乱，而且用了第三版大部分来刊登有关照片，那些照片叫我凉了半截。有一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玛特尔大夫举起捏紧的拳头致意。”许多人在会上这样做，杰罗姆只是仿效别人罢了，我记得这张照片的情景。杰罗姆举起拳头是由于肇事者向他冲去，他正举起拳头朝他下巴揍去。另一张照片以讲台为场景，警察、学生和讲演者乱成一团，杰罗姆出现在混乱的中心。这张照片比第一张更糟糕，因为它显示了一些令人难堪和有损尊严的细节：杰罗姆眼里闪烁着战斗的喜悦，旁边站着那位西班牙坦克军官，愁眉不展，阴阳怪气。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有诺拉·布莱克韦尔出现的一张：诺拉挽着杰罗姆的胳膊，得意地仰望着他。我不知道她怎么窜到他身边的，但我猜她在台侧听演讲，武斗开始时，她跑出来站在自己的英雄身边。

最糟的是头版上的报道内容，撰写者署名为欧文·达布林，我知道他是一个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人，他的措词向人表明，杰罗姆不仅是一位对西班牙共和派感兴趣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医生，而且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意识到这是达布林别有用心，以此进一步孤立杰罗姆，从而把他赶入共产党的怀抱。

我翻到社论页，不出所料：一篇恶意中伤的说教，居然质问：一个像玛特尔大夫那样受过教育、具有社会地位的人，怎么可能让自己与这桩不光彩的骚乱联系在一起。我读着这些，为没有尽够责任而感到内疚，因为我了解蒙特利尔这座城市，早该警惕他别上当。我早该听信杰克·克里斯托弗的话，他也了解蒙特利尔。我应当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即使只是默许他那样干，听之任之而已。

我必须等待两周才能知道事后的影响和细节，因为那个周末该我值班。每天我翻阅报纸，不见下文。他们的沉默也典型地反映了蒙特利尔处理这类事件的策略：重炮猛攻一阵之后，报社大员们便让它沉睡，只发表几封对杰罗姆的行为表示惊骇的读者来信，但支持他的文章一篇不登。然后，便不再过问这整个事件。

等我终于进城后，我首先打电话找杰克·克里斯托弗，他在家，请我上门去。然而他讲的细节似乎并不重要，大体是这样的：

罗杰斯大夫星期一早晨从底特律返回途中，在火车上早餐时读到了骚乱的报道。我不愿对这位老人的感受妄加揣测，但我相信他的感情绝不简单，也许他尝到一种苦乐难分的滋味。杰罗姆终于落入他的掌心了，但他出身于蒙特利尔的古老家族，法官的儿子，年轻时曾在威廉·奥斯勒手下工作过，他受的是贵族教育，本质上是个贵族。我不相信，像罗杰斯这样的人会觉得有必要向杰罗姆或加拿大的任何人表明自己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时他怒不可遏，甚至责备自己没有早采取措施防止杰罗姆出这种事。

可是这纯属揣测，我从不了解罗杰斯大夫，我所知道的都是道听途说。

按照杰克·克里斯托弗的说法，罗杰斯直至十点左右才回到医院，这时董事会主席鲁珀特·艾恩斯爵士已经两次打电话找他。罗杰斯知道艾恩斯想干什么，即使在这种时候他还是往日的作风，不理睬艾恩斯的要求，拒不一到医院就与他联系。在罗杰斯的头脑里，艾恩斯无论多么富有，毕竟是个暴发户。这位老外科医生到了办公室，读罢桌上的信件，

口授了几封回信，照例去病房查巡一遍。

在查房过程中，他才发现骚乱的前一天晚上，杰罗姆为莫法特夫人动了手术。他立即询问克劳福德大夫，这时他已排出肾结石，尽管还在病床上休息。从克劳福德口里得知细节之后，罗杰斯回到办公室，读了病情报告后立即传话：他希望在玛特尔大夫方便的时候尽早见到他。杰罗姆当时正在手术室，将近中午两人才见面。

以杰罗姆感知对别人造成了损伤的敏悟，马上明白老外科医生由于莫法特的手术深感耻辱。我不知道罗杰斯在第一次手术中的差错，但显然出了什么纰漏。

杰罗姆立即表示出善意——这是他性急好斗的另一面，做出第一个姿态。

“请你别想这次手术，”他说，“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我自己也有过一次。”

这几句话，杰克告诉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一位年资更高，更有经验的医生，说得最不得体。

老医生盯着比他年轻的人，憎恨他，说道：“既然这个病员已从我手里夺走，我们不必再议了。”

“但并不是夺走。”杰罗姆最温和诚恳地微笑了一下。“我只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临时填补。”

“不必再议。”

这时罗杰斯大夫拣起早上的报纸，从桌上往杰罗姆面前一推，审视着年轻医生的面孔。

“是的，”杰罗姆说，“我已经读过了。”

罗杰斯继续注视着他，杰罗姆意识到无法缓和的怨恨，不禁发火了。

“我在医院外的作为是我个人的私事，罗杰斯大夫。我恰好不相信医疗是神圣的职业。那次集会涉及当今世上最重大的问题。瞧，德国发生了什么事。科学家、教授、医生——他们大家恪守职业，袖手旁观，将抵抗的大事让与少数工人和失业者。现在瞧吧，他们怎么样了。”

老医生抬起眉头。“这儿不是德国，这是在蒙特利尔。我们这儿没有纳粹党。”

“没有？”

“我数了数，这所医院的名字在今天早晨的报上出现了五处。恐怕你业余的作为与本医院大有关系。”

“引起骚乱可不是我们。”杰罗姆突然像小学生似地谈话。“那是受法西斯欺骗的大学生干的，他们进来斗肇事之前，会议一直秩序井然。”

经过一会默不作声的思索，老医生把指头放在杰罗姆演讲的一段话上。

“你真的讲了报道中所写的那些话吗？”

“我记不清讲的每个字，这与报道中说的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摘下眼罩，就会明白我说的是真话。”

“你既承认演讲的内容，还说那是秩序井然的集会？那是最狂妄最武断的结论，煽动性的指责。无论在什么场合，搞科学的人都不应当说那样的话。我不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把你带上法庭。”

杰罗姆看着他，说道：“你以为闭目塞听就可以制止法西斯？”

老医生也正视着他：“我们不必争论。武断的结论已经够多了。我们只读一些事实。”他的指头落在一张照片上。

“这个青年女人一直是本医院的护士，是事实吧？”

“不错，她是布莱克韦尔夫人。”

“请问她混在这伙人中间干什么？”

“这难道不是她个人的私事？”

老医生往椅背一靠，打量着杰罗姆。

“是什么在支配你？你一向粗暴放肆，但我把它归于你的脾气，你的出身背景。你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外科医生，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说：“我很尊重你的妻子，她的家庭我早就了解。”又是一顿。“我是一个旧式人物，你在这儿的走廊里不止说过一次，甚至有些勤杂工也听见了。我不希望家丑外扬，只要不招惹起庸俗的议论，我愿意对不齿的行为闭上眼睛。可是——”他的指头再次指着照片——“你不仅把自己的丑恶暴露于众，事实上把它抛到了新闻记者的镜头前面。”他那张苦行僧似的面孔直对着杰罗姆，杰罗姆的脸红了。“这桩典型的丑事，玛特尔大夫，再也不许和本医院联系在一起。”

杰罗姆蹦了起来：“收回这话，罗杰斯大夫。”

老医生沉静地打量着他，说道：“不，我不会收回。那是深思熟虑的声明。我还可以更加直截了当。通知你，布莱克韦尔夫人已经从本医院的护士名单上除名了。她也许会发现，到别的任何地方供职也很困难。”

“那不是她的过错。你对她不公平。她需要这份工作才能生活。她介入那场骚乱的情形同我一样。她有什么错？”

老医生盯着杰罗姆说：“我已经接通知，鲁珀特·艾恩斯爵士希望立即会见我。我能猜出他要讲什么，提出什

么要求。迄今我还未同他照面。”停顿了一下。“我是个旧式人物，玛特尔大夫，我刚才已经提到。不过这是违背我的信条的：医院、学校或高等学府让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接受商人的指挥。”又一次停顿。“我不喜欢你，玛特尔大夫，其原因你恐怕没有想到。你们这种人把上司置于无法接受的地位。我保护了你整整两年——不是为你，而是为了信守我的原则。但你一意孤行，继续与我作对。而且，你有意这样干。你这样干，因为你为制造麻烦而感到开心。”

“简直荒唐！”杰罗姆说。

“是吗？请你仔细考察一下形势。如果我裁掉你，我会遭到你和你那些共产党朋友的诋毁。你会指责我是资本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你会声称——你说得对——你在这儿的工作无可指摘，还会补充说，你的个人生活是私事。但是这种宣传——”他的指头又弹在报纸上——“旨在破坏整个社会秩序。你能抵赖吗？”

“当然不承认。你以为——”

老医生挥了挥手：“医疗和科学对我说来是神圣的，对你也应当如此。任何医务工作者或科学工作者都不可染指这——这庸俗肮脏的勾当。”

杰罗姆沉默了一下说：“我不会责骂你，如果你要求我辞职。相反，我主动提出辞职。我很遗憾，因为我在这儿的日子是愉快的。我想我工作得不错。你为我做了许多事，我感谢你。我从未想过与你为敌，但你生活在另一个与我不同的世界，而且我认为我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老医生坐着不动，然后耸耸肩说：“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但既然没有，现在我就不同你握手了。我叹息你的性

格，你的行为，你的信条——或者说缺乏信条。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的前途应当是远大的，可是现在永远失去机会了。我接受你的辞职，我将告诉董事会，这不是我要求你而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已经把自己毁了。”

这就是杰克·克里斯托弗给我讲的故事。他讲完后，我问：“他真地毁了自己吗？”

“在蒙特利尔当然是的。这之后，他无法在这儿的医院再找到职位。他是外科医生，一个外科医生离开了医院——他毁了自己，甚至在整個国内。”

“他将怎么办？”

“我只能猜测，而且不喜欢所猜的内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用得着我明说吗？除了到已经俘虏了他的人们中间，他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该死的女人！她毒害了他，我能毒死她就好了。”

“杰克，”我说，“我不认为那女人与此有何重大关系，没有她，他也会陷进去的。”

他厌烦地说：“我想你说得对，可是人们不会这样说。他的确让自己和她搅在一起了。我想以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但也有可能，他身上的动物性不少。”

“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少动物性，不是吗？”

杰克怨恨地说：“好啦，让诺拉见鬼去吧。可是这桩事，照你们这些人的认识，像一种疾病。杰罗姆染上它病倒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他停了一下。“你见到凯萨琳了吗？”

“已经两周未见面了。”

“我也一样，没有勇气见她。你知道杰罗姆在哪儿？”

“我正要问你呢。”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凯萨琳同莎莉上北面的湖边去了，现在她该在那儿。”

“我明天上那儿去看她。”

“那么最好借我的车去。我得去纽约过周末，不需要用车。”

三

四月转五月，天地更显得光明晴朗：阳光暖烘，空气还冷飕飕的，硬木树开始吐露新芽，原野上绿色的臭松映衬着深翠的云杉和枞树，新绿的大地轮廓鲜明，像是运动员健壮的肌体。水冰凉冰凉的，横跨圣罗斯桥面时，我看见河水涌向蒙特利尔岛的北湾，水流平顺像海蜇的背面。十点钟的太阳，差不多有些热力了，然而空气还充满凉意，只有照晒着阳光时才暖和。跨过一道雪融的河水再往北去，从山上消融下来的水流带着一股雪的气息。我开进劳伦琴地区后转入一道山谷，再经过一个U形转弯，开上一条云杉和枫树环抱的小道，最后滑下几步黄褐的踩踏路面抵达了别墅。我从车内钻出来，便听见枞树林间飒飒的风声，我真希望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听百鸟在凌晨歌吟。湖面上微波荡漾，丛生的蕨草吐出细长的新茎，延龄草像白色的星星隐在树下，凯萨琳五年前栽种的水仙花，迎风摇曳像一群金黄的舞女。沿着陡峭的湖岸望去，我看见湖滩上杰罗姆那只独木舟的红色侧翼。

凯萨琳独自坐在游廊的躺椅上，眺望着远方。

“乔治！”她叫道。她没有起身，只握着我的手，示意我在旁边的空椅坐下。

我坐下来，隔了好一会，彼此没有讲话。

之后，还是她先开口说：“看着这片景色，我都忘却自己了。瞧，瞧。一两周内我就要开始绘画，学习绘画。”

“你感觉好吗？”

“如果能绘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感到无所谓。杰罗姆喜欢说，‘你必须干些超出自己的事。瞧，我们面前这片风光。好好欣赏吧，乔治！’”

沉默。隔了一会儿，我喃喃地念起一行诗：“一代去了一代来，大地春常在。”

“我不懂那些大变化，只瞧见微小的人影通过眼前的视野。我从未发觉大地这样耐看。”

“你身体好吗？”

“我自觉不错。昨天我搬动的东西太多了，弄得挺累，可是湖那边的斯蒂文生家用车把莎莉和我送到这儿，还帮咱们解开行李。他们太好了，杰罗姆原先喜欢他们，但他们属于保守派，现在他自然不喜欢他们了。他还在城里。我想今天下午他会来。你知道他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吗？”

“杰克昨晚对我说了。”

“可怜的杰克，他被这一切弄得十分不安。他头脑清楚，总是有条有理，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医生，但绝不会又是一个杰罗姆，他不能允许自己像杰罗姆那样行事，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还是我打破它。

“你们要不要离开蒙特利尔？”

“我不会离开。不，莎莉和我将呆在我们的老地方。”

“杰罗姆呢？”

“喔，你知道，那次集会后他不可能继续在这儿行医了。那女人在会上扮演了如此可爱的角色，不是吗？她在报上的那张照片显得多气派。我想他会去西班牙，那次集会后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去就去吧。”

她就那样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但话语下面的情感深不可测，因为她的语调只是表面听来干脆利落，明朗痛快。

她微微一笑，这笑容我无法描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身，但就在他作好安排之后，包括把他原有的病人移交给别的医生。”

“亲爱的凯萨琳——我憎恨这一切。”

“我也一样。我烦死了，但事情就是如此，我嫁了一个性情冲动的杰罗姆，难道你期望我未来先知，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他会回来的。”

“当然，他是这样说的。这一周他一直很兴奋，真够狂热。我上次见他时，他使我联想起我认识的一个参加过牛津宗教改革运动的人。和罗杰斯大夫闹翻之后有好几天，他精神萎靡不振，可是你是知道杰罗姆的，他一旦明确了下一步该干什么，马上又会蹦起来。”

我凝视着晴朗的原野，极力迫使自己相信听见的一切都是真的。

“无论如何，”我说，“只是去西班牙的问题了，那女人与这毫不相干。她不会跟着他去，对吗？”

“当然不会，”她说。“但干有损尊严的事，她的确具

有才能，你不这样认为吗？”她平静地继续说：“但愿下一周，下两周，无论将会拖多久，快快过去，让事情了结。杰罗姆和我一起度过了多美好的年月，我们彼此深深相爱，他离开前的这段时间多么难挨。那之后呢？”微微一笑。“莎莉和我总会设法生活下去的，唯愿他的日子抵得过我们的一半就好了。”

我极力考虑实际，问她经济上怎么办。

“够过一些时候，杰罗姆说，眼前医院的这笔糊涂帐将来不会碍事的。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换换新鲜空气，称之为天赐洪福；因为这样一来他别无选择，反倒促成了他神圣的西班牙之行。他深信，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下一年或者后年。那时，医院的这场混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默默地凝望着四周鲜明的景色；形状、颜色、光线和阴影——对农民毫无价值；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突起在那儿，青葱，嫩绿，从古至今没人理会，持续不断，无穷无尽，谁能领会其用意呢，但它们总展现在那儿。

“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相信的，”我说。

“我也一样。奇怪，竟不知该相信什么。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得这样生活下去。”

“他爱你，我相信这一点。”

“那还用说。我对他的爱是你难以理解的，因为你没有结过婚。在过去的年月，我们鬓角相磨，心心相印。当然我不了解他。不过我认为，我对他的了解胜过他对我的。然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愈长，彼此愈是成了一个谜。作为男人和女人，我们彼此充分了解，但那有什么意义呢？也许那正是他变糊涂的原因，他的确糊涂，眼前他并不真正在思索，

只是像个梦游患者那样往前瞎闯。”

“杰克说那是疾病，他中了邪。我知道他的含义，我自己也差点儿中邪。”

“我们都成了大傻瓜，我们所有的聪明人。我们深信自己什么都懂，满认为知道一切答案。我们不像那般筑室沙上的人，而像另一种人，十一月拆掉四壁，到冬天只好八方临风。结了婚真难，难于长此下去，连过日子也难。现在我们必须边走边立些新规矩，而这样做太烦人了。要是维持旧框框，自然会更省事更可靠。”

莎莉的声音在游廊下面叫喊饿了，凯萨琳正好乘势结束谈话，起身进屋去准备午餐。我走出游廊，让莎莉领着我去看屋角边的一小片苗圃，那儿有几株黄水仙在风中摇曳。

“这是我种的，”她说，“我去年种的，爹说它们比妈种的还漂亮。”

“噢，亲爱的，它们真是可爱。”

“爹什么都知道。他下午要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和爹一块儿好玩极了。”

杰罗姆真的驾车来了，五点半到达，眼光明亮，粗糙的面膛流露出一些疲乏。他看见我时既惊异又宽慰，因为这个周末很难说是他所期待的。我不知道他与凯萨琳之间说过什么话，但我明白这个倔强的人很敏感，触觉十分尖锐。

杰罗姆到达时凯萨琳在楼上休息，莎莉刚睡过午觉，独自在林间玩耍。杰罗姆长摊在椅子上，我坐在他旁边。

“凯特对你说了我决定去西班牙吗？”

“说了。”

“一切准备就绪，轮船下星期五起航，先到南安普敦，

花两周时间在伦敦安排停当，然后乘货船从伦敦码头到巴塞罗那。”

“你是不是要加入白求恩医疗队？”

他摇了摇头。“我不加入也一样，因为他与我的情况相同——不，我们这个医疗队除我以外都是英国人，全是外科医生。我们为前线服务，无论去哪儿，由他们派遣。”

从侧面看，他显得疲惫，但他兴高采烈的兴奋劲头使他的面孔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吸引力。

“你计划在西班牙呆多久？”

“整个阶段吧，我想。现在，喝杯酒怎么样？”他进屋去，端来两杯酒。

“这儿五月的水香甜极了，掺入威士忌真是可惜，不过这威士忌也满不错，上帝作证，喝惯了，已经成了必需品。”

我们一边啜饮，一边望着湖面，这时西边伸向湖面的高大岬岸在沿湖一线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太阳仍然辉照，但已偏向西山。风停息了，空旷的北边一片沉寂，万籁无声，只听见一条涓涓细流淙淙有声地穿过树林注入湖里。除了这淙淙水声，我们周围这片宁静一直延续——北面到达北极圈，往西直抵哈得逊海湾。一只知更鸟猝然落在一块肥沃的地面，站在那儿谛听小虫的声息。

“明天我想栽种些东西，”杰罗姆说，“春天里干些脏活总使我感到愉快。但现在有什么用呢？凯特喜欢园艺，她在这方面比我强多了，如果我栽种，她就会尽心地培植管理。多可爱的女人。你知道她学过植物学吗？但她太精益求精了，要是我在园子里栽种——麻烦就出来了，她会忙个不停，直弄得尽善尽美。天啦，乔治，我要按自己的面目生存

真不容易。”

我们沉默了一会，然后我说：“你会怀恋这个地方的。”

他尖刻地四顾了一下之后，眼睛模糊了：“你认为我是个坏蛋，是不是？”

我摇摇头。

“你爱着凯特，你认为我要抛弃她和莎莉，对不对？”

“我没有那样说。”

“可是你是那样想的。像别人一样，你作了词语的奴隶。抛弃，听起来真难听，但谁也不欠谁什么。你认为你算老几，这样超脱清白？要按我自己的面目生活是不容易的。凯特和我共度了一些美好的年月。你有什么资格来裁判？”

“我并不在裁判，杰罗姆。”

“噢，是的，你在，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裁判。你读过一本叫《福克斯殉难记》的书吗？”

我跟不上他的思维的跳跃，摇了摇头。

“我的父亲，我指我的继父，是我知道的最温文尔雅的人，也许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他嗜好甜酒，喝了不少。哈利法克斯城里有个老走私贩，曾经帮过他的忙，这老酒贩常常深更半夜用木桶把甜酒运到他的住宅。我们的地下室里总摆着一桶酒，父亲老溜下去喝一口。”

“我的母亲温柔可爱，心地善良，对此很懊丧。父亲没有真正喝醉的时候，但也总不是很清醒。母亲怨恨他喝酒，但了解他为什么非喝不可。直截了当地说，他喝酒为了敬爱上帝，因为只有当甜酒下肚之后他才感到自己与上帝接近，深信上帝爱他。父亲那样做是不容易的。小时候他的父亲让

他吃了不少苦。幸好我的母亲不是求全责备的人，她爱他，理解他，并不期望她所爱的人尽善尽美。她接受他喝酒的现实，因为那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她从不抱怨唠叨或设法匡正他；即使医生告诉她，他可能会死于肝硬化，后来他的确是的。即使她一清二楚，人们讥笑他，指责他，因为在一般心胸狭窄的人看来，牧师喝酒是桩可怕的事；即使我们在那穷教区里贫困不堪，她知道他无法戒掉，或者把那看成他的习性，她从未打算改变他。她接受现实，乔治，正视现实。”

“凯萨琳没有接受你此刻的现实——这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

一阵痛苦掠过他的面部，他埋头看着脚。过了一会，他继续说：

“我开始时谈到《福克斯殉难记》，我父亲——温和的基督徒——在我十三岁时给我读那书，实际上是一本严刑折磨人的大全。不过，应该写成书，他作得对，把书给了我，因为它是真实的，包含着许多关于人性的真理。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教士，认为耶稣既然惨死在十字架上，发明更残忍的酷刑来惩处犯罪者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他们的确挖空心思，才发明出那些凶残的刑法。嗯，我常常半夜醒来，头发倒竖，由于看了那本书。我仿佛目睹了那所有的酷刑。我奇怪的是，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当他明白那将会付出什么代价。然后战争爆发，我目睹了那场毫无意义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杰罗姆停住了，用炽烈的目光瞪着我。

“认真思索这个——法西斯分子重新带回了折磨，将使

许多人被严刑毒打而死。什么是法西斯，难道不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吗？”

“什么意思——折磨造成死难者？”

“正是。除非一个人昂首挺胸，敢于正视折磨他的打手，并且说道：‘我毫不畏惧，’折磨将横行于世。道理就是这样明白简单。”

“真是那样简单吗？”

“不。”他不耐烦地摇头。“不，归根到底，这个腐败的世界上到处进行着明目张胆的经济剥削。共产党人是唯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你怎能装做不承认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当他们在这样的关头声称个人的性命微不足道？德布斯不是讲得很对吗？他说：只要监狱里还关着一个人，他就不是自由的。在这架天平上，一个人的婚姻有多少份量？要按我自己的意愿办事不容易。我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含义。隐藏在人这个动物内心的邪恶——法西斯分子正在引导出来，像引眼镜蛇出洞一样，而资本家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企业有好处。你认为我去西班牙是抛弃莎莉。告诉你，倘若我不去西班牙，那才真是把她扔向法西斯和它的集中营。”

这一席话从杰罗姆口里倾述出来像岩浆在火山爆发时迸出。我暗自思忖，凯萨琳以她脆弱的心脏得和这样巨大的力量生活在一起，而这巨大的力量又得和那她脆弱的心脏共存。

“杰罗姆，”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仅仅是单枪匹马，除非政府采取行动，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这样做明智吗？”

他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自己濒于灭顶之灾，我以前感受过他的力量，但绝没有这样咄咄逼人。过了一会，他却微微一笑，带着令人惊异的没有料到的温存，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膝头。

“乔治，你是个很善良的人，我要说几句你会认为带侮辱性的话。正因为善良，你不知道反对。像你这样的人——让你们自行其是会成为人家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剁成肉酱。你不好斗，我也一样。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搏斗，而我知道。但愿我像你就好了。我真的这样想。我并不好斗，乔治——告诉你，我不想去斗。我憎恨体内促使我好斗的东西。可是与此同时。”——他凝望着湖面——“与此同时，让我告诉你，“任何文明都毫无希望，除非它拥有能够并且乐意为之战斗的文明人，当他们不得不进行战斗。”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我开始说。

“你一直思考的是凯特。可是我感到奇怪吗？”他灼灼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又黯淡下来。“绝妙的女人，她爱我。她也是一名斗士，和她的命运斗，乔治。而且她一向是女人，这就是说 她只管个人和家庭琐事。我要背叛她吗？”耸耸肩。“说实话 乔治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从他的侧面看去 他的心思飘在湖上。杰罗姆喜爱罗伦琴这片土地巍峨雄壮的景象 它能从他胸间唤起反响，而对于我却没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喜欢更坦平柔和的原野，有花圃有果园。这时日已西斜，群山的姿影投在东边的湖面，被太阳烘暖的云杉和周围宁静空旷的土地散发出清新宜人的气息，我暗暗在想，离开这个使他赏心悦目的地方，他一定是十分难受的。

他缓慢而又沉重地说：“一个人必须归属于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标，必须倒向它。当人们还能对上帝抱有信仰的时候，归属上帝最为便当。上帝如此遥远，如此安全。”渴望地一笑。“现在除了人们自己，再没有别的。在俄国，我们这一代正在主动地为孩子的未来作出牺牲。因此，俄国人是生气勃勃的，是幸福愉快的。他们不想靠死亡的神话生活。”

我没做声，我的思绪回到了诺拉·布莱克韦尔，杰罗姆——他身上最富于动物性特征的是他导体般的敏感——突然使我大吃一惊。

“你认为我是个伪君子，是吗？”

“我什么也没说：杰罗姆。”

“可是你心里在想：难道诺拉与此无关？”

“既然你问起，我不认为她起了作用。”

他抹了一下眼睛，呼吸吃力地说：“上帝保佑，愿我从未瞧她一眼。”

我没有答话。

“我不是色鬼，照世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我不寻找借口。但是，或许你能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我这样的人不感情冲动？”

我一时没有说话，隔了一会我才问：“你觉得对她是不是负有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的，我有。我猜你在想眼前这事与她的关系——事情已经过去，压根儿没多了不起——你认为它掺杂了我的动机？”

我没吭气。

“诺拉温存和善却又烦躁不安。啊，得啦！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西班牙。她影响了我的动机吗？我的动机与她有什么相干？”

我没有答话，他仔细打量我的表情，耸了耸肩膀。

“我想的确相干。我充满活力，能有什么办法？可是我的动机明摆在那儿，与诺拉本人没有关系。”

“我在考虑凯萨琳。”

他盯着我，脸上露出深沉的痛苦：“你以为我没有考虑？上个冬天，她想用她的意志来阻止我，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我考虑的是她的健康。”

“你是医生吗？你是她的丈夫吗？她和我——我们彼此打下了烙印。”

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杰罗姆驾着独木小舟沿新不伦瑞克的激流而下，凯萨琳正在岸边招他回来。

“我们都是不幸的受害者，”他说，“她和我。”

“可是你正要离开她。”

“我唯一能做的是勾销我的生命。我明知道她心脏的状况，我娶了她，你却没有。你没担起——究竟什么是生与死？我在为重病号开刀的时候，想的不是在拯救生命，而是让他多活几年。如果病人还年轻，也许活的年头更多一些。但在许多情况下，我在争取五年或三年，甚至一年。”

我坐在那儿不答话，他又说，“只有人类才是不朽的。”

“谁能爱那样博大空泛的东西？”

“爱情与我刚说的内容无关。”

“诺拉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去西班牙？”

“就我所知，不。我的天，你竟然抱着中产阶级的心理！你以为这事儿能那么庸俗吗？”

要是我年纪大些，或者阅历更为丰富，也许能站起来同他争辩，可是那时我没有勇气反驳一位被自己奉为父亲的人。而且那会是与当时整个风气作对，这种风气在我身上也部分地存在着。对于不满现存社会，自我放逐的人来说——我们多数人都至少部分地这样做，志愿奔赴西班牙具有特殊的魅力。我撑起身来，离开椅子站到栏杆前面，背对着杰罗姆。俯视荫蔽的湖面部分，我再次暗暗纳闷，他怎么舍得离开这一切。我记起亚当·布洛对我的看法，我是一个中产阶级分子。杰罗姆刚才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多么渴望家园和家庭，一旦遇上这样的机会，我会为了获得它们而放弃别的一切。

我听见凯萨琳下楼梯的脚步声，盼望着她出现，但脚步声往屋后的厨房去了。

“我想该回城去了，”我说。

“别走，乔治，在这儿过夜。”

“今晚上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杰罗姆。”

“是，这将会是你呆的地方。”过了一会，他轻声地说：“我走之后，你照顾凯特，愿意吗？”

我正面看着他：“她不是我的妻子。她是你的妻子。她不用我照顾，她需要自己的丈夫照顾，她需要自己的家。”

这一天他的面孔首次变得迷惑，他呼吸急促，我想终于击中了他的要害。他下面说的话，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在凯特该嫁人的时候，我对她说了‘是’。如果不

说，她一定会受不了，完全垮下去。诺拉嫁了个鲁钝的傻丈夫，她认为自己会发疯。我对她说了‘是’，也许我给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也许没有。要想事事正确不难。也可能我做错了。是的，我感到困扰。是的，我感到内疚。是的，是的，对一切都承认个‘是的’。但是让我告诉你：每个人从另外的某个人那里有所得，又将其所得给与另一个人。多年前凯特把从你那儿得到的给与了我。这些年来她从我这儿得到的——如果我死了或者与她断绝关系——她又将给与另一个人，而我从她那儿得到的”——他住口了，目光掠过湖面。

“你自己呢？”

“我已经把自己勾销了。”

“为什么？凯特并未勾销你？”

他望着湖面说：“我疲倦了。”

我喝下杯里的最后几滴酒，打算起身去向凯萨琳告别，但他叫我回来。

“在你走之前，听听这个——我忘了早点告诉你。在城里我对汤姆·斯托里谈起你。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那儿工作。他对你感兴趣，我想他会给你找个职位。明天打电话给他。你老在那所学校教书太蠢了。”

他伸手去掏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写着斯托里电话号码的纸条，我不假思索地塞进衣兜，根本没料到这简单的动作将会改变我的一生。

在厨房里，我看见凯萨琳站在正制作的一碟菜面前，但她的眼睛却盯在墙头。

“我能帮点忙吗？”

她摇了摇头。

“让我带莎莉进城，这样你和杰罗姆好单独在一块儿，行不行？”

她又摇了摇头。

“杰罗姆告诉我，他下星期五动身。下星期五一早我就进城。我会乘公共汽车来看你们。”

她没有转身，高傲地昂着头，可是我从未见她这样虚弱，看上去她神情沮丧。

四

那天黄昏，从罗伦琴高地驱车下山，桔红色的太阳挂在背后，路上树影重重；很快，灯光亮起来了，穿过圣杰罗姆和圣罗斯之后，开上蒙特利尔岛进入城区，一路上我几乎什么也没看见。在这之前，我没有目睹过婚姻破裂，而现在这种事正在眼前发生。也许能弥补，重新成长，但他们内心里都觉得有负对方。我诅咒诺拉·布莱克韦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我心里明白那不是根本原因。但是她玷污了杰罗姆的名声，本来难以理解的形势被她弄得更加晦暗不清，更令人讨厌难堪。他关于文明和捍卫文明的议论也许是正确的，可是我不相信那是全部真理。法西斯引出邪恶就像引眼镜蛇出洞的说法听起来更加确切。但是我与他不同，不明白他受的压力究竟是什么。我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被杀害，没有在童年逃跑、沿林中河道划向大海的经历，没有打过仗，没有刺刀戳死人，没有和凯萨琳结婚，虽然我希望如此，不是出类拔萃的医生，也不具有医院当局所不容的革命观点。可是在

驱车回蒙特利尔的晚上我至少领悟了这个道理：我们所作的任何重要事情，都难以简单地作出解释：人类的悲剧，或者说人类的讽刺，在于必须永远承担行动的后果，即使是被迫采取的行动，无论我们理不理解。道德？责任？偶尔谈谈这些倒也容易，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最优秀最能干的人在说出这些字眼之前内心也不胜犹豫。正像杰罗姆说的：“我的责任是什么？”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推入战争火海的将军，谁不深感明白自己的责任？这是三十年代。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记得仅在十五年前以责任的名义干过些什么事。

交通拥挤，我放慢了车速，车子爬行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到达杰克·克里斯托弗的住处。我把车开进他的车房。九点半了，这是蒙特利尔最动人心弦的春夜之一。度过了漫长的冬天，空气终于变得活跃了，细小的生命，无数成群的虫子，绕着街灯飞舞。青年男女手挽手在街边溜达，气氛乐融得足以腐化圣人。我经过一家酒馆，闻到啤酒的气味，于是进去喝了一瓶啤酒，离开酒馆时天已黑了。又走了一段路后，约莫十点一刻，我开始爬一幢发霉宿舍的楼梯，在我和卡罗琳·霍尔交往的日子里对这儿十分熟悉。我按了布莱克韦尔门上的铃，诺拉把门开了。

“进来，乔治，”她说。

我带着对她的憎恨而来，心里想着凯萨琳，准备说些话给她听，使她别缠着杰罗姆。可是此刻在这寒伧的小屋里见到她，她大大的眼睛，脸上流露出女人领略到爱情滋味的表情，她声音还是那样温柔，她的体态既娇弱又丰腴，她的整个存在像一只久经霜冻而绽开的花朵——当我目睹这一切，我意识到凯萨琳远比我更有眼力，她为杰罗姆担心害怕满有

道理。诺拉的的确确叫人迷恋，我自己也感到受她吸引；而在这种情形下，我痛恨自己有这种感觉。

我坐下后说：“我刚从北面回来，同凯萨琳和莎莉呆了半天，和杰罗姆聊了一小时。”

“他好吗？”

瞧她脸上那副表情！毫无戒心，公开坦率地献出自己——为谁？

“诺拉，”我说，“我来这儿——”我迟疑了，眼睛盯着地面。

“我明白你为什么来这儿，乔治。你爱凯特。”

当我听见她使用杰罗姆称呼自己妻子的昵称，我感到满腔愤怒，但又让怒气消散了。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乔治。我知道杰罗姆爱她，一直知道，从来无心损害他对她的爱情。我想得到的是他的品德，那是我一直向往的。”

我看着她，知道这是她的由衷之言。我记起凯萨琳说过的另一些话，我的立场动摇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反应迟钝——在某些情况下，真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杰罗姆说，他要去西班牙。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资本家把我们俩赶出了医院。当杰罗姆知道罗杰斯大夫对我的决定，他立即辞职了。”

我从她脸上搜索骄傲的痕迹，但没有发现。啊，凯萨琳对这女人估计多正确！诺拉——上帝保佑她——真的不了解更多情况。

“你没有考虑去西班牙，对不对？”我问。

她忧愁地看着我，显得十分悲伤。茫然不知所措。这情景使我深受感动，但我强迫自己坐定，不去搂住安慰她。她像是每个人的女儿，要有适当的机会，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情人。凯萨琳知道这点，很可能一见她就看出来。

“不，”她说，“不是现在。可是我是外科护士，西班牙需要护士。我想在这儿受不了，但得由党来决定。”

“由党而不是由杰罗姆？”

“哦，乔治，我怎么知道？”

“我希望能够恨你。”

“我知道你恨我，但表现不出来，和哈里一样。”

哈里！我早把他忘了。

“他打算怎么办？”

“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

“诺拉，你怎么老陷在泥坑里？你有哈里，他需要你。凯萨琳有杰罗姆，她需要他。赶紧收手，回头是岸，诺拉。眼前的处境毫无希望。”

“一切都似乎如此，除了一桩。革命将要到来，那时一切都会改观。这就是我不能为了凯特而责备自己的原因，乔治。你瞧，她和你一样不懂革命。”

“啊，见鬼去吧！她比任何人都懂。”

“你不相信象征吗？我相信。啊，我不责怪她，乔治。那不是她的过错。可是她有病，而杰罗姆身强体壮，样样能干。她是一个——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病态的文明。”

她那样说反使我高兴，因为这终于把我激怒了，我怀着愤怒离开了她。

五

下星期五，我问比格彼博士：早上的课完了我就离开滑铁卢行不行，他的回答叫我有些懊恼。

“完全行，我亲爱的斯图尔特，我亲自给你代课，近来我怀疑你是不是保持了授课的水准。”

我乘上汽车，下午三点就到了城里，接着在终点站叫了辆出租车到杰罗姆的住处，可是我上梯坎时却犹豫不前了。我突然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下午，我干嘛闯去打扰？于是我走开了，到就近的公用电话间向轮船公司查问，知道杰罗姆乘的船晚上八点才起锚。然后我到市中区闲逛，一个不冷不热的晴朗日子，像往常一样，它使我感到舒坦。

一刻钟后，我记起汤姆·斯托里和广播公司的事，进电话间去打电话，他正在办公室，叫我立即去一趟。我一见到他，就开始喜欢他。他比我只大两岁，但曾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未能谋到教席，结果来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了。谈起这个组织，他坚持说在政府管理下，这儿的人员比美国的广播员享有更多的灵活性，那儿的广播受着商业广告商的控制；他还解释说，但他们挣的薪金少得多。然后他领我去播音室，把我介绍给值班的技师，放一张稿子在我面前，请我准备一下，十分钟后我便开始第一次试播了。

录制完毕，斯托里笑了：“现在听听，我先倒回来，听见自己的声音别太惊讶。”

圆盘转动了，当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简直惊异极了，不敢相信。

“杰罗姆对我说过，我的声音与罗斯福总统的有点相似，”我说。“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斯托里笑着说：“他是个奇特的人，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能洞察别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才能。我认识他时正在生病，没有找到工作，他对我说，我将成为一个很糟糕的哲学家，但要干电台广播这一行，却会很出色。我不敢说他后半句评论很真实，但总算在以广播谋生。”

向技师表示感谢之后，斯托里领我回到他的办公室，窗户开着，圣凯萨琳大街上过往车辆的噪音直往里灌。

“杰罗姆告诉我，你获得一个历史学位，对政治抱有巨大热情，是吗？”他开始谈话。

我想纠正这句恭维话，但我回答的却是：“至少，历史学位不假。”

斯托里说：“你大概知道，美国通过电台搞新闻评论干得不错。依我看来，他们大多数评论员喜欢夸夸其谈，调儿唱得太高，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这儿的听众文静些，也不必担心商业广告。”他停顿了一下，望着窗外。“现在我不能向你作任何确切的许诺，可是我有一个主意提供你考虑。刚才的试播好极了，你的音色完美，这是我的印象。”

他扼要的讲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主意。城里有个旅游机构，需要雇一个旅途服务员，带领一个夏季旅游团去苏联，斯托里叫我答应这个差事。不给工资，但包干一切用费。从六月到劳动节^①，我将去国外，旅游团的人不多。我的职责是办票证，管行李，负责从一个城市到下个城市的安排。

“杰罗姆告诉我，你精通法语，还懂一些德语，”斯托里说。

^①北美的劳动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我的法语还过得去，懂一些德语是恭维话。我想能够叫啤酒什么的，不过如此而已。”

“没关系。会法语和英语，你就能顺利办事了。现在告诉你，要你去应这个差事的原因。”

斯托里的想法是，我利用这次旅行作为进入广播公司担任评论员的手段。他要我不带任何偏见地去俄国，沿途观察，记下我的感想，他相信旅游之后写一组稿子不成问题。如果获得成功，那时公司也许会永久性地雇佣我。

“完全像是一场赌博，”他说，“可是不花路费去俄国一趟，毫无损失。你觉得怎么样？”

我明确地说，对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整个事儿听起来太雄心勃勃了，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该死的不景气，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个个都藐视自己。在杰罗姆提携我并向我灌输一些道理之前，我也同样糟糕。”

我提出另外一项异议——仍在滑铁卢教书；由于我不在蒙特利尔，不可能试播那一组稿子。

“不成问题。你每个周末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录制成唱片。总之，为什么不看看光明的一面？如果这个主意成功，你就能永远离开滑铁卢了。”

我满心欢喜地离开汤姆·斯托里，但一到街上，脑子里想的却全是：这是凯萨琳和杰罗姆的最后一个下午，也许这会成为与杰罗姆的永别。我步行了一会，大约六点钟我去一家自助餐馆吃了点东西。六点半我钻进一辆出租汽车，恰好准时赶到他们住的街道。另一辆出租车停在街边，车门开着，司机正在剔牙等候。我付了车费出来，这时他们住屋的

门开了，一小家子出现在门口。莎莉牵着父亲的手，凯萨琳走在前面；我一见她的脸，就知道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她的面色苍白，却神情安详，美丽可爱。

“乔治！”杰罗姆叫道。“乔治，你来了我很高兴。一切都准备好了，都弄妥当了。上车吧，咱们一块儿去轮船码头。”

我们往河岸去的长段斜坡开去，颠簸地驶过几条铁路轨道，在一个大货棚前下了车，一条竖着两道烟囱的航海客轮高耸在旁边。我们走过码头，凯萨琳说她会永远忘不了面前一对海鸥栖息在一条铁椽上的情景。杰罗姆和几个办事员交谈之后，肩上驮着莎莉向舷门走去，消失在船舱里。凯萨琳和我单独呆在那儿，她看着我，面色苍白却又露出雨过天晴的新的沉静。

“熬过了上周，谢天谢地，乔治。”

“太好了。”

“我和他又十分亲密。现在情况好多了。不管会发生什么……”骄傲地一笑。“你知道，我有可能病倒，一旦病倒也许会把他拖下，但是没有。不至于那样是困难的，可我办到了。”

“你现在疲不疲倦？”

又是一笑：“说实话，我完全筋疲力尽，如果昏倒下去，我毫不奇怪；尽管如此，我感到比起一长段时间来更好些。”

“还是在什么地方坐坐吧。”

旁边停放着一辆空行李车，我拿出衣兜里卷塞着的一张报纸铺在车上，扶着凯萨琳坐上去。她悬垂着两只脚，像个

小姑娘，灰色的大眼睛惊奇地望着朝向船舷的货棚大门。前甲板上的吊机绳吱格吱格地响，吊起最后一批行李，放上滑道送下统舱，一些晚到的乘客纷纷告别，走上跳板进入船舱。货棚里响起欢天喜地的喧哗，一对二十岁左右的男女，身上覆满五彩纸花，背后拥簇着一群穿着晨服的青年和身着女侯相服装的姑娘，一齐拥上跳板，消失在船舱里。

“是的，”凯萨琳细声地说，“这一周至少拯救了一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灵魂；求求上帝，也拯救他的灵魂吧。”

“我真高兴。”

“既然他非去西班牙不可，他就去吧，我不是第一个送丈夫上战场的妻子，也不愿做最后一个。”

这时，我们看见他的头部和肩膀，他们正在下跳板，莎莉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他们上了码头朝我们走来。

“嘿，凯特，时间到了。”

“爹说他要出来朝我们挥手，是要我们到船头前面去。”

我起身走开，让他们单独一起，可是这时我的眼睛却没有离开他们。她依然坐着，整个心思反映在她苍白、沉静、富于表情的脸上，他坐在她旁边望着她。我从未见过任何一对男女这样脉脉相望。他们就要分别，眼里流露出受伤的惊异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彼此深深相爱，却又令对方难过和伤心。那神情充满震惊和痛苦，还有一种可怕的几乎是绝望的温情。

“凯特，”他嘶哑地说，“我不愿去。”

她带着沉静无力的自尊心情说：“亲爱的，我知道。但是你必须去。”

突然，码头在轮船汽笛的吼声中震颤，吼声打破了紧张。杰罗姆向前一步，把她抱下行李车，凯萨琳消融在他怀里，然后他放她站定，转身抱起莎莉，亲她，放她下地。最后尽管走路有些跛，他奔上跳板，消失在船里。

我转向凯萨琳：“现在，让我送你回家。”

“不，”莎莉叫道，“爹答应朝我们挥手的。”

我埋头看了一眼莎莉，她以孩子的直觉感到了痛苦和这场悲剧，极力想抵赖它。

“爹要给我们挥手，他答应了的。”

凯萨琳虚弱无力，但她振作起精神，朝莎莉笑了笑，我们一起在白色的巨轮侧翼下沿着码头走到缆绳旁边。我们抬头仰望，只看见船舷栏杆处有几个乘客的头部，可是在码头的混凝土前沿，却只有凯萨琳莎莉和我三人。我们等候着。暮霭昏糊了河面，像一层透明紫纱笼罩在圣海伦岛上，空气凉爽，海鸥还未开始鸣叫。我们望着，先看见一条白色的手绢在飘动，然后看见栏杆旁边杰罗姆的头部和肩膀。

“爹！爹！”孩子高声叫喊，开始哭了。

杰罗姆双手合在嘴边朝我们呼喊，但这时汽笛又吼叫起来，震动了空气，淹没了他的话语。我朝码头边望去，看见吊板已经放下，船与码头之间正咝咝地喷着脏水，艀缆已经解开，轮船迅速外移。那条白手绢还在飘动，莎莉也挥动自己的手绢，凯萨琳站在那儿像一尊塑像。

“凯萨琳，请让我送你回家！”

可是我说得太晚了，因为这时，我一直害怕却又不相信将会发生的事发生了。杰罗姆的肩头旁边，接近但未靠拢，现出了一个女人的头。那女人的头悄悄靠过来，她受了自身

毫不意识的破坏力的可怕躯体挤过来了，我们三人在杰罗姆之前看清了她，显然杰罗姆不知道她在船上。凯萨琳顿时面如土色，蹒跚了一步，我赶紧扶住她。

“咱们走！请！”我叫道。“请跟我来！”

她浑身颤抖，在我身旁麻木不省人事地举步，沿着庞大的白色轮船的侧边。一群海鸥在船尾盘旋翻飞，缆绳拖来拉去，可是凯萨琳全然看不见。我们在码头入口停下，我回头一看，莎莉在巨轮旁边显得更为细小，不住地向船头的父亲狂挥乱舞。然后，她似乎也明白了，放下手绢，转身奔向母亲。我们三人默不作声地穿过货棚，到了另一边的鹅卵石地面，上了出租汽车。我们跨过铁轨，经过水手的住房，再往上进入旧城区，穿过空荡的军训场，翻过海狸山，进入蒙特利尔繁忙的闹市区：交通拥挤，喧嚣嘈杂，明亮的灯光，以及暖融融的春夜里川流不息的人群。

两小时之后，莎莉上床睡了，凯萨琳和我呆在楼下。她看上去精疲力竭，我问是不是打电话叫杰克·克里斯托弗来一趟，但她不让打。

“杰罗姆一点不知道她，”我说，“我明白这点，完全明白他不知道她会在船上。”

她冷静地说：“不再有什么意思了。”

“那个女人——她闹不清自己在干啥！”

“不，她清楚，”凯萨琳说。“在她心里的某个部分，她完全清楚，可是现在也不用提她了。”她转过脸去。“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谁，什么也不知道。”

透过开着的窗户，我听见城市晚间那种模模糊糊的嗡嗡声响，人们从街边走过的脚步声，我这时真对人生感到害

怕。当首脑人物关上大门，当习俗的墙垣倒塌，当人们在人生的游戏中努力自订规则，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仿佛看见凯萨琳，杰罗姆，我自己，以及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像失落的影子在掩盖着虚无的薄壳上面朝不保夕的爬动。

“我作了那么大的努力，乔治，那么大的努力。现在我虚弱无力了，我感到很丑恶。”

“你不丑恶，你很美。”

“我愿永远沉睡不醒。”

“亲爱的凯萨琳，现在睡一觉吧。喝一点镇静剂就睡吧。”

“我乞求他为了我留下来，我下跪在地，把全部的自尊心都丢尽了。”

“他爱你。你难道没听见他说不愿去吗？”

“我知道。”她的平静恢复了。“他会永远爱我，而那使我更为他难过，因为我曾经使他失望。他出生在——什么？他赤手空拳地来到世上，现在又赤手空拳去到——什么？他现在赤手空拳，深陷苦痛，我为他感到悲哀，又和那女人同在同一条船上。”

“现在他也许憎恨她了。”

“是的，他现在也许想害死她，可是那会使他更憎恨自己。”

“她无关紧要，凯萨琳。”

“那太可怕了。她无关紧要，然而竟干出了这种事。”

“无论遇不遇上她，他总是要去西班牙的。”

“是的，不错，他要去。但会是清清白白的，而不像现在这样，不会带着对自己的憎恨。他去之后，也许会发现自

我，发现他在上次堑壕战中失去的东西。”

“你是说他的宗教信仰。”

“我指某种能在凌晨三点钟保护他的东西。他认为他在我身上找到了这种东西。有个时候，他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于是，事事都不对劲了。不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不，不是。当一切都乱了套，他又开始回味自己的战争经历，法西斯分子发动的这场新战争。当然，他想过问的事太多了，他的精力充沛得令人害怕，人人都想榨取他，他又到处插手。啊，空谈有什么用？一切都失去了控制，我想永远睡去。”

“他会回来的。”

“要是他真的回来，我想我会受不了。爱情竟是这样一场可怕的折磨，乔治，它太强大了，弄得我支持不住。爱情究竟是什么？上帝才知道，爱情无疑是残忍的。人们干脆去寻找性刺激，因为那既直接又省事。啊，我感到如此丑恶和疲惫。”

长时间的沉默，城市街头的模糊声音从窗户传进来。

“我很害怕。我们都害怕极了。他似乎勇敢而又坚强，每个人都榨取他，我也一样。他厌倦了——从内心里，在灵魂深处，而这桩共产主义的事仿佛成了一种逃避。尽管如此，他想有益于人。我不明白，理解不了。我知道曾经使他失望。”

“亲爱的凯萨琳，喝点镇静剂，休息去吧。”

她做了一个起身的动作，却仍然呆在原处。

“他会变成怎样，乔治？”

我耸耸肩膀，我正担心她会变成怎样。

“好吧，我喝镇静剂，尽可能睡一觉。”她站起身，娇

小玲珑，精神恍惚。“对一个女人来说，太可怕了，当她明白爱情并不是一切。我们需要上帝，上帝却无动于衷。也许是我们不让他关心的缘故。然而上帝在哪里？他到哪儿去了？”

她上楼去，当我估计她已上床，我也跟上去了，她叫我进入她与杰罗姆共用的双人房间，她独自躺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身子显得瘦小，但两眼大大的。她静静地躺在被单下，我坐在床边，彼此望着。

我拿起她的手，不觉说道：“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我将不需要……”

可是，这些熟悉的字句对我们俩都失去了神力，因为曾经指引犹太人和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不见了，我们也丧失了寻找他的习惯。

六

仅仅是一个月又两周之前？

我站在列宁格勒欧洲旅馆的阳台上，暂时忘记了上个春天在蒙特利尔卷入的那场深刻的小悲剧。现在来到国外，从事搜集新闻和开拓前程的巨大——称做什么好呢？谁能理解一九三七年的欧洲？谁能理解那时或任何时候的俄国？曾经局限我的狭隘围墙坍塌了，我独自来到国外。同我一道的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前天晚上我才在赫尔辛基城外的火车上认识他，他不远万里专程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而来，想亲眼看看这儿的状况。到达俄国后的第一天中午，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庞大的数量使他生畏，他用来装备自己的严密理论

已被压得粉碎。现在我们在俄国会在一起，亲密无间，虽然我们仅仅相互知道姓名而已。

六月下旬列宁格勒的白夜，使成千上万的人感到神奇，他们赤着脚日夜在下边的路道上窸窸窣窣个不停，共产党人把沙皇铺的这些路道连同这座旅馆和附近的大理石宫殿一起没收了。我们只能看见白夜中的蜂拥人群，看不清单独的面孔；他们穿的是清一色的工作服，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川流不息。显然，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看，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他们拥挤在神奇的白夜里的形象，好象我们在轮船上看见马尾藻海里冒出来的神秘生物。在列宁格勒街上逛了一天之后，我们知道每张面孔，对我们来说，却和自离开芬兰车站那天早上所看见的同是一个模样：布满皱纹，未老先衰，没有笑容，没有表情，托尔斯泰时的农民面孔，生活在他们不理解的世界，在饥寒年代受过创伤，知道自己毫无用处。对新的苏维埃社会来说，有无数的面孔显得过于衰老、迟钝，无知和愚笨。

“看过俄国，”这位美国人说，“让你的种种理论见鬼去吧。”

成千上万双脚在地上拖曳，发出不息的大海声响，他们这样拖曳，因为脚上缠的是绷带和麻布，在俄国鞋的生产不够需要，那年头买一双便宜的鞋，一个普通苏联工人得付两个月的工资。

“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我们背后一个带英国口音的人回答说：“他们从国内来，无处可去。我的朋友，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富农，农奴的儿子，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解放了他们。”

两小时之前，这个上了些年纪、话带讽刺的英国人，同我们共进了七道菜的晚餐。他告诉我们，麻布是这些人群的基本裹足之物，他自己就在经营大麻生意，每年他的公司运来上万吨大麻到列宁格勒和敖德萨的港口。他自称是俄国通，无论对革命前或革命后的俄国。我们看见他厚颜无耻地为旅馆招徕游客，以及一些英国工会人士，他与这些英国人算是旅游同伴，尽说行话。这些人都记下有趣的见闻，当他们回到国内，将向布鲁克林，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同行们报告。这个英国人只要一听到走廊有讲英语的声音，听见有人提到当时常用的词语——干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诸如此类，他就会和他们攀谈起来。他装做寻求指教，却把别人引入荒谬的话题，然后他会带着天真的神情表示同意：俄国简直好极了，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解决了失业问题的国家，为大约一千八百万人提供了集中的工作场所，禁止社会主义分子破坏劳动生产力，让劳动者习惯于获得只相当于在英美工作的四分之一的工资，通过征兵保持了一支两千一百万人的军队，不能容忍让消费品生产优于军火生产的无知邪说。英国人目光炯炯，会看到愤怒涌上同行的面孔，然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他被人称为法西斯分子或反动分子。

他对我们倒温和些，虽然我们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认为我们至少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不过，他喜欢令我们震惊。

“下面那些人，”他平静地说，“对于国家来说不会毫无益处。战争一到，他们就会有发光的时刻，会被送上战场，为坦克开路，踏翻敌人的地雷。”

“不会那样糟吧！”

“也许不。时间会作证。可是如果你富于理智，你就会说，

事情不可能那样乐观，因为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俄国人会成为我们的盟友。”他爽朗的笑了，接着转向美国人说：

“目前在我们旅馆，你的同胞有十七位，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生活得更优裕。一日三餐鱼子酱。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千里迢迢从美国来到俄国教他们赶上美国的生产。啊，别以为俄国人办不到，只是时间问题。你瞧，这儿还没有工会组织。让我告诉你俄国最妙的事情：这些人不了解自己。他们认为应该、却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的那个重要分水岭。

那位美国人对此提出一些异议，英国人哈哈大笑。

难道没读过俄国文学吗？那些优秀的文学，最为真实；如果你想从文学中获得真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抵得过一打莎士比亚。但它不是增进彼此了解的文学，你不能死抠它。它突破了一切藩篱，因而是真实的，真理是不可能死抠的。哦，真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她令人畏惧的事实与它的伟大毫无联系。她疆域辽阔，什么事都能办到。瞧，二十年之间她在共产主义方面走了多远。罗马人花了整整三个世纪来建立教会，俄国人只用了二十年来竖起马克思的旗帜。这正是因为俄国人不去管了解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未来将属于俄国的缘故。我们对此怀疑吗？看看法国。是的，看她耗费了多少精力去了解自己。不相信吗？等上几年，当战争到来时，瞧法国的那支批评家队伍如何战斗。英国？不错，英国的确有过昌盛兴隆的时候，但她现在完蛋了。几百年来，英国人一直努力避免自我反省，可是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张伯伦知道英国完蛋了。他见过好时光，他愚蠢，但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笨。

“听我说，老兄，张伯伦先生懂得你们大多数人都拒绝接受的一桩事。他知道希特勒是欧洲必须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如果希特勒打垮了俄国，欧洲的命运就注定灭亡了。但他没把俄国打垮，因为他是个疯子，不过我认为，即使他神志清楚，也办不到。”

然后他继续说，战争将会十分可怕，只有俄国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⁴⁰因为唯有他们最能吃苦。军事统帅才能？别提了。赢得战争靠的是吃苦耐劳，斯大林使战争尽可能艰巨可怕，可是俄国人比德国兵更吃得苦。怀疑吗？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黎明时分，英国人打着呵欠离开我们。美国人和我留下一会儿，观看古老的沙皇宫殿从短暂的白夜浮现出来，变成大白天。一只鸟儿栖息在近处的护墙上啁啾，之后又飞走了。我们闻到一股俄国城市的难以言述的气味，游客们说那是亚洲门廊的味儿。

“噢，”美国人说，“我想该准备睡觉了。”

我们到了楼下，看见乐队正为俄国官员奏起过时的美国爵士音乐，他们在旅游者听完民歌节目就寝之后来到餐厅。我回到长住游客让与我的宽大房间，解开衣服躺下睡觉，但又不能入睡。当太阳照进屋内，我仍然醒着，正在思索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空虚。这之前我常常感到渺小，虚弱、畏惧和力不从心；可是现在，我却感到完全等于零。

“这就是未来，”我在餐桌上听见一个旅游同伴这样说。

傻瓜曾经相信：理智控制着未来。

入睡之前，我记起杰罗姆。他划出森林的独木舟现在载

着他进入了海洋——大海中一叶扁舟，时值黑夜，十二级飓风就要刮起。杰罗姆、我自己以及所有的人的处境都是如此。

七

当客轮进入圣劳伦斯河口，我的目光掠过几哩宽的冷冷河水，直抵魁北克北边荒凉的群山，我感到自己老了。可是我毕竟回家来了。很怪，在目睹那片贫瘠土地的景象之前，我从未把加拿大看作家乡。这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我却从不认为加拿大具有未来，要在未来发挥作用。现在我心里有数了。我暗下决心！“我将在这儿工作，努力了解这个国家。这是我现在能做的一切，其余的事都可望而不可及。”

通过安排我参与那次夏季旅行，汤姆·斯托里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格调。从此，我不再相信任何事情可以简单地说明，我不再相信政界人物有什么理论。现在我知道，我们谈得最多的两个话题实际上知道得最少；政治和天气。构成政治和天气的因素错综复杂，没有任何人的头脑，甚至任何计算机器，能够正确估计和说明。

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为什么——除非那些声称热爱和平的人渴望战争？

越过河水眺望群山，我记起快要上车去柏林之前我和一个波兰旅行代理人在华沙车站的一次谈话。

“噢，你参观过华沙了。几年之内，将不再有华沙存在。你遇见了我，一两年内，我会不在人世。”然后他笑了笑说：“可是，这一切的结果会带来一件好事：一两年内，

整个欧洲将不会再剩下一个犹太人。”

是的，战争将会爆发。

轮船沿劳伦琴大峡口的岩岸往上行驶，住在这一带的人丝毫不了解我在这个夏天的感受。曾经使杰罗姆惴惴不安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单纯？使他不安的强度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吗？对此，我也提不出答案。

河道逐渐变窄了，黄昏前我们绕过了奥尔良岛，船停下来让魁北克的乘客上岸。一小时后我们继续行驶时，晚祈祷的钟声飘过河道，我们迎着落日余辉驶向蒙特利尔。从晚饭后直到半夜，我在甲板上徘徊，靠近两岸教区的灯光随着河道的宽窄时远时近。我忽然想到：这个国家，这个叫加拿大的地方，我生长在这儿，却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我的祖先已经在这儿繁殖了六七代，我仍然对她不甚了了。我想起滑铁卢，鄙薄自己竟然浪迹那儿好多年。过错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听任比格彼之类的人摆布。漫步在甲板，闻着湿润的夜间空气的温馨，我发誓宁肯流浪在圣凯萨琳大街，而不愿在滑铁卢再工作一年。我想着已经为汤姆·斯托里写好的六七篇广播稿子，不知道这几块敲门砖能否撞开大门。

进城后的次日早上，我带着广播稿去找斯托里，他答应立即阅读，约我下午就到他的办公室谈话。然后我往比米斯纪念医院打电话，得知杰克·克里斯托弗现在私人开业，我去他的诊所还来得及。中午时分我就到了他那里，他告诉我，凯萨琳已经转租了她的住房，带着莎莉到湖边与她的父母一起居住了。

“我讨厌这整个事儿，”杰克对我说。“你走后她的神经全垮了。她处于休克状态而不意识，直拖到七月中旬。那

时她已出现中度神经分裂而陷于崩溃。”他犹豫着——现在他成了她的内科医生——但决定都告诉我：“不幸的是，那还不是她最严重的症状。她的心脏开始出现纤维性颤动。”

“那是什么意思？”

“省去细节，那意味着不能承担正常的负荷。反过来说，意味着她衰老了——就她的寿命而论——大约在过去半年内老了二十年。当然，她在服用毛地黄；她的机体会作某种调整，但只可能有一种判病结局——进行性的心力衰竭。”

我感到似乎半截身子都凉了，于是问可不可以看看她。

“很遗憾，我只能说不，乔治。她——不，目前我不能同意。”

我头昏发冷，努力使声音保持正常稳定：“告诉我一件事：杰罗姆离开时预料到这个吗？”

杰克平静地回答：“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

“你是说，他走时知道这情况会发生？”

“我没有那样说。可是他知道最终这是会发生的，他娶她时就知道。”

“但走时知道是可能的！”

我一向认为杰克态度严厉，判断正确，他的话使我吃了一惊。

“乔治，别以己律人。你——恕我直言——也许与凯萨琳相爱，可是你没有娶她，你不是那种敢作敢为的人。杰罗姆整天接触病人，每晚还得回家陪伴一个生病的妻子。”

“可是她是他的妻子！我知道他爱她。”

“哦，看在上帝面上，乔治，我知道什么呢？我现在只

知道自己的本份责任。”

“杰罗姆给凯萨琳写过信吗？”

“我相信经常写，他甚至给我写信，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可是凯萨琳垮了，一个人能承受的震撼是有限度的。她忍受了不少，但比我认为的更虚弱。杰罗姆走后我才知道她多需要他，于是她垮了。别问我所有这一切。我是个医生，不是心理学家。”

向杰克告辞后，我去父母的住所，发现他们见到我很高兴。然而，我的俄国之行对父亲没有现实感，他对政治毫无兴趣，早从他阅读的书目中取消了俄国。不一会，他便谈起自己新发明的罐头开刀，并说很快会赚钱。他与布法罗之间通了一连串的信，还说到另一项发明，但我忘了名目。

当天下午，我去见汤姆·斯托里，这位极为和善谦逊的人对我写的稿子很满意，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但是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我说。“只是普普通通的报道而已。我并不真正了解俄国。”

“这正是我喜欢的原因。别的人都认为自己对俄国的事儿样样通晓。我读到的关于俄国的报道都带有偏见。这玩意儿却使人觉得耳目一新，真实可信。”他微笑了一下。“恐怕它会使你失去你的左派朋友。现在咱们去播音室，先录下第一篇。”

他在播音室排练了我好几次，以便强调得当，时速吻合，然后他叫技师开始录音，把稿子内容录上唱片。

“现在，”斯托里说，“向你提个建议。我们在温哥华的机构有个空缺，这些稿子既可以从这儿也可以从那儿播送。我不想开空头支票，今晚我就去多伦多，带上那叠稿子

和录制的唱片。我要让一些大人物认真给与考虑，无论成不成，一两天内就作出决定。这将给你足够时间在开学前辞去学校里的职位，假如你不能与我们一起干——唔，还可以回学校。”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从多伦多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我愿意，那份工作就是我的了。我满口答应。

第二天早上，我乘火车去滑铁卢收拾留在那儿的衣物和书籍，并通知比格彼博士我不再回去了。我在车上曾十分焦虑，以为老头子会发脾气或者威胁我。如果我在开学前一周走掉，他将对我采取措施。他从不和聘请的教师订立合同，但我想他一定有什么控制手段：我感到畏惧，因为他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孩子。

我的焦虑是多余的。当我把消息告诉博士，他擤了擤鼻子，望了一会窗外，然后说道：“喔，我想填补你的位子不会太费事。我刚收到一封电报，有人想到这儿来。我不太了解他，但我揣想他能堵上缺。”

这就是我为博士工作五载之后，与他最后一次谈话的大致情形。他甚至没问我打算干什么，暑假里到过哪儿，我为什么决定离开。

十二天之后，我乘车到了温哥华。

八

从那一年起，我开始成长。就我个人而言，萧条时期终于过去了。我从它深厚的冰冻挣脱出来，耽误了大约十年之后，心里突然升起了生存的热望和有所作为的雄心。

到了新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站稳了脚跟。那一组关于俄国的广播稿大获成功，一段时间内，我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家里成了小有名气的广播新人物。那组稿子播完后，我接受了一项解释新闻的经常节目，开始系统地研究报纸、新闻刊物，欧洲和亚洲的外交史。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干一项真正的工作，第一次成为有用的人。我开始习惯于听全国各地的人不时说起：“你听了昨晚乔治·斯图尔特的节目吗？”或者，“你认为乔治·斯图尔特讲得对或是在胡说八道？”

我一生中许多讽刺之一是，我的声誉的得来恰好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俄国归来途中，在柏林度过了一周，而只要有耳长眼的人，那时即使在柏林呆上一天，都不会不觉察希特勒的用心。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都不相信——真正相信——希特勒想发动战争。我却深信没有别的可能。说来也怪，卷入杰罗姆和凯萨琳的纠纷，目睹他们关系破裂，使我在感情上对酝酿的巨大破裂作好了准备。

慕尼黑会议那年——我常常感到不可思议，这一年里人们没有由于收音机对他们神经系统的干扰而扔掉它们——我经常收到听众来信，狂暴地指责我悲观丧气，当我把慕尼黑会议称为屈服投降。慕尼黑会议之后一周，希特勒在萨尔布吕肯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即使张伯伦听了都不寒而栗，这时我预言：不出半年他就会吞并整个捷克。我注意到那时的希特勒像一条周期性饱餐的巨蛇，每半年饥饿一次。一九三九年冬末，塞谬尔·霍尔爵士断言：欧洲的黄金时代即将开始。我以此作为一次广播讲话的基础，其中这样说道：在夏季到来之前，塞谬尔爵士断言的黄金时代将以德国的另一

次暴行开端。两周之后，希特勒攻占了布拉格。

我前后的讲话，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并不以此自诩，因为我所讲的都显而易见——广播公司决定把我调往更接近首都的东部。一九三九年春末我回到蒙特利尔，第一次租了一套公寓，两间一厨，离杰罗姆和凯萨琳曾经居住过的半月街只有三个街口。

那是一个奇怪的春天，令人不安的春天，而表面上又是一个可爱的春天。五月下旬，大学校园榆树成荫，学生整装待发即将去战斗和丧命，校园空荡荡的。天气晴朗和煦，我所研究的新闻信息却愈来愈显得严峻。我开始产生切身的恐惧感。我读了许多描写往日战争的小说，不敢想象自己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充当一名士兵的生活情景。我常常想念杰罗姆，深感自己缺乏他的勇敢精神。

同时还有凯萨琳。冬天里我们一直书来信往，她在信中对我说，她日益恢复健康。我一回到蒙特利尔就和杰克·克里斯托弗联系。“喂，”我这样开始对杰克说，“现在看到杰罗姆的见解的价值了吗？”

“看样子很不妙，”杰克承认道。“可是战争一旦爆发，也许会使他从西班牙出来。”

接着我向他询问凯萨琳。

“谢谢上帝，她好起来了。她的心理状况肯定已恢复正常。现在她和莎莉住在湖边，已经习惯于服用毛地黄，决心开始新的有趣的生活。”

“你是说，她相信不会再同杰罗姆一起生活了？”

“我不知道，乔治。我不这样认为。你知道去年冬天他曾回蒙特利尔一趟吗？”

这使我惊讶，凯萨琳在她写的那些信里绝口未提此事。

“是的，他回来住了两个星期左右。他受了点轻伤——我记得他左臂上了夹板。我没有见到他。他回来为他的外科医疗队募捐，但我想不会成功。现在西班牙成了一个僵局，许多人认为我们自己也将参与战争，共产党人利用他达到宣传目的，可是他的讲话报纸只字未提。”

“但是他总见到了凯萨琳？”

“是的，很短暂。”

“之后他又去西班牙了？”

“他去了。别问我为什么，确实去了。”

“他们之间有什么交往？”

“这个你必须问凯萨琳。我没有问过她，她也没告诉我。”

凯萨琳在劳伦琴的别墅没有电话，我两天前买的一辆旧车还未彻底检修。我的公事很忙，只好把访问凯萨琳的事推迟到周末。但我想先和上次见到过杰罗姆的人谈谈，首先想到的是阿瑟·拉任彼。我打电话找他，当晚八点半左右他到了我的住所。

拉任彼外貌上的变化令我不胜惊异。看上去他像撞了鬼，惊魂不定。他不住地抽烟，神经紧张，坐立不安，左面颊不时抽动；但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心理上的变化。

“你关于俄国的广播讲话我每次都听了，”他说，“啊，讲得很好。”

“听到你这样说，我很吃惊。”

拉任彼畏缩了一下：“去年我处于心理失常的边缘，以杰罗姆·玛特尔开始。”

“什么意思？”

“他从西班牙回来时我见到了他。他向我大泼冷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他吗？我想请他帮助我参入国际纵队。你要有兴趣知道的话，我早就是共产党员了。你也许还记得，你们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我几乎一言不发。但我是共产党员，而你不是。我不想细说党组织不让我去西班牙战斗的原因，就说没让吧，但杰罗姆具有影响——至少我这样认为——于是我去找他。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来着？”

“讲下去，告诉我吧。”

“他只是像往常那样盯着我，摇着头说：‘我不愿帮助我最凶恶的敌人进入西班牙’，他说。这话把我惊呆了，我说话时都语不成句。”

“‘这整个糟糕的悲剧’，杰罗姆说，‘一两个月内将要结束。斯大林在自己国内屠杀革命者，对他来说，西班牙只不过是一桩难堪而已。他绝不会为西班牙而冒与希特勒作战的风险。从一开始，他就视之为政治游戏。瞧他干了什么。他只派遣了几名顾问。他让国际纵队里成千上万的非俄国共产党人走上自杀的道路，他还散布这种神话：站在共和派一边的共产党人是唯一从事战斗的人，他一直把西班牙当作屠场，用以铲除工人运动中的异己，这些人不像德国人紧跟希特勒那样跟随他’。”

我听了这些不禁问道：“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还要返回西班牙呢？”

拉任彼凝视着我，好像他自己几个月来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别问我。我不是他的对手。我猜，他是一个非凡的傻

瓜。当树倒猢猻散之际——像我这样的猢猻，他能坚持到底。他有一个由外科医生组成的医疗队，也许他觉得，回去是他的职责。可是他对我讲的西班牙”——拉任彼的身子一缩，面颊一抽搐——“使我感到心惊肉跳，太可怕了，乔治。然而，那是真话。”

“你身为共产党员，却这样说话？”

“过去是共产党员，过去是。当然我绝不相信他的话，我对他用尽了共党分子使用的所有侮辱语言。”拉任彼又畏缩了一下。“好吧，也许我最好向你和盘托出。”

很明显，和他平时一样，杰罗姆总是以牙还牙，当他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他对拉任彼明说，拉任彼打算去西班牙的真正目的是想继续往革命阵营内部钻。他说，拉任彼散布的那些宣传也曾经使他自己入迷。

拉任彼以一种我永远忘记不了的神情看着我。他仿佛受了侮辱，仍然怨恨杰罗姆，然而他的态度顽固，桀傲不驯。他是我知道的共产党的第一个脱党分子，这在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者中间会引起何等的沮丧，我却说不上来。

“我和杰罗姆谈话之后三天，”拉任彼说，“我记起他对我说的一些事——我忘记了，因为当时我感到十分害怕而又痛苦。他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适宜于去外交部工作，他乐意代我向斯克林杰博士写封信，这位博士是他的老病号。”

拉任彼点燃另一支烟，他的整个身心都似乎在抽搐，他说：“两个月前我参加了外交部的考试。”

“进去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斯克林杰博士会见我时，我向他承认加入过共产党，又退了出来。我对他说，像我这样的

人会有用处，因为我曾经是共产党。我这样做很对，他们迟早会知道。斯克林杰博士私下对我谈起杰罗姆，认为他很了不起，但却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还有一件事，乔治。”拉任彼愁苦地望了我一眼。“你认为今年大战会爆发吗？”

“是的。”

“你知道会怎样开始？”

“我想会以希特勒进攻波兰为开端。”

“但是这之前呢？”拉任彼晃晃头。“在这之前，你瞧吧，斯大林和希特勒将搞在一起，反对法西斯的将是我们，俄国会安然坐在一旁。”

我也产生过同样的想法，可我不相信，看不出这种情况如何能够实现。

“等着瞧吧，”拉任彼说，“我这样对外交部的人说了，他们只是微笑。可是，等着瞧吧。”他又补充说。“这是杰罗姆告诉我的。三天以后，我知道他说对了。你走着瞧。”

又一天过去了。我在办公室上班，写了一篇广播讲话的初稿。我为住房又添置了几件必需品，从卖主那儿领取了福特牌旧汽车。这是我的第一辆车，我花了几个小时驾着它在城里乱转；时而开上西山，观赏花园里的郁金香；时而从倾斜的城区望去，直望断远处蓝色的圣劳伦斯河。七点钟我回到家里，自做晚餐。我刚好坐在打字机前面，电话铃响了，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乔治，我是卡罗琳，卡罗琳·霍尔。如果你说已经把我忘了，我会恨你的。”

“天啦，你现在哪儿？”

“昨天下的船，刚找好一间房住几天。”她给了我一家旅游住所的名字，离我的住处不远。“乔治，我一定得见你。这会儿能不能过来一趟？”

我有一篇稿子需要重写，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甚至没想到过卡罗琳，我犹豫了。

“我从巴黎回来，”她说，“需要人帮忙。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可怜的诺拉的人，我必须——”

“你说什么，最后一个看见诺拉的人？你指的是诺拉·布莱克韦尔？她——”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我记起那天晚上，诺拉对于卡罗琳的婚姻几乎说了同样的话。

“你是不是说她已经死了？”

卡罗琳满怀同情地说：“一个月前，她在巴黎街上被车子压了，现在我带回了她的婴儿。这小女孩很可爱，就在我这儿。”

我一生中有这样的电话交谈！

“这孩子是不是杰罗姆的？”

“谁的孩子有什么关系？我正要领她去哈里那儿，我害怕单独去，不敢独自面对那失魂落魄的人，你一定得帮助我。”

听了这话，我知道这一晚告吹了，于是我说“好吧，”搁了别的事出门了。春天的晚霞映在屋顶上空，我在街角看见一个犹太老人，衣衫褴褛，态度安详，仰望着缓缓掠过山顶的云彩。五分钟后，我按响了卡罗琳住屋的门铃。

她看上去老了些，褐色的眼睛比我记得的更温和，她像

姊妹那样亲吻我。

我们各自心里还藏着往日一起分享的炽热情感，我们成了理解彼此孤寂的朋友，现在仍然眷恋不忘。

“咱们散散步去，”她说：“孩子在睡觉，我想和你谈谈。”

我们往西漫步，穿过灰色的街道直到大学校园，然后像是一对学生坐在石梯坎上，朝着一条榆树林荫道，看见第一批灯光在城区亮起。

“吉姆是不是同你在一起？”

她摇摇头，微微一笑。

“你和他还是夫妻吗？”

“法律上是。诺拉说她对你讲过，我离开时怀孕了。可是没有生孩子，我在巴黎小产了。”

“我以为你去了纽约。”

“我们先是去那儿，但以后几乎四海飘泊。”

“吉姆现在哪儿？”

“不知道，”她简单地回答。

“你嫁他时知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知道，但是不明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又是微微一笑。“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完了。对他们来说，党是一切。我要去西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在那儿找个工。我还年轻，老想着那可怜的孩子，像是一直还未生他似的。我想找一个善良的男人，重新生个孩子。”

我们在黄昏里抽着烟，城里的灯光愈来愈明亮了。

“噢，乔治，你知道杰罗姆在西班牙吧。诺拉想跟随他，却办不到。我们老在不同地方分别遇见他们。”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在一起生活？”

“那算什么？对杰罗姆来说，加入西班牙的战争就是他的一切。吉姆在马德里遇见他，但谈起他时——谈得很少——话中的意味使我毛骨悚然。他们那些人没有人性，乔治。我不知道杰罗姆是否知道，会不会在意，可是他处境危险，我是说危险不仅来自法西斯分子。”

“你带回的孩子是杰罗姆的吗？”我再一次问。

卡罗琳又是微笑。“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孩子挺可爱的。”

“杰罗姆把诺拉也给抛弃了？”

“噢，他绝没想到她会跟着他到欧洲去。她是党员，顺便说一句，他不是。我认为他有一阵子打算加入，但始终没有那样做。可是诺拉陷得很深，他们为她找了工作，在巴黎的一家收养西班牙难民孩子的托儿所。”

“她是不是有意自杀？”

卡罗琳叹了口气：“法国警察称之为事故。但是同一年的早些时候，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些令人惊骇的治疗。像她那样做人太可怕了。别评论她，乔治。”

“评论一个神经病人没多大意思。”

“别用那个词儿。她只是——啊，谈有何用？她的处境太困难了。假若她幸运的话，麻烦就不会发生了。假若杰罗姆娶了她——”

“他绝不会的，”我说。

“我想这在她心里一直明白”。她一双褐色的眼睛直盯着我。“说这说那有什么意思？可怜的女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她作过那么多努力，她那样讨人喜欢。”

我凝望着通向城区的林荫路，隔了一会，我问她是否知道杰罗姆再回西班牙的原因。

“我从来不了解他，可是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呢？也许他回去的原因与诺拉撞进里沃利大街的来往车辆相同。我很幸运，没像你们这些人多长脑髓。我得过且过，一天天打发日子，我不断劝诺拉撒手回家，到哈里身边去，她的确回去过一段时间。我想是去年吧，但简直受不了。”

“她回去时见到哈里没有？”

“当然见到了。可怜的哈里希望她回去同他过日子，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可是她一见到他就感到厌恶，她甚至不愿住在他屋里。我想，党叫她还是回巴黎去的好。”

“我明白了。”

卡罗琳站起身来，理直她的法兰绒裙子，活泼地说：

“现在，你和我有一件事要办，越快越好。咱们把小孩给哈里送去。”

我以怀疑的目光看着她。“你的用意是说，孩子是他的？”

“我想这孩子送给他挺合适。我爱这小婴孩，假若他拒绝的话，我乐意抚养她，可是把她给哈里最好不过了。”

“婴儿应该由妈妈喂养吧？”

“说得对极了。哈里正是一个妈妈型的男人。”

“为什么要我跟你一道去办这事儿？”

她朝我神秘地一笑，这种女性的微笑，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

“呃，哈里一向喜欢你，要是有你一块儿去，我想事情会顺利得多。”

“是什么使你产生这想法的？”

“乔治，还用说吗？要是他觉得你都认为孩子是他的，同样，别人也会这么认为，对哈里来说，这会使一切更加容易，更显得自然。”

我们走回她的住处，看见小孩睡在一张大铜床中央。卡罗琳抱起她，口里发出温柔的咕咕声，这时我听见远处街头交通车辆的模糊声响，闻到了暖融融的夜里蒙特利尔闹市区的气味。

“她真可爱极了，”卡罗琳说。“乔治，抱着她。难道不可爱吗？”她用手指背轻轻地抚摩婴孩的脸蛋，婴孩咯咯地笑了，卡罗琳又赞美她：“她长大后，会是一个大美人。”

“要是那样，你怎么相信哈里会认为自己是她的父亲？”

卡罗琳调皮地笑了。

“哈里也许愚蠢，但不会蠢到那个地步。”我说。

“乔治，我们有谁比你聪明。你只管等着瞧吧。”又是调皮地一笑。“现在咱们动身吧。”

于是我们走进黑夜，婴孩抱在卡罗琳怀里，我走在她身边，仿佛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叫住一辆出租车，开过一段熟悉的居住地带。卡罗琳亲昵地不停逗婴孩玩，我透过车窗扫视行人。汽车停了，我付了车费后一起走上台阶。

“你怎么知道他在家？”我说。

“我打了电话，但一听见他的声音便立即放下话筒。他会以为我是法国人，以为我一听到讲英语便明白拨错了电话。”

“那不表明现在他在家。”

“咱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不告诉他是我打电话，因为不想让他见到孩子前有思考的时间。哈里的心肠很好。”

“你也一样。”

“我不太喜欢你讲这话的调儿。”

“我想哈里知道诺拉死了吧？”

“当然知道。她在这儿的老朋友都知道。”

不一会，我们进了那间我了如指掌的小套间，老样子仍然未变。墙上还贴着便宜的印花布，地板上照样一尘不染，诺拉头戴护士帽的照片摆在桌子上。

哈里开始见到我们时友好快活，显得有些迷惘，但与平时的情形差不多，完全没注意到带去的婴孩。

“好久不见了，”他说。

“不是吗？”卡罗琳说。

哈里的梨形身躯，过大的头颅，短瘦的腿，没有生气的头发，一切依然如故，但他的两眼变了。

“我把屋子收拾得相当整洁，你们认为是吗？”他说。

“这会令诺拉喜欢的，我想。”

“她当然喜欢，”卡罗琳说。“诺拉为你感到骄傲。”

她坐下，婴孩放在膝头上，我想哈里把婴孩当做她的了，甚至以为我是孩子的父亲。我点燃一支烟，突然想到这是我一生中所面临的最古怪可笑的情景。

“哈里。”卡罗琳说，“我不知道如何讲起。”但我看她的神情，明白她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正讲着呢。“诺拉是不是写信说过她和我常常在巴黎见面？”

“噢，是的。她一直在写信，没有哪一周耽误了。”

“她太欣赏你的信了，哈里。生孩子的时候，她多想你

在身边。”

哈里的下嘴唇颤抖了，喉头一上一下，但他努力噙住，一面说道：“当然，她只好留在那儿，因为她在巴黎有那么多看护任务。”

“她在巴黎干得出色极了，你一定早就引以为骄傲。”

“是的，她肯定会干得很出色。我们曾经度过多么美好的时光。你知道，我们总是彼此了解，默不作声地，我们有过一些好日子。”

他和卡罗琳彼此看着，哈里的干酪形脸上慢慢浮现出新的表情。他瞧着我，我努力点头微笑。他咕哝道：“哎呀，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乔治。”然后，他脸红耳赤，我想他多半是要哭了，但不等他这样做，卡罗琳站起身，将婴儿放在沙发椅上，把她的小指头塞进嘴里，孩子又是笑又是蹬脚。

“哈里，她不是挺可爱吗？你多幸运！”

这时她端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两人呆呆地站着。接着是一声啜泣，他脸上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我又一次以为他快哭了。可是相反，他咧嘴嬉笑，像一个白痴，立即跪在地上逗小孩玩。

“她活像诺拉，”他说，“不是吗？”

“是的，”卡罗琳挑剔地说，“她身上也有像你的地方。瞧她的鼻子。你的鼻子长在男人脸上不怎么样，要是你不介意我这样说，但长在女人脸上可恰到好处，漂亮极了。要不然，我何必千辛万苦把她带在身边。小女孩的鼻子不是挺美吗？”

“天哪，是呀！”

我俯视婴孩，在我看来，她既不像诺拉，也没有长着哈里式的鼻梁，她只是一个婴孩，红红的脸蛋，胖胖的四肢，充分意识到正在被人欣赏。我抽了一口烟往后站。

“诺拉和我——”哈里开始说，马上又止住了，发出一声哽咽，抱起婴孩走到开启的窗边。当他把小孩紧紧地贴在胸膛，我看见他背部的肌肉绷得直直的，衣服起了皱，然后他一边摇她一边发出奇怪的声响。

“诺拉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他哽咽着低声说道：“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不明白。她多么快活，那天夜里她告诉我，她……”

“是的，那正是她在巴黎对我说的。她很快活，当她知道怀了孕，而且你也知道。”

“我要给小孩取名琼，”哈里说，仍然把婴孩抱在怀里，茫然地望着窗外。“琼！你认为诺拉会不会喜欢这个名字？”

“我知道她会。”

他转过身，把婴孩放在沙发上，开始陪她玩，小孩喜欢他。

“她笑了！”哈里抬起头，脸上满是惊喜。“你们听见她笑吗？”

“她知道是她的父亲，”卡罗琳说。

“天哪，婴儿怎么会知道这个？”

“我尽早把她送到你手那，哈里。你知道，诺拉——噢，诺拉出了事故之后，幸好我当时在巴黎。更幸运的是，我也快离开巴黎，所以才给你送得来。”

耳闻目睹这一切，我坐在那儿呆了。

“喂养婴儿的事，你得好好学哟，哈里，”卡罗琳尖锐地说。“不过，有书籍、托儿所这之类的可以帮忙，一两周之内我再来教你。”

“我愿意学，”哈里说。“看我学吧。”

“你当然愿意学，但是可别到处夸口会照料婴儿，比女人还能干。”

“要学会的，你等着瞧吧。我会照诺拉喜欢的方式把她抚养大。”

他充满了自豪感。那真是自豪吗？不，就在那瞬间，我看清了他的眼神，知道他并不在自我愚弄或愚弄我们。他突然发现了生存的理由，可怕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从此有了依托，这将恢复他与唯一贴心的事儿的联系。我瞥见卡罗琳足智多谋的微笑，怀疑自己怎么低估了她的智力。

“我已经恢复了工作，”哈里说。“我没有告诉你，可是我得到了。”

“在那个收音机商店？太好了！”

“从现在起，情况将会好转，”他说。“从今以后，我一定成功。”

“你会的。你会使诺拉和别的任何人为你感到骄傲。她不注视着你，你知道。”

我又一次惊讶地看着卡罗琳。

“是呀，”她继续说，“诺拉死之前恢复了宗教信仰，她相信会有来世。”

我知道卡罗琳说的这话她自己一个字都不信，但是哈里相信了。他的眼睛闪亮，萎靡不振的身子直了起来，头不住地点。

“是的，”他说，“是的。”

我们离开他后，在回她的住处途中，我问：杰罗姆知不知道这个婴儿？”

“当然知道。”

“是不是他的？”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要是真的话，他会更高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噢，乔治，我想还是告诉你吧。当诺拉和他一起去英国时，她自然以为问题解决了，他们将会一起生活。杰罗姆虽然待她很好。可是，不——他不愿那样做。她准是弄得他生活不安宁，神经分裂之类的事，闹得很不像话。他去西班牙之后，她倒变得特别安静，几乎同任何瞧得起她的人睡觉。这个婴儿的父亲可能是那几十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你知道，诺拉和杰罗姆有关系之前，她对哈里是忠实的。她内心里一直憋着，一旦开了头，就跑野马了，随便乱来。他们那些人常常这样做，你知道。”

“谁常常这样做？”

“像他们那种病态的人。他们的一半心灵是纯洁的，而另一半——你知道，他们不再明白自己是谁。可怜的杰罗姆，太够他受了。他谴责自己毁了她。”

“她终归要自我毁灭的。”

“我有同感。事实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责备谁，那该是哈里，他从来未让她感到满足。你能想象哈里满足像诺拉那样的女人？他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是——嗯，我希望他的第二个妻子不是性欲过于旺盛的人。我相信他会

再次结婚。”

“你真的相信？”

“哦，男人总能找到妻子的，假若他们真的离不得；”

我们相互道了晚安，空气暖和，我朝住处走去。但到了门口，由于心里很不安静没有进门；我折身往山坡走，直走进树林。一对男女手挽手轻声用法语交谈，星光从树枝间筛下，山下面城区的灯光闪烁发亮。我在一块花岗石上坐了半小时，感到自己被许多事物纠缠着十分困惑；想到杰罗姆，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再为他的行为震惊，他也被事物纠缠而感困惑，卡罗琳也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只要我们生活的时间一长。我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卡罗琳，我有一个预感，永远见不到她了。以后我的确没有再见到她。

同样，有好多年我也没见到哈里·布莱克韦尔。他和新婴儿消失在蒙特利尔的人海，很快我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二次大战后第一年的一天，我偶然走在舍布鲁克和圣凯萨琳大街之间的一条侧街上——我在蒙特利尔的活动范围已经缩小到市中心——猛抬头，看见他的名字闪亮在一家商店门前，商店经过整修，非常时髦，我从窗口望见哈里·布莱克韦尔本人，头秃得差不多了，还是以前那副梨形的滑稽身躯，可是现在穿得笔挺，举止更新。他正同一个身穿波斯黑羊皮袍的高个子女人谈话，看上去是那种只屑于跟店主或经理交谈的女人。当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一位在圣詹姆斯大街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问他知不知道哈里商行的情况。他告诉我，布莱克韦尔开的收音机和唱机商行不仅生意兴隆，而且在那一行里，他的上层主顾占了可观的比重，哈里自己则成了一位阔商人。

九

遇见卡罗琳以后几天，我开着新买的旧车到劳伦琴去看望凯萨琳和莎莉。我感到紧张而又别扭，半路上我甚至开始感到愤恨。我对凯萨琳的专注旷日持久，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用不着掩饰我的灰心丧气，有时我的确感到气愤，由于她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我；去劳伦琴的路上，我差点儿又指责她。为什么对我采取一副又接受又拒绝的态度？她会不会无意识地把她视作某种保险措施？她在与杰罗姆一起生活的日子，曾经给我介绍过几个女人，也曾要我只把她当作朋友而计划我自己的生活。这些没有任何用处。有她在我心里，我无法爱别的任何女人，尽管我也看上几个。

这些想法顿时化为乌有，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因为这小小子女人的面容已经衰老憔悴了许多。虽然娇小丰满的体型仍然保持着风韵。这个曾经一度享受美满充实生活的女人，而今陷入了窘困；这个当初深深爱着一位精力充沛的丈夫的妻子，而今只是为了女儿而活着。我想：在人生的旅途上，她又一次赶在我的前头。

我们坐在游廊上静静地闲谈，她初见我时的冷静态度，一上来便就事论事的谈吐，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她告诉我，杰罗姆给她留下一小笔投资，每年只有一定的收入，她打算拍卖掉别墅，希望秋天能找到一份工作。

“无论什么差事，全天工作我可能吃不消，”她说。“但是，我必须再有点儿额外收入才行。我的身体垮下来后，

父母接收了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但爸爸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活不多久了，同妈一起住是不可能的事。她吼着莎莉，仍然对我感到愤懑，尽管她自己没意识到。爸爸一死，她一定希望自由自在，那一直是她心中的追求。”

我俯视着杰罗姆曾经一边划船一边讲述童年的湖面，明白领略周围景色对于我们两人也将是最后一个夏天，我竭力控制住请求凯萨琳与我结合的冲动。我挣的钱并不多，但比起我在滑铁卢时所向往的薪金却超过一倍以上，按目前的价格，恰好能维持我们的生活。当然，这还牵涉到杰罗姆的问题。

“我想，他回家时你见到了吧？”我漫不经心地问。

“见到了。”

“他好吗？”

她的脸上像罩着面具。“这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杰克·克里斯托弗告诉我，他受了伤。”

“不错，但他并不在意。你知道杰罗姆在这类事情上的态度。”

“我同阿瑟·拉任彼交谈时，”我说，“他告诉我，杰罗姆厌恶共产党人了。”

凯萨琳呼吸沉重，我看见她的胸膛在隐隐起伏。

“我早知道他会厌恶他们的，当他真的认识他们。”她说，隔了一会又说：“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乔治。他陷进去了，我只能这么说；他陷得那么深，谁也搭不上手。这不像两个陌生人相遇，这——”她抬起手又放下了。“这真可怕，然而又不值得害怕，我们俩仿佛处于催眠状态。”

“列宁曾经谈到休眠的死人。”

“是吗？”她说，“他真谈过？”她轻声地笑了一下。

“我想他没有谈过休眠的女人吧？”

我感到受了攻击，孤立无援，被这句话刺得体无完肤。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

然后，我强作镇静，平铺直叙地说，“这场西班牙战争快要结束了。杰罗姆会马上回家吗？”

“我怎么知道。我怀疑他会。”

“你希望他回来不？”

“我怎么回答你，乔治？”

我看着她靠在椅上的娇小身子，脸上不是因为皱纹而显衰老，而是由于内心奉行的俨然不可冒犯的准则。

“有些事情现在越发清楚了，”她说“我想曾经告诉过你，杰罗姆和我之间的麻烦在于我们彼此爱得太深。那是当我情感混乱几乎不能思索的时候说的。可是现在，我发觉那一点不假——我们彼此爱得太深，相互都弄得精疲力竭了。人人都想幸福，而幸福多半依赖于有节制。我们彼此间的要求都不切实际，不可能达到。你知道赖克的这行诗吗？——

‘爱情在于此：两个孤独者相依为命，相敬如宾。’建立在这种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才能持久，而像杰罗姆和我之间的——”

我们谈了一会别的事之后，最后我问她是否知道诺拉·布莱克韦尔已经死了。

“可怜的疯女人，”凯萨琳说。“我可以怜惜她了，但不是由于她已去世。不，我不是因为她的死而可怜她。”

我记得杰克·克里斯托弗说过，凯萨琳的心脏开始出现

纤维性颤动，可是看上去她挺有精神，我觉得她的生命处于危险的说法不是真实可信的。我留心观察，她的行动自然缓慢了些，而且比我记忆之中的更为做作；她歇脚的时候比以往多，但她的身躯仍然轮廓鲜明，娇小玲珑，皮肤仍然柔滑滋润，头发还是黑黑的，富有光泽。在我眼里，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女人的魅力。她身上似乎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东西——我老早以前提到过这奇怪的力量，由于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词，曾称之为精神力量。现在，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它，仿佛它正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一直能到我的体肤。

“乔治，”她简单明了地说，“杰罗姆走后我的身体垮掉了，我不得不向自己提出困难的问题。当杰罗姆在身边，我生活得幸福美满的时候，我自以为不存在未来的问题，老陶醉在眼前的时刻——一天又一天。我依靠他的力量。而今——”她微微一笑，“像是要保护我。你别介意这个，乔治，我必须有话直说。现在我的问题很简单。无论如何，我必须努力活下去，让莎莉长大成人。”

这话使我无限震惊，我觉得自己的面色都变了，凯萨琳这时把她的手指覆在我手背上。

“我这样说话，你别大惊小怪。我还希望活一长段时间呢，可是我完全明白自己的精力消减了。莎莉是我现在活着的理由。可怜的小莎莉，她成了她妈追求的目标，生存的理由。”然后她的面容改变了，她微笑，笑得那么美丽动人。

“别以为我是在黑暗中挣扎，这不合事实。我从许多事儿中得到乐趣。我已经开始绘画，而且很喜爱它。很快——谁知道？也许就不再为杰罗姆操心了。”

那天晚上莎莉上床后，凯萨琳给我看了一封信。

“乔治，我让你读读它。一年前收到的，杰罗姆的继母玛特尔夫人写给我的。我只见过她两次，因为他害怕或者不好意思去看望他们，但愿她是我的母亲而不是他的。”

我拿起信，信纸宽大，字迹工整，用老式笔写成，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凯萨琳：

我知道他对你做的事很残酷，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轻易宽恕一个故意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的人，可是我简直不敢相信杰罗姆会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是好孩子，在家里的日子，我们每天为他向上帝致谢。假如你见过他那副可怜情景，当我们发现他的那天早上，见过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无论他干了什么错事，你都不会对他感到愤恨。你可能很悲伤，但绝不会愤恨。

亲爱的凯萨琳，当他还是一个孩子，逢着可怕的事儿之后又遇上战争。他战后回家的那一天成了玛特尔先生和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日子，而我们一直深信那会是我们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去迎接运载部队的船只，我真傻，双手竟然抱着水仙花——因为他的第一首诗咏唱的是水仙花，而且诗写得不错，比现在的一些诗还要有意思得多。可是，杰罗姆一进小屋便转身对我们说，我们是用神话和女巫婆的故事把他抚养大的，他这话指的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他对我可怜的丈夫说：他之所以酗酒，是因为当他喝醉之时才相信自己的生存不空虚。凯萨琳，我的丈夫从未喝醉过！杰罗姆那天的语言如此令人惊悚，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可是，我有什么理由

抱怨？我能说什么？我对战争毫无了解。他那时才十九岁，却经历了那么多恐怖的事，玛特尔先生和我真可怜，甚至想象不到战争会有多么恐怖。那天夜里我们伤伤心心地哭了。

玛特尔先生比我聪慧，第二天他对我说：“我们原以为仁善与慈悲将终生相随，可是这永远办不到，如果一个人想通过别人来寄托自己的一生。杰罗姆现在必须走自己的路了。”凯萨琳，这话在我听来太深刻了。我知道我们从未打算通过杰罗姆来寄托自己，我们只是为他感到骄傲。后来他成了一位医生，我们十分自豪和快活，想起我们在车站拾得的这个小孩，我们的小孩，终于成了大城市里普济众人的优秀医生。真的，我认为我们不曾以他为寄托，我们只是爱他，希望他幸福。亲爱的凯萨琳，他同你结婚时，我们多么快乐，我们再次感谢上帝的德行，因为你是一个理想的完美妻子。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你的身边，亲爱的凯萨琳。我心里明白，他会回到你的身边。当然我没想到自己，现在玛特尔先生已经辞世，我希望，我祈祷，快快跟随他去。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我们苏格兰人孤独而又多情善感。我喜欢那首玛特尔也欣赏的古老苏格兰歌曲《天国》，有时我独自低唱那几句歌词，唱到“像雪一般疲惫消融。在融雪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消融，消融，一切都像是一场梦。我丈夫逝世后，一切都不再显得真实，除了我记得的往昔时光和我期待与他重逢团圆的憧憬。有时我遐想，玛特尔先生在天之灵也许孤独寂寞，当然这样想是可笑的，因为他在

那儿不用人织补鞋袜，不需要人洗涤他星期日的盛装，这一切小事儿原是我十分乐意替他干的，他现在都一概用不着了。

亲爱的凯萨琳，为他祈祷吧；也别居高自傲，不愿为你自己祈祷。愿上帝保佑你对他的信赖持久，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从心底里相信，他本质上仍然是好人。愿他发现他所追求的和平，愿他早日发现上帝，因为那正是他真正的追求，而他一旦发现上帝，也就会发现他自己，发现你。这场梦迟早将终结，我们都会回到上帝的怀抱。我讲这些你别介意，这是一个老妈子的弱点，等你有一天也成为老妈子，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等于是向自己唠唠叨叨。

我希望此刻我不只是在对自己唠叨，亲爱的凯萨琳。我要向你重复我丈夫布道时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曾帮过我无数次忙。我丈夫不是一位出色的说教家，因为他的声音不宏亮，不相信别人会对他的布道发生兴趣。可是我一直喜欢他的布道内容，由于他总是道出我的心声；当他明确讲述我萦怀于心的问题时，我知道那的确一点不假。

他说的是《圣经》中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事情发生又过去了。这就是他引用的经句，但我丈夫引述的方式使熟悉的字句听起来迥然不同，获得了崭新的含义，他是这样说的——“事情发生——又过去了！”即是说，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为了成为过去。

我搁下书信，放眼宽阔的湖面和远近的群山，恍然不知

身在何处。我听见身旁响起凯萨琳的声音。

“那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她的字迹，六个星期之后，她去世了。”

凯萨琳拿着信走进里屋，剩下我独自眺望黄昏中紫气半掩的湖山。我想着那两位素不相识的和善可亲的老人，翻腾的江海可曾埋没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生过？

凯萨琳回来时觉察到了我的思绪，她说：

“我羡慕那两位老人。他俩生来只知道孤身只影，谁也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相信上帝，因而并不孤独。我羡慕他们，乔治，我羡慕他们。但愿我能信奉上帝。”

“我常常纳闷，你是否真的在这样做。”

“我既信又不信。我认为是我这可悲的心脏使我难以相信他。我小时候常常反覆祈祷，愿上帝赐福于我，使我同别人一样。不过现在，我倒真有感知他的时候。”

好一阵我们谁也没说话。天黑了，北方的夜晚，星星在万籁俱寂之中显得更加明朗。我坐着沉思，坐在那儿对凯萨琳充满渴望，我真有些忍耐不住了。我从来没像这时那样爱她，然而，过了好些时候我才明白——她当时就清楚——我自认为配得上爱她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她的境遇变迁相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境遇已经减损她，现在终于——我这时也日益成熟了——我能问心无愧，自信可以匹配得上她。

突然我听见自己说：“凯萨琳，请同我结婚吧。”

她的神情那么镇静自若，我相信她早预料到了我的请求。我感到她的手捏紧我的手，那只小巧温柔、指头细长可爱的手。

“啊，乔治！”接着又说：“亲爱的乔治，要是你恨我反倒好些。”

“别说这些。”

“即使我一时神经错乱，打算嫁人，也不梦想让你娶我。你还年轻。”

“事实上我们同龄。”

她微笑着说：“是的，我们的实际年岁相等。可是，不，亲爱的，你必须找一个真正的妻子，能给你生孩子，能妥贴地照顾你。”

我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一下把她搂在怀里，这是我们自幼以来第一次这样做，她一时软绵绵地靠着我，我激动得哭了。不一会她便挺直身子，转过头去，面颊擦过我的胸膛，她退缩了，默默地坐下。

“凯萨琳，我爱你！除了你，我谁也不可能爱，我试过了，试过了，不可能爱上别人。”

我看见她胸部一起一伏，举起双手蒙住脸，然后又放下手，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很平静地说：“我很抱歉，十分抱歉。我对你做了诺拉对杰罗姆做的事，做了几乎是他对我所做的事。我心里更明白，然而——啊，乔治，人们怎能这样彼此伤害？”

“是杰罗姆的问题？仍然是他？”

“也许。我怎么知道？噢，乔治，我——这如同丧失了亲人，比丧亲更难受，这是——我不能作决定。我作的决定太多，不可能再作了。和杰罗姆一起生活，我让他去决定，之后剩下我——只有莎莉和我，还有我的恶劣健康状况——我不能再作一次决定，不能决定。”之后她更加平静地说：

“我想说几句你感到没有必要说的话。”

我早已跪在她的椅子旁边，这时我站起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我对爱情厌倦了，”我听见她说。“我，我的整个身心，已被它弄得筋疲力尽。现在我正开始摆脱它，怎么能够再次正视它呢？”

我在黑暗中呆呆地望着她坐在椅子上的身影，她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

“乔治，亲爱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别以为我不想。可是我刚才谈的不是性欲而是爱情。满足性欲容易，太容易了。然而，你爱我，我爱你，却大为不同。我不配再爱人。”

“我不懂。”

“我希望你永远不懂，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也许会叫你震惊的事。一年前，我和一个我并不爱的孤独的人睡过觉。我原以为这样做会有帮助，但是不行。我回家后想起《圣经·诗篇》中的一行诗：‘从剑下解救我的灵魂，从狗的淫威下救出我的爱人。’这时我才明白，不可能轻易地解脱孤独。我受到了伤害，乔治。也许我会治愈伤口。如果我的健康正常——是的，我相信能够治愈。可是我不配再爱了，而你却有资格，所以你必须另外找人。”

隔了一会，她说：“说来好笑，不能真心信奉慈悲的上帝，却偏偏相信灵魂。然而，这是我们每个人到头来都得面临的问题。假若我强壮一些，我能忘掉它，可是我必须为它活着，除了莎莉之外，为它活着，直到疲惫不堪。这样讲说清楚了吗？难道你还不明白，乔治？我仍然是个相当年轻的

女人。以男人瞧我的神情来判断，我知道自己还是可取的人，可是——”她止住了，然后她十分沉着镇静地说：“我也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可活了。”

我想我哭了，但记不清，不过这无关紧要。不一会，我开车回城里，一路上她的情影浮现在我脑际，还能感到她软绵绵倒在我怀里的身子，那么温暖，贴得那么紧，黑夜仿佛都在悸动。我记起杰罗姆驾舟沿河而下直入大海的情景，我想他终于抵达了海面，陆地上再也看不见他那独木舟的踪影。而今我也到了海面，我想着感情和记忆的无边水库，上面飘浮着一个个脆弱的生命，直到水底变得深不可测。我还意识到，凯萨琳打算告诉我，爱情假若作为摆脱个人重负的出路，很快会成为一种监禁。“很好，”我大声说，“很好。”这时我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因为谁也不能预知他的实际感觉——也许我终于成熟了。如果爱凯萨琳便意味着作茧自缚，那么，我心甘情愿。

十

那年夏天以及那之后的几年，我的个人生活几乎淹没在世界仿佛要崩溃解体的混乱之中。随着一只又一只鸽子飞返家园栖息，一个又一个可怕的三十年代预言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我自己的生活的，我认识的所有人的生活，都丧失了意义。

我重访凯萨琳之后的那个夏天奇暑大热，蒙特利尔空气沉闷，热得像蒸笼冒气，比新加坡的夏天还糟，斜街小巷的垃圾高高堆起，臭气熏天。住在经济公寓里的人纷纷在日落

后坐上台阶和游廊纳凉，喘气，甚至从钟楼发出的鸣响像在敲青铜，听起来闷声闷气，死气沉沉。打雷下雨之前的天气。

在这种沉闷暑热的天气里，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忙个不停，感到死亡就要临头。不断有人打电话到广播大楼问我：

“斯图尔特先生，难道您真连一线希望都看不见？”“斯图尔特先生，请您别老告诉我们即将爆发战争。”或者问“斯图尔特先生，我的丈夫在比利时的伊普尔死了，我的儿子才十八岁，您为什么坚持说要发生战争？”

我们恍恍惚惚地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参加了战争。一个大败仗接着一个大败仗之后，第一个冬天出现了奇怪的平静，然后是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接连陷落：纳尔维克，鹿特丹，埃本·埃米尔，希特勒进入法国贡比涅森林。乐队奏起《英格兰常在》，飞行员在英国肯特郡的上空炫示他们的力量，流落在圣凯萨琳大街上的失业队伍加入了作战军队。

法国被攻陷的那周，我在华盛顿为广播公司办事。在这个中立国的参议院大厅旁听一次可怕的辩论时，我记起了杰罗姆。现在他在哪儿？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是有人看见他跟随共和派的一支残余部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我相信他被法国人拘留了，这表明他的护照要么掉了或者被偷了。这年的前一个冬天，我向渥太华打听过的消息，但外交部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一个离开祖国去参加西班牙悲剧的公民，现在他在何处？我想是死了，像我的往日那样，像我一两年内要死去那样。

返回蒙特利尔后，我便去征兵站报名参军。医生上上下下

下打量我之后，感谢我志愿报名，但以两条数据拒绝了我。于是我仍回到广播公司；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广播机构工作。

那些奇特的年月如今已经变得模糊了。当战火纷飞，风烟滚滚之际，加拿大终于不知不觉地成长为一个国家。加拿大一向谨小慎微，说得少做得多。当别的国家大出风头，沽名钓誉，她默默地站在一旁，现在她却变得朝气蓬勃，充满激情。我干的工作使我能接近这个变化着的国家的心脏。有时忆起三十年代萧条的加拿大，真是令人汗颜，那时无论什么事，除非与英美同潮合流，不会有人问津；想着这些，我不禁告诫自己，我已经在这儿找到了值得进取的适合于自己的目标。

战争风烟弥漫的三十年代成了往昔的记忆。我在哈利法克斯工作了一冬，编撰了一系列描写海军的广播稿，当时海军承担着大西洋上百分之六十的护航任务，却似乎不为人知。我渡海去英格兰一趟，访问了我们在那儿的一些军营。回加拿大后，继续从事日常工作。战争仍然进行，势头却扭转了。我去阿拉斯加公路一次，返回后又被派往美国，恰好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加拿大，整个战争期间，我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尽在于伏案工作。

正是在战争期间，我和凯萨琳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夏末，她为劳伦琴的别墅找到了一个买主。战争开始后几个星期，从市内的一家室内装饰商那里得到一份工作；不错，即使在那时，室内装饰这一行也有些生意。她把莎莉送到市里一所她自己曾上过学的老学校，很快便恢

复了信心。一九四〇年，她离开室内装饰商而从事战争后方工作，她每天只能工作一个上午，但却一直干到战争结束。同时，她利用闲暇开始学习绘画。

然后，一九四一年初，传来了杰罗姆被纳粹折磨至死的消息。

我比凯萨琳先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它先到达我所在的广播公司的办公室。我立即找到法国飞行员拉觉耶上尉，看来他是一位全面负责的人士，在加拿大组织一个自由法国人飞行战斗机队，接受帝国空军训练计划，战前他是法国军队的职业军官。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话。他告诉我，杰罗姆从法国关押西班牙残部的集中营释放出来后，曾打算逃往英国。可是纳粹迅速进入法国，他便加入了法国地下组织。拉觉耶没有目睹他的躯体用肉钩吊在集市场上，但他亲身经历了杰罗姆被捕的那次行动。他说曾经作过努力，想把杰罗姆从盖世太保控制下营救出来，但后来他手下的人告诉他，杰罗姆受尽折磨后被处死了，那人发誓亲眼看见了尸体。

这似乎成了定论，我离开拉觉耶时，心里很难受。但我马上想到凯萨琳，立即打电话给报界的朋友们，请他们不要传出具体的情节。我又一次感激蒙特利尔的宗族感情，虽然这会使外界人士恼怒不满，我在报界的朋友已经听到拉觉耶的说法，并且为凯萨琳着想，主动决定不张扬细节。而《新闻报》，正像后来我告诉杰罗姆的，还为他登了一则得体的讣告，称这位蒙特利尔旧日的外科医生在战争中英勇丧命。

可是，细节还是泄漏了，事情总是这样。一天，有个与凯萨琳只有一面之识的女人打电话问她受尽折磨的说法是否真实。凯萨琳听了自然十分震惊，于是这女人详详细细地对

她讲了，险些儿当场要了她的命。她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星期，当我去看望她时，仿佛是她自己受了折磨似的。

她恢复了。又一次跨过生命的铁栅，在栅的另一边逐渐强壮起来。我去看望她的次数日益频繁，彼此愈来愈离不开，最后她不再对我保持距离。到了夏季末尾，她想通了，“我不应当娶别的任何女人。与此同时她接到了加拿大政府关于杰罗姆死亡的正式确认。

在一九四一年感恩节^①的那个周末，我驾着车把凯萨琳开到城南的一个湖边，我的一个朋友在那儿拥有一幢别墅。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三天。那一带安宁静谧，是那个季节里世间最可爱的地方：湖水幽深，清澈见底，三种不同色彩的枫树，还有桦树、橡树、山毛榉和灰胡桃树连成一片硬木树林，如火如荼，从魁北克南面一直延伸到新英格兰的海边，树影倒映进沿途湖水，成群的候鸟展翅南飞。

“是的，乔治，”她说，“是的！”

三个星期后，我们结婚了。

十一

幸福是最难描写的感受之一，描写的困难使我渴望成为一位音乐家或画家，因为画家和音乐家与这种高尚的情感最有缘分，他会因此欣喜若狂而不会愁眉苦脸。在我看来，能够向上帝弹出一声欢乐之音或绘出色彩鲜明的赞美画面的人，比得上与神明同在或与小孩同乐的任何人。幸福能抹去时间。我们以劫难来衡量历史，凭风暴回忆天气，可是，和

^①加拿大的感恩节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平欢愉的时期——谁能加以描绘？

“到处是芳草如茵的绿岛……”难道不是真的吗？多年之后，我们铭记不忘的正是绿色的幸福岛，即使我们不能讲述它。难道不是真的吗？虽然我们能描绘痛苦，却记不住它像什么样子？杰罗姆对我说过，大自然的最大善心在于这个奇特的事实：谁也记不住痛苦。你能忆起感受过的痛苦，惧怕它再次回复，可是痛苦本身——外科医生用锯子锯在没有麻醉过的骨头上，你却不可能记住。然而，欣喜的时刻你却记得清楚，甚至连同当时的兴奋情绪。安静而又兴奋地做爱感受，多年之后还能回味，还会存在。

幸福没有匆匆忙忙来到我和凯萨琳的跟前，相反，它像北方的夏季天气，在冷飕飕的春季后才逐渐地露头。我又听见她的笑声，看到她脸上脱去了一些皱纹，看见她与成长的莎莉之间出现新的自由自在气氛。幸福在新朋友的脸上找到自身的影子，对我来说，它最动人之处是我亲自目睹世间的美又显露在凯萨琳身上。她曾经感到失魂落魄，现在却发现了自己；正像我也失落多年，这个世界不景气了十多年，现在也发现了自己一样。

现在，凯萨琳懂得什么是美，正在绘画的实践中学习如何捕捉美。而今她接受了自己的病体，没有必要拒绝这个事实：美的最微妙的特征便是稍纵即逝。

战争结束了，这个国家继续发展。现在我的名气虽然还不小，地位却牢固地建立了。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三十年代仿佛已经退隐淡薄，成了过去。愉快的年月，富裕的生活，美妙的日子，芳草如茵的绿岛处处皆是……。我们一起生活，生活得美满，直到她被损害的心脏第一次不可避免地

发病之前。我们的生活真切充实，生活中的大小情景迄今仍历历在目。即使是现在，我还能在春天的早晨回味到凯萨琳往日在类似清晨所流露出的喜悦；或在雾气缭绕的黄昏，我还能看见她眼里洋溢着安详恬淡的幸福神情；或在烛光融融的晚餐桌上，当一个俊俏的中年妇女朝身旁的男人嫣然一笑，我便立即忆起凯萨琳也曾如此笑过，当她发现这位初次上门的客人具有她喜爱的长处。那些美好的年月，充实的年月，我数不清这些年月里与我们有过接触交往的人，这些往来丰富了彼此的生活经历。现在，当城里下了第一场雪，太阳照在雪上，住所忽然显得更加明亮，我又一次看见她眼里的神情，仿佛在说：“又见到这景象了，叫人多么高兴！”她的绘画愈来愈生气盎然，充满欢愉——在这个国家，我还很少见到哪个画家的作品具有如此浓艳的色彩；许多画家认为，除了秋天之外，这片国土总是阴沉沉的。我们在乡下培植了一个花圃，旁边安了喷水装置，热天里摆动器转动，四处喷水。我们跟季节的关系日益密切，彼此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用不着掩饰过去。她曾经以整个身心对杰罗姆说“是的”，现在她也向我这样说了。

这些年里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俩年纪都轻，但内心里却感到年老了。按一般人寿命，我们正当中午，然而我们明白自己实际上已到黄昏，尽管我们谁也没有用这样的比喻。我们心照不宣，寿命是有限的。幸运的是，这黄昏却是我们一生中爱得最深的时候；一个晴朗日子的黄昏所包含的黎明和早晨，并不亚于夜晚孕育的希望。

莎莉长大上大学了，凯萨琳的乌黑头发露出了第一根银丝。这个国家继续强大富裕，年青一代已身高六呎，希特勒

和大萧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些名词而已。美满幸福的年月，斑鸠在春天里的啼叫听起来特别清晰。凯萨琳的心灵创伤似乎完全愈合了。她对杰罗姆的爱情消退了，像一只受伤的生物沉没到了海底。时光掩盖了一切——包藏和揭示一切变化的时光，充满新朋友的时光，充满生机、兴趣和爱情的时光，以及带着喜悦，看着孩子长成一个女人的安详时光。

十二

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行，是魔鬼发出的一句断然命令：跟我来！浮士德的探索经历完结了，永远幸福的美梦化为泡影。一直抱着嘲讽等待他的魔鬼说一声“跟我来”，一切便烟消云散。我总是想起这一行，每当我听见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激越优美的乐音一再出现阴郁不祥的恐怖变调，除了勇气和艺术之外，一切都会战战兢兢。从首曲的主题看来，这一变调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人，也会预感到变调的必然性，然后调子果然变了。同样，我们的生活随着凯萨琳第一次出现心肌梗塞也产生了变化。

梗塞来得很猛，像一柄利剑直接威胁她的生命，使她整个左侧肢体瘫痪了几天。我一连好几天提心吊胆，不仅为着她也为着自己。我对疾病深恶痛绝，就像犹太人与希特勒不共戴天。

可是，凯萨琳渡过了难关。她身上的巨大生命力，几乎被扼住止息之后，又聚集起不可思议的力量，医生对此也声称难以理解。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养，她好起来了，在乡下

住了一季之后，她身体复原了。左眼帘由于神经系统的损害略微下垂，但这反而增添了她的奇特的美容，到今年秋末，她差不多恢复到正常了。

我只是说差不多，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她不可能再同别人一样。无法避免的事终于发生，它曾经埋伏在我们前头，正像三十年代的战争曾悬在我们前面一样；现在它发生了，像发生在四十年代的战争。这之前她早知道头上有柄只用一根马鬃悬着的利剑，现在她尝到了它的利刃，抬起头还看见它在那儿。

一年之后，那把剑又落下一次。凯萨琳身上令人惊讶的生命力再次聚集，瘫痪之后她又恢复了。

我冷静而又平铺直叙这些经历，因为我只能如此。每一次的发病都是她的宿敌对她生命的打击。突然我似乎感到我们差不多被她的命运孤立了。我开始注意有些朋友以畏惧的眼光看待她的困境，他们善良而又周到，赞叹她勇敢和快活无忧的精神，可是有时候他们一想到我们，准会很痛苦。他们也是接近中年的人，到了这个地步，生命的最后敌人不再是一句空话。他们看见了敌人出没森林的路径，听到了它在夜里的呼号，发觉了它的怒火留下的痕迹。他们知道敌人正在安插它的第五纵队，安插在他们的动脉、瓣膜、器官、他们抽的香烟和他们生活中所承受的紧张压力。有的朋友看着凯萨琳的目光，同我看着希特勒时代德国周围的弱小国家时的目光一样，那时的希特勒像是万能的命运。尽管年龄还轻，凯萨琳将首当其冲，率先承受等待着一切人的打击。

调门的改变，情势的转折——生活的基调和旋律在四十年代的最后两年似乎突然改变，这仅仅限于我们？我想不

是。毫无疑问，整个世界在这段时间跨过了一道界线，人们都被逼过着非常奇怪的生活。

在三十年代，我们年轻人由于愤怒和明显的困境而联合起来；战争期间，我们被恐惧和明显的危险团结起来。可是现在，在原子弹的阴影下繁荣富裕，我们似乎都害了原子恐怖症。无论到哪里，我都看见人们只顾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谁也不再唱高调发宏论。当思索的问题大到无法思考的地步时，干嘛去动脑筋？当你知道即使想停下来也不可能时，干嘛考虑何处去？当你即使知道了答案也无济于事时，干嘛问这问那？

在三十年代，老约翰·多恩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当他宣称谁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岛屿，每个人都是陆地的一部分，大陆的一部分。在艰难的萧条年代，我们至少不是孤立隔绝的，而到了这些繁荣的岁月，我们却恰好是。各种神祇，无论真假，统统荡然无存。几年以前，钟声为大众敲响，现在却单独为一个个丰裕的孤立家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情形，也是许多人的生活情景。我同凯萨琳的生活变得与世隔绝！我有许多朋友都感到格格不入，不合时宜！新的生活基调多么不同了！

当然，凯萨琳知道她一生的大部分是真正度过的，最好的光阴已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现在到了她生活的最后阶段，我原先视为她性格的东西不再具有多大价值，她的性格几乎都溶进了她的精神。我当初认识并钟爱的凯萨琳如今仍然历历可见，回味起来甚至很有趣。但是，本质的凯萨琳——现在这个本质的凯萨琳是什么——有时在我看来，仿佛像一个毁坏不了的生命力容器。

然而，她常常轻松愉快。在公众场合，她只字不提自己的病（除非作为借口），当她受人邀请而又感到身体不适。莎莉对母亲的挣扎似乎很少意识，由于凯萨琳对她隐瞒得非常成功。说她内心悲哀有什么意义，当她绘出如此艳丽的画面？大约每隔两周，她就更换一次挂在我床脚头墙上的图画；早晨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这画，这表现——不表现凯萨琳，而表现她对生活的热爱，这已深入她的骨髓，几乎到了与个人无关的地步。

最后，我们到了我在故事开头时所描写的这个冬天，这时我几乎也相信自己能够承受与她共同生活在剑下的命运，直到这把剑最后斩下来。这时我差不多也相信自己获得了宁静。这时我暗暗自诩，我的勇气与她的相当了。

真正的斗士绝少被人一拳击倒。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总是接连出击才能打败敌人，而每一击之后，格斗的局面都在改变，被打击者的反应能力和接受能量也在变化。

我几乎不知道——尽管自以为完全知道——最后终结的巨大而又可怕的含义，实际上可说是一无所知。

海里的鲨鱼也许看不见，但它在海里；同样，在无意识的海洋里，恐惧也潜在那儿。

站在磐石上的人也许相信自己坚强，可以永远屹立不倒。但是如果发生地震，他会在哪儿？他会成为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我可以说当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杰罗姆死里复生，重新出现。可是很快我就会弄明白。我也将发现自己——以及每个人——想要知道和感受的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将活着并知道我们先辈满怀信心称做上帝的神秘力量有多么巨大。

第七部分

我去渥太华会见部长并将与阿瑟·拉任彼交谈的那天，故事真正开始了。那天，没有任何熟人看见杰罗姆回到蒙特利尔，在那家声名狼藉的破旅馆过了一夜之后，他结帐出来，在一个安静而又整洁的地方找了个房间，然后不顾寒冷，沿街漫步。他既没有打电话找凯萨琳，也没有和我联系。他不停地走着，直到浑身乏力，冻得半僵，才回到住房躺下睡觉。

这种举动的原因很简单。整整十二个可怕的年头，他靠着对凯萨琳和莎莉的朝思暮想熬过来了。现在他终于活着回来见她们。这曾经是他的目标，生存的目标，正像往日获得自由的希望使他能在监牢里苟延残喘了牢房的生活他已完全熟悉，当自由终于到来，他反倒惶恐害怕。

那十二年里，杰罗姆一直心神不安，担心他回家时凯萨琳已经不在人世。现在他发现她没有死，只不过同我结婚了。

因此，他独自度过那一天，内心的活动不难想象。第二天早上，他往我们住处打电话，听见凯萨琳的声音，他问当天下午可不可以去看她。下午两点他去了，凯萨琳独自在家。

现在我得向你描述他的模样，尽管这样做不容易。

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仍然很有生气，但全变得铁灰了。左面颊上有一小块三角形的深陷的伤痕；右手有两根指头，左手有一根，向外张开成八字形，这是纳粹拔去指甲后又用铁锤敲砸指骨的结果。他的身体比我记忆中的瘦削，结实而并不强壮，步子更加迟缓，走路更加颠簸。从前，他看上去精力横溢，脾气暴躁；如今他能安静地坐着，一连几个小时。

身体上的这些变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他给人的印象不同了。相貌固然老了不少，但并未完全改变；唯有神情不同，使他在世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辨认他不难，当你再次熟悉他，还能从他面孔窥见一个孩子的影子——在哈利法克斯长大的那个孩子，梦想着山顶上有一座俯瞰大海的白色城市。现在，他的面孔呈现出一种——唯有一个词恰如其分——透明。

你知道，杰罗姆像凯萨琳一样，也是死而复生。

她让他进屋，看见的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一个人，可是他看见的凯萨琳却与我眼里的凯萨琳不同，因为和她一起生活，她仍然是我记忆中的凯萨琳。他带着离开她时的印象，却看见一个与往日相仿的娇小女人，但面貌衰老多了，头发里露出了灰白，还有此刻相见的表情变化。一瞬间，两人都看到了不再存在的过去。好一阵子，他们几乎像在冥界相逢的一对夫妻。

我只知道他们的部分谈话，虽然更多的内容不难推测。他们先说了些见面套话，但在这些话的掩盖下，心灵却在交流。他们目睹的彼此面貌的变化渐渐隐退，直到相互之间重又感到熟悉。这时，杰罗姆瞧见墙头上她绘的几幅画。

他踮起脚仔细端详，然后转身对着她，她也看着他。

“这是你作的画！你！”

“是的。”

他在外面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欣赏绘画，听音乐的时间也少得可怜。看见这些绘画，他哭了。

到这时凯萨琳才打破冷淡的保留态度，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不一会，两个往日相爱的人抱在一起，紧紧搂住彼此熟悉的身体，心神恍惚，泪流满面。然后她突然推开他，默不作声地坐着，他在壁炉对面坐下，几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有讲话。

她注视着他的双手，裂成八字形的指尖，对此他感到很窘。

“我没有垮掉，”他简短地说。“我想活着回来对你说。”

“我知道你没垮，”她说，“因为你是垮不了的。”

“后来关在牢房里，我在睡梦中还想念你，伴着你的面容。”

“我在想象中看见你关在监牢里却不能入睡。”

户外，二月的阳光斜过雪地照在光秃的榆树枝干上；常年出沒的松鼠在雪地搜寻残食，天寒地冻，几乎一无所获；深蓝的寒冷天空，隐现出半边扇形的月轮，一颗暗淡的北极星发出四条白毛状的亮光。

“我曾希望还能与你做爱，”他直截了当地说，“可是现在你同乔治结婚了。”

她看看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凯特！”他嘶哑地叫道“凯特！”

然后他控制住自己，朝她画的一幅画久久凝望，最后他的面孔——后来凯萨琳告诉我——变得宁静，她从未见过的宁静。沉默许久之后，他对她讲述了一段奇特的经历。

在中国的时候，他相信已经到了生命的边缘。这之前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但内心里总不完全相信。反抗的本能总是顽强地挺住，无论在严刑拷打面前，在艰难险阻面前，在失望沮丧面前，或是在显然绝望的困境里。他常常孤注一掷地向前闯，像童年时驾着独木舟沿河向前冲撞的那天夜里。可是，他在中国患了阿米巴痢疾，没有抗菌药可服，只好等死。他实际上是一名囚犯。没有人管他，虚弱到了极点，有生以来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说，假若他信上帝的话，唯一的祷告便是请求死亡。

但是他的体魄抵制了死亡，他的心智濒于死亡之后重又活动起来。他渴望读读什么书，但是没有书可读。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

杰罗姆一直记忆过人，童年时在哈利法克斯就能背诵《圣经》中的福音书和许多诗篇。现在为了保持神志正常，他下意识地回忆。日复一日，他努力追忆圣经故事的细节；就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与此同时变化发生了。

“一天我醒来，耶稣似乎在囚室里陪着我，我不再感到孤独。他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人，不是教堂里的那位耶稣，也不是那个为我们的罪恶而死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死而复活的

人，表面上他曾经死亡，就像我心里我曾死亡一样。”

隔了一会，他对凯萨琳说：“你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对吗？”

“对，”她说，“不止一次。”

“乔治对此能理解吗？”

“乔治完全没有这种体验，杰罗姆。”

然后他说，我能想象他那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他能做到让你在死亡的阴影中生活吗？”

“不知道，我不希望他一定得这样做。”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再次端详壁炉上边的绘画。那是凯萨琳作的一幅近似于自画像的画面：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在打秋千，沉浸在周围绚丽夺目的色彩之中，色彩夸张，欢快热烈极了。然而，画面本身也给人难以形容的强烈印象，因为那小姑娘面貌模糊，简直就是所有年轻姑娘的抽象概括，她陶醉在春天里，融融自乐。她的头部像花梗上低垂的花，那恬静的孤独美不可言，透彻了人生的底蕴。

凯萨琳看见他的目光盯在画上，便说：“我不停地画，因为那是我能做的一切。虽然没有用处，却是我的寄托。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不可能留下什么值得被人记住的东西。”

他看着她说：“被谁？陌生人？”

“我想是的。”

“很要紧吗，能否被人记住？”

她苦笑着说：“我希望说不要紧。”

隔了一会，他说：“凯特，我仍然了解你，你也了解我，我们之间的了解程度是从来没有人有过或者可能达到

的。有些事我错了，普通男人的错误，但在有的事情上，我一直是正确的。”

“是的，”她说，“我从未忘记这点，自那以后我一直怀念着呢。”

“迟早你会明白，凯特。很快你就会明白。”

“你能告诉我明白什么吗？”

“不，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它显示在你脸上，”她说，“无论那是什么。”

过了一会，他说：“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个男人，仍然渴望向你做爱，再做一次也好。”

她抬起头：“为时已晚，杰罗姆。”

“凯特！”

他俩体内的活力正在枯萎，甚至对杰罗姆来说也一样。

我想他意识到了这点，因为他立即记起她的心脏。这时他像一位医生向她走去，把耳朵凑近她的胸部。他以一个医生的敏悟，听清了我常常听见的声音——他的耳朵像听诊器那样灵敏；然后两人相互凝望，用不着讲话，彼此心里都明白了。

“哦，凯特，假若我不曾发疯，咱们便不会错过这些岁月了。”

“或者说，假若我不曾令你失望。”

她羞涩地笑了，接着又收敛笑容，像我所知道的那样，沉着自然，解开她的家常便服，让他用嘴唇舔她的乳房。他亲吻她，两人相互喃喃地呼唤着名字，然后她被搂在他怀里一齐躺在沙发上；他静悄悄地躺着，纹丝不动，她还以为他睡着了。他们这样静躺了一小时，起码他得到了单独与她一

起的机会。最后他站起身来，这时室内已经昏暗。

“眼前的事乔治受得了吗？”他单刀直入地问。

“不知道，杰罗姆。他待我一直很好。我一直爱他，从未掩饰过。这与你和我一起的体验不同。”

“他会感到愤慨吗？”

她侧过头去，没有回答。

“他会不会对你这样做感到愤慨？”

“他自己认为不会。”

凯萨琳躺在沙发上仰望着他，知道他发生了巨大变化，知道他需要她，但同时明白他作为一个男人已经走在她前面去了，她自己也必将如此。

“上帝保佑你，”他说。他说这话时我能想象他面部的表情。“感谢上帝让我再一次见到你。”

“谢谢上帝让我有机会见到你。”

“几天内我就要离开蒙特利尔，凯特。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仍然能工作，尽管不如以前了，西部会有需要我的地方。我绝不会再打扰你。”

她转过头去没有说话。

“我离开之前能不能见莎莉一面？”

“我想你应当见她。”

“她会不会愤恨我？”

“会的，但她真见到你，就不会了。你是她的父亲，杰罗姆。”

“我回来你高兴吗？”

“你知道我高兴。”然后又露出她那奇特的一笑。“我不敢肯定我知道，但你心里明白。”

他躬下身亲吻她：“不枉回来一趟，凯特。尽管历尽千辛万苦，这番奋斗完全值得。”

她听见他走到门边，门开了又关上，最后只剩下她一人。

她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直躺了一小时，然后当她意识到体内产生了难受的骚动，惶恐的心情慢慢地不可遏制地加剧，她明白这是心悸的结果。她起身到盥洗间取水，但心脏悸动时她感到一阵昏眩。她上床躺下，浑身冰冷，牙齿直颤。她自己把了一下脉搏，伸手抓了毛地黄药片吞下，然后静静地躺着，这时室内漆黑了。

我心里充满奇怪的担心，甚至是内疚的感觉，当我从渥太华回家跨进寓所。我发现屋内漆黑，叫了一声，没有听到动静。我到凯萨琳的卧室，拧开电灯，看见她娇小的身躯缩在床上，眼睛睁着。她看见我，但不带任何亲昵的神情，像是我与她毫不相干似的。我不禁感到愤怒涌上心头。

然后，我观察到了她身上别的动静：她的颈动脉在痉挛地跳动。我像杰罗姆那样，把耳朵凑近她的胸膛，听见她心脏不规则地突突直跳，像是死亡在聒噪。我从来没听见它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

她仍然是那副漠不相干的神情，我以前从未见她对我露出这种神态。我把她当做我的基石，我的救星，而现在这基石动摇了，救星隐没了。这变化不纯粹是她的健康状况引起的。

我听见她说：“乔治，能有宽恕我的一天吗？”

“宽恕什么？”

“宽恕我给你一生带来的不幸，从你十七岁起。”

我站起来，从窗帘的板条空隙外看，看见白雪熠熠生辉。

“你见过杰罗姆了吗？”我问。

“几小时之前他刚离开。过些时候我会告诉你，现在不能。”

“没关系。”

“别恨我。要是你恨我，我可受不了。”

“恨你？”

我转过身，看见她那张瘦小、扭曲的面孔泪淋淋的，苍白而又没有生气。我在床沿坐下，拿起她的手。她侧过脸去。

“太难受了，”她说。“我作了多大的努力啊，现在疲惫不堪了。”

我把了一下她的脉搏，大吃一惊。“让我打电话叫杰克。”

“你自己先吃饭，过会儿就好了。这只不过是——”她差点儿啜泣——“啊，乔治，我多渴望强壮却又如此虚弱！我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

我去吃饭，寓所里半小时没有声息，正当我吃好饭时，我听见她尖声叫喊，立即赶到她房里，看见了我不愿见到的表情，这表情随着一声“跟我来！”的命令出现了。但很快又变成我所惧怕的安详镇静，这一次比她生命陷入危险的表情还更为安宁。

“为我祈祷，乔治。”

她的沉静几乎把我怔住了，她的美——相信我——忽然变得像天使一般。

“怎么回事？”

“奇怪的事儿。”

“我叫杰克来。”

她的生命垂危，当我走向电话机旁，我却想到她和杰罗姆，以及他们之间或许出了什么事。是的，我在捉摸这个。因为我记得进屋时她的神情，明白她已经远远离开我。她一直属于杰罗姆和我两人，真正地属于。她仍然属于我们两人吗，精神上——如果不在肉体上？

杰克的电话服务员告诉我，能够找着他，一刻钟之内就能和他通话。

回到卧室，我坐在她身边，看见那张苍白的脸从枕头上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我需要她胜过她需要我。我意识到她前两次发病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她病倒了，我却感到我更需要她。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我听见她轻声说。“愿上帝永远不让你尝到这滋味。”

我当时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现在也不懂；我只是原封不动地记录下她的话，我相信她的意思是说，我不明白她受身体的束缚有多么难受。

她突然气喘吁吁，坐起身紧紧按住腹部。

“又发生了，另一次栓塞。”

“不！”我叫道。“不可能！你的两眼和面孔都同平时一样。”

“这次不是脑栓塞，”她细声地说。“而是在这儿。”

我看见她双手紧紧按住腹部，面容紧张，充满恐惧和痛苦。这时，我不再看见我所了解的凯萨琳，我所钟爱的女人，而只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正在为生存进行挣扎。

我看见她嘴唇颤动，头往下点，明白她需要什么。栓塞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恶心呕吐。我跑去拿了面盆捧在她跟前，她体内翻江倒海，吐得一塌糊涂，我揩干她脸上的汗，把她的头扶向枕上，坐等在那儿，像过了几小时似的，门铃终于响了。

杰克·克里斯托弗来了。重新检查一遍，又经过熟悉的程序，二十分钟后他来到我等候的客厅，面色严峻。

“像是小肠栓塞，”他说。“但似乎又不像。”

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后，他坐下来呆呆地望着，神情紧张，惴惴不安；他虽然严肃，也喜欢凯萨琳。

“我想顶好告诉你，”我说。“杰罗姆还活着。”他两眼睁得大大地看着我。“是的，他活着，就在城里，我去渥太华的时候，他今天下午来看过她。”

我一直钦羡杰克的自制力，但我从未见过他这时的反响。他的眼睛呆了一下，双唇紧闭，透过他那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我感觉出了他闭口不说的一连串想法。

“嘿！”他说，然后纳闷地简短一笑。“你也见到他了吗？”

“一两天前我在电话上同他谈过话，但还没有见到他。”

“你不应当让他见凯萨琳。”我耸了耸肩，他接着说：“哎，他到过哪儿？”

“到过波兰、俄国和中国，老在蹲集中营。”

“你不应当让他见她。”

我没有吱声，只凝视着地板。杰克要我 say 什么呢？我比凯萨琳软弱得多，怎么能自作主张，替她作决定？

“话又说回来，”杰克说，“也许只好这样办。她迟早会知道。”

“是的，我想只好那样办。”

“我想你认为这次栓塞——也许不是栓塞——无论什么——你认为即使他不出现，也会发生这次栓塞吗？”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我说。

“总会发生的，在过去十二年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次手术？”

“也许，”杰克说。

他走到电话前，拨动号码，我听见他同医院的某个人说：“给安德鲁大夫去电话，我希望尽快见到他。”

我麻木地盯住地板，因为安德鲁大夫现在是比米斯纪念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我麻木地盯着地板，因为这些年来凯萨琳和我都认为，她经受不起另一次大手术。

我走进她的卧室，看见瘦小的身子缩在床上。当我替她收拾衣物用具，她没有吭气，甚至门铃响了，两个勤杂工和一个实习医生拿着担架进来，她也没说一句话。可是当我们上了救护车，我坐在她躺卧的担架旁边，实习医生坐在对面，救护车鸣着喇叭直往内日区驶去时，她的勇气恢复了，像一个小姑娘似地微笑着，挤了挤我的手指说：“有趣！除了乘救火车，这是最惬意的事。”

三

一个人能多年承受某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相信自己承担

得挺不错。他可以约束自己，自信完全知道那恐惧是什么。但恐惧来到之际，他也许会发现出乎预料，比猜想的大得多，迥然不同，奥秘莫测。他也许会发现那负担已经改变了他的本性。那个时刻一旦到来，恐惧会像毒剂在他身上发作，他连自己也不能辨认。“跟我来！”谁能预料他会有什么反应，当他听见这样一声命令？

我在医院等候了两个小时，无所事事；与此同时，医生们在一起会诊，进一步检查，作X光透视。然后，外科医生在杰克的陪同下到日光室来看我。他说必须等温度正常后才能决定怎样做。动手术是可能的——从外科医生的表情看来，我猜他相信有必要——但他们得等待。

“让我开车送你回家好吗？”杰克说。

“谢谢，我宁愿步行。”

户外，空气清爽，寒冷，颇有些不同寻常，城市像一条舰艇在浅蓝的寒空下朝北停泊着。袭人的寒气包围着我，我需要温暖，需要一醉，需要寻找另一个自我。是的——另一个自我。“我娶她之前，我只是我，”我喃喃自语。“现在我却成了她，而她生命垂危。”要是山上有酒店，我会立即去喝个酩酊大醉，因为我想忘记自己还活着这个事实。假若她必须死，让她此刻就死吧。死的过程太难堪了。就此了结吧。就此了结吧。

我冒着寒冷回家，一路上举止很失身份。

可是我还是步行到家了，一进公寓大门，热气冲得我头昏脑胀，我等了几分钟才去开启自家的门。我想莎莉准回家了，记起该在医院时给她去电话，可是没有这样做；相反，我独自坐在日光室里，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别的什么怪物，

陌生而又令人讨厌。

我进屋时室内几乎一片黑暗，但我记得原先让灯全开着的。莎莉睡了吗？这时我看见两个身影晃动，相互分开，明白她把阿兰·罗伊斯带回家来了。她看见母亲的门关着，以为她睡了；没有瞧见我的影子，以为我外出未归，于是两人在沙发上并颈而卧。

“先生！”阿兰说。

我太疲倦没有答话，脱下衣帽挂在壁橱里。我没有戴耳套，一路上寒气袭人，耳朵几乎冻僵了。我背后的灯亮了，我看见莎莉的背影，她显然在漫无目标地凝望窗外。

阿兰俏皮地一躬说：“先生，我吃了一惊。我相信，您只是感到惊讶而已。敢问可否借花献佛，为您斟一杯您自己的威士忌，先生？”

“不，谢谢。”

“这是在我的地位上能尽的一点点心意，先生。”

莎莉转过身说：“阿兰，别再讨赏卖乖的。”

我坐下，掏出一支香烟，阿兰以戏剧性的动作给我点燃。我靠上椅背，努力思索。即将开始的生活，就要结束的人生。我对眼前这两桩事同样感到愤懑。

“阿兰，我想你该回家了。我有些事想跟莎莉谈谈。”

“会有那么严重吗，先生？”

“你似乎觉得很怪，阿兰，但我并不想和莎莉谈及你。”

他从我的面部表情察觉，有什么严重的事儿发生了，便立即改变声调，表现出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彬彬礼节，我觉得这是挺可爱的。

“这不干我的事，先生，但真要是与此有关，我十分抱歉。”

莎莉猛然省悟，便问：“是不是妈的事？”

我点了点头：“我刚离开医院。”

我说了这话，霎时间，在莎莉这姑娘心上阿兰几乎不存在了，而近几天来，她除了阿兰外谁也没想过。

“是的，阿兰”，她说，“你最好回去吧。”

她拿出他的穗饰披巾——或者叫做别的什么名儿的海军补给品——替他穿上；当他弯曲膝头时，头发掀动，活像一条粗毛狗。他把手臂插进披巾，说：“晚安，先生”。

“晚安，阿兰。”

当莎莉同我单独在一起时，我把医生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她讲了，因为这时我比她更虚弱。她追问了几个问题，我更感到难以应对，我知道她是很能干的年轻生物学者，专门针对她母亲的病例查阅过许多医书。当我告诉她栓塞似乎在小肠，她面色刷的白了。她知道一旦确诊为栓塞得立即动手术。

“我马上去医院，”说着，她便去壁橱取外衣。

“不行，别干这种事。你母亲刚服过镇静剂，情况要有变化，他们会打电话来的。”

她坐下点燃一支烟，愁眉深皱。就在几天前的夜晚，她还坐在这个沙发上沉溺于爱情，容光焕发，现在她的美梦烟消了。

“我父亲今天来过这儿没有？”她问。

“来过。”

“他对此有无责任？”

我不耐烦地转过目光，有气无力地说：“我怎么知道这些？咱们把这归咎于上帝吧，是他给了她这么一颗心脏，早在你出生之前。”

“乔治，你疲倦了。床上休息去吧。”

我筋疲力尽，步履蹒跚；上床后房间仿佛像引擎在跳动，眼前掠过可怕的情景，我知道处于这种状况根本没法入睡。我感到像醉汉，虽然一整天我才喝一杯威士忌。我眼前浮现出在劳里埃大厦的餐厅时阿瑟·拉任彼的面影。天啦，我们谈杰罗姆时离现在不是刚过了十二个钟头吗？

我感到额上冰凉，那是莎莉的手指。我羡慕阿兰的好福气。我的潜意识支配着我。莎莉是女人，可爱的年轻女人，我的潜意识希望她是我的妻子。

“谁也不会询问‘莎莉身体好吗？’”我听见自己喃喃地说。“大家都知道莎莉身壮体健。上帝，我烦死了那句常年不变的问候——‘凯萨琳身体好吗？凯萨琳身体好吗？’从现在起，咱们称呼她凯特吧，她被称作凯特时从不生病。当她是凯特的时候，她的身体好极了。”

莎莉的手指还在安抚我，隔了一会她说：“请你别这样难受。”然而我的老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我恍恍惚惚，忽这忽那，完全忘乎形骸。

“一想到她望见阳光我就受不了，”我听见自己在咕哝。

“什么，乔治？这是什么意思？”

“当他们用手推车送她进手术室，如果阳光照耀，她会知道那将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了。”

“请你坦然些，乔治。请你！”

她的手指继续抚摸我的额头，本来的我几乎消失了，我的潜意识希望我年轻二十岁，生命尚未虚掷，她就是我的妻子。

“将会像飞龙那样尖叫长鸣，”我自言自语。

“你在胡诌些什么？”

“苏——美月球快车。”

之后的事昏糊不清，我想是睡着了。清晨我独自醒来，一眼瞥见凯萨琳贴在墙头的欢乐画面，我感到暂时的喜悦，接着记起了我在哪儿，她在何处。床头时钟的指针表明才六点半，往医院打电话太早了。可是我心里老等着听电话铃声，不能再睡。我躺在床上等了一小时的电话，这时屋内静悄悄的。

“这是破坏！”我喃喃自语。“破坏了她，由于她的缘故也破坏了我。是的，她破坏了我，杰罗姆破坏了我。生活把我们都给毁了，白白地毁了，白白地，白白地！”

七点半，我起床外望，穿过活叶窗条板，望见近处的房顶屋檐挂着冰条，映出黎明的瑰丽色彩。啊，多么美丽的早晨！滑雪者在北方的洁白原野上自由驰骋的大好早晨！在这样美好的早晨，谁的下意识里也不会产生恐惧。在这样美好的早晨，感到健康吧，感到年轻，感到清白恬静。啊，在这样的早晨感到年轻，真是洪福齐天！

我穿上拖鞋和晨衣，朝电话旁走去。

“没有任何变化，斯图尔特先生，”值班护士说。

“她晚上的情形怎样？”

“她服了镇静剂。”

换句话说，她一夜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在无边的黑暗

里跌跌撞撞，陷入一条又一条的无名暗道。

我从电话旁转过身来，看见披着金发的莎莉，像户外的早晨那样清新，面容像挂在天空里一丝云彩上的太阳。我把护士的话转告她。几分钟后，我静静地躺在一浴池热水里。

啊，可怜每个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的人：在冠冕堂皇的自我意识之下，他不是他自己而是原型的人。

命运，我在想，谁是它的对手？因为接受命运便意味着接受这一个事实：我们的一切作为，一切成就，一切忍耐，一切为之感到骄傲和羞耻的事，都不过是一场空。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我如此想着，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

四

只有把一些难于阐述的问题，成功地加以说明，我才能继续讲述这个故事，并让其后发生的事具有意义。

一个被人爱着的人病情危急，尤其当这人年纪尚轻，往往使有关的人失魂落魄，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使得他们“不省自身”，不知道自己的思想言行；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对潜在的自我更加熟悉，对于自己的真实面貌反而感到陌生。这甚至能够动摇其生存的根本基础。

萨姆骚塞·毛姆宣称：苦难绝不会使人变得高尚，实际上会令人堕落。这话确实具有其粗野的真实性。是的，粗野的真实性。但不完全是真理。我重说一遍，这是很难加以阐明的。

患上凯萨琳那样的疾病是活生生的命运所致。但她的命运却不是由于她的性格造成。我在故事的开头说过：有些人

心地狭窄，只能容下一丁点儿我们算做精神的神秘东西。而另一些人心胸开阔，他们的所谓性格却又经受不住压力而炸裂。我再说一遍，这神秘的东西可以创造，毁灭，再创造，唯一能与无情的命运抗衡，将人生与无常绑在一起。

凯萨琳的精神随着她的命运日益明显和不可避免，变得愈来愈强大，愈来愈坚定。她的生存勇气使我感到敬畏，甚至也使医生们敬畏。像这样下去，这样奋斗挣扎下去——究竟为了什么？只是为了闯一道难关又一道难关不成。在我看来，她不像一个拳击手，被击倒后一再爬起来再挨无敌对手的拳头，而更像一只小鸟，抓在猫的爪里还想继续戏谑。这猫便是上帝。

她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她经受严峻考验的开始。前几次发生栓塞与这一回不同，那几次的情形我不了解其严重性，她自己也不完全了解。我一直像初上战场的新兵，心惊胆战，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但相信死亡会落在别人头上。现在我知道无法退出这场战事，知道或早或迟，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我面临着我深信是千千万万人所面临的恐怖。

这恐怖简要地说便是：别人教导我们视为可爱的父亲的上帝，似乎对人们漠不关心；别人教导我们视为最公正的上帝，显然不理睬人们所理解的“公正”一词的含义。凯萨琳为什么必须这样受苦受难？为什么坏蛋居然身强体壮而她却受尽疾病折磨？

你也许认为我说得太过分，我觉得并不过分，因为这些疑虑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甚至无神论者也不例外。

我们大家在本质上都是孩子。一个小孩希望快快成长，

表现良好，由于他想获得父母的爱。如果没有获得爱的希望，干嘛要奋斗？还会在乎吗？

但是当孩子变成中年人，这时谁能履行父亲的责任？靠理智不能持久，靠能力和成功不是长策。一个男人也许会把他的妻子或子女摆在神的地位，作为他存在的支柱，生存的理由。女人更容易这样办，她比现代男人更容易顺应自然的格局。可是很明显，男人需要拥戴一个神。于是三十年代，我们努力把政治制度奉为神明，崇拜它，为它效劳。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替代物没有那样能永恒持久。一旦到了妻子死亡的时候，又依靠什么？一旦孩子长大离开家庭，一旦国家成了——事实上如此——一伙公务员的组织机构。

这时，尽管我们口头上不承认，巨大的恐惧降临了。因为要是一个人不能相信他也在为别人服务，不能相信人生的奋斗存在着意义，他在感情上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我们可以断言，正像蚊蚋飞向嬉闹的孩童，我们奔往随意宰杀我们的神祇。不过，我们活着时不能长久那样信仰，人类的尊严不允许。

我知道，像我在凯萨琳经受严峻考验期间抱有那些想法的人，世间上到处都是；其中许多想法使人感到惊骇，感到羞愧。可是瞧她——如此勇敢，又如此脆弱，她的美正被摧残，她的生命正被吞噬。这是为什么？我在这儿，受尽悲伤和哀怜的折磨，为她处于危难而烦恼。她在那儿，知道即使能好起来，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健全的女人。而我知道，她多么害怕自己成为负担。与此同时，没有退路，不能临阵脱逃，唯有忍耐承受。等在前面的只是一条可怕的暗道，即使到了另一头也没有希望。我——还有她——能否相信这场

奋斗具有任何价值？

最初，我不能信，我的人性起来作对。遇到类似的情形，无论是我或别的任何人都会一样。

我的潜意识抬头了。贪婪的、色情的、幼稚的潜意识，真理，半真理、五花八门的混乱思想，不加选择不作鉴别的发现者，这一团交织着憎恨与爱情，谋杀与拯救，诗意与毁灭的大杂烩，这股暗藏在每个人心灵里的污泥浊水，一旦淹没了它，它会多么迅速地抹掉他毕生培植起来的品性！

这时，一个人会沮丧地发现，他确信为自身特性的东西，只不过是漂摇在海洋里的一叶扁舟。这片海洋汇合了暗河流来的污秽脏水，到处是鲨鱼、浮游生物和折射的光线，既可怕又神奇，多年来似乎一直沉睡在那叶细小的扁舟——他自身的特性——之下。

现在海水暴涨，它里面的怪物露出了头角。渺小的人，现在怎么办？海水暴涨了，周围的一切形态不见踪影，在海洋风暴的黑暗里，看不见形体，迷失了方位，一片混沌。渺小的人，现在怎么办？

我终于发现，这就是人生斗争的性质。在内部，而不是外部。表面看来平平静静，可是内心里谁也无法用言辞描述这场斗争。谁也无能为力。然而有人曾经描写过它，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谁。

他们是音乐家。在几位音乐家的作品里，你能听见心灵里光明与黑暗进行的这种搏斗的每一个场面。你能听见所有矛盾着的人所共有的恐惧、希望、要求和激情，重新分裂，再次融合，协调一致。你能听见——几乎能看见——破坏创

造，再破坏，再创造的内在过程，最后达到可能的唯一的和谐，那即是生存、热爱、发展和知足的意愿，忍耐一切的决心，含辛茹苦的毅力，充满希望的憧憬，为了获得先辈称作上帝的荣光而作一切必要的建树的信念。剩下来便是为此奋斗不息，劳作不辍。

在音乐里，你能听见这种斗争演变为广阔无边的音域，它们好像世间的阳光冲洗在各种科学事实的表面。你能听见巴赫的精神。贝多芬的精神，如此博大浩瀚，不断从一个区间涌入另一个区间，霎时间充盈了整个宇宙。

最后，达到了新的和谐，外部的一切似乎丝毫未变。渺小的人仍然渺小，但在内心里，他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内心里发生了似乎唯有音乐家才能记录的活动：恐惧与勇气之间，爱与恨之间，惊骇与无畏之间，耻辱与荣耀之间，绝望与希望之间——在自身特性暂时丧失的海洋里，人所共有的一切矛盾斗争——达到协调，从而接受人性的最高境界。音乐家能够表现它，而且很怪，表现得很别致。一个音乐概念用小调以某种速度表现出来是屈服，绝望，悲不欲生；同一个概念用大调以号角和木管乐器演奏出来则是对生活的欢乐召唤。同样，黑暗可以转变为光明，否定可以转变为肯定，憎恨可以转变为热爱，恐惧可以转变为勇气，失败可以转变为胜利。谁能理解心灵的这些东西，除了人自身的心灵？圣保罗正是这样说的。

因此，对于人类困境的最后辩护——这也是上帝自己的最后辩护——在于看到感情的神秘性，在顿悟的瞬间，它懂得这是无足轻重的：上帝似乎不理睬人们所理解的公正的含义，上帝只给予生命。他给了那怕只有一年，一月，一天，

一小时，仍然是一项赐与。太阳的温暖，空气的抚爱，花儿的姿容，风中的浮云姿态，即使只多具有一天观赏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也算是福分。——人生的束缚同时也是人生的自由。

我为大地安放基石的时刻你在那儿？答话吧，如果你知道。

因此，暂时你可以那样理解。

具有那种理解，感到光明在移向自身的黑暗——即使只有一霎那——这是任何人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体验，而有过这种体验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五

与此同时，凯萨琳陷入黑暗与混沌，一连几天她处于痛苦和危险之中，我可怜她但又毫无办法，我对她的爱情也帮不了忙，正像几年之前，她对杰罗姆的爱情也帮不了忙一样。我的潜意识开始向我叫喊：让她死吧。让她去吧。就此了结算事。

医生们认为，她很有可能死去，但出于职业上的原因，他们心里颇不安。他们无法作出准确的诊断，认为是栓塞却又不肯肯定。在我看来，她仿佛在掩盖症状。安德鲁斯大夫希望开刀，相信手术无可避免。杰克·克里斯托弗却拒不允许，除非体温正常，因为在她身上动手术是一桩冒险的事。所以得让她等待。

这期间，别的事冒头了。我挤时间又在大学里上了一次课，为广播公司准备了一份广播稿。我查了一下帐目，知道

这病要拖久了我会陷入债务。莎莉不能从我这儿获得帮助，便转向常常与她一起的阿兰·罗伊斯。我愈来愈感到害怕，变得更容易发脾气，陷入绝望。要是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和忍耐，竟得到如此结果，那么无论怎样，到头来都是白搭。还有别的事冒出来。

第二天，哈里·布莱克韦尔打电话来了，我心里诅咒他的声音，因为我把他全忘了。

“你答应同我取得联系的，”他责怪说。

我告诉他，我曾经外出，而现在妻子又病得厉害，希望这会使他放下电话，事实上却不奏效。

“我为你遇上的麻烦感到遗憾，”他说，“但我吃的苦头已有多年了。玛特尔在哪儿？”

“一点儿也不知道。”

“为什么向我撒谎？瞧，我是挺认真的，向我撒谎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

“我没有撒谎，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调子。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显然，哈里的潜意识也俘虏了他。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谴责杰罗姆，这时我突然感到他把我自己埋藏的感情讲出来了。在这之前，我真正相信自己从来没有厌恶过杰罗姆。现在我却发现自己憎恨他，恨不得损害他，仿佛我以前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似的。我心里惊恐，由于惊恐我感到气愤。而这时哈里的仇恨又在电话上冲着我来，我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在叫喊，“不，那不是真的。你爱他！你爱他！”我对哈里说：“看在上帝面上，别打扰我。我快疯啦。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警告你，我要找侦探插手。”

“即使你把整个警察部队都搬来，这与我何干？只要别打扰我，一切都行。”

“啊，”我听见他说，“我知道你在保护自己的妻子，免遭非议。”

“我妻子免遭非议？你疯啦？”

“她一开头就全错了，”他以一种奇怪的强硬声音说。

“像她那样的女人，根本不应嫁给他那样的男人。”他停了一下，然后说出使我毛发竖立的话来。“像她那样的女人同他那样的男人一起，一定会糟糕透顶。”

“去你娘的！”我破口大骂。“滚开！”

我挂了电话，离开时还听见他强硬的声音：“全是她的错。”

有事要做，对于我来说，总有做不完的事。于是我回到桌边，努力静下心来工作，但却不可能，因为我耳边还不断响起哈里·布莱克韦尔令人震惊的声音：“全是她的错！”我望着窗外的雪喃喃自语：“要不是为了她，你能想象自己现在的情形吗？你怎么知道自己现在会像什么情形？那些年我爱她，她却是杰罗姆的妻子。现在杰罗姆回来了，她又病了。你得到她的疾病，他得到她的健康。而现在，你只得到她的死亡而已，别的一场空，因为你自己也完了。”

电话铃响了，这是莎莉打来的电话。她在医院里，说话时声音镇定，像杰克·克里斯托弗在对病员讲话。

“乔治，我想你最好先吃点东西，然后到这儿来。体温终于正常了。”

我舒了一口气，紧紧地握住话筒。“我明白了。”

“手术预定在三点钟。”

“我立即就来。”

“不，”莎莉坚定地说，“先吃点东西。我现在就回她身边去，他们替她作准备时我得出来。她的精神状态好极了，她叫我别担心，要我转告你别担心，她真了不起。”她的声音哽了一下，我听见她强忍着不哭出声来。“谁能象妈这样了不起？”

我喝了二两威士忌，煮了一个鸡蛋，沏好茶，烤了两片面包。我正在喝茶咽食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杰罗姆。这时我完全不客气了。

“哼，你想找凯萨琳吗？”我说。“嘿，这一次你干的好事，看来很可能你再也同她讲不了话啦。你刚一走，她的小肠便出现了栓塞。你比我更能判断，她度过这次手术的希望有多大。”

“不，”我听见他轻声的说。“不！”

“是的，”我厉声地说。“是的。”

沉默之后，他问：“她是不是住在纪念医院？”

“不错，可是你别管。以前你几乎毁了她，现在又回来，看来你要她的命。我读到过破坏型的人，我知道一切都被你毁了。杰罗姆，死后的男人不咬人，死后的女人不斥责人，你就甘心了吧。”

“乔治——请等一等，我必须——”

他的声音充满了悲痛和悔恨，迫切地了解细节，可是不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再回到桌边喝茶。电话又尖声地响起，我知道是杰罗姆，让它响了八次。然后我穿戴好衣帽，走进寒冷的户外，在街角处叫了辆出租车。

开车的是一位老相识，从车内的照片知道，他名叫罗米

欧·普罗诺沃斯特。他的看法是，生病自然可怕。他认识凯萨琳，而且喜欢她，知道几天前一辆救护车送她进了纪念医院。“仁慈的上帝有些奇怪的主意，”这是普罗诺沃斯特深思熟虑的看法。他的理由是，遇上麻烦的玛特尔太太是一位可爱的女人，而艾利森太太，住在同一条街上也用他的车的女人，没有任何麻烦，偏又不讨人喜欢。

我付他车钱时，他探索地瞧了我一眼说：“这一次真的很糟，是吗？”

“恐怕是很糟。”

“我能做点什么不？也许我能效点劳吧？”

我想着凯萨琳处于黑暗的边缘，怜悯灼热了我的眼底。我想看凯萨琳幼年的情景——她惊喜地叫喊，看见松鼠回到窗边多么高兴，我对事物的无常感到愤怒，肺都气炸了。我想着凯萨琳还是个年轻漂亮姑娘的时候，她高叫：“我要活！我要活！”这时我心里也喊叫起来。她所有的奋斗，一切的丽质，全部的爱情，整个的艺术，统统的努力——到头来还是濒于死亡的境地。为什么要这样奋斗挣扎？为什么如此顽强不息，艰辛地活命，如果这便是最终的结果？

我用法语对普罗诺沃斯特说：“要是你愿意，请为我们说声万福。”

“是的！当然。一定。”

他的目光凝视着我的眼睛，顿时他的善良使我深有感触，他的善意纯洁而又真诚。

我离开他后走进医院，在电梯厢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默默地站在我身边，忽然从翻腾的潜意识海洋里浮现出施韦策《巴赫传》中的一段话：

“注有数字来表示和弦的低音，”巴赫曾经为自己的学生写道，“是最完美的音乐底调，演奏时左手弹注明的音符，右手配上和音和不谐和音，合奏出一支优美的曲子，赞颂上帝，抚慰灵魂。”

上帝赏不赏识那些绘画？我猛然想起她为了描述它们而活着的那些图画。她为生存而斗争是否有助于表明上帝的光荣？需要这种奉献的该是多么丑恶的神？那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神吗？我大大地“呸”了一声，实习医生瞅了我一眼。

我沿走廊到了日光室，在那儿见到莎莉，她告诉我他们还在为凯萨琳作手术前的准备。

“杰克是不是在那儿？”

莎莉掩盖心里的恐惧，说道：“好像看见他那政治家风度的侧影高耸在一群辅助医务人员中间。”

我们等了半小时，一边等一边朝向走廊，企望见到杰克的影子，或者走来一个护士，告诉我们可以看看病人。大约二点半钟，杰克瘦长的身影出现了。

“你好？”他招呼莎莉，用手抚摸她的金发。“你好，乔治！坐下吧，我把知道的告诉你们。”

可是他没有谈到任何新鲜的东西，我问她的神志怎样。

“好极了，”他说。“她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病人。”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看看她？”

“你可以看她，乔治。但这位年轻姑娘——”他瞟了一眼莎莉，说了一句笨拙陈旧的医务笑话——“我愿陪她几分钟，磨砺一下我的生物学。”

凯萨琳前几次出现危机时，脑栓塞使她的神志处于半昏迷状态。现在她却神志清醒，我进病房时，她娇小的身子躺在床上，她的表情使我大为惊讶。她面带微笑，神情快活，看上去至少比头天晚上年轻了十岁，甚至显得很开心。

“看来我有一样长处，”她说，“即是病而不悲。这也许是我喜欢生病的缘故。当我病倒，我喜欢炫耀自己挺得住。我多年来没听说过有谁像这儿的医生这样吹捧我。能具有某种长处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我抓起她的手，细小的手指攥紧，疼得我直畏缩。

“你瞧？”她说。“我像狮子一般有力。安德鲁斯大夫说我像狮子那样勇敢。可是，必须像头狮子那样勇敢才能活着该多烦人。”

她微笑得活像个小姑娘，左眼帘微微下垂，嘴唇淘气似地绷着。

“住院的医生被我搞得莫名其妙。我希望他们以我来打赌。也许他们已经下了赌注，我希望他们这样办了，因为我将胡弄他们，乔治，我真会的。”

她比我坚强多了，我感到渺小到了极点。濒于死亡边缘还如此快乐——哦，不，你要活下去，你必须活下去！

“向我作点许诺好吗，乔治？”

“许诺什么？”

“今晚喝个大醉，换一副面孔，开开心去。我不能多和你谈了，手术过后，我一定要叫人大吃一惊。”

一个住院医师进来，见我们在一起，露出职业性的微笑走开了。凯萨琳朝我眨眨眼。

“那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千里迢迢，从加利福尼亚到

这儿来实习，跟安德鲁斯当助手，他把有关家乡的事儿统统告诉了我。户外像什么样子？”

“糟糕透了。”

“那么用今天这个日子来干这一切倒不坏。我还想到别的事——你知道吧，当我再次恢复健康时冬天不就过了吗？我真等不得，真想去看你上个秋天栽的郁金香。”

她的欢乐有些做作，因为他们给她服了兴奋剂，但也不全是药物的原因。她身上那种神秘的东西，那令人惊奇的力量，在支配着她，每次处于危急的时候都这样。在她那神奇的力量面前，我渺小到了极点。我从窗口外望，看见蒙特利尔被白雪弥漫了。普罗诺沃斯特开车来时，空气中只飘着碎雪花，而现在雪片绕着檐边屋角愤然翻飞，寒风滚滚，雪片被卷成一条条白柱；看不见天空，城市一片迷濛，交通中断，没有行人，唯见漫天遍地的白雪。我想，这也好，至少你不必看见阳光了。

我转身回来，我喜爱的面容已收敛了微笑。无限地温存，无限地明智，我相信，如果此后便再也见不到这副表情，我将悲不欲生。她望着我，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手。

“乔治，亲爱的，请别把这归咎于杰罗姆。”

“依你说的吧。”

“不是依我说，不。我必须见他。等这事儿过了，我会全告诉你的。要是他打电话，就告诉他我在这儿，情况良好。你一直是很和善的。”她的目光搜索我的眼睛，看出了问题。“求求你——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亲爱的——请你继续和善待人。”

“好吧。”

她把我的手凑上她的面颊，我感到她发热的体温。

“我这辈子何等幸运。”

我在她身边跪下来，她的头从枕上侧过来，一双大大的眼睛充满了爱，凝视着我。

“我们一起生活得多么美满，你和我。我这辈子真幸运，我太感激了，我可以为此歌唱。”

“凯萨琳！”

“同大多数人相比，我的一生太美满了。”

“凯萨琳！”

“乔治，亲爱的？”

“什么？”

“我绝不会出什么事儿——总之，不会是这次。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从未感到她向我表露过如此多的情意——“乔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答应我一件事，以免我为你担心。”

“什么事？”

她的眼睛含笑望着我：“万一我死了——再次结婚。”

“凯萨琳！”

“一定。结婚满有趣，而且你不像杰罗姆，你生来是个作丈夫的材料。”

“凯萨琳！亲爱的凯萨琳！”

“噢，还不至于。我希望，还有一长段时间。但是只管记在心里。”又露出小姑娘似的快活微笑。“我将渡过这一关，还要继续艰难地活下去。除开这些，我还得绘画！它们已酝酿在我心中，有一幅已经蠢蠢欲动，像莎莉在腹中踢第一脚。乔治，我要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等着瞧吧。等这事儿

过了，我将不停歇地作画。舍布鲁克大街的美术馆会为那一天感到悔恨，他们说我只是一名业余画家。”

“当然会的。”

她用嘴唇擦吻我的手，两眼清澈明净，最后又朝我微微一笑。

“好啦，亲爱的，现在到莎莉那儿去。他们随时都可能来我这儿。”

她的头转过去，微笑收敛了，她的面容变得像个谜。我所知道的凯萨琳再一次消失，变成了她动员起来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力量。我看着她，她脸上露出一项警告，一道命令，要我离开她。我离开她时几乎全身都瘫了。

六

用车把她从手术室推回来之前一小时，雪停了。不等他们动完手术，白天已去，黑夜降临。莎莉和我从窗口望去，看见整个蒙特利尔白晃晃的，带着北方城市在一场大风雪涤净空气之后所特有的清晰。整个世界一片雪白洁净，铺盖着滑雪者渴求的厚雪。

阿兰·罗伊斯走进我们所在的日光室，身上挂着穗饰披巾，脚上一双大雪靴，看上去不修边幅，像个庞然大物。现在他和莎莉站在一盆棕榈背后交谈。这次住院开刀使他们有机会比一般年轻恋人更加接近。我仔细端详阿兰的侧影：鼻子略扁，下巴宽厚，嘴唇有力。我喜欢他眼睛周围的纹路。尽管她又害怕又难受，他把她说笑了。他还说了些别的话。看起来，他比我年长得多，她与他亲密的程度远比同我亲

近。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可是我的妻子——我抬头一望，看见杰克·克里斯托弗站在门口，安德鲁斯大夫在他背后。我起身迎向他们，腿脚却像泥塑木雕似的。

外科医生打手势叫我坐下，莎莉起身去问情况，也示意她坐下。我看见他的白褂子汗湿了，面上显出一位将军经过一场激战后的神情。

“这个，”他开始讲话，简洁地向我作了手术过程的职业性描述。

听起来很可怕。正像他们所推测地那样，肠里出现了阻塞，但却不理解体温为什么显现得那么慢。我觉察到两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我知道外科医生打算早些开刀，内科医生却非等体温显明后才让动手术。假若两天前动了手术，凯萨琳的情形会好一些，杰克看起来神色沮丧。无论如何，现在手术完成了，安德鲁斯大夫替她切除了两呎半小肠。他说要是对于她的生存能力有把握，他会多切除一呎。

“几天后多半会恢复，这是很可能的。”他说。

“咱们得走着瞧。同时我必须告诉你，她目前很虚弱。”

这话听起来像是死亡的判决，杰克·克里斯托弗的面孔恰好与宣读判决的法官的脸色没有两样，虽然他一个字都没说。

“回家去，斯图尔特先生，”外科医生说。“喝点镇静剂，好好睡一睡。恐怕你还得辛苦几天。可是我想她会闯过来的。她有一副了不起的体魄。”

我站起来，心里感到莫名其妙的气愤。“我的上帝，如果她说得上具有一副了不起的体魄，你怎么给‘体魄’这个

词儿下定义？”

他投以我一瞥好斗的目光：“顽强活下来的能力呗。”说着，粗暴地点点头离开了我们。

杰克多呆了几分钟，但他意识到留在这儿对我们不方便，于是声称要去看另一个病人，走开了。阿兰给我一支香烟，我默默地抽着。我去大衣兜里掏出带在身上的酒瓶，深深地喝了一口，坐在那儿。像青年人在某些场合那样，阿兰呆坐着不吭气，莎莉神情紧张，一动不动，她的面容看来至少有三十五岁。隔了一会，一个护士出现了，告诉我可以见凯萨琳，但只能看一眼。

如果你熟悉动过大手术之后的情景，便知道我进病房后看见了什么：一个瘦小的形体躺在白色的床单上，一条胳膊插上静脉注射针，另一条插上输血针，嘴张着喘气，一根软管露在外面，另一根引向伤口；掩盖在绷带下面。房里弥漫着不自然的暖气，蛇舍式的温暖。五小时以前她还有说有笑，勇敢无畏，充满爱情，现在看上去却被摧垮了。

我回到莎莉身边时，浑身惊骇得麻木了。

“咱们离开这儿。咱们出去吃点东西。”

莎莉询问地凝视着我，神色惊恐。我粗声粗气地说：“你听见了安德鲁斯大夫说的话。你听见的，不是吗？还问我干啥？”

她的下唇颤动，但没有哭出来。我想莎莉身上也蕴藏着不少神秘的力量。这时阿兰，一个大熊般的孩子，伸手挽住她，把她颀长紧束的身子拉到自己的庞大身躯旁边；他朝我咧嘴一笑，说了句不得体的笑话，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们穿上外衣，走下楼梯，进入户外的寒冷空气。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仿佛现在还能看见它。蒙特利尔在一场大雪后的那些冬夜之一，当天空闪现出几颗伯利恒式的金色星斗^①。景色如此迷人，一时令我感到振奋。

然而两小时之后独自躺在床上，黑暗降临，潜意识的海洋又升起了。

七

到了第三天，天气以蒙特利尔惯常的方式变化了。上个星期的严寒干冷让位于从南边吹来的温和空气，山顶上照着金色的阳光，温度迅速上升到融雪的高度。街道上的冰呈现出吹拂过加拿大初春气息的痕迹：紫蓝色的斑影，冰的表面像鱼肉般坚实而富有弹性。出租汽车司机罗米欧·普罗诺沃斯特一大早开车送我去医院，告诉我冬天接近尾声，毫无疑问春天正在降临。

可是当我缓慢走进她的病房，我的步子不带春天的轻快，心里没有春天的光明。从护士脸上，我只领会到一个信息：她的死只不过是几小时或者最多一两天内的事了。房里躺着她弱小的身子，不省人事，软管露在外面。我完全一筹莫展。

离开医院，我拖着僵硬的腿脚，艰难地在城里走动。别的还能干什么呢。中午时分，我在一家旅馆的酒吧间停下来，喝了两杯酒，酒的效力只是促进了我的潜意识活动。我走到街上，空气有了最初的春意，风和日丽的晴朗日子，街道

^①伯利恒：耶路撒冷南六英里地方的一个市镇，耶稣降生之地。当耶稣出生时，伯利恒的上空出现金色的星斗，东方三智士即根据金星方位找去该处朝拜圣婴。

挤满了活泼愉快的人们，但在我眼里，他们都仿佛正濒于死亡的时刻。一位可爱的嘻嘻笑着的姑娘像一具腐败的尸体，身上满是蛆虫，扭曲不安，然后我看见凯萨琳也像这样。接着我充满怜悯、害怕和恐怖，因为我眼前浮现出一系列万花筒似的往日情景：小姑娘时候的模样，她说：“这就是我，请大家别介意！”然后是她与杰罗姆结合的那些年月，当我潦倒失意却一直爱着她；然后我看见杰罗姆，恨他，想把他杀掉。我步履艰难地在城里走来走去，希望自己是别的什么人。我又喝下更多烈酒，半晌午的时分撞回家里，我的外表神情令莎莉震惊；我进入卧室，一头倒在床上。黑暗在我四周咆哮。

后来得知，那一天举止古怪的不止我一个人。哈里·布莱克韦尔也深深陷入他的潜意识里。

那个相貌荒唐、梨形身躯的小人物，如今兴旺发达，手头富裕，雇了两名私人侦探追踪杰罗姆，其中一名在杰罗姆进我们的公寓大楼时找到了他，立即去告诉哈里。哈里的商店离得不远，叫了辆出租车跟即赶到。杰罗姆见我们的寓所没人，便同大楼管理人交谈了一会，出门时哈里正等候在那儿。杰罗姆跨出门槛，没有认出哈里，他的第一个知觉便是脸上挨了功力不足的一拳。

杰罗姆没有偏晃，吃过了过去十多年的苦头，被一个陌生人揍一拳并不使他特别吃惊。

“是你！”哈里气喘吁吁地冲着他说：“你回来了。是你，你这畜生。”

杰罗姆伸出两手，抓住哈里笨拙的手腕，仔细端详他的

面孔之后才认出他。哈里像孩子似地挣扎，不一会他发现自己在同比杰罗姆的体力更庞大的东西搏斗。

“我很高兴见到你，”杰罗姆平静地说，“因为我正在设法找你。”

仇恨遇到和气，哈里想朝他吐唾沫。

“哈里。”杰罗姆以同样平静的口气说，“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你还活着！”哈里两手挣扎，杰罗姆放开他。现在他的手腕自由了，两只手却无力地垂在两侧。“你还活着！”他又轻声地重复说。“可她却死了。”

“是的，”杰罗姆说。

两人相对注视，我可以想象，杰罗姆的目光对哈里·布莱克韦尔会产生什么印象。现在哈里咕咕啾啾，半带哭泣地说：“她是我所有的一切。她是爱我的唯一女人。现在她死了你却活着。你需要什么女人都能得到，可是你偏偏把她拐走了，她是我的一切。”

“不，”杰罗姆平静地说，“她不是你所有的一切。”

哈里举手又想动武，但没有举到腰部的高度。

“她的确死了，哈里。你的这些举动没有那一桩能使她活转来。”

“你也该死了才好。”

“我常常这样想。可是我没有死，你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然后，他盯着哈里的眼睛说：“我打电话找你，因为我有事儿告诉你。你是真心诚意钟爱诺拉的唯一男人，为她干了一个男人所能做的事。你是她所尊敬的唯一男人。她尊敬你，哈里，真的是这样。”

哈里凝视了杰罗姆一会，然后周身开始颤抖，发病了。一个送货人从公寓楼里出来，视而不见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就像在蒙特利尔的闹市区，人们不理不睬地经过争执的场面。哈里颤抖着站不稳身子，杰罗姆扶住他，用自己的手绢替他擦嘴。街边停着一辆车，杰罗姆打开车门，扶哈里进入车内，两人坐在那辆陌生的车里，哈里逐渐清醒过来。

过了一会，哈里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似地说：“我经历了一些事。”

杰罗姆没有回答。

接着哈里说：“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爱着她，现在改变了。她仿佛一直在我周围，现在不再是这样。当我见到你，我……”他说不下去了。

“当你见到我，”杰罗姆镇静地说，“你发现经过这些年之后你却真正地恨她。我不是指她和你一起生活，你爱她的时候，我是指那些年之后。”

哈里周身发抖，突然叫喊道：“别接近我的女儿，不然我要……”然后，他看见杰罗姆的面部表情，不吭声了。他开始啜泣，两肩颤动，最后他说：“帮帮我！”

杰罗姆说：“你自己干得不错，哈里。”

哈里大声问道：“你也恨她吗？”

“由于有她，我恨自己。”

哈里瞪着眼直叫：“她是个臭婆娘，我为她做的一切她毫不珍惜。为了她我像女人一样活着，料理家务，她却把我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感谢？她明白我情愿为她去死。是的，我情愿。我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大家都夸我们家整洁。她从不认为我有什么

能耐，她在家时别人也这样看。她明明知道。可是我用事实表明他们都错了。我挣了不少钱。我本来应当为她这样做的。但她从不把我当回事。她离开我去追求更高贵的东西，她心里是这样想的。”

杰罗姆没有吭声，只是带着新的目光看着哈里。他们并排地坐在陌生人的车里，约莫有十分钟彼此没有讲话。

然后，哈里抬起头说：“你可知道？我感到好受多了。”

“你应当把这些话说出来，尽管其中有些不是事实。”

“都是事实。全都一点不假。”

“真也好假也好，过几天就无所谓了。可怜的诺拉死了，她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不是你的错，我认为也不是她的错。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你很坚强，后来还干得很不错。”

过了一会，哈里说：“杰罗姆，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女儿？”

“想，可是我认为不应当这样做。”

哈里掏出钱包，摸来摸去，拿出一张小姑娘的照片。

“她多可爱，”杰罗姆说。

“她将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杰罗姆。她在上最好的学校，擅长音乐，我看，几乎无论什么都行。”

“她长得很漂亮，哈里。你一定为她感到骄傲。”

“你知道诺拉……琼如此漂亮，诺拉会……”

“为什么不痛快地说出来？”

哈里轻声地说：“诺拉的嫉妒心很强，她……”他收住话，盯着杰罗姆：“你没有权利叫我这样讲话。”

杰罗姆打开车门走出来：“我得走了，哈里。很高兴你找到了我。”

“我能不能再见到你？”

“也许。”

哈里坐在陌生人的车里，看着杰罗姆的背影远去。杰罗姆走路的颠簸比他记得的更加明显。

八

那一天过去了，除了模糊的一团黑之外什么也记不清。下一天也大同小异：往来医院一趟，胡乱吃了两餐不知味道的饭，喝了不少酒，借以浇愁镇痛。凯萨琳仍然不省人事，显然病情没有好转。下午睡了一觉，当我再次走出公寓，已经黄昏时候了，我依然疲倦，麻木不仁，几乎不知道身在何处，在干什么事。我钻进普罗诺沃斯特的出租车内，听见他询问我夫人的情况，在黄昏的余光里看见远山闪现出一抹绿色。普罗诺沃斯特向我保证说，真正暖和的天气已经来了，春天差不多就在眼前。他说，你只消用鼻子嗅嗅，就会闻出空气里的春天气息。

在医院楼下的询问台，我问莎莉是不是在那儿，他们说午饭后她来过又离开了，因为克里斯托弗大夫不许她进入她母亲的病房。

恐惧使我所有的感官都警觉起来：“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我们没收到有变化的报告，斯图尔特先生。”

这些该死的，我心里想，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什么。

我乘电梯上去，正要进凯萨琳的病房，一位特别护士出现了，她把一根指头放在唇边，招呼我跟她去日光室。我像坠

入了黑暗，抱着期待，怀着害怕，同时又希望被告知凯萨琳已经死了。我坐下，护士坐在我对面，我打量着她。即使在这时，我还是辨认出了她的外貌。她五十岁了，我记得她结了婚并安了家，凯萨琳前几次发病时，她护理过一次，当时我很喜欢她。看来她符合我对一个理想护士的概念。她受护士训练的年月，护士是加拿大最受尊重的妇女职业，同时加拿大的护士在世界上又被认为首屈一指。

她朝我温和地一笑，说道：“现在情况似乎有了起色。”

“开始有任何知觉了吗？”

“没有，可是现在我充满希望了。昨晚我感到毫无希望，但现在我抱希望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她的病房？”

她平静地回答：“斯图尔特先生，你绝不要介意，玛特尔大夫现正在她身边呢。”

我跳起身来，额角青筋直蹦。

“克里斯托弗大夫建议他进去的。”又是温和地一笑。
“他是我知道的最能干的医生。”

血直往头部涌，我感到即使杀人的事也干得出来。“克里斯托弗干嘛要把他卷进来？我没有请他当我们的医生，我们请的是克里斯托弗大夫。”

仍然带着护士般地温和平静，她说：“今天午饭，玛特尔大夫和克里斯托弗大夫一起商议过，他们这样做我很高兴。”富于女性的微微一笑。“你瞧，玛特尔大夫在这儿任职的时候，我曾经是这层楼的护士长。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他回来真是太好了。”

我瞅着她，心里粗暴地想：我的上帝，他是不是曾经同你睡过觉，你现在记起来了？但她的微笑里没有任何邪恶的成分，唯有令人放心的和蔼，绝对自信的神情。我记得杰罗姆在这儿工作时，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他在这儿作为一个医生出现，或者别的什么？”

“咱们就说他在这儿吧。”

“我现在就去看我的妻子，你反不反对？或者我非得等到玛特尔大夫离开她的时候？”

“完全可以去看你的妻子，斯图尔特先生。”

上次我去病房，房里有死亡的阴影。我知道这话难听，从科学的角度说来也不精确，但只得那样说，因为那里面不仅有死亡，还有对死亡的恐惧。

我沿着走廊下去，心里杀气腾腾。我憎恨他们俩——像恨杰罗姆那样恨凯萨琳。我也憎恨自己，憎恨人生。我走进病房，看见杰罗姆的身影在床的另一边，床上仍然是手术后的设施，杰罗姆背部弓着，两肩俯向前，面影靠近她的脸，右手指头轻轻地搭在她的右手腕上。我恨他，恨不得宰了他。他享受了她难得的几个好年头，然后扔下她，让我来收拾残局。他迫使我——他们俩都迫使我——不得不有这样的感受，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现在他又回到她的身边，目睹她的终结。清清楚楚——像人迎着电光闪亮——我仿佛看见杰罗姆双手端起步枪刺刀，凶神恶煞地将刺刀戳进一个金黄头发的德国兵的腹部。现在他回来了，蹲了许多年的集中营，挨打受饿，被人憎恶，伤害和折磨——现在他回到了她身边，看着她死了。他守在那儿活像一头秃鹫。

杰罗姆的面部抬了起来，看见我便站起身；我走上前

去，直端端地瞅着他的眼睛。突然我感到木然，莫名其妙。

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副表情。他的面孔显得苍白，布满皱纹，但纹路整齐有致，两眼大大的。整个面孔仿佛透明。眼睛的表情新奇，不可思议，好像阅历过一切，无所不知，尝尽艰辛。可是从他眼里投进我体内的是光明，而不是黑暗。那光温和冷静，进入我体内之后，杀气腾腾的情绪烟消了。我不再感到恐惧。杰罗姆的目光纹丝不动，把手伸过来，我握住了。经过这许多年，我们俩再次遇到一起，凯萨琳那弱小不动的身体夹在我们中间。

他平静地说：“咱们到外面去。”

我们一起到了日光室，坐了几分钟谁也没讲话；我仍然感受到他那神秘的力量，他投射的光明在我体内扩散。然后，我听见他用柔和的声音说：“她将逐渐好起来，乔治。”

他的额头上冒着汗，衬衫也湿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原以为他的穿着会和逃散人员一样，可是他的衣服却是标准的英国式；我记起来了，他回家之前曾在香港呆过一年。我从窗口望见城市的灯火，仰靠在椅上，像孩子般地感到疲倦，成年人很少有这种纯然困倦的感觉，这感觉往往出现在酣睡之前。

“你怎么知道她会逐渐好起来？”最后我问。

“乔治，我是这类病情的老手，相信我。”

“你是不是进行了什么新的处理？”

“当然没有。从医疗的意义上来说，杰克和安德鲁斯大夫已经做了可能的一切。”

我再一次对他面孔的透明感无限惊异。他上年纪了，他

的身躯比我记得的更消瘦，但比大多数五十二岁的人的体格更结实，仍然灵动强壮。他脸上闪烁着荷兰画家勃布兰特的一双眼睛。

“就在你进屋之前，”我听见他说，“我坐在那儿，感到死亡从我身旁挤过去离开了病房。”

我摇着头注视他，我站起身凝视他，他的表情仍然没有剧烈的变化，他脸上完全是一片宁静，充满绝对的自信。

“你是个医生，”我说，“却像这样讲话！那种说法该出自医生之口吗？”

他微微一笑：“乔治，回去看看她。你爱和她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会在这儿等到你回来。”

我进入病房时，护士站起身来，浆硬的衣服窸窸窣窣地响。我独自俯过身去，看见她心形的面孔惨白如纸，只有一点儿湿润，她的身躯似乎萎缩了，比一个小孩的身子还小。假若她还活着，只不过有一口气而已，因为她像死人躺在那儿，像是死了好几个小时。不过——我看见了——还有活的迹象，喉头处隐约有些动静。我像杰罗姆那样把着她的手腕，这时——由于没有警觉而吃了一惊——她的眼睛睁开了，只消一霎那工夫，她便认出了我。两眼又很快合上了，我仿佛看见一丝古怪的笑意。

护士在我背后轻声地说：“她现在不是没有知觉了，斯图尔特先生。她正在睡觉。”

能够睡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生命。

我走到窗边，望见蒙特利尔的一片灯海，然后闭上眼，回想起多次从这座医院俯瞰城区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也曾在这儿俯视过这片灯海。

我回到杰罗姆那儿，坐了好一段时间才开口讲话。

“你刚才和她一起有多久？”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

“你却说什么事也没有干？”

“无事可干，我只是呆在那儿。”

“她知不知道你在那儿？”

“我看那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从窗口凝望蒙特利尔城区的灯光火海。这时恐惧又回到我身上，一种完全的绝望使我更难忍受，由于有过一霎那的希望。

“这有什么用？”我凑向杰罗姆说。“这有什么意思？她还得再次经历这种事。别告诉我她的心脏有好转的希望。别对我撒谎，杰罗姆。别对我装模做样。”

他平静地说：“不，这以后她的心脏会更衰弱，比手术前更弱。但仍然足以使她经受下次手术。”

我呻吟着说：“不！不，她绝不能再经受另一次手术！”

“恐怕另一次手术是必要的，但不会在她强壮起来之前。这一次她太虚弱，安德鲁斯大夫未能按预计的完成。不过，下一次容易得多。”

我又呻吟了一声：“这还得延续多久？这样延续下去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让这可怜的女人一去了事？”

他凑过来，用手握住我的手腕：“乔治，这不是癌症。她会好起来的。”

“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多活几年。”

黑暗又一次降临，又在我四周嚎叫，我作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差不多被淹没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黑暗深处说：

“你恨不恨她？还要活两年！什么样的日子？充满痛苦、恐怖和悲哀。随时都可能再出现栓塞。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究竟是生活或是活受罪？”

他没有做声，我也沉默了一长段时间。可是我感到他在我跟前，力量再次注入我体内，我不感到那么昏暗了。

“你说的都是真话，乔治，”最后他说。“她的病况是根深蒂固的，一直如此，她心里一直明白。”

“你也清楚，”我朝他大声说。“你一直明白。”说着我又迸发出对他的仇视。“这是不是你扔下她出走的原因？”

他摇了摇头：“我不认为去西班牙是扔下她出走。”

“为了别的什么？告诉我——别的什么？”

他又奇怪地一笑，“实际上，我认为我做了你现在正打算做的事。我原是逃避自己，而不是她。”

然后，我意识到他愈来愈凑近我，虽然他坐着没动。突然，我仿佛感到他进入了 my 体内，变成了我自己，我开始头昏目眩，没有力气。

“今后的日子会像在原子弹威胁下的这个世界，”我仿佛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可是世界将会存在，”他又一次伸手握着我的手腕。

“你必须理解这点，乔治，因为我不相信你理解它，真地想理解它。瞧她吧，瞧她活下来的前景。在你目前的情形，你不能正视。”他停顿了一下。“可是她能。你明白吗，乔治，凯特想活下去。”

“我不相信她真想活。”

“毫无疑问，她的器官确实如此。”他又面带微笑。

“我从未见过这样顽强的器官。真的，乔治，她渴望生活，她必须活下去。她的生命尚未完结。无论你明不明白，她心里可是一清二楚。她希望绘更多的画。”他又停住，缓慢地若有所思地说：“假若必要，应当让她活到死期，她算是能够这样做的稀而又少的人。”

我凝视着蒙特利尔不变的奇特夜景，亮着灯光的劳伦斯河的弯曲的南岸，没有灯光闪亮的弯曲河道，一片灯海的城区——凝望着这一切，我感到身上最后的力气在消散，额头上冒出粒粒冷汗。

“屋里太热或是我出了什么毛病？我快昏倒了。”

我感到他双手扶在我的腋下，不一会我长瘫在沙发上，他守在我身边。

他轻声地说，声音里几乎带着哽噎。“乔治，你别再希望她死。”

我想坐起身来表示否认，可是没有力气。我声音微弱地说：“不，你一定得相信，我从来没有希望她死。有时我想她会这样认为，但这不是事实——我从来，从来没有希望她死。”

他平静地说：“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乔治。别太跟自己过不去。你以前没有盼她死。但你是谁？别人是怎么回事？为了让你发现自我，她必须活得更久一些。”

我背过身去像是没有父母照管的小孩，无依无靠。

“你一直待她很好，乔治，”我听见他说。

“不，还不够。”

“现在你必须学会宽容自己。”

“哦，杰罗姆，我太疲倦了，太疲倦了。”

过了一会，他说：“现在你毫无掩饰，露出了真相。无论是谁，忍耐都有限度，你终于发现了你的限度。用不着为此担心，你会恢复常态的。凯特将好起来，她会帮助你。”

“应该是我帮助她。”

“你一直在帮助她，还会继续帮助她。”然后他说：“仔细听我说，乔治。你太暴露了，必须学会在自己周围营造一层壳，像蜗牛那样，每隔一会儿又缩进壳去。在里面隐藏两天，你再出来就能正视一切。这些凯特都知道，从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起。”

我在沙发上慢慢地转过身子，他的面孔游入焦点，我再次感到他存在于我体内，他与我融为一体。

“周围营造一层壳？什么意思？”

“想想凯特是怎么做的。你觉察出了征兆，不是吗？她老这样做。当她潜入自身的几天，你觉得自己对她来说像不存在似的，你为此气愤过，不是吗？我明白自己的体验。你恐慌，感到被人置之度外，你气愤她，到后来却又因为气愤过她而惭愧。”一顿，又是奇怪的一笑：“难道不是吗？”

我又感到开始冒冷汗，于是说：“我已尽力而为，不遗余力，筋疲力尽了。”接着我低声说：“是的，你说的一点不假。一层壳——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突然他的面孔变得清澈透明，两眼洞察一切，像荷兰画家伦布兰特的眼睛，他说话简洁明了。

“死亡。那层壳就是死亡。你必须缩进死亡的壳，自行

灭亡。你必须失去自己的生命，又把它找回来。”

“你在胡说些什么？”

“当情况变得不可忍受——对你来说现在的情况就难以忍受——你必须在自己体内休息。你的灵魂使身躯反抗你觉得必须忍耐的东西。只有面对死亡，你才可能活下去。然后你蔑视它，你得对自己说，真心实意地说：‘她死与不死有什么关系？我要是死了有什么要紧？假若我丢了脸有什么难为情？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益有什么了不起？’你必须说这些话，而且深信不疑。那么，你便会生存。”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但是冷汗不再冒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神经不再叫喊了；我照样躺着，但房间和杰罗姆却仍处于焦点上；我照样躺着，可是我不再陷于黑暗。

“你知道，乔治，我已经历了这一切，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无数人同我一样。我们大家实际上都与别的人一样，这正是我们令人惊骇之处。我们多么渴望具有自身的特性，可是一旦我们发现自己与每个人无异，人人都将自危。这时就该是你龟缩自毙的时候。设想你的一生不曾虚掷，设想你已被人毁掉，那么，死亡将无足轻重。那时，恐惧会自行消失，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在波兰的集中营——奥斯威辛从一个犹太先生那儿学来的，知道如何作基督教徒。”

我仍然躺着不动，很长一段时间什么话也不说。他没有接触我，只是坐在一旁。现在我觉得他不再是我，预感到几分钟之后就会恢复自我。

“那么，我害怕的是死亡？”我停了一下，费了不少劲才挤出这几个字：“不是她的死亡，而是我的？”

他朝我微笑：“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害怕的绝

不是死亡，而是生活。”

他这样说，我大吃了一惊：不是由于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这话说出的神秘力量，在我听来仿佛那是难得的金玉良言。在这之前我曾对自己说过，也许我害怕生活。这是一句陈词滥调——害怕生活，现在我注视着他，明白这不只是陈词滥调而已。

“不是和她一起的生活，乔治，而是没有她的生活。”

我转过头，低声地说：“是的。”

“你和她结婚为了生活安稳，我也一样，大多数人都如此——为生活安稳而结婚。是的，我不想否认。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缓慢死去，可是她却在迅速死亡。让她一直活到死亡的时刻，不去为你担心，不牵挂你今后的遭遇。迄今为止，你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她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帮过她，那以后全是你照料她了。与此同时，她照顾了我们两人。我想，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我曾经离开，逃避自己，把从前的我毁了，差不多把她也给毁了。可是你不必重蹈覆辙。我后悔已晚，而你借鉴不迟。”

他仿佛在离开我，从我体内出来，离我慢慢远了。我有了些力气，坐起来背对着他，眺望眼前的城市，城市的广阔全景——她会活着，重又见到这景色，热爱这景色。

然后，我忆起我们一块儿见过做过的许多往事：乡下的花圃，春天初吐的绿芽，秋日湖面的宁静。我想到在她心里酝酿着的画面。我记起她漫长不息的斗争，记起她充满感激的神情，每当她的生命承受打击之后又得以继续生活的时候。我想到莎莉，盼望她来到这儿。她必须再次见到杰罗姆，杰罗姆也必须见到她。莎莉和这个不同于过去的杰罗姆

不会闹别扭的。她应当见他，很有必要，绝对正确。一旦见到他，她就会明白自己是他的女儿。孩子时的杰罗姆掠过脑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驾着独木舟在夜里沿河而下，直抵大海。他是谁？我记得这问题曾令他十分烦恼。我也记得十一月那个令人惊异的下午，在劳伦琴的湖面上，他一边划桨，一边告诉我他的身世：‘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说。现在我也不比他更清楚自己是谁。姓氏名字有什么要紧？名门子弟有什么稀奇？人们几乎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们。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除非我们每个人同时也有自我存在，那是无法容忍的。什么是奋斗的价值？如何用普通的尺度去衡量这类大事？梵高^①在疯狂绝望的状况独自绘画，一生中只卖出过一幅画。成千上万的人在孤苦地奋斗，不为人知，英勇奋斗不下于任何大名鼎鼎的英雄。毫无价值吗？我认为是的。

听见杰罗姆在我背后说：“耶稣说过，‘我既是生命的复活也是生命本身。’他以死来证实自己的话，又用复活来证实。他的精神复活了。他死是为了生。假如他没有死去，便不会有复活的一天。”长时间的沉默。“凯特将活下去，你也一样。”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隔了一会我离开他，走进凯萨琳的病房。护士面带笑容地迎上来。

“她睡得恬静极了，”她说。

“克里斯托弗大夫来看过她没有？”

“他这会儿随时都可能来，但不要紧。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儿了，斯图尔特先生。绝对没有。她即将好起

^①梵高（1853—1890） 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

来，我向你保证。”

我回到日光室，发现他的姿态同先前我离开时没有改变。但我差不多立即明白，他与我刚才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他已经脱离了我，彻底脱离，这种感觉非常离奇。一会儿之前他与**我**融为一体，此刻他是**他**我是**我**，像两个陌生人。面对这种变化，我们两人都忽然拘谨客套起来。

“你将在城里呆一段时间吗？”我问他。

他摇摇头说：“不，几天内就要离开。你记不记得阿瑟·拉任彼？不知怎么回事，他查觉了我的行踪，早上从渥太华给我来了个电话。他正在西部为我找工作——也许是在北部。那儿似乎在修建一座新城市，需要医生。我的一双手”——他伸了出来，我第一次看见那些裂开的指头——

“不再能进行复杂的手术，但日常手术没问题，而且我还能干活。我不会再回这儿来了，乔治。”

听他这样说，我有些孤独之感，但并不害怕孤独。

我对他说：“你走之前必须见见莎莉。她很可爱。我猜她今年就会结婚。”

他面带喜色地说：“好，如果她愿意见我，我要见见她。凯特说我应当这样做。”

“你仍然是她的父亲，杰罗姆。”

“不错仍然是她的父亲。”又是微微一笑，他伸出手说：“再见，乔治。”

“再见，杰罗姆。”

我和他分手后从电梯来到底楼，我见到杰克·克里斯托弗，他正在和凯萨琳所在楼层的护士长打电话，他笔直对称的嘴角溢出温和的微笑，自我认识他以来，这是第一次觉得

他比我年轻些。

“见到他了吗？”他问，声音里带着焦急不安的成份。

“是的，见到了。他还在楼上。”

杰克还是那副温和的神气：“乔治，听我说，你对此不会介意，是吗？”

“没什么。”

“他依然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他和我联系上了——嗯，我们商讨了一下。比他更懂科学的人为数不少，而他又许久没摸这一行——可是他却仍然保持着那神秘的功能，乔治，而且本事比以往更强。但别叫我作解释。”

“不叫你解释。我知道他有本事。不过他告诉我，他没有做任何事。”

“当然没有。”杰克恢复了职业习惯。“医疗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可做的事儿。可是我同样很高兴，他今天下午和她呆在一起。”

“我也一样。”

“太好了，她即将恢复健康。我没有——”杰克心里有些内疚，但这种心情的流露令人很窘，也会伤害他的职业尊严，说着他便转身进入电梯。我也乐意他这样走开。

新奇的现象开始在我身上发生。当我走出室外，踏上通往城市的车道，我心里仿佛被照得亮亮堂堂。天气更加暖和，山边岩前，冰雪消融，汇成淙淙有声的涓涓细流。普罗诺沃斯特说得对：冬天接近尾声。随着春天声息的到来，今夜多美，除了在这片春天已到、冰雪犹存的北国大地，哪儿能找上比这更纯洁，更清冷、更新鲜的春天？柔和的空气像健康的童年一样甘美，夜空清明，映照着我疲惫的身子。我

自十岁以来，还不曾见到这般迷人的夜空，我记得它的魅力，几乎感动得掉泪。内心里连日来的混沌消失了，我的心境像一片山青水秀的原野，迷雾散去，明月显露出来，远近山野轮廓分明，恬淡宁静。整个城区也光彩夺目，隐约有声，这可闻的声音，闪烁摇曳的灯火，仿佛要包容地上所有的声响和晴朗的天空，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当我沿着从罗亚尔山岩开凿出来的那条熟悉的街道行走，旁边是灯光炫目的城区，头顶上是皎洁明亮的夜空，我心中充满音乐，全身似乎成了音乐和光明的融合体。这时我明白她自幼坚持追求的东西不是没有意义，她并不是掉下陷阱的老鼠，她激发的爱情没有令彼此成为陌路人，不会消亡，也不会收敛，而会化作神秘的精神，四面八方地向空间扩散。我走回家里，发现莎莉在家，亲吻了她的额头，告诉她一切都好。然后，带着充满心中的音乐，巴赫的乐曲，沉入了酣睡，一动不动地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醒来看见墙头凯萨琳的绘画，色彩欢快，她作画时的乐趣也成了我的欢乐。

尾 声

我可以到此结束，因为故事讲完了。但假如读者曾经被人循循领进这个故事，我想也该有头有尾地领他出来。

正如杰罗姆所料，凯萨琳经历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在三月中旬进行，她又一次像斗士般接受了挑战。安德鲁斯大夫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作了一次漂亮的手术，手术后她恢复之快，我们大家都很吃惊。又是杰罗姆说对了：她一定会活着，因为她的生命尚未结束。

在漫长的下午，当最后的积雪在山坡上融化，松鼠在发黄的枯草地上搜索，阳光斜照在白色的桦树枝头，斑驳的阴影映在蓝色的岩石上，野雉偶尔展开艳丽的羽毛，飞翔在这树石杂陈的景色上空——面对这片景象，凯萨琳好起来了，消瘦的脸上又有了红润，残损的身体又有了一些力气，心间又升起了欢乐。当她还躺在病床上，已经开始勾勒草图，准备一旦有力气站立便动手挥动画笔。种子目录寄来了，她列出一旦去乡间就要栽种的菜蔬和其它年生植物。复活节过后不久，她出院回家了，我们便到了乡间住地，正赶上蝴蝶花开放。

这时我们一起生活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凯萨琳绝不会再有一个健康女人的相貌和生命。她身上的曲线轮廓模糊不见了，看起来瘦小而又虚弱，轻得像薄纱。她的心脏更加衰弱，开始难以执行为其它器官担负的职能。杰罗姆说的那句奇妙的话：“必须让她一直活到死期。”现在她正这样做。她脸上安详静谧的表情，我以前只偶尔能观察到，现在经常可见。她的五官单独看来的确枯槁，但她的面容在我眼里同往日一样美丽。她的面孔同杰罗姆的一样，甚至变得更为晶莹透明，人们几乎会认为看见了某种精神。它闪烁在那里，从中迸射出来，不断地射入我的体内。

日常生活的可爱节奏恢复了，我们又一道观看景色，一起静听声响，共同领略芬芳。夏日的早上，小猫在太阳坝戏耍，我们坐在一旁喝咖啡。六月，我们的花园艳丽芬芳，开放着红芙蓉、牡丹花和玫瑰花。接着是七月，我们周围的原野开遍了形形色色的野花。她头上仍悬着一柄利剑，正像世界生活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下。可是她活着，而那个夏天是我们在

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最充实的日子。我常常见她坐在画架前——她现在能作画了——面带喜色，安详沉静，眼睛比她小时候还年轻，终于进入了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我看着她绘画，心里不禁感到阵阵悲痛，知道她没有时间为后世留下足够的作品，令人记住她；可是到夏末，我把这个想法撇在一边了。她用不着抱什么雄心壮志，作画只是她因为喜欢画而已。她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神情，她会见朋友，甚至还为他们举办了几次招待会。她的幽默感变得意味隽永，带着感激之情，似乎开个玩笑也值得感激。感激——这是那个夏天她最常表露的感情。

一切都神秘莫测。

当凯萨琳明显地日益接近大限之期，我不想冒昧地描写她的面部表情。这时见过她的人会经久不忘。她显得清澈透明，比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但大多数时间又仿佛身在别处，像从不可抵达的地方回来探望我们。她活着却又缺乏活力，肉体在世精神却在升天。

乌云掠过天空，大雨冲洗乡间花圃，月亮照在湖面和山坡，蝉虫在八月的草丛嘶鸣，男女青年相互恋爱。那年的十月初，在魁北克的小阳春天气里，湖面倒映着如火如荼的枫叶，我突然想到，能够沉溺于我们周围大自然的奥秘，可谓人生在世的最后而又唯一的享受。除此之外，到头来还有什么？我们终生念念不忘地追求比自身更远大的目标，现在除了顺应生活和命运的模式外，我们心里明白，无所依傍。可能会依附于上帝吧。我谨慎地使用这个被滥用的字眼，可是我坦白说，至少我意识到了他的力量。我不明白精神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存在着。生命是一项赐与，现在我明白了。

她也明白，而且更深有感受。

雨后的一个傍晚，落霞满天，凯萨琳隔着游廊望着我说：“你知道，我这辈子幸运极了。我简直闹不清究竟有多幸运，而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幸运。”

我们之间愈来愈缄默。莎莉走后仿佛要说的话早说光了，没有必要说更多的话。我们看够了人生。它的目的吗？回答不上这个问题似乎没多要紧。我们的过去没有死，可是现在正淹没过去，正如将来会淹没现在一样，直到那个时辰到来，我们俩都知道它会很快到来——当她逝去，我被留下。

我知道，谁也不能预知大限来临之际她会作何感想。我常常惧怕这个时刻，对这种厄运总是嫌恶。但是接近夏末，我几乎不再考虑未来的事了，而她更是将它完全置之度外。想着这些年来她苦苦挣扎，从痛苦和疲乏中攫取欢乐和生命，我从心底里感到这场苦斗不是没有价值。有时我极力设想她去了之后会是怎样的情形，使自己在思想上作为接受孤独的准备。但这样做不可能。杰罗姆以他令人难解的智慧和本领给了我陪她活到死的能力，为此我心里很感激她。即使只有少数人欣赏她的画又有什么关系？时间的海洋将她淹没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大家都不例外。天国正像一个人进入一个遥远的国度，他召来自己的仆人，把财产分给他们。按能分配，给第一个仆人五份，第二个两份，第三个一份。然后他迳自去旅行……于是上帝说，干得不错，你这好心的诚实的仆人，你在几件事上都表现出了诚实的品质，我将指定你为统治者，统治许多人。你将领略上帝的欢乐。

到了最后，凯萨琳的情形就是这样，她脸上的表情我只

能描绘为上帝的欢乐。我知道她溢出的光辉将与我长随。我相信，虽然必须到那时才知道，我将能够全心全意地说：愿你安息长眠。我周围的世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一团，我却比以往更爱它，她也和我一样。正是在这团阴影里，政治的混乱为我提供了赖以谋生的工作，虽然政治本身显得最不真实。

不再说了。到了她的大限之期，我将独自生活，到了祈祷的时候，我知道她希望得到的回答是：在我心中安息。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长夜漫漫

作者 = (加拿大) 休·麦克伦南著蓝仁哲译

页数 = 4 2 6

S S 号 = 1 0 3 3 8 7 9 7

出版日期 = 1 9 8 7 年 0 7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二部分	一
	二
	三
	四
第三部分	一
	二
第四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五部分	一
第六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七部分

十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尾声